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斯大林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作者前言

被称为“二次大战三巨头”的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虽然政治信仰不同，各自的经历不同，但是在反对法西斯侵略、保卫国家独立的总目标下，他们团结起来了，结成了统一战线，为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们不会忘记，在那法西斯强盗横行的年代，西方资产阶级当权派摇尾乞怜，奉行绥靖政策，因而使希特勒更加肆无忌惮，在他兵不血刃地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又以“闪电战”征服了波兰和北欧，接着希特勒就向英法开刀了。号称几百万的英法联军，在纳粹进攻面前仅 11 天就垮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不足一个星期也相继沦陷。大半个欧洲处于法西斯铁蹄蹂躏之下，像一只风雨飘摇的破船。人们普遍担心，欧洲要有一个新的漫长的黑暗时代。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是斯大林率领苏联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歼灭了德国法西斯的主力，从而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军民的最高统帅，而且为促进和巩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了大量工作。由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参加的德黑兰“三巨头”会议，为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的美国，处于另外一种情况，它没有直接遭受希特勒法西斯的入侵，和平主义弥漫全国。作为总统和三军总司令的罗斯福，最大的历史功绩之一是，以惊人的魄力冲破了孤立主义的束缚，以“租借法案”的形式有力地支援了英、苏等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在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又毅然决然地同德、日、意法西斯宣战，从而成为反法西斯联盟的重要支柱之一。他领导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英、苏等 20 多个国家结成反法西斯大同盟。他以半身不遂的病残之躯，不远万里，远渡重洋，和盟国首脑多次会晤，运筹帷幄，为打败德意日法西斯费尽了心血。难怪有人说，罗斯福不仅是美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统，而且也是最有威望的总统之一。

丘吉尔的情况和斯大林、罗斯福都不同，他是“临危受命”，是在张伯伦的绥靖政策遭到彻底破产之后上台执政的。当时，他面临的局势确实是严峻的，上台没有几天，就遇上敦刻尔克的大溃退。顷刻之间英国的防务解体了，可以说要人没人，要武器没武器。就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施政演说，表示无论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底。他说：“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你们问：我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丘吉尔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有力地鼓舞了英国人民，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使英国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成员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先后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 亿以上的人口卷入了这场战争。交战双方动员的兵力为 1.1 亿多，历时 6 年之久，战火遍及欧、亚、非三大洲，以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四大洋。战争造成的伤亡和损失难于作出确切的统计，军队和平民的伤亡约在 9000 万人以上，其中以中国和苏联伤亡人数为最多。军费消耗约为 11170 亿美元，经济损失估计超过 4 万多亿美元。战火夷平了众多的城市，

毁坏了无数的工厂、住宅，铁路、桥梁，以及无数的博物馆和名胜古迹。多少个世纪以来，人类在艺术和学术上的成就或遭到毁灭，或蒙受了巨大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浩劫！

如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 40 多年了，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参加德黑兰三巨头会议的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都逝去多年了。最后去世的是丘吉尔，他活到了 90 岁，1965 年隆重地安葬在英国他自己的庄园里，当时他离开政界已有 10 余年了。罗斯福死于 1945 年 4 月，正值希特勒德国投降前夕。斯大林比罗斯福多活了 8 年不到一点。而他们三人在德黑兰会晤时，都是反希特勒同盟国的首脑。那时深受前所未有的战争折磨的世界人民都密切注视着“三巨头”的每一行动，倾听着他们的每一句话。因此，德黑兰会议的召开自然吸引了全人类的注意力。那时不仅深受蹂躏的欧洲各国期待着“三巨头”首次会晤时要作出的决定，轴心国也惴惴不安地等待着该三国会议的结果。反希特勒同盟“三巨头”是否善于协同动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和当时文明世界的命运。

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50 周年，为了表彰“三巨头”的历史功绩，促进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和相互合作，笔者根据 20 多年来搜集的有关苏美英三国首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各种史料，编写了“二次大战三巨头”。在撰写过程中，笔者曾和一些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学者进行过广泛的交谈，力求避免片面性，力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表述；但由于笔者政治水平和历史知识的局限，难免有不妥或错误之处，敬请读者赐教。

解力夫
1987 年国庆前夕于北京

出版说明

为了纪念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 50 周年,使广大人民了解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业绩,我们特此再版《二次大战三巨头》,这是我社已经出版的《二次大战三元凶》的姊妹篇。本书内容丰富,材料翔实,生动地描述了“三巨头”,在决定人类命运的这一伟大战争中叱咤风云、运筹帷幄的情况,同时也描写了他们之间存在的矛盾和斗争。

本书是用章回体形式撰写的,全书近百万字,共分 3 册。

第一册为:《纵横捭阖——斯大林》;

第二册为:《身残志坚——罗斯福》;

第三册为:《临危受命——丘吉尔》。

纵横捭阖 斯大林

第一章 鞋匠的儿子

斯氏出生贫寒家，世世代代受欺压；
从小立下英雄志，格鲁吉亚众人夸。

约瑟夫·斯大林的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他的父亲维萨里昂是一个鞋匠。维萨里昂的双亲祖祖辈辈都是农奴，对维萨里昂来说，农奴的解放意味着他可以凭做鞋养家。

1870年前后，年轻的维萨里昂来到哥里镇，1874年与邻村一家农奴的女儿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格拉泽结了婚。妻子当时大约18岁，比大夫小5岁。夫妇俩都是格鲁吉亚少数民族的下层劳动人民，因家贫失学，目不识丁。他们的家就安在哥里大教堂附近一所大约15平方英尺的小屋里。

这所房子只有一个窗户，光线暗淡。屋里摆着一张小桌子，四张凳子，一个放着一把茶炊的小碗橱，一面镜子，一只存放衣物的箱子，以及铺着草垫子的木板床。叶卡捷琳娜在这所房子里生了三个孩子，但不幸都夭亡了。1879年12月21日生下的第四个孩子就是斯大林。父母给他起的名字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后来参加革命后改为约瑟夫·斯大林。父母把这个独子视为掌上明珠，尤其是母亲，把一腔爱和心血完全倾注在约瑟夫身上，盼儿子早日长大成人。

当时古老的城镇哥里在格鲁吉亚还算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它坐落在水流湍急的库拉河河畔，群山环抱，距第比利斯76公里。这里有葡萄园、麦田和果园。哥里是古希腊人所说的科尔吉斯州的一部分，据希腊神话传说，忒萨利亚王子伊阿宋曾率领亚尔古的英雄们来这里寻找金羊毛。在这种田园般的环境中，穷鞋匠的儿子约瑟夫度过了他的童年生涯。

在斯大林的童年生活中，母亲叶卡捷琳娜占有支配地位。母亲同父亲一样只会说格鲁吉亚语。由于穷困，父亲经常以酒解愁，把挣来的为数不多的钱大都买酒喝了。母亲只得日以继夜拼命干活，勉强养家糊口。她为人家洗衣服，烤面包，收拾屋子，缝制衣服，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儿子免受饥寒。

叶卡捷琳娜是个虔诚的教徒，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她决定让约瑟夫长大了当传教士。农奴的解放，使得神学院为农民的孩子敞开了大门。按规定，一个传教士可以结婚，掌管某个教区，进而可以步步高升，在替上帝效力的同时，可以享受到未曾梦想过的安逸生活。这就是母亲的心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无冬无夏地干活。

1888年秋，斯大林进哥里镇教会小学读书。母亲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当清洁工。当时，斯大林只能说格鲁吉亚语，她督促儿子学习俄语，这是传教士所必须学会的语言。叶卡捷琳娜还为儿子申请到了每月3个卢布的助学金。她在学校当清洁工还能挣10个卢布。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她与约瑟夫在学校度过了5年。后来，有两件事情几乎使她望子成龙的心愿落空。斯大林在8岁那年得了天花，病情严重。但他那坚实的体格使他终于熬过来了，只是脸上永远留下了很深的麻子。另一件事是她丈夫的反对，他一定要让孩子去学做鞋的手艺。“你想让我的儿子当神父，作教堂官，是不是？”他吼道，“你一辈子休想！我是个鞋匠，我儿子将来和我一样，也是个鞋匠！”大概在1889年，有一天，维萨里昂硬把儿子带到第比利斯的阿杰尔哈诺夫的工厂。于是家里便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的妻子和邻居百般劝阻，可是他不改初衷，硬是要儿子到制鞋厂学手艺。只是到1890年，父亲在一次酗酒打架

中被人用刀子捅死后，斯大林才又按着母亲的意志回到了学校。父亲的惨死，给斯大林幼小的心灵打下了一个痛苦的烙印。

斯大林热爱自己的母亲，称赞她“精明能干”。他也钦佩母亲的善良、正直。斯大林曾劝母亲搬到莫斯科居住，怕她晚年生活孤独。她在克里姆林宫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但是，她觉得这里与她原来的生活变化太大了，就又回到格鲁吉亚去过那恬静而又熟悉的生活。

1936年，斯大林的母亲去世了，终年大约80岁。去世前不久，她对守在病榻旁的儿子说：“你没有当上神父，真可惜！”

却说斯大林回到哥里教会学校后，按着母亲的嘱咐，更加刻苦用功。他争强好胜，加上天禀聪颖，记忆力非凡，因此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1894年6月，他怀揣一张考试优等证书，离开了学校。当时他才14岁。校方保送他到第比利斯神学院学习。神父们无疑知道他是贫家子弟，他的父亲因酗酒闹事致死，因此这一保送标志着肯定他的才能，相信他前程远大。

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是座古城，位于格鲁吉亚西部地区，气候炎热，风沙弥漫。这里有宽阔的广场和大街，从广场和大街伸展开去，是狭窄的曲曲弯弯的街道，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平顶房和集市。在喧闹的集市上，从土耳其和波斯来的商人以及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摩肩接踵，讨价还价之声不绝。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比利斯的人口有15万多，主要是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第比利斯是沙皇派来的总督的驻地，外高加索政府所在地，人们操着各种民族语言，熙来攘往，人声嘈杂。俄国沙皇政府看到外高加索作为边境地区的重要性，修筑了一条军用公路，加强防御。但这个地区随着石油和采矿业的迅速发展，开始具有新的经济意义。1867年，铺设了一条从第比利斯到黑海的铁路线，这条线路不久又从第比利斯延伸到黑海石油城巴库。

对年仅14岁的斯大林来说，从哥里搬到这个喧闹的城市，开始很不习惯。过去，他一直住在家里，得到母亲的体贴关怀；如今，他孑然一人生活在陌生的环境里。儿子负笈远去，叶卡捷琳娜也觉得孤单，但她引以自豪的是，他的儿子进了第比利斯神学院。这个学院在信奉东正教的格鲁吉亚人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看成是他们的最高学府。第比利斯神学院，后改为正教中学，它与俄罗斯帝国其他地区的神学院一样，其宗旨不仅要对学生进行教育，而且还要训练学生过宗教生活。但是，19世纪下半叶，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席卷欧洲。在俄国，神学院的革命运动也在发展。

当时俄国由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思想也迅速传播起来。由列宁组织和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大大推进了全国各地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南高加索原是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区，还保存着许多农奴制的残余，这时工人运动浪潮也波及这里，因为这里资本主义势力已经侵入，加上民族压迫也十分厉害。

19世纪最后的25年间，由外资占主要地位的石油工业和采矿工业在南高加索迅速发展起来。“于是，”列宁当时写道，“俄国资本主义把高加索卷入了世界贸易范围，消除了它那些带地方性的特点，即旧时宗法闭塞状态的遗迹，而为自己的工厂创立了市场。这个区域在资本主义侵入初期，人口尚属稀少，其土著山民本与世界经济隔绝，甚至是与历史无关的，而现在这里却已经是石油企业家、酒业商人、小麦厂主和烟草厂主麇集之区了。”自从高加索有了铁路和出现了第一批工厂，工人阶级也跟着出现了。尤其是石

油出产丰富的巴库发展得非常迅速，竟成了高加索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巨大中心。

19世纪90年代，流放到南高加索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此地开展革命工作。于是，在南高加索一带便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当时，第比利斯神学院是在青年中间培植各种解放运动思想的苗圃，其中既有民粹民族主义思想，又有马克思国际主义思想。这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秘密小组。神学院里所厉行的阴险毒辣的校规，引起了斯大林的激烈反抗，助长和加强了他的革命情绪。

约瑟夫·斯大林被录取时，第比利斯神学院已经变成一个反对俄国当局的中心。

1885年，一个名叫西尔韦斯特·季布拉泽的学生，由于袭击了曾说过格鲁吉亚语是“狗语”的院长丘杰茨基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次年，丘杰茨基被另一个学生暗杀了。

1890年3月，学生举行为期一周的罢课。警察关闭了学院，87名学生被开除。

斯大林入学时，神学院院长是个俄国修道士，名叫格尔莫格尼斯，学监阿巴希泽是格鲁吉亚人，一心想得到俄国当局的提拔，害怕学生的造反精神。他们对学生严加管制，时时刻刻盯着学生，探听学生的活动情况，经常检查宿舍。学校变成了一座大监狱。早晨7点全体学生集中到礼拜堂做长时间的东正教祈祷。白天，上课和祈祷交替进行。学生只有得到特殊允许才可以在课后外出两个小时，但必须在下午5点校门关闭以前返校。校纪森严。学生一个小过失就要受到在地下室的一间小黑屋子里关禁闭的处分。修道士的迫害，低劣的饭食，以及缺少新鲜空气和运动，使不少学生身心健康受到损害。这套反动校规，引起了斯大林强烈的愤恨。

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理，这个时期斯大林读书的范围更加广泛了。他读的作品不仅有格鲁吉亚诗歌，也有俄罗斯和西方的经典著作。果戈里、谢德林、契河夫和托尔斯泰都是他喜欢的俄罗斯作家。他阅读巴尔扎克、雨果、萨克雷作品的译本，萨克雷的《名利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爱看历史、经济和生物学方面的书籍。在他阅读的书籍中，对他思想影响较大的有达尔文的《人类的起源》，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巴克尔的《英格兰文明史》，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勒图努的《民族文学发展史》和门捷列夫的《化学》等。对一个年轻的神学院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读书活动。这些书籍使斯大林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当一位同学提到上帝时，斯大林就打断他的话说：“你知道，他们在欺骗我们。根本没有什么上帝，我借一本书给你读一读，它会告诉你，这个世界和一切生物与你想象的有很大不同，关于上帝的话全是胡说八道。”

斯大林除了对启迪思想的政治书籍感兴趣外，还对民间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格鲁吉亚历史上充满了传奇故事，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约瑟夫被格鲁吉亚传奇英雄们迷住了。他读了肖泰·鲁斯塔维里的名著《豹皮武士》，但是给他印象最深的则是卡兹别吉写的绿林好汉柯巴的故事。他用“柯巴”作自己的绰号；后来这个绰号干脆成了他经常使用的名字，直到1910年前后，他开始自称柯巴·斯大林，最后才改为约瑟夫·斯大林。

斯大林感情奔放，在激情之下也写过一些诗文。

1893年下半年发表过五首诗，次年发表了第六首。这些诗带有浪漫色

彩，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他有一首诗是纪念格鲁吉亚著名诗人拉斐尔·叶里斯塔维的。他在诗中表现出对祖国强烈的爱。另一首特别引人注目的诗名叫《致月亮》，这是一首热情奔放的抒情诗，歌颂为反抗外国压迫者而牺牲的格鲁吉亚烈士们。

对约瑟夫·斯大林来说，这个时期，他虽然失去了对东正教的信仰，但在纷乱的政治派别中，他还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萨沙·楚鲁吉泽和拉多·凯茨霍维利的年纪都大于约瑟夫，他们才华超群，这个时期对他的影响最大。他们是19世纪末叶俄国涌现出来的一批出类拔萃的革命青年。这些人勇敢，富于理想，事业心强，他们极端仇视旧社会，强烈主张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楚鲁吉泽出身于皇族家庭，是个有文学才干的知识分子。他投身革命事业，用格鲁吉亚文为《沟》和《伊比利亚》这两家大型刊物撰稿，大力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

1905年6月他患肺病去世。当时所有的格鲁吉亚革命者都参加了他的葬礼，结果变成了一次群众性的游行示威。约瑟夫把楚鲁吉泽的文章收集成册，于1927年出版，作为对朋友的悼念。拉多·凯茨霍维利的性格与楚鲁吉泽大不相同。楚鲁吉泽是个热情奔放的知识分子，而凯茨霍维利是个不知疲倦、富有事业心的实干家。凯茨霍维利也在哥里教会学校和第比利斯神学院上过学，然后开始了革命生涯。1893年12月神学院发生的轰动一时的罢课之后，他到了基辅，在那里被捕，坐了3个月的牢，出狱后一直受到警察的监视。

1897年，他回到第比利斯，以巨大的热情从事革命地下工作。这两位年轻的革命者激发了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从而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斯大林在1931年与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谈话中说道：“我参加革命运动是从15岁起，当时我和居住在南高加索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成立的一些秘密小组发生了联系。这些小组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引起了读马克思主义秘密刊物的兴趣。”

路德维希问道：“是什么力量把你推向了反抗的方面呢？是因为双亲的虐待吗？”斯大林回答说：“不是的。我的父母是没有学问的人，但他们对我却非常好。是另外一回事，是我当时在那里求学的那个神学院的反动校规，和贫富不均、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使我成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真正革命学说的拥护者。”

当时俄国已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代。列宁已在彼得堡展开了革命活动。

1894年列宁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名著《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一光辉著作对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阶级力量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无产阶级解放之路。这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激起了年轻的斯大林要求革命的愿望，他准备献身于革命，决心为争取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从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斗争。这些革命情绪反映在斯大林在神学院期间所写的诗篇里。斯大林在他的诗作中吐露了他对于从压迫和剥削中把劳动者解放出来的憧憬，相信人民必会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一定会胜利。

1896年至1898年，斯大林成了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领导骨干。他向大家讲解达尔文学说，举行关于历史、政治经济学的座谈会。组员们还

对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以及其他作家的古典文艺作品进行热烈的讨论。在斯大林这个小组里，还根据手抄本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为反对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而写的一些著作。学习小组并根据斯大林的倡议，组织了手稿杂志的出版。血气方刚的青年朋友们在这个杂志上撰文抨击专制制度及其对劳动者的压迫和残酷剥削。斯大林尤其喜欢列宁关于俄国局势的分析，他说：“我无论如何都要见见他。”

1898年8月，在当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介绍下，斯大林参加了“麦撒墨达西社”，这是格鲁吉亚的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从1893年至1898年，这个小组在格鲁吉亚和南高加索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事业上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麦撒墨达西社”的性质在政治上并不是统一的，多数社员是站在“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使马克思主义适应资产阶级的要求，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并倾向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斯大林与自1895年参加该社的楚鲁吉泽和1897年参加该社的凯茨霍维利三人，是在“麦撒墨达西社”中占少数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核心，这个核心便是格鲁吉亚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派的萌芽。

斯大林加入麦撒墨达西革命组织之后，更加意气风发，除了领导神学院马克思主义小组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还在工人群众中进行革命活动，参加秘密工人会议，写传单，组织罢工。这是斯大林在第比里斯先进无产者中间所受到的第一次革命实际工作的锻炼。

1926年，斯大林向第比里斯铁路工厂的工人演讲时回忆道：“我记得，在1898年，那时我第一次指导了一个铁路工厂的工人小组。这是28年前的事情了。我记得，在斯笃鲁阿同志住宅里，有吉波拉则、乔德里施维里、齐赫芝、宁鲁阿以及第比里斯的其他先进工人在场，我是怎样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初步实际工作的教益。与这些同志们比起来，我那时候还是一个青年人。也许那时我比这些同志中许多人读的书要多一点。但是，我作为一个实际工作者，在当时毫无疑问是一个刚刚开始工作的人。当时在这里，在这些同志中间，我受到了第一次革命战斗的洗礼。在这里，在这些同志中间，我那时是一个革命的学生。现在你们大家都见到了，第比里斯的工人是我最初的教师。”

由于斯大林经常在工人和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1899年5月29日，学院委员会把他开除了。这对斯大林来说无疑是个打击，不过他从此更加自由了，便一心一意投身到以革命为职业的生涯中去，成了革命的“柯巴”。正是：囚鸟出笼更欢唱，高温烈火宜炼钢。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章 投身革命

革命“柯巴”英雄胆，推翻沙皇发誓言；

披荆斩棘无所惧，敢教日月换新天。

约瑟夫·斯大林在离开神学院的时候，他的造反精神有所发展，产生了试向沙皇政权挑战并摧毁这个政权的强烈欲望。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学说，如饥似渴地阅读他能弄到的各种革命材料，同具有革命精神的人广泛交谈。但是，他一时还找不到他所需要的那种指导和答案。当时在俄国，在南高加索，“经济主义”和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甚嚣尘上。在所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就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列宁认为，要革命就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思想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任何取消暴力革命的主张都是严重的背叛。

1900年2月，列宁从流放地回来，在普斯科夫稍事逗留，然后前往慕尼黑。他希望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统一党的思想，恢复和巩固社会民主运动的团结。他还筹办一张报纸，取名《火星报》。

1900年12月这张报纸在莱比锡出版了。报纸从边境偷运入境，立即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喉舌，影响很大。斯大林对《火星报》产生了特大的兴趣。他完全拥护列宁的主张，经过研究和比较，他认为列宁是真正马克思主义党的创始人，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

斯大林说：“当我知道列宁从19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1901年以后，在《火星报》出版以后的革命活动时，我就深信列宁是个非凡的人物。当时在我看来，他不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领导者，而是我们党的实际的缔造者，因为只有他一人了解我们党的内部实质和迫切需要。当我拿列宁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比较时，总觉得列宁的战友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远不如列宁。列宁和他们比较起来不单是一个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

斯大林在建党方面和在领导俄国工人运动方面，是列宁可靠的和忠实的战友。由于有了斯大林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小组的积极活动，南高加索的革命运动获得了新的发展。当时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在群众中印发传单，说明当前革命斗争的迫切问题，进行鼓动工作，组织群众罢工和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示威。起领导核心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于1900年4月23日，在第比利斯郊外12俄里的盐湖附近，举行了革命的“五一”示威，参加的群众约有500人。同年8月，在第比利斯铁路工厂举行了规模更大的罢工，参加的工人有4000多人。斯大林在会上发表了令人感动的演说。他强调指出，必须对沙皇和资本家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在工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

南高加索革命运动的发展，使沙皇政府惊恐万状，他们大施高压手段，决定逮捕工人阶级领袖，斯大林随之转入秘密活动。从那时起，直到1917年2月革命时止，斯大林始终是在秘密条件下过着职业革命家的紧张生活。这样一来，由列宁思想所武装起来的斯大林领导的“麦撒墨达西社”革命小组，构成了第比利斯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它使格鲁吉亚的工人运动从狭小的小组宣传转向对群众进行政治鼓动，使社会主义与高加索的工人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

为了进一步对工农大众进行思想动员，在斯大林和凯茨霍维利具体领导下，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第一张秘密报纸《斗争报》于1901年9月创刊了。列宁的《火星报》热烈地祝贺第一个革命的格鲁吉亚定期刊物的问世，并指出该报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在揭露机会主义者和团结工人为革命而斗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斗争报》始终贯彻列宁《火星报》的思想。在俄国，除《火星报》之外，《斗争报》是一份最好的马克思主义报纸。报上的主要文章多是斯大林撰写的。他在《斗争报》第一期《编辑部的话》这篇社论中强调指出，用格鲁吉亚文出版的秘密定期刊物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迫切需要。斯大林关于报纸的内容和方针写道：“在俄国和一切地方，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负有解放人类并为全世界谋幸福的历史使命。很明显，只有工人运动才有其坚实的基础，也只有工人运动才能摆脱任何一种乌托邦的空想。所以，这个报纸既然是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就应当领导工人运动，给它指示道路，使它不犯错误。总之，这个报纸的首要职责就是尽可能接近工人群众，设法经常影响他们，成为觉悟的、领导工人群众的中心。”

斯大林通过报纸尖锐地批评了“经济派”及其奉行的机会主义路线。“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降低社会主义觉悟的作用，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改造社会的必需手段。“经济派”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妨害了工人深刻认识斗争的伟大目的，并抑制了工人阶级的伟大精力。对此，斯大林说：“伟大的精力只是为了伟大的目的而产生的。”他在1901年提出的这个有名的公式，在俄国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革命农民推翻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争取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不可征服的运动中，充分体现出来并加以证实了。

无产阶级必须而且能够在革命斗争中起着独立的作用，而且无产阶级只有在有了独立政党的条件下才能做到这一点。在革命运动中，斯大林有力地维护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中领导权的思想。斯大林写道：“为了这种领导作用，工人阶级必须组成独立的政党。”斯大林认为，必须建立强大的、紧密团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党将把革命大旗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引导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民走向胜利。斯大林及其战友在第比利斯革命活动的结果，成立了拥护列宁《火星报》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个第比利斯委员会，并建立了广泛地反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

斯大林在完成第比利斯的建党任务后，就于1901年11月末奉党组织之命，前往仅次于巴库和第比利斯的高加索第三个无产阶级中心巴士姆去了。巴士姆那时就是濒临黑海的大港口和南高加索的重工业城市。该城有10个以上的大企业，有数量众多的产业工人。可是该城却没有一个革命组织来领导工人革命运动和发动他们对沙皇制度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进行斗争。斯大林一到巴士姆就立刻直接与先进的工人联系，到了1901年12月底，他便在巴士姆城许多企业中着手建立社会民主党小组，在短短的期间共组织了11个社会民主党小组。斯大林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写传单，印刷和散发传单，领导路特希理德和曼德舍夫两个工厂的工人进行斗争，组织农村中的革命宣传工作。他把先进工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组成了一个坚强的革命核心。

1901年12月31日，在工人洛姆查里亚的住宅举行了巴士姆社会民主党各小组的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拥护列宁《火星报》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士姆委员会。为保守秘密起见，这次会议是在迎接新年形式下召开的。斯大林向工人们说明了工人阶级的斗争任务，说明了必须建

立无产阶级革命者强有力的党。会议的参加者永远都会记住他这些真挚的谈话。巴士姆老工人叙述说，天亮了，这时斯大林站起来说：“看，天已经亮了！太阳很快会升起来！这太阳将为我们射出光辉。同志们，请相信这一点吧！”

经斯大林亲手组织起来的，由罢工而形成的巴士姆工人有名的政治示威，是高加索革命运动最鲜明的表现。为了回答警察当局逮捕 32 名罢工工人，3 月 8 日斯大林组织了罢工工人的大示威。示威者要求释放一切被捕人员。在这次示威中，警察又逮捕了 300 多名工人。被捕者都被囚禁在监狱里。次日，即 1902 年 3 月 9 日，社会民主党巴士姆委员会在斯大林领导下，组织了有 6000 多名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示威，示威者在监狱前面遭到沙皇军队的射击，打死 15 人，负伤 54 人。斯大林率领示威的队伍，号召工人坚持到底。夜间，斯大林就枪杀示威群众一事写了充满激情的传单。3 月 12 日，斯大林又为被枪杀的烈士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安葬仪式。斯大林组织的巴士姆示威，对高加索以至全国的革命运动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巴士姆的示威成了把罢工和政治示威结合起来的榜样。

巴士姆的工人斗争掀起高潮，使沙皇政府深感不安，强烈地震撼着反动统治。斯大林的名字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敌人一心想把他除掉。之后，斯大林遭到警察的迫害，于 1902 年 4 月 5 日在巴士姆委员会会议上被捕，4 月 6 日即被囚禁于巴士姆监狱。斯大林在狱中从未停止过革命工作，他与社会民主党组织保持着联系，写传单，在被监禁者中间进行工作。1903 年 3 月初，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组织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斯大林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入高加索联盟委员会。代表大会决定把《斗争报》与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党的《无产者报》合并，出版高加索联盟委员会的机关报《无产阶级斗争报》。

1903 年秋，斯大林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期限 3 年。同年 12 月，斯大林在西伯利亚通过自己的朋友，收到了列宁的一封信。1924 年 1 月 28 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军校学生晚会上，斯大林曾谈到这件事，他说：“我最初和列宁认识，是在 1903 年。固然，这次认识还不是亲身晤面的认识，而是相隔两地，在通信上的认识。但这次认识在我脑海里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党里工作的整个时期中，这个印象始终都没有消失。那时，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列宁的这一封信虽然比较短，但是对于我们党的实际工作给了一个尖锐的批评，并把我们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作了一个简略的说明。只有列宁才善于把最纷乱的事情描写得这样简单、明了、扼要和大胆，他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一句寻常的话，而是一颗打中目标的子弹。这封简单而大胆的信，使我更加确信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从那个时候起，这两位工人阶级的领袖便开始了私人间的亲密友谊。

老布尔什维克苏里阿施维里在回忆斯大林与列宁通信时写道：“我们收到了斯大林令人鼓舞的谈论列宁的信。斯大林在这些信中对列宁，对他那不屈不挠的纯粹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对他解决建党问题的方法等等极为赞扬。斯大林在一封信中称列宁为山鹰，并为他反对孟什维克的不调和的斗争而欢呼。”

1904 年 1 月 5 日，斯大林从流放地逃回高加索。斯大林生活和革命活动中的新时期开始了。这位列宁的战友和学生，坚决为执行列宁的战略和策略，为实行列宁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思想而斗争。斯大林从流放地

归来，恰是俄国大革命风暴越来越猛烈的时候，全国已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列宁为了建立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个时期对孟什维克，对他们的机会主义思想、他们的分裂和破坏活动进行着不调和的斗争。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和革命的发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特别尖锐起来了。列宁认为，解决已形成的党内危机的办法便是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是为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而斗争，就成了布尔什维克的中心任务。

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坚决站在列宁一边，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1904年，他巡视了南高加索的许多地区，还巡视了格鲁吉亚西部农民地区。在巡视期间，他为巩固原有的党组织，创立新的党组织，同孟什维克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

1904年5月，沙皇政府逮捕了大批布尔什维克党人之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党组织便落入孟什维克之手，他们反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路线，反对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斯大林于6月奉命来到巴库，将孟什维克的巴库委员会予以解散，另组织了新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并领导石油城的工人举行了有名的“十二月大罢工”。这次罢工由1904年12月13日继续到31日方告结束，结果工人获得了胜利，工人与石油业主签订了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集体合同。巴库的罢工，是南高加索以及俄国许多地区革命高潮的开始。巴库罢工“是全俄一、二两月光荣发动的信号”，是俄国大革命风暴前夜的雷前闪电。

1905年1月22日的彼得堡事件，是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开端。1月22日沙皇当局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实行的血腥枪杀，大大推动了全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斗争高潮。在俄国首都爆发的革命，很快波及南高加索。在南高加索各城市和工业区听到俄国首都1月22日血腥事件的消息之后，很快掀起了罢工和示威的浪潮，要求严惩枪杀彼得堡无产者的凶手。

1905年1月31日，在第比利斯爆发了总罢工。南高加索铁路机务段的工人、职员停止工作，电车、机械工厂和一切私人印刷所的排字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达三四千人。罢工浪潮很快扩大到第比利斯其他企业。接着，其他城市和工业中心也都发生了总罢工。有些地区，由罢工发展到政治示威，工人与军警发生武装冲突。在齐亚土雷的罢工继续了两个多月，工人还组成了战斗部队，购置武器，并准备武装起义。

以斯大林为首的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是发动南高加索工人和农民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了帮助各地方的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派遣受过考验的革命战士到巴库、巴士姆、齐亚土雷、库泰依斯、哥里等地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他们在许多地区把工人农民组成了战斗的武装部队，并施以军事训练。根据斯大林的倡导，高加索联盟委员会，还在第比利斯成立了卫成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除了革命的工人农民代表外，还有第比利斯和明格烈尔两团的工兵营、铁路装甲车营和步兵营的代表。在这些日子里，布尔什维克党古里亚委员会分设了一个军事技术组，负责指挥该区全部战斗力量，从事购置军火武器和对红色部队进行军事训练等工作。与此同时，格鲁吉亚的农民也挺身起来组织了革命委员会，夺取地主土地，废除苛捐杂税等，直接配合工人斗争。斯大林号召工人农民，紧密地团结在布尔什维克的周围，并坚决行动起来，为推翻沙皇制度而斗争。

为了对付南高加索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沙皇政府于1905年2月初曾在

巴库挑起鞑靼族和阿尔明尼亚民族的自相残杀。继此之后，沙皇政府还企图在高加索其他城市挑起这类民族冲突。南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了很多鼓动工作来反对这种自相残杀，他们印发传单，组织劳动者大会，抗议沙皇政府这种恶毒阴谋。由于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风起云涌的抗议怒潮，迫使沙皇暴吏不得不放弃实行他们的这种血腥计划。

由斯大林、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南高加索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斗争，得到列宁、布尔什维克党、俄国无产阶级的全面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听取了南高加索代表团关于高加索革命运动的报告之后，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特别决定，向高加索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致敬，并委托党中央委员会和各地委员会，采取最积极的办法，通过印发小册子，召集群众大会、工人大会、小组谈话等方法，广泛地传播高加索革命之火，并用一切办法及时地支援他们的斗争。

斯大林在领导南高加索革命运动的同时，还从事巨大的理论工作。当时高加索所有一切布尔什维克出版物，几乎都是斯大林发起和组织起来的。他把出版秘密书报、小册子和传单的工作，扩大到了沙皇时代空前未有的规模。从斯大林在1904年、1905年时期所写的文章、小册子和宣言中，便可看出当时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是列宁的忠实信徒和助手。他在这些著作中阐明了许多理论和政治问题，揭发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派别和集团的虚伪思想，揭发了他们的机会主义嘴脸和叛卖立场。斯大林在《库泰伊斯来信》、《论党内意见分歧》以及《答 社会民主党人报 》等论著中，坚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党的思想基础。他拥护并发展了列宁关于将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去的思想，维护并发展了关于必须把革命理论与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关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作用的思想。斯大林的论著得到了列宁的很高的评价。

在1905年4月至5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在斯大林领导下为执行代表大会关于武装起义、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态度等决议而进行着不调和的斗争。在1905年至1907年间，斯大林所写的《武装起义和我们的策略》、《临时革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等著作中，以及在传单《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告全体工人书》中，都论证并进而发展了列宁关于布尔什维主义战略和策略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斯大林写道：“据布尔什维克看来，要把目前的革命进行到底并以人民专制来完成它，只有在如下场合才有可能，就是领导这次革命的一定是有觉悟的工人，革命领导权一定要集中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手里，而不是集中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手里。”

斯大林坚决维护列宁关于武装起义是推翻专制制度和成立共和国的手段这种思想。他在《告公民书》中写道：“全民武装起义，这就是近来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全盘事件在历史上必然走向的那种必然结局。全民武装起义这就是现时摆在俄国无产阶级面前急待解决的伟大任务！”斯大林也和列宁一样，认为起义的技术准备诸如组织战斗队、武装人民、使人民受军事训练等都有重要意义。在《武装起义和我们的策略》一文中，斯大林指出：“在技术上领导和在组织上准备在全俄起义，便是实际生活向无产阶级提出的新任务。如果我们党要作工人阶级真正的政治领导者，它就不能而且也不应拒绝完成这些新的任务。”

1905年10月18日，在沙皇被迫颁布所谓给予人民“自由宣言”那天，斯大林在第比利斯工人群众大会上的发言中，在揭露高喊解除工人阶级武装口号的孟什维克的叛卖策略时说道：“为着真正获得胜利，我们需要什么呢？为着这件事，就需要三件东西：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还是武装。”布尔什维克向群众解释说，10月17日沙皇的宣言是一种圈套，并号召工人拿起武器，准备武装起义。在第比利斯、巴库、巴土姆以及南高加索其他城市中，都纷纷举行群众大会，示威游行，以表示抗议。

1905年11月，列宁回到了俄国。他避开沙皇宪兵暗探局的耳目，直接参加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在高加索11月代表会议之后，南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更加积极地展开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2月上半月，在第比利斯，以后在齐亚土雷、克维里尔、萨姆特烈加、库泰伊斯以及其他城市和地区都相继爆发了武装起义。武装起义的火焰迅即燃遍了南高加索，几乎席卷了整个格鲁吉亚。整个南俄大地出现了一派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工农群众欢呼：“太阳快要出来了！”正是：南俄大地起风雷，革命烈火劲风吹。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章 会见列宁

会见列宁喜洋洋，心明眼亮志更强；
山鹰号召齐努力，任凭沙皇镇压狂。

1905年12月，斯大林前往芬兰参加在坦默福斯召开的第一次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和列宁第一次会面了。这在俄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时斯大林已经26岁。除了在西伯利亚短期流放以外，他有生以来一直都是在外高加索度过的。他的成长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起先是一个定要在同学中刻苦奋斗的学生，接着成为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后来又成了反对第比利斯神学院领导的叛逆。在他阅读了列宁的《给一位同志的信》和《怎么办？》等著作后，革命的目的更加明确，从而成为一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十分敬仰列宁，认为他是党的“山鹰”，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因此同列宁的会见使他由衷地感到高兴。

斯大林在1924年1月28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军校学生晚会上所作的演说中对这次会见曾作了这样的回忆：

“我第一次会见列宁，是1905年12月在芬兰坦默福斯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我本来希望看见我们党的山鹰，看见一个伟人，这个人不仅在政治上是高大的，而且可以说在体格上也是高大的，因为当时列宁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身材匀称和仪表堂堂的巨人。当我看见他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最平常的、身材比较矮小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

“通常，‘大人物’照例是开会迟到，让会场上的人望眼欲穿地等着他出现；而且在‘大人物’就要出现之前，会场上的人彼此告诫说：‘嘘……静一点……他来了。’我当时觉得这一套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它能令人肃然起敬。当我知道列宁比代表们到得更早，躲在一个角落里朴实地同那些参加代表会议的最普通的代表们进行最普通的谈话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老实说，我当时觉得这未免有点违背某些必要的常规……

“后来我才明白，列宁这样朴质谦逊，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愿意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的长处，正是他这种群众的新式领袖，即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新式领袖所具有的最大长处。”

在坦默福斯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做了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工作报告，并发表了维护列宁的积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策略的演说。在代表会议上，斯大林被选进负责编审代表会议决议的政治委员会，他在这个委员会里和列宁一起工作，斯大林的锐敏的观察力和干练的工作作风给列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代表会议以后，斯大林于1906年初回到高加索。这个时期高加索的情况，也和全国的情况一样，都改变了。“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被镇压之后，沙皇的刽子手们在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各种民族主义党的叛卖策略的帮助下，也把第比利斯以及高加索其他城市的起义镇压下去了。

1905年末所掀起的工农反对沙皇制度革命斗争的浪潮，从1906年初转向低潮。高加索的革命组织受到沙皇专制制度的迫害，遭到严重的破坏。

关于那个时期的情形，斯大林曾这样写道：“我们还记得那些万恶的讨

杜马，即议会。

伐队对工人团体的野蛮袭击，农民群众的遭受鞭笞，以及这一切的掩盖物——黑帮和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在警察、地主、资本家暴徒们肆意横行之下，社会思想的局限性，普遍的疲倦和冷淡，工人中间的贫困和绝望，农民的麻木和惊慌，这就是斯托雷平‘国泰民安’的特征。”

列宁指出，在反动年代，沙皇政府、地主和资本家因革命阶级进行革命而疯狂地对这些阶级加以报复，首先是向无产阶级开刀，他们急于趁着群众斗争中断的机会，企图消灭自己的敌人。

沙皇反动政府对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列宁不得不侨居国外，继续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斯大林在俄国常常被逮捕和流放。在1902年至1913年间，斯大林先后被捕7次，流放6次，而从流放地逃走过5次。沙皇政府把列宁和斯大林视为对他们威胁最大的政治家，力图剥夺他们进行革命工作的机会。

反动年代是布尔什维克党经受严重考验的时期。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不仅为保存和巩固既有的组织而展开了斗争，而且还继续成立南高加索新的工农革命组织。这些组织为迎接反专制制度的新战斗进行了准备工作。

“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被镇压之后，孟什维克责难工人的武装起义，并且声言“本来不需要动用武器。”他们要求完全放弃武装起义，尖刻地责难这种斗争的方法。与孟什维克失败主义的叛卖立场相反，布尔什维克对无产阶级“十二月武装起义”给予很高的评价。1906年1月7日，斯大林在《两次搏斗》一文中，对孟什维克的失败主义观点给予无情的抨击。他写道：“无产阶级决没有被击溃，因为无产阶级被击溃就等于无产阶级死亡，恰恰相反，它仍旧像从前一样活着，并且日益强大起来。它不过是退却了，为的是聚集力量来同沙皇政府进行最后的搏斗。”他相信俄国无产阶级决不会放下染满鲜血的旗帜，决不会把起义的领导权让给任何人，它将是俄国革命的唯一胜任的领袖。斯大林深刻地分析了“十二月武装起义”的教训，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为了战胜沙皇制度，需要有团结的党、由党组织的起义和进攻的政策。

“十二月起义”失败之后，革命开始逐渐退却。党内就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进行准备工作。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再次激烈地展开了。斯大林领导了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对一切反无产阶级的流派展开斗争。1906年3月末，在秘密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的大会上，选举斯大林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4月初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这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与列宁一起反对孟什维克，维护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路线。斯大林就目前时局问题、社马问题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立即回到南高加索工作，他以更大的毅力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活动，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联邦主义者等进行势不两立的斗争。

在1906年至1907年期间公开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上，曾刊载了一系列卓越的论文，总标题是《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是斯大林为了回答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及其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格鲁吉亚门徒而写的。斯大林在这些论文里维护并进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些文章深刻地指出并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即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必不可免，以及与第二国际改良主义旧式政党根本不同的新式战斗无产阶级政党绝对必要的问题。

在反动时期，以斯大林为首的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为列宁的革命战略，为推翻沙皇政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以及将这种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党派遣斯大林到巴库去。巴库是南高加索最大的工业区和俄国工人运动最重要的中心之一。

20 世纪初叶，巴库的石油工业在俄国经济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石油的开采业和提炼业，都集中在外国资本家操纵的几个大公司手里。生产的集中化和垄断的增长，加强了对巴库无产阶级的剥削，造成各大企业中工人的迅速集中，使工人联合与组织起来，以反对因民族压迫而加深的资本主义压迫。巴库的无产阶级是多民族的，这里有俄罗斯人、阿塞拜疆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伊朗人等。住在油田周围的是阿塞拜疆的农民，他们非常憎恨俄罗斯的殖民者。沙皇官吏挑拨民族仇恨，唆使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互相攻击，时常在这两个民族中间煽起屠杀。因此，巴库的阶级冲突是非常尖锐的。加里宁指出：“在这极端复杂的矛盾症结中，斯大林善于引导群众消除隔阂，加强团结，为了反对沙皇制度和资本家的剥削，为了各个民族和整个阶级的彻底解放而进行斗争。”

在这些年代，巴库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进行激烈斗争的舞台，孟什维克曾一再企图把这个南高加索无产阶级的堡垒夺到自己手里。1907 年 5 月，孟什维克利用大部分布尔什维克领导骨干的被捕，急忙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统一组织中央机关的选举，造成了他们占有优势的局面。孟什维克还利用所谓“集体领导”的名义加紧破坏活动，采取了瓦解秘密党组织的路线，抛弃了巴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路线。

斯大林于 1907 年上半年来到巴库，在工人群众中进行了巨大的宣传鼓动工作，成立了许多宣传小组，对党的工作进行了整顿，并使之活跃起来。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创办了巴库布尔什维克战斗的机关报——秘密的《巴库无产者报》。斯大林亲任这个报纸的主编。该报始终不渝地维护列宁学说，宣传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路线。《巴库无产者报》编辑部同列宁的《无产者报》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有着密切的联系。布尔什维克用巴库实际生活中的具体例子来揭发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本质，逐步将孟什维克从该城各无产阶级区域里排挤出去。

1907 年 10 月 25 日，巴库举行了市党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谴责了“取消派”的破坏活动，并恢复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组织的真正革命的领导机关——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巴库委员会。巴库委员会的恢复，对巩固和维护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领导，起了重要的作用。

巴库无产阶级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仍然高举着革命斗争的旗帜。斯大林直接领导的油田工人的大罢工运动，声势浩大，规模空前。在 1907 年，与前一年比起来，罢工者的数目由 32.9% 增加到 85.5%。如按工人罢工运动波及的范围来说，巴库省可与彼得堡处于同等的地位。除经济罢工外，在巴库还连续不断地发生政治罢工。

1907 年在该城就有过三次总罢工和一次一个区的罢工。即使在 1908 年，巴库的罢工人数也比其他省多。列宁在指出巴库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时写道：“1908 年内，在有大量罢工者的省份里，居于首位的是巴库省，参加罢工的有 4.7 万名。他们是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的代表！”

斯大林非常重视巴库工人职工运动的领导。早在 1906 年，曾由他发起成

立了石油业工人联合会，该会是按照不同的产业部门把工人们组织起来的，并把各种民族的工人联合成统一的国际主义的大家庭，以无产阶级团结的精神来教育他们。于 1907 年 8 月 12 日创刊的《汽笛报》，在创刊号的社论中，曾这样确定了该报的任务：“为了顺利地同自己强大的阶级敌人作斗争，为了粉碎穿着新朋友外衣的资本奴仆的狡猾计划，工人必须有自己的工人机关报，即自己的《汽笛报》，它会号召大家协力工作，它会响亮地唱着把工人的一切呼声融合成劳动大军合唱的一种雄壮歌声……如果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汽笛》唤醒无产阶级落后的阶层起来协力一致地工作，如果我们能够减轻工会活动中的许多困难，用报刊上的言论来帮助他们，那末，我们将认为我们的任务是达到了。我们将不断地鸣起汽笛来！”

斯大林对《汽笛报》的出版和发行十分关心。他经常在报上发表论著，制订和论证布尔什维克领导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彻底革命策略。斯大林对于工人代表与石油业主谈判签订集体合同运动的领导，在他的巴库革命活动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由于不断发生的经济和政治罢工，石油资本家的经济利益受到惨重损失。他们对日益增长的工人运动惊恐万状，请求斯托雷平采取紧急的“迫害石油工人运动的措施”。政府及石油业主知道，只用迫害手段并不能摧毁巴库的无产阶级，因而决定采取向工人讨好的方针。他们企图用谈判签订集体合同的方法，来转移巴库无产阶级的注意力，使他们放弃斗争。斯大林认为，石油业主想以极小的让步来阻止工人罢工，从而攫取更大的利益。因此，围绕举行谈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孟什维克起而反对举行总罢工，并鼓动参加幕后的妥协，在欺骗工人阶级这件事情上帮助了石油业主和反动政府当局。斯大林反对孟什维克的妥协策略，并提出这样的口号：“打倒妥协，斗争万岁！”斯大林的这个口号是以布尔什维克积极抑制妥协的策略为基础的。斯大林曾在《汽笛报》上发表过《应当抵制协商会议！》一文，对当时的斗争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对于制订积极抵制妥协的策略有极大的意义。在为反对妥协而展开的斗争进程中，布尔什维克揭发石油业主的阴谋，扩大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向群众指明已沦为资本家走狗的孟什维克的真实面目，并对号召工人不要行动起来的社会革命党人和达史纳克派给予反击。工人拒绝了幕后谈判。孟什维克的妥协策略被绝大多数的工人推翻了。

石油业主在谈判破裂之后，随即对巴库无产阶级采取了坚决的进攻。开始大批解雇和逮捕先进工人。

1908 年 3 月，斯大林被捕，囚在巴伊洛夫监狱中。然而，即使在狱中，他也未停止革命活动。他继续领导巴库的党组织和工人运动。斯大林在狱中写了很多文章，有《经济恫吓和工人运动》、《石油业主对经济恫吓的看法》、《协商会议和工人》等。在这些文章里，斯大林就协商运动作了总结，分析了巴库的环境，对敌人诽谤无产阶级策略的一切企图给予了反击，并指出无产阶级最近的任务。

斯大林揭露石油业主的阴谋时写道：协商的决裂是一种挑拨行为，其目的是引起工人总罢工。他向工人们解释说，在当前情况下不能开始总罢工，因为石油业主积存了大量的石油，因为他们很早就准备对总罢工给以回击。工人必须作临时的让步并准备力量来展开新的攻势。斯大林指出：“只有各公司的罢工，才是适合时宜的最适当的退却形式。”

斯大林对党的组织指示说：在巴库的反动时期，在当局使协商决裂之后，

希望最后消灭所谓“巴库的自由”时，党的组织不应完全转入秘密状态而把活动地盘让给反动派。必须保持与工人最密切的联系，继续领导他们进行斗争，决不应忘记，群众是补充党的后备力量，我们的组织只有随着积极参与无产阶级的一切斗争才会成长起来。斯大林的这些指示，确定了革命行动在新条件下的正确道路。

在巴库，斯大林被监禁 8 个月之后，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期 2 年。

1909 年 6 月，斯大林从流放地逃了出来。一回到巴库，立即着手恢复久已停刊的《巴库无产者报》，并在报纸上发表了《论即将到来的总罢工》的文章。经过调查研究，斯大林看出了工人运动活跃起来的初步迹象，并号召无产阶级着手准备总罢工，把“自己全部的智慧、精力、勇气”都放在这个事业上。根据工厂稽查人员报告的材料，在 1909 年 6 月到 11 月这段时间内，在巴库登记的工人罢工就有 89 次，参加罢工的有 20246 人，沉重地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

就这样，在最困难的反动年代，革命运动退潮的时期，斯大林虽然常被逮捕和流放，但他仍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在为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斗争中，成了列宁亲密的战友。

1911 年 9 月，他从流放地来到彼得堡后，列宁与斯大林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列宁经常与斯大林商议党的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列宁重视斯大林的丰富的革命经验，把党的紧要任务委托给他，而斯大林总是出色地完成这些任务。在俄国的大地上，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新的革命时期就要开始了。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革命洪流滚滚来。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章 创办《真理报》

身遭流放志不衰，埋头等待时机来；
巧计逃出樊笼后，创办党报敌惊呆。

1912年2月中旬，还是在沃洛格达流放期间，斯大林直接得到了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消息。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列宁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奥尔忠尼启则奉命亲自把这个建立新党的消息告诉了他。斯大林还得知他被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俄国局成员。从此一个新的革命时期开始了。

党的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是1912年1月在布拉格召开的。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孟什维克被驱逐出党，永远结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形式上联合在一个党内的局面，布尔什维克最后由一个政治集团发展为独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这是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党，列宁主义的党，它对俄共革命后来的发展具有决定的意义。

为了建立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和斯大林曾进行了巨大的思想和组织工作。列宁所著《做什么？》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思想上的准备。列宁所著《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组织上的准备。列宁所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政治上的准备。最后，列宁所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理论上的准备。

代表会议指出，原被破坏的党中央机关已经恢复，党中央委员会已经成立。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党组织虽然遭受过极严厉的压迫，虽然受到过外来的严重打击，虽然党内有过机会主义者的叛变和动摇，但无产阶级终究保全了自己的旗帜和自己的组织。

代表会议指出了俄国工人运动重新高涨的征候，指出了党的工作正在活跃起来的事实。代表会议在讨论了各地方代表的报告后指出：“在所有各个地方的社会民主工人中间，都在为巩固地方秘密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团体工作而努力。”在所有各个地方组织方面，都承认布尔什维克在退却时期所采取的策略的主要原则——把秘密工作与党的各种合法工作相结合的原则是正确的。

布拉格代表会议选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有列宁、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斯维尔德洛夫等人。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是在本人缺席时被选进中央的，因为他们当时还在流放地。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还有加里宁。为了加强党对俄国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国中央局。代表会议还就布尔什维克过去反对机会主义的全部斗争作了一个总结，并做出决议将孟什维克驱逐出党。

1912年初，列宁在致高尔基信中谈到布拉格代表会议时写道：“不管取消派混蛋们怎样捣乱，我们终于把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恢复成功了。我想你对此是会和我们同声称快的。”斯大林对布拉格会议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次代表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划定了一条界限，并把全国各地布尔什维克组织统一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从此，这个无产阶级政党变得更坚强有力了。

但是，取消派、托洛茨基分子和各色机会主义者对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是敌视的。所有这些“取消派”组织了“八月联盟”。这是一切反布尔什维克党的集团和流派的联盟，旨在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这个联盟

的是托洛茨基。

为实现布拉格代表会议决议的顽强斗争，争取将各地方党委变成新式党的战斗组织的艰巨斗争，即将到来。这个斗争的成败，首先取决于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积极活动。斯大林在俄国直接领导中央的工作，这对于俄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列宁认为，斯大林具有丰富的革命实践，只有他才能担当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在革命运动方面的全盘领导工作。

1912年2月29日，斯大林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再度从沃洛格达流放地逃了出来。他负责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工作。当时列宁和斯大林认为俄国局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实现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而奋斗。必须向全国党的组织说明布拉格代表会议决议的重大意义，为组织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展开斗争，使它们的工作活跃起来。为此，斯大林奉党中央之命视察了俄国各个重要地区。当他来到南高加索后，那里的孟什维克组织正企图破坏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斯大林冒着被沙皇走狗逮捕的危险，在巴库召集了各区党组织的工作人员大会。大会一致欢迎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斯大林在他撰写的工作通讯中指出：南高加索的党组织在跟孟什维克及其南高加索省委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对维护党性、反对取消派的胜利，具有极重要的政治意义。

斯大林在南高加索期间，在第比利斯秘密印刷所中，曾组织印发列宁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名义写的传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竞选纲领》。在这个重要文件中，谈到了即将到来的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制订了党的口号，指出积极参加选举运动的必要。布尔什维克提出了利用杜马为工人阶级革命斗争服务的任务。列宁写道：“社会民主党竞选纲领的真谛、实质和精神，就是为了革命！”“它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数十万的政治罢工者，对千百万老百姓大军中的先进者的直接号召，要向他们说明起义的任务。”

这年春天，以连纳事件为导火线掀起了新的工人革命运动的大高潮。

1912年4月4日，位于西伯利亚的连纳金矿工人举行罢工，沙皇宪兵当局下令开枪，工人死伤500多人。这一惨案立即激怒全国。沙皇政府这一血腥暴行，完全是为了取悦英、俄资本家。他们对工人实行残酷剥削，每年榨取利润700多万卢布，却只付给工人极低微的工资，供给工人恶劣腐烂的食品。连纳金矿公司中的6000矿工因忍受不住这种欺压凌辱，便宣布罢工了。

连纳惨案发生后，无产阶级立刻在彼得堡、莫斯科及其他工业中心和矿区纷纷举行罢工、游行示威和群众大会，以表示抗议。他们通过决议，严厉谴责沙皇政府的血腥暴行。决议说：“我们万分震惊，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无论我们提出怎样的抗议，都不能表达我们每个人的沸腾心情于万一。对于我们，无论眼泪或抗议都没有用，唯一有用的就是有组织的群众斗争！”特别当沙皇大臣马卡洛夫在国家杜马中回答社会民主党党团对连纳惨案所提出的质问时，这位大臣竟无耻地说道：“从前如此，将来也会如此！”于是工人群众的怒潮更加汹涌澎湃，参加抗议罢工的人数达到30多万人。

连纳事件有如飓风一般，打破了斯托雷平制度所造成的“沉静”空气。对当时的斗争形势，斯大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连纳的枪声击破了沉默的冰层，人民运动的江河奔流起来了。奔流起来了！现存制度中的一切弊端祸害，多灾多难的俄国所受的一切苦痛都集中到一事实上，集中在连纳事件上。这就是连纳的枪声正好成为罢工和游行示威的信号的原因。”

取消派被工人群众的革命行动弄得惊惶失措，他们企图埋葬革命，反对

工人举行罢工，骂它为“罢工的狂热”。取消派及其同盟者托洛茨基竟想用“请愿运动”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他们劝工人在呼吁“权利”的请愿书上签名，然后递给国家杜马。但取消派只征得 1300 人的签名，而团结到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革命口号周围的工人却有数十万之众。工人阶级在遵循布尔什维克所指示的道路奋勇前进。

列宁认为 1912 年 5 月罢工和示威游行，是全俄无产阶级大规模的发动。这些行动证明：俄国进入了新革命高潮的阶段。为了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无产阶级政党很需要一张全国性的有权威的报纸，《真理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新的革命运动浪潮中于 1912 年 5 月 5 日诞生了。斯大林受党中央和列宁的委托，积极参加了《真理报》的创刊工作。斯大林实际上是这家报纸的第一任总编辑，他以党中央委员的身份，领导制订了《真理报》的编辑方针，并参加编辑该报创刊号事宜。当时《真理报》的编辑人员和主要工作人员有莫洛托夫、奥里明斯基、巴杜林、斯维尔德洛夫和高尔基等人。在两年半内，《真理报》曾被沙皇政府封闭过 8 次，但在工人的支持下，它以新的名称继续出版。《真理报》成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强有力的战斗武器。斯大林在《真理报》10 周年纪念日写道：

“1912 年的《真理报》，奠定了布尔什维克 1917 年胜利的基础。”

《真理报》的创刊号社论《我们的目的》是由斯大林执笔撰写的。这篇文章确定了该报的战斗任务，即向工人运动的敌人宣战，对他们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斯大林说，工人阶级斗争的统一，便是使无产阶级已经展开的战斗获得成功的保证。《真理报》在巩固党的组织方面，在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方面，在争取广大群众拥护布尔什维克主义方面都曾起了很大的作用。列宁和斯大林借助《真理报》在思想上锻炼了布尔什维克组织，对取消派、托洛茨基之流的政策进行了斗争，揭露了沙皇政府反人民的政策。

《真理报》很快就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因为它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工人与自己报纸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工人在寄给《真理报》的许多书信和贺词中充满了对报纸的爱戴。工人群众认定《真理报》是他们自己的报纸，对它极表信任，细心听从它的呼声。《真理报》一出，就在工人中间辗转传阅，每份报纸的受益人数多达几十人，培养了工人的阶级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号召他们进行斗争。

为了密切联系群众，每期《真理报》上都刊载工人写的通讯和消息。这些报道记述了工人们遭受残酷剥削的种种事实。这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一针见血的尖刻的揭露。在《真理报》所载的报道中，往往传出忍饥挨饿的失业工人因根本无法找到工作而自杀的消息。报纸还用充分的篇幅报道工人的罢工和游行。凡遇有大规模的长期罢工时，《真理报》便在一些企业和工业部门的工人中募捐援助罢工工友。募得的罢工基金多达数万卢布，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因为当时大多数工人每天只能领七八十个戈比的工资。这种办法在工人群众中培养了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使他们认识到全体工人利益的一致。

每逢发生政治事件，每逢获得胜利或遭受失败时，《真理报》上往往登载工人的来信、贺词或抗议书。《真理报》在自己的论文中，根据布尔什维克党的立场指明工人运动的任务。然而当时公开发行的报纸是不能直接号召推翻沙皇制度的，必须用暗示的方法，但觉悟的工人很能理解这种暗示，他们从字里行间可以了解到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口号是推翻沙皇制度，成立民主

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 8 小时工作制。《真理报》在斯大林领导下，成了指导工人运动、准备革命的有组织的核心。

斯大林曾在《真理报》创刊那天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捕，经过数月监禁之后，被流放到纳赖姆边区，他在那里没有逗留多久，就从流放地逃了出来。一回到彼得堡，他就继续领导《真理报》的出版工作，同时领导布尔什维克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斗争。

《真理报》在第四届杜马选举前夜组织了先进工人的队伍。它对孟什维克主张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主张成立“斯托雷平工党”的叛变立场进行了揭露。《真理报》号召工人投票拥护为自己谋利益的人，即拥护布尔什维克。当时的选举是多级的，首先由工人大会选出初选代表，再由初选代表选出复选代表，只有这种复选代表才能参加杜马工人代表的选举。在实行选举那天，《真理报》公布了布尔什维克复选代表候选人名单，并号召工人投票选举他们。为防止预定候选人在杜马选举前遭受被捕的危险，这个名单是不能预先公布的。

斯大林亲自领导了布尔什维克在选举运动中的全部活动。他在《真理报》和《明星周报》发表的《非党的傻瓜》、《他们怎样准备选举》、《全权代表的意志》等文章中，透彻地阐明了进行第四届杜马选举的环境，揭穿了完全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立场的孟什维克的纲领，说明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任务。

斯大林的活动和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博得了列宁的赞扬。列宁在 1912 年 11 月 2 日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对斯大林的《谁胜利了》一文极表欢迎。斯大林的这篇文章是关于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总结。列宁在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写道：“因您写的第 146 期的社论，我特向您表示祝贺。”

《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在选举运动中曾起了重要的作用。《委托书》是斯大林于 1912 年 10 月写成的，并在彼得堡最大企业工人大会上，在全权代表大会以及工人集会上一致通过的。斯大林在《委托书》中精细地制订了布尔什维克党在选举运动中的纲领。他写道：“我们希望从杜马讲坛的高处响亮地发出社会民主党党团员的呼声，说明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提出 1905 年的全部的不折不扣的要求；说明俄国工人阶级是人民运动的领袖，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说明自由资产阶级是‘人民自由’的叛徒。”

列宁认为《委托书》有特别重大意义。列宁刚刚得到《委托书》的原文，就采取一切办法，使它在下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出来。在把这篇文章送往印刷所去排印的时候，列宁在《委托书》上写道：“一定要把原稿交还！不要把它弄脏。保存这个文件是极端重要的。”列宁在致《真理报》编辑的信中主张：“一定要把这个给彼得堡代表的委托书用大号字登在显著的地位。”

布尔什维克党因为善于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赢得了辉煌的胜利。根据工人选民团的选举，有 6 个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几个主要的工业省份当选到国家杜马中去。大选之后，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即负责直接领导布尔什维克代表的活动。在 11 月间开幕的第四届国家杜马会议上，布尔什维克代表利用沙皇杜马的讲坛，号召工人为俄国制度的民主化而斗争。列宁主张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前去克拉科夫，并写信给斯大林，要他一定与代表们同去。

1912年12月末，斯大林前往克拉科夫去见列宁，以便参加中央和党的工作者的联席会议。为了保密起见，这次会议被称为“二月会议”。其实，会议是1912年12月28日在克拉科夫开幕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总结工人阶级最近几年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会议之后，列宁与斯大林共同制订了改进《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方针。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在1913年年初克拉科夫会议时，“伊里奇跟斯大林就民族问题谈了很多，他高兴地会见了真正关心这个问题并对它很有研究的人。”

在工人运动高涨的年份内，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一再试图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毒素来麻醉工人阶级，从而粉碎工人阶级的统一。布尔什维克党负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给民族主义一个反击，使群众不受一般“时疫”的传染。因为社会民主党，而且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负起这个使命，用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的武器，用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斗争去对抗民族主义。斯大林受党中央的委托，肩负起完成这个任务的责任。

斯大林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于1913年初脱稿，发表在1913年3月至5月布尔什维克《启蒙》杂志第三期至第五期上。斯大林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书，是布尔什维克党在战前国际舞台上对民族问题所发表的重要的论著，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纲领宣言”。

斯大林于1913年2月下旬回到彼得堡。他和斯维尔德洛夫共同执行列宁关于《真理报》的指示，更加广泛地吸收先进工人来参加报纸工作，并注意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地引导工人注意斗争策略。当1914年春天，彼得堡许多厂主实行大规模歇业抵制，致使工人不宜于实行群众罢工的时候，《真理报》就号召工人采取其他斗争方式，例如在工厂中召集群众大会，在街道上举行示威。当时在报纸上不能公开写明这点，但觉悟的工人能理解这种号召，因为他们读到了列宁用《论工人运动方式》这一通常题目所写的一篇论文，说目前必须用工人运动的更高方式来代替罢工，这意思就是号召工人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

《真理报》不仅注意报道工人生活、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情形，同时也用一定的篇幅报道农民的疾苦和斗争。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俄国地主的大地产和农民的小地产》一文中，很清楚地向工农群众指明有怎样多的地产握在寄生地主手中。仅仅3万个大地主就占有土地约7000万俄亩，而1000万农户总共也只有这么多土地。每个大地主平均占有土地2300俄亩，而农民，连富农包括在内，每户平均不过7俄亩，其中有500万，即占全体农户一半的贫苦农户，每户不过1至2俄亩。这些事实具体证明，农民遭受贫困和饥饿是因为有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即农奴制度残余存在，农民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革命，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真理报》经过那些同乡村有来往的工人深入农村，去唤起先进农民加入革命斗争。

《真理报》有个庞大的工人通讯网。它在一年内就刊载了1.1万多份工人的稿件。但报纸与工人的联系并不限于写信和通讯。每天都有很多工人从企业中跑到编辑部来访问。党内的组织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真理报》编辑部里面。地方党支部代表，常在这里同领导机关接头。各地党组织的消息往往由这里接收。彼得堡党委会和党中央委员会的指令往往从这里转达。

由于布尔什维克两年半来为重建革命工人政党而与取消派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由于《真理报》通俗地深入地宣传党的政策，到1914年夏天，俄国

积极工人已有 4/5 是拥护布尔什维克党，拥护“真理报派”策略的了。

1914 年捐款援助工人报纸的 7000 个工人团体中，有 5600 个捐助布尔什维克刊物，而捐助孟什维克刊物的却只有 1400 个团体。但孟什维克在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很多“富足的朋友”，他们供给了孟什维克报纸所需要的大部分经费。

当时布尔什维克被称为“真理报纸”。随着《真理报》成长起来的有一整代革命无产阶级，这一代人后来便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真理报》受到数万以至数十万工人的拥护。在革命高涨年代（1912—1914 年）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坚固的群众基础，沙皇政府在帝国主义大战时期所采取的一切压迫手段都没能把这一基础摧毁。

1913 年 2 月 23 日，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在加拉施尼可夫交易所会场举行晚间演奏会，为《真理报》募捐。来观看这次演奏会的多数是工人，他们以捐助的资金来支持自己的报纸。斯大林到这次晚会上来跟党的工作者碰头，向他们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和委托。而出席这次晚会的奸细马林诺夫斯基把斯大林出卖了，他向警察署告了密。斯大林于是被捕，这对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为此，列宁立刻写信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我们的被捕情况是很严重的。柯巴被抓走了……柯巴幸而写完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长文章。很好！要为真理而战，反对崩得和取消派的分裂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

斯大林被监禁 5 个月之后，于 1913 年 7 月 2 日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边区，经常处于警察公开的监视之下，期限 4 年。加里宁写道：“我希望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要密切地注意斯大林的秘密生活和活动的纪事。秘密工作、逮捕、牢狱、流放、逃跑。又是秘密工作、逮捕和流放等等。多么简单、平凡！然而在这‘枯燥无味’的图画后面却隐藏着极残酷的阶级斗争。整个沙皇政府的机器都在无情地打击着那些以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去反抗它的勇士。不消说，它特别打击那些抱着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这种目的的人。”

图鲁汉斯克流放地是最偏僻的，流放者的处境也是最艰难的。

起初，斯大林被押送到一个不大的名叫科斯廷诺村的流放地去，但沙皇当局怕斯大林逃跑，于 1914 年 3 月将他转解到北极圈以北的库莱卡村流放地，警察并对他严加监视。

西伯利亚北部的叶尼塞—图鲁汉斯克地区，是一大片荒凉地带，从那儿逃跑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气候严寒，黑暗的冬季漫长，生活极其单调；盛夏时间短暂，蚊虫满天飞；冬天令人生畏的暴风雪，犹如飓风，把整个村庄埋在风雪之中。这一切使人更觉得孤独。生活就是像原始人那样要与大自然搏斗。许多流放者发了疯，自杀现象层出不穷。在这个地方，只有那些刚强健壮的人才能活下来；而这种经历在他们身上也永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据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回忆说，斯大林有时谈起西伯利亚，谈起西伯利亚那“严峻的美和粗犷沉默的人民”。他与当地人相处得很好。他们教他如何在叶尼塞河捕鱼，但他不像他们那样总守在一个地方，而是转来转去，直至找到一个鱼多的地方为止。他常常捕到很多鱼，以致他们以为他一定有什么魔力，于是喊道：“奥西普（他们给他起的名字），你最懂鱼的语言！”有一次，正是冬天，他在回家途中遇到了暴风雪，迷了路。他碰见当地两个农民，使他奇怪的是农民见到他后吓得跑开了。他后来才知

道，他的脸上沾满了冰雪，他们以为他是个恶鬼。

沙皇政府决心把斯大林与整个世界隔绝起来。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斯大林也未与列宁和彼得堡委员会断绝通信，并与住在流放地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联系。1915年夏，斯大林到曼纳斯特尔斯可耶村，在流放地的布尔什维克的大会上，他痛斥加米涅夫在审问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时的背叛行为。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斯大林继续坚持工作，写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

斯大林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英勇地熬过了这一切苦难，在二月革命之后，于1917年3月12日回到了彼得格勒。此后没有多久就与列宁再次会面了。正是：英雄磨难志更坚，回到京城谋造反。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章 难忘的 1917 年

帝国列强开大战，洒向人间都是怨；
人民群众齐奋起，沙皇政权被推翻。

在斯大林流放西伯利亚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给俄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40%的男子被征入伍，大片土地荒芜，粮价飞涨，物资奇缺，许多工厂停工，人民饥寒交迫，千百万人牺牲了生命。由于沙皇制度的腐败，俄军屡遭失利。德国军队占领了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和白俄罗斯一部分地区。大批居民背井离乡，生活极端困苦。广大人民群众对沙皇政府的不满日益增长。

在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和领导下，工人首先起来斗争。

1914 年后半年，发生了 70 次罢工，有近 3.5 万人参加；1915 年，罢工超过 1000 次，参加者达 50 多万人；1916 年，罢工 1500 起，参加人数超过 100 万。在工人运动影响下，士兵也不断展开反战斗争。早在 1914 年底，俄国士兵就在前线同德奥士兵联欢，1915 至 1916 年，这种事件不断出现。成千的士兵逃离前线，不愿再为沙皇卖命。1915 年 10 月，主力舰“甘古特号”水兵起义。海军当局以鱼艇等包围这艘军舰，迫使投降，随即逮捕近百名水兵，把 26 人判服苦役。

1916 年 10 月，当法庭审判另一批水兵时，13 万工人在彼得格勒党委会的号召下举行罢工，迫使政府不敢轻易判处水兵死刑。许多地区的农民也展开了斗争，他们夺取地主的粮食、牲畜和农具，烧毁庄园，撵走地主。被压迫民族也行动起来。

1916 年，在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曾发生几万人的起义。

大战时期列宁的革命理论，对人民群众起了巨大的动员作用。1917 年 2 月中旬，彼得格勒的普梯洛夫工厂开始罢工，其他工厂纷纷响应。到 24 日，罢工工人已达 20 万。工人在游行时高呼：“打倒沙皇！打倒战争！面包！”在群众已经觉醒的基础上，2 月 26 日，布尔什维克号召举行总起义，成立临时政府。工人积极响应号召，士兵也转向起义，到 27 日晚，已有 6 万以上的士兵转到革命方面来。起义工人和士兵很快就取得了胜利，逮捕沙皇的将军和 大臣，释放政治犯，并在当日晚举行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彼得格勒起义胜利的消息，推动了其他城市和前线士兵的起义。统治俄国达 300 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终于被革命力量推翻。

革命后的最初几天，继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之后，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苏维埃。但是，当布尔什维克在街头领导群众进行战斗，许多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还被关在牢狱里或仍在流放中的时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在苏维埃中窃取了领导权。他们惧怕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赶紧同国家杜马中的资产阶级代表达成协议，决定成立以李沃夫大公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加入临时政府的有米留柯夫为首的立宪民主党，和以古契科夫为首的十月党人，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克伦斯基等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也加入临时政府。列宁在国外揭露了这个临时政府的性质。他说：“这个新政府并不是偶然凑合起来的一群人。这是已经上升到执掌俄国政权地位的新阶级，即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但是，当时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政权，即苏维埃。因此，二月革命后，俄国就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二月革命之后，由秘密状态转向公开活动的布尔什维克党，展开了公开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以大量的事实揭发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性质，揭露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背叛行为，并且说明俄国各族人民如果不以苏维埃政府来代替临时政府，是不可能得到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的。关于二月革命的消息，斯大林是在西伯利亚听到的。

1917年3月8日，斯大林从西伯利亚起程并在途中打电报给住在瑞士的列宁表示祝贺。

1917年3月12日，斯大林到达彼得格勒。斯大林开始在这紧要时期参加党的领导，他团结全党为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斯大林参加和协助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活动。党中央局扩大会议委托斯大林领导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工作。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布尔什维克从这些文章中吸取对自己工作的指示。在第一篇《论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文章中，斯大林向党提出了一项任务，就是巩固苏维埃并普遍成立苏维埃，以作为人民革命政权机关的工兵代表中央苏维埃为首，把它们互相联系起来。斯大林在《论战争》这篇论文中向俄国劳动人民解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因政权转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之手而不含有帝国主义的性质。斯大林拥护列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并号召“撕下帝国主义的假面具，使群众认清这次战争的真实内幕，这也就等于向战争真正宣战，使现在这次战争不可能再打下去。”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人，坚决反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防御战的说法，反对党内其他机会主义者所持的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的半孟什维克立场。

1917年4月3日，列宁在长期流亡生活之后终于回到了彼得格勒。以斯大林为首的工人代表团前往别洛斯特洛夫车站迎接列宁。成千上万的士兵、工人和水手都到彼得格勒城芬兰车站欢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在车站前面的装甲车上发表了富有历史意义的演说，号召群众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4月4日，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大会上，以及后来在布尔什维克及孟什维克——全俄苏维埃会议代表——的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战争和革命的报告。列宁阐明了《四月提纲》。这是党争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天才计划。列宁首先指出：目前的战争对于俄国来说仍然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号召不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以任何帮助。他强调说明：“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不高和组织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

斯大林在解释列宁《四月提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斯大林在自己的论著中，如《论临时政府》、《土地归还农民》、《论玛丽亚宫的会议》、《五一》等，宣传了列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和“对临时政府不给予任何支持”的口号。

1917年4月24日至29日，布尔什维克举行第七次（4月）全俄代表会议。这是自建党以来，第一次公开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在党史上按其重要性来说，等于一次党代表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133个有表决权的代表，18个有发言权的代表，一共代表着8万名有组织的党员。

代表会议讨论了关于战争与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并且定出了党对于这些问题的路线，其中包括时局问题、战争问题、临时政府问题、苏维埃问题、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等。列宁在他所作的报告中发挥了他先前已在《四月

提纲》中说明过的原理。党的任务就是要实行从革命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使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掌握。列宁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作为党的最近任务。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口号的意义，就是说必须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即结束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分掌政权的局面，必须使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并将地主资本家代表驱逐出政权机关。代表会议认定，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始终不倦地向群众解释“临时政府按其性质说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一真理，同时必须揭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持妥协政策含有的致命危险，因为他们用虚伪的诺言欺骗群众，叫民众去受帝国主义战争和反革命势力的打击。

“四月会议”之后，斯大林协助列宁在工人和士兵中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士兵真理报》和《战壕真理报》。这两张报纸在动员士兵参加革命工作上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斯大林非常重视这两张报纸。他在《士兵真理报》上刊载的《我们期待于代表会议的是什么？》的文章中，通俗地说明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目的和任务，号召大家研究布尔什维克党“四月会议”的决议。在《昨天和今天》以及其他文章中，斯大林向士兵和工人们揭露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性质及其在战争中的掠夺目的。从6月16日到23日，列宁和斯大林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各军事组织的全俄代表会议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代表党中央向大会致敬并作了《论民族运动和民族军队》的报告。会议通过了斯大林提出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

斯大林和列宁一起组织了6月18日有历史意义的示威。斯大林以中央名义写了《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斯大林写道：

“让明天（6月18日）这个和平示威的日子，变成革命的彼得格勒对又猖獗起来的专横暴虐提出严重抗议的日子吧！”

“为了使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敌人恐惧，让明天飘扬着胜利的旗帜吧！”

“让你们的呐喊，革命战士的呐喊飞遍全世界，让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奴役者都欢乐吧！”

《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深刻而真实地表明了工人和士兵群众的期望和要求，表明了他们对和平与自由的意愿。

1917年6月18日的示威成了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的真正大检阅。示威表明了群众的革命倾向日益增长，表明了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党越来越信任。当4月18日临时政府宣布要继续战争时，10万人响应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号召，举行抗议示威。这次示威是临时政府危机的开端。6月18日又发生了50万人大示威。示威群众高呼口号：“打倒十大资本家部长！打倒战争！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次示威表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遭到了完全的失败。示威群众向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方面走去，要求苏维埃掌管政权，要求苏维埃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决裂而实行积极的和平政策。

尽管这次示威是和平性质的，但临时政府经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之后，即调来哥萨克队伍和士官生队伍加以镇压。在这之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与资产阶级白卫军便共同对布尔什维克党施加压力，加以迫害。7月5日清晨，《真理报》编辑部，以后还有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劳动印刷所均被捣毁，工人区遭到搜查，工人和示威

者团队的武器被收缴，党的许多积极分子被逮捕。彼得格勒驻军中的革命部队被撤出首都而调往前线。临时政府还以“叛国”罪和举行武装起义的罪名发出了逮捕列宁的命令。由于环境已经改变，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了。全部政权都掌握在临时政府的手中，反革命赢得了胜利。革命的和平时期已告终结，布尔什维克党转入秘密状态并开始准备起义，以使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

“七月事件”之后，资产阶级开始疯狂地迫害列宁。他们采取一切办法，对列宁施加报复，使革命失去领导。资产阶级报刊对列宁进行诽谤污蔑，要求列宁到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法庭去受审。当时，拯救列宁的生命，设法使他转入秘密状态，成了党的头等重要任务。然而，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极力主张列宁应当到反革命法庭去受审，斯大林则坚决反对列宁到法庭受审，他认为这不是什么审判，而是一种摧残手段，临时政府会把列宁当作威胁最大的敌人而加以肉体上的摧残。斯大林进行妥善安排，使列宁避开临时政府的迫害，并设法让他离开了彼得格勒。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在党内外组织了抗议迫害列宁的广泛活动。

面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行径，斯大林立刻写了《把队伍团结起来》、《发生了什么事件？》、《反革命的胜利》以及其他几篇文章。斯大林在这些文章中说明当前局势的特征，号召布尔什维克要力持镇静，聚集力量以便同反革命作坚决的斗争。

斯大林在《发生了什么事件？》一文中写道：“反革命的胜利就是地主的胜利。但是，农民无地再也活不下去。因此，同地主作坚决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反革命的胜利就是资本家的胜利。但是，如果不根本改善工人的生活，工人与资本家是不会相安无事的。因此，同资本家作坚决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反革命的胜利就是战争的继续，但是战争不能长久继续下去，因为全国都在战争的重压下喘不过气来。

“因此，反革命的胜利是不能持久的，只是暂时的。未来属于新的革命。”

斯大林用科学的分析向群众揭示了当前的斗争，用具体的斗争计划，对革命发展的历史远景，和对未来胜利的信心把他们武装起来了。7月中旬，斯大林在第二次彼得格勒全市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作了中央关于“七月事件”的总结报告和当前时局的报告。他明确地规定了党在新的条件下的斗争策略。代表会议广泛印发了由斯大林起草的《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宣言》。这个宣言在劳动者和士兵心中燃起了斗争的渴望，鼓起他们对胜利的颠扑不灭的信心。斯大林写道：“革命没有覆亡，它只是隐蔽起来了，以便聚集新的力量，再次有力地向敌人冲击。”

为了应付新的局势，布尔什维克党于1917年7月26日到8月3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第六次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伦敦第五次代表大会10年后，在布拉格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5年后召开的。代表大会是秘密举行的。报纸上只公布了召集代表大会的消息，没有指明代表大会开会的地点。列宁因受临时政府的通缉、侦捕而未能出席代表大会。会议由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人主持。参加这次大会的有157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2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当时党员人数将近24万。

在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代表党中央做了政治报告。对当前斗争形势，斯

大林明确指出，不管资产阶级怎样设法镇压革命，但革命还是在增长和发展。革命提出了对生产和产品分配实行工人监督，土地转归农民，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归工人阶级和穷苦农民等问题。他说，革命按其性质来说，已是社会主义的了。“七月事件”以后，政权已集中在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手中，这个政府还在继续解除革命武装，摧残革命组织，摧残布尔什维克党。革命和平发展的前途已经断绝，必须用暴力推翻临时政府而夺取政权。在这场革命中，必须注意巩固工农联盟，农民特别是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反对武装夺取政权的意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坚持只有“当西欧无产阶级发生革命时，才有可能把俄国引上社会主义道路”。而布哈林则认为，农民怀有“护国主义情绪”，他们已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决不会跟着工人阶级走。代表大会否决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两人所提出的修正案，而批准了斯大林所提出的决议草案。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其所有一切决议中，特别着重强调了列宁认定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联盟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保证的原理。

代表大会还通过了新的党章，并接受了“区联派”及其首领托洛茨基入党。这是个人数不多的集团，从1913年起便存在于彼得格勒，其中所包括的是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以及一部分从党内分裂出去的从前的布尔什维克。“区联派”进行过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斗争，但在许多问题上他们对孟什维克也不尽表赞同，因此他们在许多问题上采取中间的动摇的立场。第六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区联派”声明，他们同意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并请求接受他们入党。代表大会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并将托洛茨基选为党中央委员，指望他们经过一些时候将会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有些“区联派”分子，后来真正成了布尔什维克。

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一切决议，都是为着准备无产阶级举行起义。代表大会在其发表的全党宣言中，号召工人、士兵和农民准备力量去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宣言的结语是：“我们的战斗同志们，准备迎接新的战斗！要坚定、勇敢、镇静，不受挑拨，积蓄力量，列成战斗的队伍！无产者和士兵们，站到党的旗帜下来！农村的被压迫者们，站到我们的旗帜下来！”

为了引导全党实现大会的决议，增强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信心，斯大林在大会结论中进一步指出，俄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有顺利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更大可能，因为俄国工人阶级已高度地组织起来，领导它的是真正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俄国无产阶级有强大的同盟者，即贫苦农民。斯大林说，在国内出现新的、强大的政治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任何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因为人民群众对于和平、土地、工人监督生产的要求还没有得到满足。他说，新的运动的基本力量将是城市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因此，布尔什维克必须注意在贫穷农民中间开展巨大的工作，把贫雇农组织起来，把它们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正是他们一旦获得了胜利，就会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根据列宁的指示，斯大林提议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因为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苏维埃，已滚入资产阶级营垒，并充当了临时政府帮凶的角色。斯大林说，“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应该收回。但暂时收回这个口号决不等于放弃夺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当时所说的不是

作为革命斗争机关的一般苏维埃，而只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苏维埃。斯大林强调指出：“现在我们提出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及贫苦农民的口号。因此，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把政权交给什么阶级，问题在于苏维埃的成分。”

在代表大会上，有人反映资产阶级的影响，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对此斯大林给予了坚决的反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企图使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为转移。为了回答他的卖弄玄虚，斯大林说道：“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有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主张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的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大会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代表们支持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学说。

俄国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就准备把削弱了的苏维埃消灭掉，建立赤裸裸的反革命专政。

1917年8月底，爆发了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反革命叛乱。他企图在俄国建立资产阶级军事专政。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号召工人、士兵对反革命积极开展武装的反击。在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的日子里，布尔什维克继续揭露克伦斯基政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用自己的政策在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的阴谋。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布尔什维克深入的思想发动，数以千万计的武装工人赤卫队建立起来了，白卫军士兵在党组织的鼓动下也纷纷发生兵变。结果，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叛乱被粉碎了。

斯大林把1917年9月至10月时期，称为“组织冲击时期”。斯大林写道：“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危机的迅速增长，统治集团的茫然失措，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孤立及动摇分子大量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在粉碎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叛乱之后，国内新的革命高潮开始了。贫苦的农民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阶级的周围团结起来了，中农开始更多地转到无产阶级方面。在8月底和9月间，布尔什维克在各地苏维埃，首先是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斯大林9月17日在《工人之路报》上写道：“革命正在进行。7月里被枪杀了的而在莫斯科会议上‘被埋葬的’革命，又重新抬起头来，摧毁旧障碍，建立着新政权。继科尔尼洛夫之后，退却的是加列金。在斗争烽火中奄奄一息的苏维埃又复活了。它们又掌握了舵盘，引导着革命群众前进。”

党中央又重新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但这已不是把政权用和平的方法转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苏维埃手中的旧口号了。斯大林说：“现在这个口号意味着与帝国主义的彻底决裂，把政权交给布尔什维克，因为大多数苏维埃已是布尔什维克的了。现在这个口号意味着用起义的方法使革命直接达到无产阶级专政。况且，现在这个口号的意思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和国家的形成。”

科尔尼洛夫叛乱被肃清之后，反革命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疯狂进行反扑。临时政府绝望地准备对革命决一死战。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党中央的决定，斯大林直接领导准备起义的一切事宜。他召见各省组织的代表，给他们以指示并指出各省的战斗任务。他的指导性的文章都由各省市布尔什维克报纸加以转载。

9月12日到14日，列宁写好了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委员会的两封指示信——《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他指出：“布尔什维克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之后，能够而且必须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9月15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讨论了列宁的这两封信。根据斯大林的提议，中央通过了将列宁的指示信分发给布尔什维克党各个最大组织的决议，并决定动员党的一切力量来组织胜利的起义。

10月7日，列宁秘密地来到了彼得格勒。斯大林向列宁报告了武装起义的准备情况。在10月10日至16日举行的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党中央通过了列宁和斯大林制定的武装起义计划。这次会议也坚决驳斥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的建议。斯大林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所提出的办法，客观上是让反革命有可能准备和组织起来，而要我们无止境地退却下去，使革命遭受失败。试问，为什么我们不应保证自己有可能选择起义的日期和条件，使反革命没有可能组织起来呢？”会上确定斯大林为中央政治局领导武装起义的总指挥。后来斯大林写道：“我回忆起1917年的情景，当时我经历了牢狱和流放地的飘泊生活以后，奉党的命令转到列宁格勒去工作了。正是在那里，在俄国工人中间，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列宁身旁，在无产阶级反资产阶级伟大搏斗的风暴中，在帝国主义战争环境内，我第一次懂得了怎样才配做一个伟大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人。正是在那里，在俄国工人中间，在这些被压迫民族解放者以及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先锋中间，我受到第三次战斗的革命洗礼。正是在那里，在俄国，在列宁领导下，我成了一个革命家。”

为了加强对这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列宁和斯大林往各处都派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代表。顿巴斯的起义准备事宜由伏罗希洛夫领导，北高加索是基洛夫，自俄罗斯是卡冈诺维奇，乌拉尔是日丹诺夫。在莫斯科准备指挥这次历史性战斗的是斯克沃尔措夫、斯捷潘诺夫、雅罗斯拉夫斯基等人。在彼得格勒，托洛茨基于9月当选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并在十月革命期间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

10月24日早晨，克伦斯基下令封闭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人之路报》，并派装甲车包围该报编辑部和印刷所。临时政府对革命展开了攻势。但就在同一天的早晨，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赤卫队员与革命士兵击退了反革命军队，并在印刷所和编辑部周围加岗防卫。到上午11点钟的时候，《工人之路报》出版了，发表了斯大林写的号召推翻临时政府的社论。

斯大林在这篇题为《我们需要什么？》的社论中写道：

“时机到了，此时若再稍事延缓，就会葬送整个革命事业。

“需要以新的工农政府来代替现在的地主和资本家政府。

“需要以人民公认的，由工农兵代表选举的并对这些代表负责的政府，来代替目前的不是由人民选举的也不对人民负责的伪政府。

“需要以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的苏维埃政府，来代替克伦斯基的反动政府。”

起义开始了。起义总指挥斯大林和领导成员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始终留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里。他们制订了详细的起义计划，布置部队占领电报局和电话局。革命军事委员会分派部队把守桥梁，以便与各区保持联系。

10月24日夜，列宁由他最后的秘密住处来到了斯莫尔尼宫，亲自担

负起领导起义的重任。整夜都有革命军队和赤卫队向斯莫尔尼宫开来。布尔什维克随即将这些部队派往首都中心去包围临时政府盘踞着的冬宫。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所在的斯莫尔尼宫，成了革命的战斗司令部。

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赤卫队和革命军队占领了各火车站、邮政局、电报局、政府各部以及国家银行。预备国会被解散了。在这些战斗的日子里，彼得格勒工人表明他们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受到了很好的锻炼。参加起义的革命军队，认真地执行了总指挥部的战斗命令，同赤卫队肩并肩地进行了战斗。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堡垒，这里早就不承认临时政府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以其向冬宫轰击的炮声，报道了10月25日是新纪元，即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新纪元的开始。这天深夜，革命的工人、士兵和水兵攻下了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人员。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了。

1917年10月25日晚上10点45分，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宣布开幕，当时彼得格勒的胜利起义已达沸点，首都的政权事实上已掌握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手中。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说：“根据绝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依靠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所举行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革命政权诞生的第二天，10月26日夜间，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代表大会向各交战国建议，立即缔结至少3个月的停战协定，以便进行和平谈判。代表大会向一切交战国的政府和人民呼吁的同时，又向英法德三国工人阶级呼吁，号召他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

同一天晚上，苏维埃代表大会又通过了《土地法令》，规定“立刻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不付任何赎金”。这个土地法令的基础就是根据242份地方农民委托书拟定的全国农民委托书。根据这个委托书，土地私有制永远废除，而代之以全民的、国家的土地所有制。地主、皇族和寺院的土地，一律无偿地交给全体劳动者使用。按照这个法令，农民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共获得了1.5亿俄亩以上的新土地，并从而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的5亿卢布的租金。

土地法令规定，所有地下矿藏，森林和水流都转归人民所有。

最后，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第一届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从此，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诞生了。正是：

俄国大地起苍黄，
风卷红旗人心畅；
人民当家做主人，
天翻地覆慨而慷。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章 保卫苏维埃

革命政权岌岌危，外国列强合力摧；
工农红军齐奋战，武装干涉被粉碎。

虽说十月革命胜利了，但形势仍十分险峻。俄国无产阶级不仅面临国内阶级敌人的负隅顽抗，而且还有帝国主义列强的严重干涉。不论新诞生的苏维埃政府怎样三番五次地提出建议，英、法总是断然拒绝举行任何和谈。列宁主张，为了拯救年轻的共和国，必须结束战争，复员沙皇旧军队，赶快同德国议和。

在中央委员会里，列宁的尽快单独同德国议和的主张，遭到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不顾一切地反对和平，主张继续进行战争。反对派对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信心。对此，托洛茨基施展权术，装作站在“中间”立场上，实际上支持布哈林派。布尔什维主义的所有反对派，都是以托洛茨基的论点为出发点，即认为假如国际革命的正式援助不能及时到来，苏维埃共和国将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悲惨的结果。

从列宁由前线收到的详细情报中可以看出，军队没有斗志，再不能打下去了；士兵一心想回家。工人和农民都厌恶长期的战争，国民经济已经完全崩溃。就在这些日子里，德军迅速向前推进的消息不断传来。德国人利用他们的突击部队，很快攻占了不止城市。

1918年2月18日，列宁在一次中央特别会议上说：“一秒钟也不能再等待了，已经折腾得够受了！”他指出，德国的条件，无论多么苛刻，必须立刻接受。没有别的选择，任何别的决定就等于宣布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列宁说，假如那种玩弄革命词藻的政策继续下去，他将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他将向党呼吁，党是会拥护他的。他将为他的路线而斗争。他反复向中央委员会解释，对德宣战将会助长俄国资产阶级的煽动，将会葬送苏维埃政府，并使工农在这些日子里所争取到的一切化为乌有。“我们必须懂得怎样退却，我们必须善于等候时机，我们必须利用这一喘息时机来加强力量。”

在中央委员会上，斯大林坚决拥护列宁的政策。他说：“我们必须立刻接受这些条件，签订和约。和平将给我们以喘息时机。我们要利用这个喘息时机说服人民，积蓄力量，要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并建立一支忠于苏维埃的人民的军队，否则我们将来还会像现在这样遭受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

由于大多数投票赞成，中央委员会接受了德国的全部条件。但是，乌里茨基代表布哈林、皮达可夫等宣称，他们要辞去党和苏维埃中的职务，托洛茨基也在这时递了辞呈。但是，列宁像狂涛中的岩石那样屹立不动。他们的辞呈吓不住他。列宁在斯大林等人的支持下，还是坚持立即缔结和约的政策。

为了拯救革命，在经过激烈争吵的会议之后，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终于接受了德国的和平条件。和约于1918年3月3日签订。根据和约的条款，俄国失去了126.7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包括俄国农田的27%），6200万人口，26%的铁路和75%的钢铁工业。布尔什维克政权保住了，但是即便在沙皇的统治下，这个国家也从未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和耻辱。后来，当代表团准备把布列斯特和约的正本给列宁看时，他特别指出说：“如果我有任何办法避免这样一个和约，我是既不愿看它，也不愿遵守它的。”但是，不行啊，“我们没有军队，士兵都不愿打了，而围

绕着我们的是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强盗。沙皇旧军队是我们国家的病灶，它和旧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愈早解散愈好。客观形势逼迫我们不得不签订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在紧接着十月革命后的几个月里，苏维埃政权利用签订和约这样一个喘息的机会，开始在俄国中部及莫斯科、彼得格勒等主要城市，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是，沙皇将军和官吏、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们仍不承认工人阶级的胜利。他们在十月革命起初的一些战斗中受到挫败之后，开始在工业无产阶级力量小而富农势力大的顿河地区、库班地区和乌克兰地区聚集并巩固反革命武装力量，继续和新生的革命政权进行残酷的较量。因此，在俄国大地上，一场暴力、仇恨和杀戮的风暴席卷全国。这是历史上最残酷的内战之一，它在俄罗斯广阔的平原上展开，成千上万的人卷了进去，其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这场内战并非突然爆发的。正如一场地震之前有预震一样，内战远在南方先开始了。与此同时，在彼得格勒地区破坏事件一个接一个发生。1918年3月，党中央把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这项决定是作为权宜之计仓促做出的。列宁说：“如果德国人把彼得格勒连同我们一举拿下，革命就完蛋了。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在莫斯科，那么彼得格勒的失陷只是严重的局部挫折。”这次迁都在苏俄历史上以及在斯大林个人生活中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

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这两个城市在俄罗斯民族历史上具有不同的特征。莫斯科是古都，俄国就是在它周围诞生的。在那里，由亚洲和东正教传统混合而成的古老的俄罗斯沙皇帝国，被奉若神明。几个世纪以来，俄国人一直把它视为圣地。克里姆林宫是一座神秘可怖的城堡，里面教堂的金黄色圆屋顶更增添了它原始的美，它仍然保留了作为沙皇宫殿的特色，受人尊敬，令人畏惧，具有绝对的权威。如今，它又成了新生的苏俄革命领导机关的所在地了。

彼得格勒是彼得大帝在18世纪初建造的一座雄伟壮丽的城市。它是西方思想和技术输入的大门，体现了俄国同西方的密切关系。革命前这两个城市代表着俄罗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彼得格勒人认为，莫斯科是俄国生活中一切保守和落后东西的中心。另一方面，莫斯科人则把彼得格勒斥为危险的暴发户。莫斯科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西方，并为自己作为古老的、自给自足的和优越的莫斯科生活方式的卫士而感到自豪。如今，作为革命诞生地彼得格勒的人民，更为他们把伟大的西方革命学说马克思主义引进俄国而感到骄傲。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多数领导人，在精神上属于彼得格勒。他们面向西方，期望着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但是，斯大林从他青少年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影响来说，更多地带有亚洲特性的莫斯科传统。

在苏俄领导机关迁到莫斯科后，列宁和他所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全部移住克里姆林宫。列宁的住所包括5个小房间，他自己使用的房间面积只有16平方米。里面有一张小书桌，一张铁床，两把椅子，一扇窗子。在1918年，那时走廊上装着一架电报机，从列宁的屋子通到他的办公室和人民委员会。日夜都有电报打进打出。办公室的隔壁是克里姆林宫的电话总机所在，这里有专线通到各人民委员部，通到斯大林的屋子里，通到彼得格勒和其他一些城市，通到各个战场，从这里把命令发出去。列宁和他所领导的党中央，在指挥着一场惊心动魄的保卫苏维埃的战争。

战争的第一阶段在 1918 年 1 月就开始了。沙皇军官米哈伊·阿列克谢耶夫将军逃到了南方，加入了在顿河地区已建立哥萨克政权的阿列克谢·卡列金的队伍。在那儿，阿列克谢耶夫招兵买马，组织了一支“志愿军”，即由旧沙皇军官、士官生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组成的白匪军。列宁和斯大林随后派主力部队进入顿河地区，打垮了卡列金反革命政权。阿列克谢耶夫的自卫“志愿军”也被迫退到库班地区。在严寒刺骨的冬天，许多人死在通过凄凉大草原的途中。得到库班军队增援以后，改由科尔尼洛夫指挥的白卫“志愿军”，向驻有 3 万多红军的叶卡捷琳诺达尔发动进攻。经过 4 天的残酷战斗后，科尔尼洛夫被红军的一发炮弹打死，进攻被粉碎了。5 月初，德国军队占领了罗斯托夫，白匪军又回到顿河地区，这儿成了反革命分子的集结点。

1918 年夏天，由于外国的干涉，战局进一步严峻了。帝国主义列强不甘心于俄国无产阶级战胜地主和资产阶级。他们看到这即将燃起的革命烈火，很容易燃烧到欧洲其他国家。此外，英国和法国还在俄国工业中投资了几十亿卢布，他们对此是不甘愿轻易舍弃的。苏维埃政府遵照列宁的命令，虽然多次向“协约国”建议缔结和约，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不承认苏维埃政府，他们竭力援助俄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并准备了进攻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

早在 1917 年底，英国和法国就已缔结了共同进攻和瓜分俄国的协定。

1918 年，在丘吉尔的煽动下，英、法、日、美帝国主义者，未经宣战而径直开始了武装干涉。这些打着“文明”旗号的外国军队，像盗贼一般，潜入俄国边境，开进俄国领土。

在俄国北部，英、法、美三国军队登陆，占领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扶持那里的白军叛乱，推翻当地的苏维埃政权，成立白匪“俄国北方政府”。在海参崴，日、英、美干涉军登陆，占领沿海城市，驱散苏维埃，扶持复辟资产阶级制度的白军叛乱分子。在北高加索，阿列克谢耶夫和邓尼金等沙皇将军，在英、法援助下组织白卫“志愿军”，发动哥萨克上层分子叛乱，开始向苏维埃政权大举进攻。在顿河一带，克拉斯诺夫将军和马蒙托夫将军，在德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发动顿河哥萨克的叛乱，占领顿河区，并开始向苏维埃政权大举进攻。

在伏尔加河中游和西伯利亚一带，英法帝国主义阴谋策划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这个军团原是由战俘组成，经苏维埃政府允许取道西伯利亚和远东而开回本国的，但他们在中途却被社会革命党人和英法两国利用来举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当这个军团举行叛乱时，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一带的富农和剥削阶级立即响应，他们在伏尔加河岸成立了萨马拉白卫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府，在鄂木斯克成立了西伯利亚白卫政府。

德国虽然没有参加英、法、日、美联盟所进行的武装干涉，但它确实用了各种办法来孤立、削弱并消灭这个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它从苏俄夺去了乌克兰，用残暴手段劫掠和压迫乌克兰人民，禁止乌克兰人民同苏维埃俄国保持任何联系。他们从苏俄方面夺去了南高加索，还应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民族主义者之请，调派德、土军队进驻该地，在第比利斯和巴库肆意横行。他们多方设法用军火和粮食援助当时在顿河区举行叛乱的克拉斯诺夫将军，反对苏维埃政权。

这样，苏维埃俄国就与各个盛产粮食、原料和燃料的富饶区域隔绝了。当时新生的共和国困难重重，粮食供应不足，工人忍饥挨饿。各城市的工人，每天只能领到 1/8 磅的面包，甚至还有完全领不到食物的日子。工厂因为缺

乏原料和燃料，不得不停止生产，或半停止生产。为了应付国内外敌人的严重挑战，克服难关，党宣布全国为军营，并把全国经济和文化政治生活转入战时轨道。苏维埃政府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并号召人民努力生产，支援抗战。列宁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于是几十万工人和农民自愿加入红军，开往前线作战。各级党团组织约有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党团员奔赴前线了。党发动全国人民进行卫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和武装侵犯，反对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的叛乱。由于实行义务兵役制的结果，红军很快由几十万人发展为百万大军。在这场保卫苏维埃的严酷斗争中，斯大林作为列宁的主要助手之一，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苏联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列宁，唤起千百万工人和劳动农民群众来保卫自己的祖国，他为着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建设，为着建立和巩固红军等重要任务而呕心沥血。作为列宁的主要助手之一，斯大林担负着十分繁重的工作。这时他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国家监察部人民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是列宁在组织和领导苏维埃国家国防事务上的主要支柱之一。

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苏维埃共和国遭到了极大的困难。工厂停工，水路和铁路交通均告断绝。年轻的苏维埃国家面临着最可怕的敌人——饥饿。帝国主义者和白卫军用战争的铁钳将共和国包围起来，打算用饥饿的魔掌来摧垮苏维埃政权。只有从伏尔加河下游和北高加索才能取得粮食来挽救革命的危机，而察里津是沿着伏尔加河到那里去的必经之路。党中央根据列宁的提议，派斯大林前往察里津工作，任命他为南俄粮务总监，并让他担任代表党中央负责南方战场的总指挥。

1918年5月底，斯大林在他新婚的妻子、年轻的妇女社会活动家纳佳·阿利卢耶娃的陪同下，由两辆装甲车和400名赤卫队护送，穿过敌人层层封锁线，于6月6日抵达察里津。第二天他向列宁报告说，他发现了“一片混乱，投机盛行”，并当即采取了措施。他把那些腐化堕落和办事不力的官员撤了职，解散了一些敌对的“革命委员会”，任命了一些政治委员去整顿劳工和运输组织，并在短期内征集了一大批粮食，以确保对莫斯科的粮食供应。1918年6月11日，列宁以党和政府的名义在人民委员会《告全体劳动人民书》中写道：外国及俄国的帝国主义者，想用饥饿来绞杀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东南方正在帮助闹饥荒的北方。在察里津领导顿河和库班粮食工作的人民委员斯大林，打电报给我们，说那边有大量贮藏的粮食，他希冀于最近数周内将这些粮食运到北方来。”

斯大林在最紧要的粮食战线上获得了相当的成就。他树立了巩固的革命秩序，无情地摧毁了富农的怠工和投机，调整了与农民的商品交换，保证了铁路和水路的运输。由于斯大林的工作成就，5个月中约500万普特粮食及其他食物运给了共和国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和红军。这便粉碎了敌人用饥饿来绞杀苏维埃国家的阴谋。

斯大林在南方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就看出察里津的重要性。它位于伏尔加河弯曲部分的西岸，城市沿河约18英里长，是南俄的工业重镇，守卫着伏尔加河的门户。它是反革命实行主要打击的目标。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所抱的目的就是占领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心，以便使苏维埃共和国与粮食产地和巴库石油区隔绝开来，在这里把顿河一带的反革命势力与高尔察克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军队汇合起来，一同进攻莫斯科。因此，无论花多少代

价都要保卫住察里津，粉碎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阴谋。这个任务，在指挥国家整个东南方防务的斯大林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斯大林以迅速果断的步骤整顿软弱无力的军事指挥机关，从军事机构中将托洛茨基的代理人、怠工者和叛卖者清除出去，展开建设察里津战线正规军的工作。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将以前零散的游击队伍和赤卫军编成正规的师、旅、团。斯大林迅速从顿巴斯调来了伏罗希洛夫的部队，以他们为核心，重新编成第十集团军，由英勇善战的工人出身的伏罗希洛夫担任察里津集团军司令。又将萨里斯克草原的骑兵游击队改编成正规的骑兵部队，由精神抖擞的原骑兵中士布琼尼负责这支部队。这些队伍的组建，对保卫察里津、粉碎国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18年7月7日，列宁在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向他通报了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搞暴动一事，并告诫说，“必须无情地镇压这些已经成为反革命手中工具的可鄙的歇斯底里的冒险分子。因此，请无情地镇压反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人’，并经常地保持我们之间的联系。”

就在那年夏天，社会革命党人趁火打劫，他们在“革命”的口号下，多方制造事端，妄图颠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7月6日，两名社会革命党人进入德国大使馆，他们开枪打死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他们搞暗杀的目的是想刺激德国废除和约并进攻俄国。同一天，社会革命党人还企图以一支数千人的队伍接管莫斯科市。这支队伍晚上到达大剧院，在那里，他们发现有强大的布尔什维克部队严阵以待，于是一枪未发便偷偷地撤到他们的大本营，后来被缴械投降了。从此，社会革命党被宣布为非法团体。但是，这伙狂热的亡命之徒转而求助于恐怖主义，作为他们对付革命的主要政治武器。1918年8月30日，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的领导人乌里茨基被他们暗杀。与此同时，列宁也受到年轻的犹太人范尼娅·卡普兰的枪击而负伤。他被送回克里姆林宫，经过令人忧虑的两天两夜之后，伤势开始好转。到9月19日才恢复工作。

在这段列宁所说的革命最危急的日子里，当内战和面包战达到炽热化的程度时，反革命恐怖活动十分猖獗，地富分子和沙皇余孽到处枪杀布尔什维克党和革命群众，制造了无数的流血惨案，致使广大工农群众的愤怒被激发起来，如同火山爆发时喷射出来的沸腾熔岩一样，复仇的声浪遍及全国。内务人民委员彼得罗夫斯基向所有各地的苏维埃发布一项通告，“地方苏维埃政府应立即逮捕所有社会革命党人；肃反委员会和军事部门应作出特殊努力，寻捕所有那些隐姓埋名的反革命分子，并指示对于那些同白军勾结的罪大恶极的奸特和反对工人阶级和苏维埃政府的卑鄙的阴谋家，可不经任何法定手续予以处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罪恶昭著的并同外国势力勾结的尼古拉二世被革命政府处以极刑。

斯大林在察里津工作时，经常同党中央和列宁保持着联系。他向列宁报告购粮、运粮的情况，前线战局及建军和巩固后方的措施。斯大林的结论和措施总是得到列宁的嘉许和支持。8月7日斯大林写道：“我迫切请求即刻满足他们对武器的需求……前线的形势略有改进，如果我们的要求能及时实现，我们一定会打败哥萨克。”同年8月31日，斯大林再次写信给列宁，请求派驱逐舰和潜水艇前去，以便确保在保卫南方和里海的斗争中获得胜利。斯大林在这封信的结尾说：“我们前线的情况很好，我确信将来会更好。”斯大林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使察里津的保卫者空前地团结起来，成为一支战

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中坚力量。

1918年夏秋，形势进一步吃紧，察里津再次成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最重要的战区之一。北高加索的粮食，巴库的石油，中亚的棉花，都要通过这一工业铁路枢纽和伏尔加河的港口，才能提供给国家的中心地区。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这一无产阶级前哨，成了当时顿河流域和东部反革命力量聚合的主要路障。斯大林决心采取一切措施，使察里津掌握在苏维埃政权手中。当时察里津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同时这里又潜伏了不少从中部地区逃来的社会革命党人、前军官、资本家和其他敌视苏维埃的分子，其中一部分人又以“革命的面目”钻进了民政机关和军事机关。这一切都孕育着严重的后果。

根据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倡议，7月17日举行了察里津战线的军事指挥员、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联席会议，讨论面临的严重局势。会议制定了加强政治领导和提高革命警惕的措施。这一切都报告了莫斯科，征得列宁的同意后，于1918年7月19日建立了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斯大林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和察里津苏维埃主席米宁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在军事委员会和市党委的领导下，经过充分的思想发动和大量的组织工作，察里津的工人阶级给部队提供了大量的新的战斗装备，他们修好了300门大炮，制造了11辆装甲列车和18辆装甲汽车。全市许多工厂都为军队生产枪支弹药。数以万计的市民参加挖战壕和修筑阵地工事。为了同机动性强的白卫哥萨克骑兵部队作战，斯大林又组建了几个用大量机枪和大炮装备起来的加强师；原红军骑兵部队改编成更大的炮兵部队。为了支持步兵和骑兵作战，组建了装甲纵队，由工人出身的英雄战将阿利亚勃耶夫负责指挥。所有这些都加强了察里津的防卫，并能在个别地段发动战役性的进攻，从而打破了敌人的封锁包围。

到了8月份，敌人的增援部队又从四面八方围聚在察里津周围，再次发起新的进攻。敌人从侧翼对伏尔加河沿岸形成的半圆形包围圈越收越紧。为了达到夺取察里津的既定目标，白卫军克拉斯诺夫将军放手让士兵肆意抢劫。“在夺取察里津以后，我给你们放假三天。”他宣布，“抢到的所有东西都归你们自己。你们可以抢，并且可以寄回家给亲人。”

察里津再次处于敌人的紧密包围之中。当时，十月革命的成果有得而复失的危险，东面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在北面和卡斯皮伊河沿岸是英国和法国军队，在南面驻有克拉斯诺夫匪军和德国的军队。他们要推翻苏维埃政权，从农民手中夺回土地，压迫获得自由的无产阶级，让资本家、地主和沙俄将军们重新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8月11日，斯大林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说，“察里津被包围了！察里津可能陷落了！……”他号召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红军指战员和工人阶级，紧急动员起来，保卫察里津，保卫革命胜利果实，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他在命令中给各作战区、段布置了新任务。在这些紧张的日日夜夜里，斯大林彻夜不眠，领导保卫察里津，参加浴血战斗。他的号召有力地提高了察里津保卫者的士气。在和敌人生死拼搏中，伏罗希洛夫亲自带领部队冲杀。他大声喊道：“同志们，向前冲啊！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后面就是伏尔加河。革命的儿子们，跟我来！”就这样，终于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保卫住了这座英雄的城市。

为此，列宁于9月19日，以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给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保卫察里津的指战员们发来了贺电。电报说：

“请转达我们对奋不顾身的为建立工农政权而战的察里津前线的英雄指挥员们，以及全体革命军人们的兄弟般问候。请转告他们，苏维埃俄国十分赞扬胡贾科夫、哈尔钦科和科尔帕科夫的共产主义团队和革命团队的英雄战绩，十分赞扬杜缅科和布拉特金的炮兵部队，阿利亚勃耶夫的装甲列车队，和佐洛塔列夫的伏尔加河区舰队所建树的英雄战绩。

“高举红旗，奋勇向前，毫不留情地消灭地主——将军反革命势力和富农反革命势力，向全世界表明，社会主义的俄国是不可战胜的。”

斯大林以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坚不可摧的精力和意志，粉碎了敌人多次夺取察里津的一切企图。1918年11月间，察里津的保卫者们继续掌握着各个方面的战斗主动权。在许多地段，敌人被迫撤退。白卫哥萨克夺取俄国东南部最重要的战略据点的第二次尝试彻底失败了。白卫哥萨克在1919年1月发动的第三次攻势也被粉碎了。

在保卫察里津的壮丽史诗中，斯大林和他的战友们提供了新的、更高级的战略与战术的非凡范例。他们巧妙地采用了步兵、骑兵与炮兵、铁甲列车和伏尔加河军舰的协同作战，表明进攻是防御战最好的形式。依照劳动人民的请求，这个光荣不朽的城市——察里津命名为斯大林格勒，以纪念斯大林在保卫察里津战斗中的功绩。

1918年末，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工人和农民，如火如荼地展开驱逐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由察里津归来的斯大林，又奉党中央之命，去组织乌克兰战线。1918年11月底，在斯大林的指挥下，乌克兰战线的部队迅速解放了哈尔科夫，并继续向基辅和顿巴斯挺进，把皮特柳尔白匪和德国侵略军从乌克兰领土上撵了出去。12月10日，红军解放了明斯克，以后又解放了白俄罗斯的其他城市。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大部领土也很快光复了。

1918年12月，东方战线告急，红军第三集团军在与高尔察克匪军的战斗中连吃败仗，元气大伤，并于12月24日放弃皮尔姆。这样便产生了西伯利亚反革命势力与由阿尔汉格尔斯克向前挺进的英、美干涉军会师的危险。为了挽救这种危急局势，经列宁提议，党中央委员会和国际委员会决定派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组成的党的审查委员会到东方战线去，调查皮尔姆失守的原因，并采取措施扭转东线的战局。1919年1月5日，斯大林抵达前线后，及时查明了失利的原因，迅速整顿了第三集团军参谋部的程序，加强了领导，补充了新的步兵团和骑兵团，组成了神速的滑雪出征队，随即向白匪和干涉军展开了有力的反击。与此同时，还采取各种措施来清洗和巩固后方。在维亚特卡城（现改名基洛夫城）设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便统一东部战区党政军和革命委员会的活动，把广大劳动人民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斯大林采取这些措施的结果，使东线形势发生根本性的转折。第三集团军有效地阻止了白匪的进攻，并在东线转入反攻。红军信心百倍地向前挺进了。1月22日解放奥伦堡城，1月24日英勇的夏伯阳师团进入乌拉尔斯克。到1919年春天，白匪高尔察克的部队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列宁对斯大林在东方战线所作出的努力十分赞赏。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斯大林规定了改造党、苏维埃和军事机关的工作办法，制订了巩固苏维埃国家国防能力的完备而严格的纲领。在军事建设方面，为动员和整编、建立常备军和加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以及大兵团协同作战等创造了宝贵的经验。在1919年3月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他捍卫了列宁的建

党、建军原则，粉碎了“军事反对派”的有害论点。“军事反对派”维护军队中的游击主义残余，反对建立正规红军，反对利用军事专家，反对铁的纪律。斯大林在演说中指出，只是在有了“富有遵守纪律精神、有善于做思想工作的政治部、一旦接到命令即善于而能够奋起抗敌的正规军”时，才能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斯大林的发言，受到大会的热烈欢迎。

1919年春天，英、法、美等帝国主义组织了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联合征讨”，再次掀起了武装干涉的新高潮。高尔察克是这次进犯的主要突击力量。帝国主义者趁着红军与高尔察克大战方酣之际，又派尤登尼奇将军所部进攻彼得格勒，派芬兰白军和爱沙尼亚白军以及英国舰队到波罗的海来声援他们。在红军后方的反革命也猖獗起来。新生共和国再次面临严重的危险。

为了组织在彼得格勒近郊对白军的反击，党中央特派斯大林前去彼得格勒掌握保卫战的全盘事宜。他发动红军战士和工人保卫城市。5月底6月初，他亲自到处于白军直接打击之下的加特琴纳地区去，到危急万分的纳尔瓦前线去，视察卡列里地峡的防务，就地采取击退敌人攻势的对策。斯大林特别重视波罗的海舰队的作用，他采取种种办法，清除了波罗的海舰队中的叛徒和间谍，恢复了波罗的海海军的战斗威力。5月25日，斯大林向列宁报告说：“我确信，我们舰队正在变成名副其实的舰队，它有纪律严明的水兵，准备用一切力量保卫彼得格勒。”波罗的海的战士们，没有辜负斯大林对他们的高度评价。

1919年五六两月，波罗的海舰队给了侵犯苏维埃共和国的英国武装干涉者以毁灭性的打击。6月14日，舰队水兵和工人分遣队又奉斯大林之命，查剿了彼得格勒间谍破坏分子的巢穴，收缴了他们的武器，把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消灭了，从而粉碎了英、法帝国主义企图利用勾结者和间谍破坏分子，对彼得格勒保卫者从背后施加打击的阴谋。

在保卫彼得格勒的这些日子里，斯大林还领导了肃清“红丘”和“灰马”两个炮台的反革命叛乱工作。这次叛乱是武装干涉者在叛徒的帮助下制造的。在奥兰宁巴乌姆举行的海陆军指挥官会议上，斯大林夺回“红丘”炮台的计划虽然遇到海军专家们的反对，但他仍建议从海上和陆上围攻“红丘”炮台。在斯大林亲临前线指挥下，“红丘”被拿下来了，尤登尼奇见势不妙，迅即由彼得格勒狼狈逃窜。

1919年6月27日，按照斯大林的指挥，红军部队在阿尼亚湖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支援下，以突然行动占领了拉多加湖岸上的维德里茨，并从苏维埃国家领土上将芬兰白军驱逐出去。与此同时，还阻止了波兰白军在白俄罗斯的攻势。这对巩固西方战线有着重大的意义。

红军在斯大林领导下，在彼得格勒附近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又挥师东进，继续同高尔察克斗争。经过多次激烈战斗，终于击溃了高尔察克的军队。这个号称为“俄国最高执政者”的沙皇海军上将也做了红军的俘虏，最后被革命委员会枪决了。当时，在西伯利亚流行着一支讽刺高尔察克的歌曲：

英国的军装，
法国的肩章，
日本的烟草，
鄂木斯克的执政王。
军装穿破了，
肩章脱落了，

烟草吸完了，
执政王不见了。”

外国武装干涉者看见高尔察克没有实现他们所寄托于他的希望，便改变其进攻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他们经过一番准备，于 1919 年秋天又发动了第二次进犯。丘吉尔把这次侵犯吹嘘为“14 国联军的征讨”。从南俄库班地区北上的邓尼金匪军是这次主要的突击力量。列宁号召“大家都去与邓尼金斗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女都纷纷响应他的号召，拿起了武器。为了组织南方战线的胜利，党中央根据列宁的提议，派斯大林去担任这个战线的总指挥，以便整顿被托洛茨基搞乱了的南方战线的秩序，并保证把邓尼金匪军消灭掉。

斯大林抵达南方战线后，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首先制定了严格的军纪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他抛弃了托洛茨基所主张的从伏尔加河至诺沃罗斯斯克突破邓尼金阵线的计划，制订了由沃龙涅什一带经过哈尔科夫—顿巴斯—罗斯托夫实施主要打击的有名的战略计划。按照这个计划，邓尼金所部将被截成两段，并保证红军迅速通过许多由无产阶级所控制的中心城市和铁路密布的地区，解放燃料工业城市顿巴斯。党中央采纳了斯大林的计划。为了打击邓尼金的主要部队，在奥勒尔西北，斯大林把南方战线第十三和第十四两集团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组成突击队。在他亲自指挥下首战告捷，于 1919 年 10 月 20 日一举解放了奥勒尔，使白匪军遭到重大的损失和决定性的失败，从而军心大振。布琼尼的骑兵随即乘胜追击，在沃龙涅什附近将白军击溃。10 月 25 日，斯大林在给列宁的报告中这样写道：“作为反革命的主要支柱，经过协约国和邓尼金长期努力而建成的施库罗和马蒙托夫的骑兵军，已在沃龙涅什附近战斗中布琼尼的骑兵迎头击溃。沃龙涅什已由英雄的红军所占领。”邓尼金的主力部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之后，斯大林就满怀信心地指挥南方军向敌人展开猛烈的进攻。根据他的建议而建立的以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和夏殿科为首的第一骑兵军对取得胜利起了极大的作用。邓尼金的败北使协约国的第二次进犯又彻底破产了。

在 1920 年初，苏维埃政权有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时期，经济建设问题就特别尖锐地提出来了。苏维埃国家劳动人民纷纷响应党的号召：“一切为了恢复被破坏的国民经济而斗争！”这时斯大林奉列宁的指示，负责领导恢复乌克兰被战争破坏的经济，领导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这年 3 月，在他的领导下，举行了乌克兰共产党（布）第四次代表会议。斯大林在关于经济政策和其他问题的发言中，确定了党组织在经济战线上的任务。他指出必须从工人中提拔新的领导干部，推行企业一长制及岗位责任制，发挥地方机关的创造性，组织各工厂、矿山、铁路劳动者开展竞赛。在斯大林的具体领导下，乌克兰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努力，首先恢复了顿涅茨矿区的生产。斯大林认为，如果不先把燃料工业恢复起来，全国的工厂和交通便不能开工和运行。这个极端困难的任务解决后，被白军破坏的矿山纷纷恢复生产，扩大了采煤量，铁路、桥梁、工厂和发电站也都迅速修复，重新投入生产。这对发展经济、支援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1920 年春，协约国的武装干涉集团派波兰地主军队和弗兰格尔白军开始第三次进犯苏维埃共和国。

1920 年 5 月底，斯大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开始指挥西南战线。列宁在发给他的电报中说：

“我认为，你在权衡整个环境时，一定会发挥你的全部精力，并将获得重大成就。”苏维埃国家顺利地击退了这次帝国主义的进攻。斯大林在西南战线上实现了他制订的战略计划，对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的波兰白军给予反击。骑兵军突破波兰白军阵线，并于6月7日占领日托密尔城。有名的日托密尔城突破战在扭转前线的形势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使敌人进行联合作战——运动战和阵地战的一切打算都失败了。波兰地主军队很快就开始退却，以后则变成狼狈的逃窜。骑兵军展开攻势，配合其他部队共同解放了基辅，并在短期内开始向里沃夫挺进。在西南战线上的战果，也促成了白俄罗斯领土上战争发展的转变。

在红军与波兰地主军队进行激烈战斗的时候，弗兰格尔从克里米亚发动了新的攻势，威胁顿巴斯和西南战线的后方。斯大林在1920年7月11日《真理报》上发表的《论波兰战线形势》的谈话中，指出必须消灭来自南方的危险。他说，党必须在自己的旗帜上标明当前新的口号：“记住弗兰格尔！”“一定要消灭弗兰格尔！”在斯大林为党中央起草的《致各级党组织的信》中，号召全党重视克里米亚前线。列宁对这封信十分赞赏，并作了如下的批语：“我赞成立刻把它分发出去，这是毋庸讨论的一个文件。”为了尽快肃清弗兰格尔匪军，1920年8月2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决议，把西南战线的克里米亚战场划分为一个独立的南方战线。责成斯大林来执行这个决议。为了完成这一重要的战略任务，斯大林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工作，他亲自到辛涅里尼柯沃、沃尔诺瓦哈、阿历山大罗夫斯克、马利乌坡里以及克里米亚战线的其他地区去，亲自指挥战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帮助指挥员们制定作战计划。经过激烈的战斗，反复争夺，终于在1920年秋解放了克里米亚，彻底击溃了协约国走狗弗兰格尔的部队。协约国帝国主义分子对苏维埃国家的第三次武装进犯就这样遭到了失败。

在1918年至1920年内战期间，在反对白匪和外国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斗争中，斯大林作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红军的统帅，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正是：

保卫革命立奇功，
察城鏖战扬威名；
哪里危险哪里去，
扭转战局倍称颂。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章 转入和平轨道

战争和平相交替，千疮百孔尽废墟；
当务之急搞建设，创伤恢复显生气。

苏维埃国家在战争结束后，开始过渡到和平经济建设的轨道。必须医治战争所引起的创伤。必须恢复备遭破坏的国民经济，振兴工业、运输业和农业。国家被4年帝国主义战争和3年反武装干涉战争弄得贫穷不堪了。

1920年农业总产量，只等于战前总产量的一半左右。加之，1920年在许多地区发生过歉收。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当时工业情况更坏，已处于破坏状态。

1920年的大工业产值，几乎等于战前的1/7。大多数工厂关闭了，矿山和矿井有的被破坏，有的被淹没了。尤其感到困难的是冶金业。

1921年生铁产量只有11.63万吨，即等于战前生铁产量的3%左右。燃料严重不足，运输业被破坏了，国内所有储存的金属和布匹差不多都已用完。甚至连必需的生活用品如面包、食油、肉类、鞋帽、衣服、火柴、食盐、煤油等，也都极为缺乏。

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大家都忍受着这种物品欠缺的情况，但现在已经没有战争了，于是人们就感到这些物品欠缺的情况不堪忍受。农民中间呈现着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工农联盟是在国内战争火焰中建立起来的，它所借以支持的基础，是农民从苏维埃政权方面取得土地和免除地主富农压迫的保障，工人按照余粮收集制从农民方面取得粮食。现在这种基础已经不够了。

从前，苏维埃国家不得不把农民手里的剩余粮食按余粮收集制收进国库以供给国防需要。当时不实行余粮收集制，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就不能在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乃是为战争和武装干涉所逼迫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政策。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农民曾甘愿接受余粮收集制，没有觉察到商品不足，而当战争已告结束，地主卷土重来的威胁已成过去的时候，农民已开始对余粮收集制表示不满，转而要求供给他们充足的商品了。

列宁已经清楚地看到，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已处于同农民利益相抵触的地位，党中央必须制定新的经济政策。他认为，余粮收集制已经没有继续实行的必要，而应该代之以粮食税，使农民能随意处理他们所生产的大部分剩余粮食；实行这种办法，便能活跃农业，扩大工业发展所必需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活跃国家的商品流通，改善城市供应，并为工农联盟建立新的经济基础。

但是，阶级敌人多方破坏，党内反对派也多方作梗。他们企图利用经济困难，利用农民不满情绪煽动叛乱。在西伯利亚、乌克兰等地，各种各样的反革命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白卫分子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都加紧活动起来。敌人采取新的策略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如今他们所喊的已经不是遭到破产的“打倒苏维埃”的旧口号，而是“赞成苏维埃，而不要共产党人参加苏维埃”的新口号。

在战场上吃了败仗的敌人，现在企图组织匪帮和富农暴动来颠覆苏维埃政权。武装匪帮被派进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来进行牵制。敌特分子甚至钻到红军内部进行煽动、破坏。当时在喀琅施塔得发生的叛乱，便是阶级敌人这种新策略的明显表现。这次叛乱是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开幕前一星期，即

1921年3月间开始的。领导叛乱的是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外国代表有勾结的白卫分子。促成这次叛乱的另一情况是：当时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薄弱，波罗的海舰队中许多优秀水兵已开赴前线，新补充的水兵都是没有经过革命锻炼的农民，他们对继续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余粮收集制怀有不满情绪。因此，反革命分子乘机挑起了武装叛乱。

叛乱者占据了这个重要的要塞，连同几艘军舰和大批枪炮弹药也被他们夺去。苏维埃政府的敌人，指望这次叛乱能够得到国内其他地方的响应。国外的反革命势力也在遥相欢庆。但是阶级敌人高兴得太早了，列宁采取了迅速而果断的措施，党中央派图哈切夫斯基和伏罗希洛夫率领红军镇压了这次叛乱。红军战士们踏着薄冰向喀琅施塔得前进。因为中途冰解，竟有许多人沉溺水中。但是战士们抱着为苏维埃政权捐躯的决心，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攻克了要塞，肃清了叛乱。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教训使列宁和斯大林进一步认识到，党的政策必须来个决定性的转变。必须让农民有一种愿意改进耕作的推动力，并且在改进农业的基础上，大规模的工业必须恢复起来，必须把机器和货物供给农村，以加强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经济联系。

早在1920年初，列宁就主张在国家电气化的基础上恢复工业，并责成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一些著名的科学家草拟国家电气化的全国计划。他写道：“计划应该现在就提出来，要通俗易懂，一目了然，以使用清晰明确的远景来吸引群众：干吧，在10到20年内我们就会使整个俄国，不论工业和农业都实现电气化。”

斯大林对列宁主持编纂的这本电气化计划十分赞赏。他说：“这是一本出色的、编得很好的计划。一个不带引号的真正统一的和真正国家的经济计划的杰出草案。这是现代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尝试，要给经济落后的俄国的苏维埃上层建筑，奠定在目前条件下真正现实而唯一可能的技术生产基础。”与此同时，他还批评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另一个与此唱对台戏的计划。他说：“这和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比较起来，是多么贫乏，多么落后！真是一个中世纪的手工业者，一个自命为负有用古代传说‘拯救’俄国的使命的易卜生剧作中的英雄。”在同一篇文章里，斯大林还揭露了那仍然在批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和满脑子保守思想的李可夫的庸俗“现实主义”。他指责他们身上有“马尼洛夫精神”。正像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所描写的，这些人所奉行的是一种只讲空话而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作风。

在1920年3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过渡时期的经济建设问题指出，改造俄国经济的基础，主要是提高农业耕作的水平，但是要这样做，就必须恢复重工业。国家电气化的计划是一切经济建设的基础。这是党的新纲领。“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列宁指出，在地方上，资本主义“是靠小经济来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还就恢复国民经济、可以准许外国资本家在某些企业中获得租让权问题发表了讲话。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尽快地取得机器设备，为此用黄金和租让权去偿付资本家是值得的。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是，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经济利益的深刻而不可避免的冲

突，阻止或延缓他们组成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盟。为此，列宁主张，在互惠的基础上，苏联要同英国发生贸易关系，要同德国发生贸易关系，要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贸易关系，要想方设法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

但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却遇到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党内反对派的严重挑战。在1920年11月举行的全俄职工代表会上，托洛茨基公然提出要把战时共产主义的“螺丝钉扭得更紧一些”。与此同时，还提出了立刻把“工会国家化”的要求。他反对向工人群众采用说服方法。他主张把军事方法搬到职工会里来。托洛茨基反对在工会里扩大民主，反对工会机关实行选举制，而主张采取赤裸裸的强制命令的手段。凡是由托洛茨基分子领导工会的地方，他们总是用自己的政策在工会引起冲突、分裂和瓦解，挑拨非党工人群众反对党。其实这次争论的范围要比工会问题范围广泛得多。它涉及共产党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农民，怎样对待工人，以及在新的环境下怎样对待群众的问题。

跟着托洛茨基反对列宁路线的还有“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和“左派共产主义者”。“工人反对派”提出了要把全部国民经济管理事业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去做的口号。他们想把党的作用化为乌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建设中的意义。“工人反对派”拿工会来与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党对立。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不是党而是工会。“工人反对派”实际上是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反党集团。

“民主集中派”反对党政机构的权力集中化而要求更多的党内民主自由；他们还反对在工业中实行一长制，而坚持在工业领导方面事事都实行“集体领导”。列宁把民主集中派称为“叫喊得最响亮者”的派别组织，把民主集中派的纲领称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纲领。

在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时期，斯大林同列宁站在一起，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他号召全国党组织团结在列宁的周围。当时莫斯科党组织的斗争来得特别紧张，反对派在这里集中了他们的主要力量，打算把首都的党组织夺归己有。但是，反对派的这种阴谋诡计受到了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坚决回击。当时在乌克兰党组织中也发生过尖锐的斗争。在乌克兰中央书记莫洛托夫的领导下，击溃了托洛茨基分子和施里亚普尼可夫分子。乌克兰共产党仍然是列宁党的忠实可靠的支柱。在巴库，奥尔忠尼启则领导南高加索党组织击溃了反对派。在中亚细亚，由卡冈诺维奇领导进行了反对反党集团的斗争。当时斯大林把地方组织中的争论总结材料交给《真理报》发表，这些材料表明，党获得了胜利，而各个反对派遭到了失败。

1921年1月19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他指责托洛茨基的态度鼓励了国内外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都懂得在白匪口号下的公开的反革命活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他们企图采用冒牌的革命口号来打击苏维埃政府。他们开始装着像个共产党员，以便利用党内的分歧。

1921年3月8日，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了。出席这次大会的有694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73.2万多党员。代表大会对工会问题的争论作了总结，并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列宁所提出的政纲。列宁在代表大会开幕时说，争论是一种不可容许的奢侈品，敌人是满心指望共产党内部出现分裂的。鉴于党内派别组织的存在，代表大会斥责了一切反对派集团，并指出它们事实上是在帮助无产阶级的敌人。代表大会责成立刻解散一切派别组织。委托各

级党组织严格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并说，凡不执行代表大会决议的人，都应立刻毫无条件地开除出党。代表大会给了中央一种全权，凡遇有中央委员违反纪律，以及凡遇有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事情发生时，均得采取党内一切处罚办法，直到开除其中央委员资格和党籍为止。所有这些决定，都写进了由列宁提出而经代表大会通过的《论党内统一》的特别决议中。

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从余粮收集制过渡到粮食税，过渡到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极重要的决议。决议说，所有超过税额的剩余粮食，完全留归农民自己支配，农民可以自由出卖这种剩余粮食。列宁在其报告中指出，贸易自由，在开始的时候，会使国内资本主义成分有某种活跃。尽管如此，还得允许私人贸易和准许私人工业家开设小企业。但这用不着害怕。列宁认为少许的商品流通自由能造成农民努力经营的兴趣，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使农业迅速高涨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国家工业将会恢复起来，而私人资本则将被排挤出去；积蓄了力量和资财以后，就可以建立强有力的工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然后就转为坚决进攻，以便消灭国内资本主义残余。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施行新经济政策的决议，保证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坚固联盟。

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也是服从于这个基本任务的。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作了《论当前党在民族问题上的任务》的报告。斯大林说：我们已经消灭了民族压迫，但是这还不够。现在的任务是要消灭旧时代的沉重遗产，即过去的被压迫民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必须帮助他们在这方面赶上俄国中部。斯大林指出了民族问题上的两种反党倾向，即大国（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大会谴责了这两种倾向，并集中主要火力打击了当时的主要危险——大国主义，即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新经济政策的施行，遇到了党内两种人的反对。一种人是“左”的叫喊者，如洛明纳泽和沙茨金等人，他们力图“证明”说，施行新经济政策就是放弃十月革命所获得的成果，就是退回到资本主义，就是使苏维埃政权趋于灭亡。这些人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不懂得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而陷入惊慌失措状态，并在自己周围散布灰心失望的情绪。另一种人则不相信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匍匐拜倒于资本主义“威力”之前，并且为了要巩固资本主义在苏维埃国家中的阵地，居然要求对国内和国外的私人资本作巨大的让步，来把苏维埃政权在国民经济中的许多经济命脉让给私人资本。俄共中央对这两种人都加以揭露并使其陷于孤立，在对党内反对派进行坚决回击的同时，根据列宁的指示将“欺骗分子、官僚分子、不诚实分子、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装过‘门面’，但内心里仍旧是孟什维克的那些人”清除出党，从而改善了党的成份，提高了群众对党的信任。

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就证实了这个政策的正确性。由于贯彻了新经济政策，使得工农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大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坚强有力。富农和白匪的叛乱差不多已全被肃清。余粮收集制取消后，在反对富农叛乱的斗争中，中农帮助了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把操纵国计民生的大工业、运输业、银行、土地、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国民经济出现了新的高涨。

1922年3月间，俄共中央召开了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对新经济政策进行了总结。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乃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殊死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为了胜利，就要保证工人阶级与农民

之间，社会主义工业与农民经济之间的结合，其方法就是极力发展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为此就必须学会管理经济，就必须学会文明经商。在这个时期，商业是党面前所有各个任务链条中的基本环节。不解决这个任务，便不能扩展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便不能巩固工农经济联盟，便不能提高农业，便不能使工业走出破坏状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经济工作更加沸腾起来了。国家所遭遇的歉收后果，已经顺利地解决。农民经济正在迅速地恢复起来。铁路运输工作已有进步。重新开工的工厂数目日益增多。

列宁因在 1918 年被刺受伤，以及积劳成疾，健康大不如前了。从 1921 年末起，列宁已不得不时常间断自己的工作。于是领导全党的日常工作就落到斯大林肩上了。

1922 年 4 月 3 日，斯大林当选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从那时起，斯大林就一直担任这个职务。

1922 年 12 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和斯大林两人的提议，成立了各苏维埃民族自愿成立的国家联合，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最初加入苏联的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南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久后又在中亚细亚成立了 3 个独立的加盟苏维埃共和国，即乌兹别克、土库曼和塔吉克苏维埃共和国。现在，所有这些共和国都按自愿和平等原则联合成一个统一的苏维埃国家联盟。

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道：“今天是苏维埃政权历史上转变的日子。它在新旧两个时期中间立下了一座界碑：旧时期已经过去。当时各苏维埃共和国虽然也曾协同动作，但它们是分头行进，因为它们当时首先要设法维持本身的生存；而今新的时期已经开始，各苏维埃共和国单独生存的局面已告结束，各个共和国联合成了一个联盟国家，以求顺利消除经济破坏状态，此时苏维埃政权已经不只力求维持本身的生存，并且力求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巨大影响的国际力量。”从此，在苏联历史上，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开始了。但是，正当全国掀起建设高潮的时候，1924 年 1 月 21 日列宁却与世长辞了。正是：列宁溘然而逝，全民嘶声恸哭。从此，斯大林肩负了领导全党的重担，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章 入主克里姆林宫

创业艰难百战多，成功失败难定夺；
真理标准靠实践，是非曲直任人说。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入主克里姆林宫，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在人民通常的概念里，社会主义意味着一种更富足的生活，它建立在充裕的财富的基础上，有着日益扩大的自由和日益提高的文化。但是，沙皇俄国并没有现代的生产机器，也没有充裕的财富，而是一个文盲充斥的愚昧落后的国家。

当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垮台时，既没有多少工业品，也很缺少粮食。同时也没有什么熟练工人；农民还过着中世纪的生活。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政权，这并非由于人民广泛要求社会主义，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了人民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强烈要求。那时整个国家处在动荡混乱中，农民纷纷起来夺取地主和贵族的土地；工人由于工厂停工待料而挨饿；前线士兵开小差。这些工人和士兵选举了苏维埃来表达他们的要求。列宁说这些苏维埃是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就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口号。

接管政权是简单的；这在一天内就完成了，士兵和工人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和政府机关，并攻下了冬宫。但保持政权就比较困难了，这经过了多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被剥夺的贵族和前政府高级官员组织武装叛乱，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德国帝国主义夺取了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派军队到芬兰帮助曼纳海姆男爵建立了一个反动政权，并派兵到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去抢夺粮食、煤、铁和石油。英、法、日、美派兵到北冰洋各港，从海参威进入西伯利亚，并进入高加索和中亚细亚。武装干涉一直延续到1920年甚至1921年。当武装干涉最后结束时，芬兰、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都已作为单独的国家分离了出去。俄国其余的地方则属于苏维埃国家的版图。

这个俄国已经破产了，没有粮食，没有原料，也没有机器。农民的牲畜被宰杀了，农具在7年战争期间遭到很大的破坏。

1920和1921年两个饥荒的年头，百万人死亡，加上7年战争，俄国有上千万的人被夺去了生命。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1921年她曾到伏尔加河流域的乡村进行采访，即使当时有学校，也没有一个农民的儿童能够上学，因为农家儿童既没有鞋子也没有衣服；他们穿得单薄褴褛，整个冬天蜷伏在炉灶旁，出不了门。为了刺激经济的恢复，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允许各种各样的经济成分共存，有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甚至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保留了矿山、铁路和重工业，这些大企业在战争中破坏得很惨。小工厂和商店绝大部分在私人资本家手中。到1924年1月列宁逝世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战前沙皇统治下的那种贫困状况。工农业生产还没有从7年战争的灾难性的减产中恢复过来。而且在党内外、国内外还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势力。帝国主义国家不仅对新生的共和国实行经济封锁，而且随时有武装侵犯的威胁。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建设社会主义，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理论家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是斯大林在1924年8月提出了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其实，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经过反复思考的。几个月之

前，他还曾说：“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是不够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然而，在8月份，在同托洛茨基争论时，斯大林则说，即使没有任何外国工人阶级的援助，苏维埃政府也能够开发俄国，并建成社会主义，因为它将得到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支持。

当时斯大林提出的，虽然还不是一套完整的理论，却表达了俄国人民对于建设自己国家的日益强烈的要求，以及他们对于即使没有外援也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日益增长的信心。十月革命7年来，斯大林从切身的经历中已经树立了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的自信心。那种认为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希望应该寄托在革命迟迟不发的欧洲工人身上的想法，已经开始使他们感到不现实了。因而当斯大林宣布俄国人能够自立，能够建成他们所选择的社会经济制度时，这就使革命取得了一个继续前进的目标，而且能够鼓舞人们进行爱国的努力。

斯大林决心在困难的条件下去探索、去实践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斯大林不同于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他出身于一个被压迫民族中的被压迫阶级。他的父亲是鞋匠，生来就是农奴。苦难的童年和革命生活的磨炼培养了他的坚毅性格。

在白色恐怖下，他使用过许多不同的名字，过着危险的生活。“斯大林”——钢铁的人——是同伴们给他起的并保留下来的一个名字。在革命生涯中，他时常被捕，先后4次被流放到北极圈内的一些地方，但每次他都逃掉了。第五次流放是在1913年，这次他被送到西伯利亚最北部，叶尼塞河流入北冰洋的地方；从那里，他无法逃出，直到二月革命才把他解放了出来。长期的革命斗争，把他锻炼成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22年，斯大林就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这一重要岗位所能起的作用，只是由他发挥之后才被人们充分认识到。选择他来担任这一职务是很自然的，因为大多数其他领导人在沙皇统治时期都生活在俄国以外的欧洲各国，并且在那些“有言论自由的国家里”发展成为作家和演说家。斯大林却在沙皇俄国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他所使用的武器，不只是语言文字，而且还要进行深入的思想发动和艰巨的组织工作。作为总书记和党的政治局委员，斯大林成为制定政策的5个人之一。这5个人是：列宁、斯大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和布哈林。1922年，斯大林又被指派草拟宪法，通过这部宪法俄国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列宁看到并同意了的原草案中，中央政府的权力仅限于国防、外交、对外贸易、铁路和交通。包括政治警察在内的治安工作是放在地方政府权限之下的。在那一年的年尾，斯大林被派到格鲁吉亚去同强大的反对派进行斗争，并且运用政治警察把反对派监禁起来。列宁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口授了一些记录，指出斯大林应对格鲁吉亚的过火行为“负政治责任”。并建议代表大会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让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务。

列宁在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信中说过：“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见赫鲁晓夫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他又说：“斯大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当1923年4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列宁因病未能出席大会向斯大林提出非难。在那次大会上有两件事显示了斯大林的力量和做法。他在代表党中央做报告时，说明党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获得控制地位。共产党员的比例在地方工会干部中已从27%增加到57%，在军官中从16%增加到24%。一切组织都逐渐处在党的控制和绝对领导之下。第二件事是斯大林对于一个要求在党内有更多讨论自由的批评者的回答。斯大林说：“党不是辩论会。俄国正处在帝国主义豺狼的包围之中，而在两万个党的基层组织中讨论一切重要问题，就会把我们手中的牌都摊在敌人面前。”这次大会，斯大林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取得了胜利。大会以后，持不同政见者聚众闹事时，就遭到政治警察的逮捕。每当“民主自由”与国家安全的概念之间发生冲突时，他总是选择安全，将安全列于自由之先。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时，斯大林主持丧礼，他在执佛者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尽管有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即后来所谓列宁“遗嘱”，斯大林却有许多理由把自己看成是列宁的最忠实的学生和当然的继承者。他已经是一个有着20多年党龄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时期的历届中央委员，并曾在6个暴风雨般的革命年头中直接在列宁手下工作。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和外国武装干涉最严重的岁月里，立下了无人比拟的卓越功勋。论党龄，论功绩，斯大林都是佼佼者。关于列宁那次对他“过火行为”的批评，很容易看成是由于列宁患病而产生的误会，如果列宁康复了的话，这是可以弄清楚的。而所有其他的领导人都曾和列宁发生过更严重的冲突。托洛茨基曾多年反对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时刻公开反对起义，并在非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泄露了党中央关于起义的机密。列宁都原谅了他们。同这些人对列宁所负的罪过比较起来，斯大林的过失在他自己看来，很可能算是微不足道的。

在以后的几年中，斯大林在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性决策中，他逐个击败了党内的反对派，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每一个反对者都斥责过斯大林“专制”，可是每一次斯大林都设法掌握了政治局中的多数，同时通过种种手法，得到广泛的群众支持。然而，随着每一个反对者的失败，提出不同政见的权利愈来愈受到排斥。到了1927年12月，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称，“附和反对派是与党籍不相容的”。在每一次胜利之后，斯大林都向被击败的反对者伸出手去，如果他们承认了错误就把他们接纳回来，重新分配工作。当托洛茨基表明决不退让时，斯大林就建议驱逐他，把他从俄国赶了出去。

据当时生活在苏联的美国作家斯特朗说，在列宁逝世以后的最初那年月里，斯大林待人是谦虚的，直爽的，朴实的。他对问题的分析异常明确。当年，斯特朗在苏联创办了英文的《莫斯科新闻》报纸，后来同她的苏联同事发生了恼人的纠纷，以致她要辞职，甚至在失望之余想要离开苏联了。经一个朋友的劝告，她向斯大林提出了申诉。斯大林的办公室打来电话，要她“到这里来同几位负责同志谈谈问题”。当她发现自己是在同斯大林、卡冈

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以及她所控诉的那些人坐在一张桌前时，她简直发呆了。小型的政治局、全体苏联的指导委员会在处理她的申诉呢！

斯大林先问她是否能听懂用俄语进行的讨论，从而消除了她的紧张。接着他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发言。他随便坐在一旁，听别人讲话。起初，斯特朗感到失望，因为他那样没有威仪。后来，她才意识到斯大林正是用偶然插一句话，提一个问题，或者着重地重复别人的话来引导讨论的进行，并使它不离开主题。当他把所有的看法都引出来了以后，斯特朗开始对她所控诉的那些人产生了谅解之意。她曾想辞职，一走了事。可是当斯大林重复问道：“这就是全部吗？你在其他方面很满意吗？”“我内心潜在的愿望苏醒了，”斯特朗说：“我发现我所真正要求的乃是一张更大、更好的报纸，而有了已经达到的新的谅解，这件事现在看来已是可能的了。”从那时起，斯特朗就把斯大林看作她所遇到过的最善于主持会议的人。他能够“以达到天才程度的速度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引向和谐，并且在许多不同的意见中间指出正确的道路，从而唤醒和鼓舞要求行动的愿望。”

斯特朗后来在《斯大林时代》一书中写道：“我住在苏联的所有那些年月里，从来没有听苏联人谈到过‘斯大林的决定’或者‘斯大林的命令’，而总是谈到集体作出的‘行政的命令’或者‘党的路线’。当谈到斯大林时，他们称颂他的‘明确’，他的‘分析’。原因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想，而是同科学院的智囊团、企业和工会的负责人一起商量而思想的。即使到了后来，当人们过度地把他神化了的时候，他们也不是把他称为‘伟大的统治者’，而是把他称为‘伟大的导师’，革命道路的领导人。”

1929年12月21日，全国庆祝斯大林50寿辰，盛况空前。报纸竞相发表颂扬的文章。克里姆林宫的墙上挂满了巨幅画像。每个城镇的广场上和公共建筑物内到处是斯大林的全身塑像和半身塑像。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工厂、集体农庄以及一批一批的人向他发出了效忠信。“斯大林是当代的列宁”的口号出现在各种旗帜上，响彻各种集会。斯大林的名字被用来命名城市和乡镇，帕米尔的最高峰被命名为斯大林峰。他的名字和肖像成了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各种各样的崇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表达了群众对党和领袖的崇敬和热爱。但是，一旦这种崇拜取得势头，他能否煞住车就很难讲了。在某种程度上，他已成为他自己权力和地位的俘虏。

斯大林尽力同党和政府的各个部门保持着直接的联系。从他生涯的早期开始，他就养成了一种通宵工作、白天打几次短盹的习惯。他长时间地呆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夏天一有空闲，他就到离莫斯科不远的祖巴洛沃的别墅去。这是他和妻子、孩子们以及亲戚朋友们生活的家，就是在此时此刻，他才像一个轻松的家庭成员。

根据斯大林的女儿所说的一鳞半爪的情况，这幢房子具有温暖而又活跃的气氛。那里有保姆、家庭教师，亲戚朋友一大帮，热热闹闹、和和睦睦。斯大林的妻子纳佳的父母和姐姐也住在那里。

经常来往的有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及其夫人们，基洛夫、布哈林等人也是这座房子的常客。这里经常举行家庭晚餐、小树林中的野餐，常常听到孩子们的玩闹声。但这里也有不和，主要围绕着纳佳，因为虽然她主管家务，增添了不少家庭气氛，但她并不愉快，不能适应婚姻给她带来的地位。

纳佳出生在巴库，在高加索长大。她从她的家庭中汲取了革命精神。她

长成了一位漂亮的年轻姑娘，带有东方气质，但她没有时间打扮，她是同时代人当中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发工作的典型。她当姑娘的时候，无疑把斯大林理想化了，她记得他是四处奔波的革命者，得到过她父母的保护，后来又作为一个革命家从西伯利亚回来了。同这样一个人物结婚，在她看来是为革命服务的最高形式，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真挚的和深厚的情谊。纳佳的母亲对这桩婚事曾表示反对。她和她的丈夫认识斯大林已有 20 多年了，他们总是把他当作一位亲密的朋友，甚至几乎把他当作儿子。但是她本人尝到了嫁给一个革命者的“苦头”。纳佳年轻而浪漫。她被她的姐姐和两个哥哥宠坏了。她母亲大概看出，和斯大林这样一个一心为革命而又脾气暴躁的人结婚，不会给她带来多少家庭的幸福，况且他们俩的年龄又相差 22 岁。

1918 年，纳佳和斯大林结婚。起初，他们住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里，很快她开始厌恶这座石墙堡垒。她在斯大林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任秘书。结婚后她进入由弗齐也娃领导的列宁的秘书班子。后来，她陪同丈夫到了察里津，参加了那里的保卫战，经历了残酷的战争生活的考验。

内战期间，斯大林一直在前线指挥作战；战争结束后，又完全致力于经济恢复和党组织的整顿工作，几乎全然不顾这个家。有一次，纳佳出席一个招待会后感觉不舒服，他扶她睡下，安慰了她。“原来你对我还算有一点爱情，”她对他说。这只是那些“苦多乐少”的婚后生活的小插曲。纳佳生了一儿一女。他们的儿子瓦西里生于 1920 年。女儿斯维特兰娜生于 1926 年。但是他们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有一次儿子到列宁格勒，住在他外祖父家里，但不久又回到了莫斯科。

斯大林整天埋头于工作，很少照管孩子。纳佳也很少和孩子们在一起，给他们以温暖。然而她却是一个至诚的母亲，她很关心让他们在保姆和教师的帮助下学习全部功课。她常常偏袒她的儿子瓦西里，可能是因为他父亲对他太严格的缘故。她对斯维特兰娜却很严厉，而这女儿是父亲的宝贝。斯大林很爱他的女儿，经常与她逗乐，给她写短信，称她是“女主人”，在信中要她向他发号施令。从她保存的这些信中，反映出斯大林对女儿的健康和幸福的关注。

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斯大林不大喜欢他第一个妻子生的儿子雅可夫，这个孩子的母亲早就去世了，他是在高加索由他慈爱的祖母和外祖父母抚养成人的。从他到了莫斯科的第一天起，斯大林就对他十分严格。他不赞成雅可夫对学习的态度和他的软弱性格。当雅可夫在 1928 年或 1929 年自杀未遂时，他父亲冷冰冰地说：“哼，他的枪法都不准！”斯大林并对他的自杀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雅可夫转向只比他大 7 岁的继母，以求得爱抚和谅解。她赞助他的事业，并设法弥补父亲对他的冷漠态度。纳佳对斯大林只知道工作而不关心家庭的做法很有意见。她好象根本不理解丈夫肩负的担子有多重，或他工作中的压力有多大。她不喜欢自己作国家第一夫人的角色，而且显然也没有试图支持她丈夫的地位。凡有可能，她总是不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她严格要求自己，避免乘小汽车外出，因为这会使她显得很突出，会脱离群众。她把她的业余时间花在学习法文、音乐和其他课程上，拼命地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以免在官方场合不得不见面的人们面前相形见绌。她是个多情善感的年轻妇女，而所嫁的丈夫则是个铁骨铮铮“冷若冰霜”的人中豪杰。

20 年代中期，斯大林决心推行对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这

使他同自己的妻子进一步疏远了。他没有低估走向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巨大阻力和困难，但是他具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钢铁意志。他激励人们相信，他们还得忍受苦难和牺牲，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胜利、安全和其他的报偿。任何能导致实现社会主义的正义和繁荣的事情都是合理的，这正是他自己的信仰。

斯大林十分憎恨软弱、消极和失败主义。他用这些词来解释右倾机会主义的政策，并且毫不留情地奚落他们。1929年4月，他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说：“你们看见过在叶尼塞那样的大河上遇到风暴的渔夫吗？我看见过不止一次。有一种渔夫在风暴来临时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鼓舞自己的同伴，勇敢地划着船迎着风暴前进：‘弟兄们，把舵掌得更稳些，破浪前进，我们一定会胜利！’

“但是也有另一种渔夫，他们一感到风暴要来临就灰心丧气，叫苦连天，瓦解自己队伍的士气：‘真倒霉，风暴就要来了，弟兄们，躺在船底里，闭上眼睛，也许能侥幸冲到岸边。’”

斯大林在他关于“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中，提出了党和人民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他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英雄们的业绩去创造一个没有剥削的崭新的社会。他的呼吁特别在年轻的党员中激起了一股热情、苦干和奋发向上的精神。一切都是为了在俄国尽快地实现社会主义，并为全世界开创出一条道路。

斯大林在一次极能说明他的心情的讲话中，以咄咄逼人的语调解释了赶上和超过西方的迫切需要。

1931年2月，他在全苏社会主义产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说：“人们有时在问：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们！决不能减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对全世界工人阶级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它所以挨打，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

“过去我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祖国。但是现在，当我们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而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祖国，而且我们要保卫它的独立。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么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期间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

就这样，在斯大林的发动下，在苏共中央的领导下，苏联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正是：举红旗，拓新途，试看天地翻覆！欲知斯大林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且看下文分解。

第九章 艰难的历程

经济改造多艰难，急功近利勇向前；
工农生产得发展，落后面貌在改观。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斯大林对落后的俄国工农业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尝试。它为工业确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并设想了农业的大规模社会主义集体化，经过全国人民的非凡努力，苏联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沙俄在工业方面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它所装备的近代生产机器只等于英国的 1/3，德国的 1/4，美国的 1/9。列宁曾经写道：“就铁——现代工业主要产品之一，也可以说是文明的基石之一——来说，俄国的落后性和野蛮性是特别大的。”在十月革命之前，沙俄的农户共有 800 万具俄式犁，200 万具木犁，1800 万个木耙，只有 400 万具铁犁。

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消灭俄国长期落后状态的任务就摆在布尔什维克的面前了。列宁曾经再三指示说：现代化的重工业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如果要挽救俄国，不仅是要在农业方面有很好的收获——这还不够的；也不仅是要供应农民日用必需品的轻工业情况良好——这也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重工业。”

到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时，即 1925 年，全国工业化的问题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时，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所破坏的工业和农业都已经恢复起来了。农业接近了战前的规模，达到战前水平的 87%。在 1925 年，苏联大工业的生产已经达到战前工业产量的 3/4 左右。在恢复国民经济方面，虽然有如此巨大的成就，但苏联依然还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它的国民经济的全部产品有 2/3 是农业方面生产的，只有 1/3 是工业产品。斯大林认为，1925 年是苏联革命发展中的一个转变关头。他说：如果说 1917 年十月革命时，问题是要在政治上战胜资本主义，那么，1925 年，主要的任务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扩展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以期在经济上也把资本主义战胜”。

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在这个发展的转变关头，他向苏共和苏联人民提出了历史性的重大任务，要把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他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必须重新创立沙俄时代所未曾有过的许多工业部门——必须建立新的机器制造厂、机床制造厂、汽车制造厂、化学工厂和冶金工厂，必须创立本国制造发动机和电站装备品的生产，必须增加金属和煤炭开采量，因为这是为保证苏联社会主义胜利而绝对必需的。”他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特别重视建设社会主义，全国工业化，以及为苏联经济独立自主而斗争等问题。他反复讲到全国工业化是一个基本环节，如果抓住这个环节，就可以解决布尔什维克党在为社会主义胜利而奋斗时所面临的其他一切任务。如果不能使国家工业化，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我们祖国的经济独立自主和加强苏维埃祖国的国防能力。斯大林说：“把我国由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

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上，联共中央曾排除了来自右的和“左”的干扰和破坏。如果按照季诺维也夫提出的“计划”，苏联依然是一个以生产原料和粮食为主，而自己却没有发达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机器制造业的农业国家。斯大林说：“这条路线将使我国永远或差不多永远不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在客观上成为资本主义总体系的附属物。这条路线就是要离开我国

建设方面的各种任务。”托洛茨基分子在反对全国工业化的斗争中，曾以“左”的面目出现，提出了所谓“超工业化”的要求，他们提议要用掠夺农民的方法来建设工业。按照他们的“计划”，工农联盟就要破裂，社会主义建设就要失败。

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具体情况，联共中央研究制定了苏联工业化的方法，这种方法与资本主义的通常作法是根本不同的。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因为在轻工业方面，较之重工业来说，所需要的投资数量要少些，资本周转要快些，而且获得利润也容易些，所以那里的轻工业也就成为工业化的首要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让轻工业积蓄一些利润并将利润集中于银行以后，才会轮到重工业方面，然后逐渐把所积蓄的资本转用到重工业中去，造成保证它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悠久的历史过程，需要数十年或者更长的时期。斯大林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决不能走这一条路。他说：“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假如这件事稍迟一着，那就等于失败。党记住了列宁的指示：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排除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来开始实行国家工业化。”

当时，实现工业化的困难是很多的，既缺少资金，又没有技术，西方世界把它看作“莫斯科的一个狂妄荒诞的计划”。斯大林在他关于全国工业化问题的论著中，表明他深信苏共在完成这一任务时，会克服一切困难。斯大林在《论苏联经济状况与党的政策》那篇报告中，向全党发出了如下的号召：

“同志们！

9年以前，1917年2月，我们在列宁格勒曾经是一个小小的集团。老党员都记得，我们布尔什维克在那时只占列宁格勒苏维埃中的不大的少数。老布尔什维克们应该记得，当时，布尔什维主义的为数众多的敌人是嘲弄我们的。但是我们前进了，夺取了一个阵地又一个阵地，因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以团结的队伍进行了斗争。后来这个小小的力量发展成了一个伟大的力量。我们粉碎了资产阶级，推倒了克伦斯基，我们组织了苏维埃政权。我们粉碎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我们把英法的和美国的强暴者从我国赶了出去。我们克服了经济的凋敝。最后，我们恢复了我们的工业和农业。现在，新的任务——我们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困难已经过去了。可否怀疑：我们能完成国家工业化这个新任务？当然是不可以怀疑的。相反，现在我们有一切的根据，足以克服困难，实现我们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到我们面前的新任务。

“同志们，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在新的工业战线上，我们一定会胜利。”

为了实现全国工业化的政策，当时需要基本建设投资，需要亿万货币资金。在资本主义国家拒绝向苏联提供贷款的情况下，资金问题只有依靠本国内部来解决。斯大林指出，苏联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资金和积蓄的来源。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地主和资本家被剥夺了，私有财产制被消灭了。土地、工厂和银行，都变成了全民的资产。社会主义工业化所依靠的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积累和储蓄。

苏维埃政权取消了沙皇政府所借的外债，过去人民仅仅为偿付这种外债的利息，每年就要付出数亿卢布。苏维埃政权既然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消灭

了，就使农民免除了每年必须向地主缴纳的 5 亿卢布左右的地租。农民因为摆脱了这一切重担，所以能够帮助国家来创立新的强大的工业。所有这些收入的源泉，都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中。

1926—1927 年度投入工业的资金约达 10 亿卢布，而再经过 3 年就有可能投入 50 亿卢布了。于是，国家就有可能来着手建筑许多大型企业，如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第聂伯河水电站，连接土尔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铁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重型机器制造厂，“阿模”汽车制造厂（即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和在乌拉尔—库兹涅茨克建立的第二个大型的煤钢联合企业。乌拉尔新工业区的中心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在 1931 年开始建高炉和轧钢厂时，工人只是住在一片棚屋里；8 年后，这里发展成为有 14.6 万居民的城市。西伯利亚的库兹涅茨克和哈萨克的卡拉干达，在同样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了大工业城市。

为了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国防能力，迅速消灭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落后现象，联共中央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斯大林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 50 以至 100 年。我们应当在 10 年以内跑完这个距离。或者是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是我们被人打倒。”为了尽快地解决技术问题，适应飞速发展的需要，国家和工厂兴办了许多高等和中等的技术学校。到 1933 年，约有 20 万学生在高等技术院校攻读，90 万学生在中等技术学校学习，同时工厂办的学校和专业训练班每年训练 100 万工人。这些学校和训练班，缓和了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短缺的矛盾。此外，全国还开展了一个扫盲运动。在这个文盲充斥的国度里，1929 年，8 岁至 50 岁的人口中，文盲人数下降到 48.9%。1930 年 1 月，建立起各个地方的委员会来引导这一运动，到 1939 年，文盲的比例下降到 18.8%。

由于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职工的技术进步了，生产效率提高了，成本降低了，提前完成了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 年 1 月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报告说，苏联由从前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工业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仅用 4 年零 3 个月的时间就于 1932 年完成了。产业工人的数目增加了 1 倍，从 1100 万增加到 2200 万；生产量也增加了 1 倍。斯大林报告说：

“我们从前没有钢铁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从前没有拖拉机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从前没有机床制造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从前没有汽车制造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他接着谈到航空工业、农业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以及其他，并且说，“我们不仅创立了这些工业部门，而且它们的规模使欧洲工业相形见绌。”

为了完成这个宏伟的计划，苏联的党和人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工作中也发生过一些失误，然而在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迅速这样伟大的进展。苏联人民认为，如果步伐不是这样迅速，不但社会主义建设将会推迟，而且国家的生存也会处在危险之中。因为在 1933 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从中国东北向苏联边境寻衅，而纳粹德国已公开提出占有乌克兰的要求。苏联人民认为，如果没有他们那迅速提高的经济力量，他们可能会遭到来自东西两面的入侵。斯大林在报告中说：“我们不得不鞭策我们的国家，因为它落后了 100 年，并因落后而面临亡国的危险。否则我们会在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处于手无寸铁的状况。”

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方面获得了重大成功，而资本主义国家却于1929年末爆发了破坏力空前巨大的世界经济危机，并在以后3年中危机更为加深。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3年间（1930年至1933年），苏联工业增长了一倍以上，而美国工业在1933年底却降到1929年的65%，英国工业降到86%，德国工业降到66%，法国工业降到77%。由于发生世界经济危机，结果有2400万失业工人陷于饥饿贫困的境地。数千万农民感受到农业危机的痛苦。这种情形再次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时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世界上唯一不受经济危机影响的国家。

世界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之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资本主义国家从两方面寻找逃出经济危机的出路：一方面是建立法西斯专政来镇压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挑起重新分割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来劫掠防御能力薄弱的国家。

根据上述情况，苏联在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立刻投身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提出了5倍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建设的新工业，以及整个经济的技术改造。然而，正如斯大林所说，这一任务“无疑是比较容易了”，今后任何一个五年计划都不会有第一个那么困难了。为了加速工作的进展，减少工作中的失误，联共中央根据斯大林的倡议，召开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先进人员的会议。斯大林与工业及运输业中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共同讨论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最重要问题。

1935年7月30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铁路运输工作人员招待会，斯大林在这次会上作了关于铁路工作人员任务的讲演。1935年11月，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苏联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上发表长篇演说。他指明斯达汉诺夫运动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它包含有工人阶级文化技术高涨的种子，这种提高有助于将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

领袖的会见，亲切的慰问，有力地鼓舞了劳动者的热情。两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这是保证苏联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获得胜利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1940年生产了1500万吨生铁，1830万吨钢，3100万吨石油。全部大工业的产量，比十月革命前的1913年增加了近11倍，生产资料的产量增加了19倍，机器制造增加了44倍，发电量增加了24倍。苏联在工业生产速度方面超过了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产品的绝对数量方面居于欧洲的第二位。

在社会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那几年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同样迅速发展着。在1930年到1933年期间，大约有1400万缺乏效率的小片农民土地合并成为约20万个大农庄，这些农庄为集体所有，并用拖拉机和机器耕种。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必须现代化。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的农民还在用中世纪的方法，甚至是公元前的方法耕种。他们住在村庄里，要走很长的路才到田里。一个农户的4公顷到8公顷的土地，常常被分割为十几块，散布得很广，而且常常被分成连钉耙都无法转过身来的可笑的窄条子。1/4的农民没有马匹，所以翻耕的次数很少，而且很浅，通常用自制的没有金属铧的木犁。播种是用手从围裙里把种子撒到地上，很多种子常常被鸟吃掉或者被风刮走。很少有机器。宗教节日固定了播种的日期。最虔诚的信徒把拖拉机看作“魔鬼的机器”。因此，任何为农

业现代化的斗争，都是一场“反封建、反宗教”的斗争。

1928年，农业已经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总收获量已经达到战前的水平。但是运给城里的粮食却少得多了。在沙俄时代，尽管农民在挨饿，还是把谷物运出口。苏维埃时代的农民比以前吃得好了，但是出售的谷物就少了。余粮常常落到富农的手里，这些农村小资本家不仅从自己的田里得到谷物，而且还通过拥有磨坊和以收成作抵押而放债来获得谷物。他们同国家争夺粮食的控制权和农民的支持。因此，实行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政策，就成为党中央的当务之急了。

1929年间，农业集体化运动加快了步伐，很快席卷全国，出现了整村整区加入集体农庄的情况。1930年1月5日，党中央宣布说，在五年计划期间，使绝大多数农民实现集体化的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它还进一步提到，要在1932年秋季之前，在所有的粮食生产地区完成集体化。这就使集体化运动达到了“狂热的顶点”。由于要求太高太急，不少地区出现了强迫命令的现象。为了争取达到集体化的百分比，一些地区大刮浮夸风，用行政命令代替说服教育，有的竟采取“剥夺财产”、褫夺选举权等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一些地方领导人不顾中央关于“集体农庄运动，只是把基本生产资料公有的农业劳动组合”的指示，公然鲁莽地跳过劳动组合而径直组织农业公社，把住房、自用奶牛、小牲畜及家禽等实行公有化。

强迫命令和一些过火行动引起了农民的严重不满，加上阶级敌人的挑拨，谋杀和纵火案时有发生。有些农民用屠宰牲口的办法进行反抗。对农民来说，一匹马、一头牛、几只羊都是他的宝贵财产，在困难时期是食品的来源。但是，与其让牲畜被没收和交给集体农庄，还不如一杀了之。仅在1930年头几个月里，就有1400万头牛被宰。

1929年，在全国3400万匹马中，有1800万匹被宰。此外，在1929年至1933年之间，67%左右的羊被宰。

暴力和破坏的怒潮几乎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斯大林对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感到不安。

1930年3月2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篇著名的文章《胜利冲昏头脑》。在这篇论文里，斯大林强调了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原则，并指出，在规定集体化速度和方法时，必须估计到苏联各地区的特殊条件。斯大林提醒说；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是农业劳动组合，这种劳动组合只把基本生产资料，主要是粮食生产方面的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公有，而并不把宅旁园地、住宅、自用奶牛、小牲畜和家禽等实行公有。斯大林的论文产生了极大的政治效果。

为了把纠正错误的事情贯彻到底，1930年3月15日，联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详细分析了由于离开党的路线、直接违反党的指令所发生的种种错误。中央指出，“‘左的’过火行为乃是直接帮助阶级敌人的一种举动”。中央对几个犯了政治错误而又不善于改正错误的省委和边区党委进行了改组。4月3日，党中央又公布了斯大林所写的《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一文。这篇论文指出，“在农民问题上所犯的种种错误的根源，以及在集体农庄运动中所犯的主要错误是：不正确地对待中农；在建设集体农庄时违背了列宁所规定的自愿原则；违背了列宁所说的必须估计到苏联各地特殊条件的原则；公然跳过劳动组合而径直成立公社。”由于采取了这一切措施，党中央在许多地区克服了

过火行为，从而把集体农庄的建设工作引上了健康的轨道。如果说，在农民大批加入集体农庄以前，苏维埃政权主要是依靠社会主义的工业，那么今后它将同时依靠迅速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农业了。

当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已经创立和巩固，而且已经继续向前发展的时候，斯大林向全党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这就是在新的现代技术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所有各个部门，必须拿出现代的新技术、新机床和新机器来供给燃料工业、冶金工业、轻工业、木材工业、军事工业、运输业和农业。由于农产品和工业品需求额的大量增加，必须把国民经济所有各个部门中的生产量增加两三倍。可是要达到这一步，必须拿出充分的现代新装备来供给工厂、苏维埃农庄和集体农庄，因为旧装备不能把生产量提到这样的高度。

斯大林指出，不改造国民经济各个基本部门，就不能使国家及其国民经济愈益增长的新的需要得到满足。不实行改造，就不能把社会主义的全面攻势贯彻到底，因为“要打破和彻底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就不但要运用新的劳动组织和新的所有制，而且要运用新的技术、运用自己优越的技术。不实行改造，就不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苏联在工业发展速度方面虽已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工业发展水平方面，在生产数量方面，却比它们落后得多。为了消灭这种落后情形，斯大林强调必须在现代新技术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各部门。于是，“技术就有了决定一切的意义”。

到1943年底，“集体农庄已成为坚强而不可战胜的力量了”。当时，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约占苏联总农户的3/4，集体农庄播种的土地已约占全部播种面积的90%。1934年苏联农业中使用的拖拉机已有28.1万台，联合收割机3.2万台。1934年的春播工作比1933年早15天至20天完成，比1932年早30至40天完成，而粮食收购计划则比1932年早3个月完成。

1933年2月，在第一次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所作的报告，对动员庄员群众为巩固集体农庄而斗争的积极性起了很大的作用。斯大林说：在旧制度下，农民进行单干，用古老陈旧的方法和旧式农具工作，为地主和资本家、为富农和投机分子工作，自己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而使别人发财致富。在新的集体农庄制度下，农民按劳动组合的方式共同工作，用新式农具——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工作，为自己和自己的集体农庄工作，过着没有资本家和地主、没有富农和投机分子的生活，为了使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而工作。”斯大林在这篇报告中，不仅总结了集体农庄所取得的成绩，而且指明了集体农庄发展的远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机械化的程度，仅拖拉机一项，要从1932年的225万马力，增加到1937年的800多万马力。为了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斯大林号召科学种田，并广泛采用农业新工艺。

然而，随着经济改造的深入和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斯大林居功骄傲起来，越来越听不进不同的意见，越来越不注意集体领导，一言堂作风盛行，而且作风十分粗暴。在多数情况下，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尤其是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以后所发动的那场肃反运动中，在其错误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下，使许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干部蒙受了不白之冤，使党的事业招致了不

可估量的严重损失。正是：我行我素任蛮干，错误肃反酿大难。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章 怨恨与悲剧

居功骄傲发疯狂，内外矛盾日紧张；
怀疑一切搞肃反，大批干部惨遭殃。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党内不同政见增多了。从此，斯大林更加专心致志地投身于他所设计的“伟大事业”。不管遇到什么阻力，不管需要作出多大的牺牲，他决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建设社会主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也不惜一切代价清除各种阻力。

大规模的“镇反”当时是在反托洛茨基的旗号下进行的。斯大林在1937年联共中央2—3月全会上《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它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企图给大规模恐怖政策寻找理论根据，所用的借口是“随着社会主义的深入进展，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斯大林并且说，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事实上，这种恐怖手段不只用来反对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和暗藏的敌对分子，而且还把矛头指向持有不同政见的党员干部。他们被诬陷为“两面派”、“特务分子”和“破坏分子”，而加以错误处理或被残酷镇压。

赫鲁晓夫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披露，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中，被逮捕和遭枪决的有98人，即70%；在代表大会有表决权 and 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达1108人，占一半以上。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作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而载入史册的。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革命以前的年代，在地下以及在国内战争的前线，为党的事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英勇地同敌人搏斗，他们的生命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险，但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贞信念从未动摇过。怎么能够相信，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中，这些人竟变成了革命的敌人！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愈深入、敌人就愈多的论断，以及1937年联共中央2—3月全会根据叶若夫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就被钻进国家保安机关的破坏者，以及野心家、阴谋家加以利用。他们以保卫党的名义，对党和苏维埃的干部横加迫害，而且不断升级，1937年被诬告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数就比1936年增加了九倍多。现在查明，这些案件多系伪造，许多被捕者的供词以及所谓从事敌对活动的指控，都是用惨无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其中前联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埃赫的案件就是典型的一例。

埃赫是在严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拟好的审讯记录上签字的，审讯记录诬告埃赫犯有反苏维埃的活动。但是埃赫不服，1939年10月1日他交给斯大林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有罪过，要求调查他的案件。他在声明中写道：“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蹲在我一直为之奋斗的政府的监狱中。……如果这些材料中所说的罪行，哪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敢向您提出这份临终的申诉，但被指控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没有做过。我的心灵里卑鄙的影子从未有过。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半句假话，现在当我的两条腿已站在坟墓里时，我还是向您说实话。我的整个案子是阴谋、中伤和违犯革命法则的最起码原则的典型……我恳求您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调查清楚，这不是为了使您宽恕我，而是为了揭露这一卑鄙的阴谋。”按理说，这

样重要的声明应该在中央委员会上进行讨论，但并未这样做。声明书送给了贝利亚，而对埃赫的迫害仍在继续，并且在1940年2月4日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枪决了。现在查明，这纯系一件大冤案。

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口供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祖塔克。他是1905年的党员，在沙皇时代蹲过十年劳工营。最高法院审判会议记录，记载了卢祖塔克下列声明：“他对法庭的唯一请求是，告诉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没有被割除的脓疮，它假造一些案件，逼着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他认为对被指控的事实没有进行审查，没有给被告以任何机会来证明自己与别人供出的那些罪行并无任何关系。侦查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编罪行和诬告完全无罪的人们，被告对自己的问题更不用说了。他请求法庭给他机会把这一切写给联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证，他本人从来没有反对我党政策的坏思想，因为他从来完全同意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全部政策。”然而，卢祖塔克的这一声明并没有受到注意，尽管卢祖塔克是当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也没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来听取他的申辩。他在20分钟之内就被判了罪，然后就被枪毙了。现已查明，这又是一件大冤案，被指控的材料完全是造谣中伤。真是悲哉！痛哉！

同样，这场大清洗也涉及军队中大批富有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在苏德战争初期，号称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以败得那么惨，蒙受重大损失，除了由于斯大林对战争形势严重估计不足和盲目拒绝来自各方面有关敌人要入侵的情报，因而缺乏及时的战备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场大清洗整肃了大批的优秀军官，严重挫伤了红军的战斗力。红军总参谋部有近一半的军官被处死或被投进了监狱。据苏联《在国外》周刊1988年第22期披露，苏联5名元帅中杀了3个，15名集团军司令中被整肃了13名，85名方面军司令中被整掉了57名，195名师长中只剩下85名，406名旅长中剩下了186名。这家杂志说：“根据可靠材料，斯大林在1937—1938年的肃反运动中，处死了近35000名红军指挥员。”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被指控因背叛祖国和反党活动罪而遭到镇压的数万名军官，是没有丝毫罪过的。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人民和党的敌人，没有一个人企图推翻政府，更没有一个人像斯大林的保安机关所断言的那样“为德国间谍机关服务”。所谓轰动一时的“军官反党事件”完全是希特勒等人精心策划的。

为了借刀杀人，希特勒的特务头子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炮制了两份极为阴险毒辣的情报。第一份情报是，红军总参谋部正在策划一个反对斯大林的阴谋，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这一阴谋的头子。第二份情报说，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亲信正在同德军最高司令部和德国间谍机关进行秘密接触。德特机关并通过巧妙的手法和途径，向苏联保安机关抛出了他们伪造的文件——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著名军事领导人为首的阴谋集团同德军合作的“证据”。就这样，图哈切夫斯基等人就成了苏联红色政权的刀下鬼。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苏联最有才能、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当时他是苏联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红军总参谋长。他出生于贵族家庭，1914年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沙俄军队中服役。十月革命后，图哈切夫斯基就转到了苏维埃政权方面，并于1918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

1920年他指挥高加索方面军打败了邓尼金的部队。他使红军充满活力，他是红军力量日益强大的象征。作为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和功勋卓著的将

领，作为红色革命政权的忠诚保卫者，图哈切夫斯基享有广泛的声誉。除掉总参谋部这位强有力的领导，犹如推倒了一棵大树，加上大批高级和中级军官被整肃，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存在着严重的纪律松弛倾向，致使卫国战争初期，苏军防务和指挥陷入极度混乱，遭受了不应有的严重损失。

然而，在监狱中幸存下来的军官，他们虽然受尽折磨，但总算挣扎着活下来了，在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他们英勇地为祖国而战。有的光荣战死，有的为祖国立了大功，像罗科索夫斯基、戈尔巴托夫、波德拉斯等人就是这方面的光荣代表。

斯大林发动的这场肃反运动，不仅给全党全国带来了巨大灾难，而且给他的家庭和亲属也带来了莫大的不幸。1932年11月18日，斯大林的妻子纳佳在和他发生了一场口角后，当天夜里就用一支小左轮手枪自杀了。这件事虽然是因为在招待会上饮酒问题引起的，但这件事的实质却反映了斯大林的妻子对他制定的某些政策及其粗暴行为的严重不满和抗议。当她听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由于强迫命令许多人被拉出去枪毙，不少人被迫害致死；在联共中央，她所尊敬的斯大林过去的战友——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由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路线和她的丈夫持有不同意见而在挨整时，她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因此采取了这种愤懑的激烈行动。

妻子的自杀，极大地地震动了斯大林。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她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担心人们会说他是个严酷的、毫不体贴妻子的丈夫，竭力表明自己总是热爱和尊敬妻子的。他问他周围的人，难道他少陪她去几次戏院算是真正严重的问题吗？她竟然发出这样的怨言，这说明她是多么地不理解和不支持他的工作。

妻子的死对斯大林来说是一可怕的打击，使他的心灵变得如此空虚，以致失去了对同志、对朋友的信任。尤其是她留给丈夫的一张条子也伤害了他的感情，使他感到气愤。这张条子被立即毁掉了，但斯大林的女儿从看到过这张条子的人那里得知，条子上充满了对他个人以及对一些政治问题的申斥和指责。当时正是农村为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而出现的强迫现象最严重的时候。她从同学和朋友中听到一些残酷无情的传说。她感到惊骇，就怪罪于他。对斯大林来说，被他视为“最亲密和忠诚的朋友”的女人留下的这张最后的条子，是一次毁灭性的“背叛”。他悲愤欲绝。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他走近棺木站了一会儿。突然用双手推开棺木，转身走了，他甚至没有去参加葬礼。斯大林认为她是作为一个反对他的持不同政见者离开他的。因此，他拒绝到新圣母公墓去看妻子的坟。

之后，为了减少精神上的痛苦，斯大林搬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另一套房间去住，因为他不能忍受再住在曾和妻子同住过的那套房间里。坐落在祖巴洛夫的那座别墅，经常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他的孩子们仍然上那儿去。他却在附近的孔策沃新建了一幢房子，在以后的20年中他一直单身住在那里。但是他从未忘怀过她，在后来的岁月里，斯大林把纳佳在1929年春天和夏天心情愉快时拍的照片，放大后挂在他克里姆林宫的住宅和别墅的墙上。他往往难以忘怀地谈起她。妻子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不支持他进行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试图理解这一切。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那娃，在和友人的通信中，对她的妈妈曾作过如下的回忆：

“我和妈妈的最后一次见面大概就是她逝世的前夜，不然就是她死前的

一两天。她把我叫到她的房间里，叫我坐在她心爱的软榻上，久久地教导我应该作一个什么样的人，并且如何作人。她说：‘不要喝酒！永远不要喝酒！’这是她和父亲争吵的回声。按着高加索的习惯，逢年过节总是让孩子喝点上等葡萄酒。在她的眼里，这就是学坏的开端，不会有好结果。大概她是对的，后来我哥哥瓦西里就死于酒精中毒。这一天我在她的软榻上坐了很久，由于我总是很难得见到妈妈，所以这最后一次十分清楚。”

“妈妈是个非常内向的、自尊心很强的人。她情绪不好时，也从来不承认心里有什么事。她不喜欢谈她个人的事情。为此，外祖母和她的姐姐安娜姨妈常和她生气，因为她们都是非常外向的人，心直口快，想什么就说什么。”

“问题在于母亲一直坚持她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她从不妥协。她自己属于革命的年轻一代，这一代是最初的五年计划的热情劳动者。他们是具有坚强信念的新生活的建设者，他们自己就是新的人，他们虔诚地相信革命把人们从市侩习气和旧社会的罪恶中解放出来的新的理想。她用革命理想主义的全部力量相信这一切，而她周围的人也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她的信念。在这些人中间，我父亲曾是她心目中新人的最高典范。一个年轻的中学生就是这样看他的；他是一个刚从西伯利亚归来的‘百折不挠的革命者’，是她父母的朋友。对她来说，在很长时间内，父亲在她心中就是这样的人；但并非永远如此……”

“我的保姆告诉我，说在我母亲死前不久，她十分忧郁，脾气也不好。这时有一位她中学时期的女友去看她，她们就坐在我的儿童室里谈话，我的保姆曾听到她说：‘一切都烦恼极了’，‘一切都讨厌死了’，‘没有一件高兴的事’。……不幸的是，1932年的秋天，一个亲人都不在莫斯科，巴维尔舅舅和斯瓦尼泽全家远在柏林；安娜·谢尔盖那芙娜舅妈和她的丈夫在哈尔科夫，外祖父在索契。这时妈妈从工学院刚刚毕业，身体也过于疲倦。”

“她的神经本来就有毛病，完全不能喝酒；酒对她的身体很有害，因此不爱喝酒，而且当大家喝酒时她就非常害怕。父亲曾对我讲过：有一次妈妈从工学院参加晚会回来，她喝了一点酒就完全病倒了，两臂都痉挛了。父亲扶她睡下，安慰了她，于是妈妈说：‘你还是有点爱我！……’这是他在战前亲自对我说的。在他死前的最后几年，他越来越常回忆起妈妈，并且一直在寻找致妈妈于死命的‘罪魁祸首’是谁、是什么？”

“如果说当时父亲都不了解妈妈，那么在事隔20年之后，他已经完全不能理解她，而且也忘记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幸好他现在谈起妈妈的时候，态度缓和了些，甚至有些怜悯她，提起自杀的事也不责怪她了。……”

“那个时候，常有开枪自杀的事。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埋葬，开始了集体化，反对派的派系斗争分裂了党。……我想这一切都不能不对妈妈的思想有所影响，因为她这个人十分敏感，容易冲动。阿利卢耶夫全家的人，为人行事都很有分寸，有些神经质，生性谨慎。这是一种演员的性格，而不是政治家的性格。普希金说过：

‘不能把一匹战马和一只战战兢兢的鹿套在一辆车上。’”

纳佳死后，斯大林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他对旁人的不信任感加深了，思想上好像蒙上了一层阴影，同亲属和朋友的关系疏远了。他相信一切现行的或潜在的反对派必须根除和摧毁。他的猜忌、独裁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号召下，一场大规模的肃反和清党运动在全国、全党展开了。斯大林要挖出隐藏在党内外的一切敌人，一个不留地全

部肃清。他明白，外科医生在病人身上割去毒瘤时，要割去其周围的健康肌肉，以防感染；同样，无辜的人们也将在这场清洗过程中受难，但这种伤亡是不可避免的，也阻挡不住他采取行动的决心。斯大林认为，苏联的成就越大，资本主义阶级敌人的破坏企图也就越大。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肃清这些敌人。基于这种错误的思想，任何人，甚至那些最有献身精神的工作人员，都在怀疑之列。他像是在传播病毒一样，向全国的肌体中注射怀疑的毒素。

这场震惊世界的肃反运动，长达四年之久，由于斯大林独裁专权，由于坏人钻进了掌权的肃反部门，使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无辜的株连。1933年，苏共党员和预备党员的人数为350多万。1935年5月，即在基洛夫被刺后的几个月，中央委员会指示，所有党证应该审查一遍。到1937年1月为止，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的人数降到了200万以下。在三年时间内，有150多万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失去了党籍。并有成千的革命者以“反革命”或“特务”的罪名，无辜地遭到逮捕或惨遭杀害。斯大林死后，苏联开始重新审查这些案件。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过去两年里，已有7679人被“恢复名誉”。他们中间大多数都已死去。肃反运动严重挫伤了党的元气，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受到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布哈林之死。在肃反运动中，布哈林于1937年遭到逮捕，1938年3月15日与李可夫等人一道以叛国罪被处决，时年50岁。

布哈林是俄共20年代的重要领导人。他在俄国十月革命时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委员和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当时他只不过29岁。十月革命后，布哈林长期任《真理报》的主编，在1924年当选为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他才35岁。他还担任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等职。从1917年至1938年期间，布哈林作为党的一位领导人、理论家和经济学家在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列宁在世时对布哈林的赞扬多于对他的批评。列宁说：“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

正如苏联历史学家阿纳托利·拉特舍夫1987年12月25日在苏联《消息报》的《星期副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说的，布哈林是个复杂的和自相矛盾的人物。

布哈林既是列宁的忠诚支持者，又与列宁有过多次分歧和争执。列宁逝世后，布哈林积极参加了斯大林领导的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但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布哈林与斯大林又存在严重分歧。

布哈林一生正直，敢于发表不同政见。他犯过不少理论的和政治的错误，但一旦发现自己错了，又主动承认错误。他所犯的一些错误，只是一个正直的革命者在寻求正确的革命道路中认识上的一些错误。世界上没有完人，布哈林也同样不是完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很多理论问题，正在探索之中，我们不应苛求于布哈林。而且布哈林在很多理论问题上的意见，是十分高明而富预见性的，至今还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布哈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的一生。18岁就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布哈林被斯大林等人迫害致死，这件事玷污了历史，成了历史上最可悲、最可耻的一页。这一悲剧，无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对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都是无可估量的损失。

1988年2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通过一项决定，撤销军事法庭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判决，理由是对他们的指控“缺乏任何罪证”。布哈林的历史冤案终于得到平反。

1937年是镇压高潮的一年。忽然，负责肃反的刽子手叶若夫自己也不见了；谣传他已被斯大林送进疯人院。原因是，他滥用职权，杀人过多，他的名字后来成为恐怖运动最猖獗时期的代号。1938年初党通过了一项新的决议。疯狂开始减退了。赫鲁晓夫在谈到1937年好人受到陷害一事时曾说：“我们指责叶若夫应对1937年的暴虐行为负责，我们的指责是正确的。”可是他接着说，叶若夫准备了一些在没有审讯之前就决定予以判决的人的名单，并且把名单送给斯大林批准，如果没有斯大林的同意，叶若夫是不能判处某些著名人士的。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人，有着病态的疑心。”肃反委员会里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利用了斯大林关于越接近社会主义，敌人就会越多的这一论断，利用二三月间中央全会根据叶若夫报告所作的决议，钻进国家保安机关里的破坏者，同一些没有良心的机会主义者一起，开始以党的名义掩护大规模的恐怖手段。”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临到苏联的时候，世界各国看到希特勒第五纵队在苏联是相对地少，而它却曾推翻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霍华德·克·史密斯评论道：“如果俄国不曾清洗掉几千个文武官员，无疑红军在两个月内就已崩溃了。”曾长期驻在苏联的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却完全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她说：“我知道苏联人民之所以忍受了那些疯狂的年代，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在准备着决死的防御战，相信他们已在同一个隐蔽的敌人进行搏斗。并且相信每消灭一个叛徒就可以在以后挽救成千人的生命，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就是这种在黑暗中同高踞领导地位的敌人作着斗争的感觉，使这些年代具有梦魇的性质。”

在历史上，一个领导人的错误，特别是有威望的国家领导人的错误，往往会变成全体人民的悲剧。对于斯大林的问题，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不能不说斯大林的行为是失去理智的暴君的行为。斯大林认为，为了党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果实，应该这样做。这正是悲剧之所在！”

长期从事研究有关斯大林的传记史料的苏联哲学博士沃尔科戈诺夫教授，在苏联《文学报》为他即将问世的《胜利和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一书写的前言说：“斯大林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当代和未来。这个人物的历史像是一个中心，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极其复杂的辩证法。那个时代的情况有多么复杂，领导人民和党的这个人物也就有多么复杂。”

沃尔科戈诺夫进一步指出：“要忠实地对待真理和历史，就不能不承认，斯大林对争取和捍卫社会主义的斗争作出了无可争辩的贡献。同样，也不能不承认，他犯有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和罪行，那就是成千上万的无辜人们遭到毫无根据的镇压。斯大林和党的领导核心在政治思想斗争中坚持和捍卫了列宁主义，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正当人们认为党内斗争方面最困难的事情已成为过去，而且在创造新事物的许多领域已取得重大成绩

霍华德·克·史密斯：《从柏林开出的最后列车》，第325页。

斯特朗：《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第96页。

的时候，被斯大林‘神圣化’了的关于随着社会向前发展，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极其错误的政治论断产生了。”这就是这场悲剧的根源。

然而，就在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时候，世界形势骤变，德意日法西斯疯狂进行侵略和扩军备战，三个法西斯国家并先后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全世界人民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一场席卷全球的战争就要爆发了。正是：混沌未分天地乱，法西斯蒂要开战。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一章 战争风云

法西斯蒂太猖狂，耀武扬威耍刀枪；
痴心要吞全世界，狼烟四起众惊慌。

正当苏联人民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战争风云骤起，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已经形成，德意日法西斯势力加紧扩军备战，肆行侵略，对世界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斯大林号召苏联人民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加快农业集体化，特别是加快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建设，全国开展了斯达汉诺夫运动和“时间啊，前进！”的劳动竞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相对和平时期，这个和平只是前后两次世界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它实际上是下一次世界战争的准备时期。通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建立的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帝国主义列强完成了一次对世界的重新瓜分。这次瓜分是和当时的实力对比相适应的。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很快发生了变化，它们在战后形成的相对均势被打破，重新瓜分世界的问题，必然再次提上日程。

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德国实力的迅速恢复。德国虽然因为战败而被严重地削弱了，但它还是一个欧洲大国，拥有 6000 多万人口，有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和巨大的经济潜力。但是，单靠德国本身的力量，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实力是不可能的。德国的再度崛起，是和美、英垄断资本的扶植分不开的。由于大量的外国资本同德国巨大的工业潜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使德国帝国主义很快东山再起，回到争夺世界霸权的行列。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德国的扶植是多方面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道威斯计划”所起的作用。这个计划是以美国银行家道威斯为首的协约国赔款委员会所属的一个专家委员会提出来的。这个计划为外国资本进入德国打开了大门。据统计，在 1924 年至 1932 年间，投入德国的外国资本达 318 亿多马克。德国利用这些资本恢复了信贷制度和商品流通，恢复了生产，更新了工业设备，实现了主要工业的现代化和合理化，使德国很快地恢复和发展了自己的重工业，首先是冶金工业和军事工业，重建和加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西方垄断资本还在技术、装备、燃料和原料方面支持德国，帮助德国获得提炼人造汽油和人造橡胶的先进技术。1933 年 2 月 1 日，美国军火托拉斯杜邦·德·尼·摩尔公司，更不顾凡尔赛和约关于禁止德国输入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的规定，同德国缔结了一项出售军火的协定，把飞机发动机和战斗机出售给德国。不久，英国的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也同德国签订了出售军火的合同。英国及其自治领向德国提供了它所需要的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合金等战略物资；美国向德国大量供应石油；德国需要的生铁、废铁、铁矿石，也是英、法等国提供的。

因此，在 1921 年至 1929 年间，德国工业生产平均以每年 7.1% 的速度增长，而英国在同一时期的每年增长率只有 1.7%。到 1929 年，德国的工业总产值以及钢、铁、铝、电力等的生产已经超过英法，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与此同时，德国资本的集中和垄断有了很大的发展，蒂森、克虏伯、法本等一小撮垄断巨头完全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他们对德国重新军国主义化和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起了重要作用。

在逐渐恢复经济实力的同时，德国统治阶级竭力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

1924年9月，德国政府正式向战胜国提出下列要求：接纳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并给予行政院常任理事席位，解除德国的战争责任，给德国殖民地委任统治权，修改凡尔赛条约有关军备的条款。

1925年10月，英、法、德、比、意、波、捷七国在瑞士洛迦诺召开的会议，对助长德国的扩张野心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次会议确定了德国西部的边界，但却向德国敞开了向东方邻国和苏联侵略扩张的大门。会议还决定让德国加入国际联盟。这样，德国就在政治上取得了和战胜国平等的权力。洛迦诺会议是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在凡尔赛条约的基础上调解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矛盾，在政治上纵容德国向东方扩张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里程碑。斯大林指出：“洛迦诺公约是为新战争配置力量的计划”，它“孕育着欧洲的新战争”。

在恢复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同时，德国还采取种种手段重整军备。

1928至1929年间，德国开始秘密地建造飞机、装甲车和坦克。到1929年底，德国已有12个飞机制造厂，6个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在研制坦克方面也取得了成果。它还秘密地在西班牙等国建造潜艇和其他军舰，并积极从事军用化学、人造汽油等方面的研究。德国利用西方列强憎恨社会主义苏联的心理，大谈“苏俄威胁”，抱怨自己“毫无防御能力”，要求撤消对它的军备限制，实行军备平等。于是，在日内瓦裁军会议期间，英、美、法、意、日五国政府首脑会议便于1932年12月通过决议，原则上承认了德国军备平等的权利。在同年举行的洛桑会议上还正式取消了德国的赔款义务。

1933年1月，希特勒被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捧上了台，当上了德国的总理。希特勒上台是德国垄断资产阶级重新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的一个重大决策，也是德国成为欧洲战争策源地的一个重要标志。希特勒上台后，立即实行法西斯的极权政治，血腥镇压德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疯狂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大力扩军备战，制造舆论，准备冒险发动战争。

希特勒就任总理后的第二十八天，即1933年2月7日，精心策划了国会纵火案，嫁祸于德国共产党。6周之内，逮捕了德共领导人和积极分子18000余人，取缔了德共在议会中的所有席位。随后，社会民主党及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也相继被迫解散。希特勒还禁止在德国成立新的政党。1933年底，希特勒宣布“党和国家合一”，使国家政权完全成为纯粹党的权力机构。1934年8月，德国总统兴登堡病死，希特勒兼任总统，自称国家元首，实行了法西斯独裁统治。

德国建立法西斯专政后，立即把国民经济纳入战争的轨道，提出“大炮代替黄油”的口号，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军费迅速上升。从1933年开始的6年半时间内，德国军费支出高达900亿马克，占同期国家预算支出的3/5。

1934年8月，希特勒秘密下令把陆军限额从10万人扩充到30万人。

1935年3月，德国空军正式宣布建立，德国飞机的产量迅速增加，1934年生产飞机约2000架，1938年增至5200架。

1935年3月，德国还正式发表了重振军备的宣言。

为了发动侵略战争，希特勒大造反革命舆论。学校教育全力灌输“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法西斯理论。希特勒想把德国青年培养成“全世界都望而生畏的青年。”他说：“我需要看到的是具有强烈主动性的、主人翁气概

的、不胆怯的、残忍的青年。绝不许他们软弱和温和。我要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骄傲的神色和猛兽般独立的光辉。”德国法西斯还编造了一套极端反动的种族理论。说日耳曼民族是“地球上最高级的人种”，应当统治其他民族。希特勒叫嚣：“我们要精选一个新的统治阶层，这个阶层不知温和为何物；这个阶层将认识到自己属于优良种族，因而有权统治别人；这个阶层将能毫不动摇地夺得并坚守它的统治权。”

希特勒还伪造德国“人口过剩”的理论，说消除“人口过剩”的唯一办法就是夺取“生存空间”，要“集结全民族政治力量”去“寻求新的生存空间”。怎样夺取“生存空间”呢，他说，“要解决德国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动武，要动武而又想一点风险都不冒是不可能的。”希特勒扬言要用刀剑去“征服土地”。“任何人要是胆敢对我们的这一行动加以阻挠，我们就要把他撕成碎片。只有当德国重新用它自己的刺刀尖来保卫自己的时候，我们的权利才能获得保护。”希特勒还竭力煽动反共反苏，制造赤色苏联“威胁”的谎言，表示德国重振军备是为了反对苏联的“威胁”；另一方面又假惺惺地宣称，德国增加军队是为了“维持和平”，并表示，德国的军事力量“绝不愿为战争攻击之用”，以取得英、法的支持。与此同时，德国宣布实行国防军法，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并将军队和警察扩编为 12 个军，36 个师，约 50 万人。

1936 年 3 月，希特勒宣布废除《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派兵进入莱茵非军事区。这是一项带有很大风险的军事行动，因为这时德国实力虽有增强，但希特勒羽毛未丰，尚不足以同英、法一战，正如希特勒以后所供认的那样，在进军莱茵区以后的 48 小时，是他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如果当时法国人向莱茵区进军，德国只好忍辱撤退。然而，法国对德军进驻非军事区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措施，而英国则采取纵容的态度。就这样，希特勒以区区 4 个旅的兵力探明了英、法的虚实，摸到了底细。德军进占了莱茵非军事区，《凡尔赛和约》所给予德国的限制和束缚也就荡然无存了。同年 7 月，德国伙同意大利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至此，地处欧洲心脏地区的法西斯德国就变成了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动者，成为欧洲战争策源地。

意大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个用武力向外实行侵略的欧洲国家，又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帮凶。意大利经济基础薄弱，在 1929 年经济危机之后，预算出现巨大赤字，全国失业人口超过 100 万。为了摆脱危机，墨索里尼极力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加紧扩军备战，企图通过武力进行扩张，掠夺市场和原料产地，进一步同英、法抗衡。意大利为了重新分割东非与北非的殖民地，独霸地中海，控制红海通向印度洋的航路，以削弱英法与亚洲及殖民地的联系，发动了侵略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35 年 10 月 3 日，意大利出动 20 万大军，从北、东、南三路侵入阿比西尼亚。阿国军民奋起反抗。1936 年 5 月，意大利占领了阿比西尼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阿比西尼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流亡英国。意大利侵略军以历时 7 个月，死伤 14 万人的代价占领了阿比西尼亚，并将其与意属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合并，组成意属东非帝国。

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全境后不久，又伙同德国对西班牙内战实行了公开的武装干涉。本来，德、意之间存在着矛盾。

1934 年希特勒企图染指奥地利，遭到英、法的反对，意大利也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一度陈兵意奥边境，使希特勒不得不知难而退。事后，意大利感到

在争夺殖民地势力范围的斗争中，主要对手是英国和法国，意大利需要有德国支持，以对付英、法。而德国在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时，也给予了积极支持；希特勒还曾访问罗马，当面吹捧过墨索里尼，两国关系有了重大改善。在武装干涉西班牙时，两国关系更加密切，并在 1936 年 10 月签订了共同协定，结成了“柏林—罗马轴心”。

在东方，日本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化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加快了军事化的步伐。从 1931 年起，日本的军事预算年年上升，1936 年达到 10.7 亿多日元，占财政支出的 47% 以上。日本政府还颁布和修改了许多法令，加强了对主要经济部门的控制，逐步将国民经济纳入战时轨道。日本的军事工业急剧膨胀，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畸形上升。构成军事工业基础的化学工业和钢铁工业，在 1931 年至 1936 年间增长了 2.5 倍。生铁产量，1931 年不足 16 万吨，1936 年增至 200 万吨以上。1934 年初，日本统治集团以国家垄断企业八幡钢铁厂为中心，把属于三井等五大财阀的钢铁公司合并，组成庞大的日本钢铁公司。日本经济军事化的过程，也是垄断资本扩大的过程。到 1936 年，大垄断企业特别是重工业部门，一般都控制了各该部门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从 1932 年至 1936 年，财阀控制的企业接受政府军事订货达 55 亿日元之巨。经济军事化促进了财阀同军部的勾结，为扩军备战创造了条件。日本军队得到大力扩充，装备有了很大改善。

1930 年，日军人数为 23 万人，到 1936 年达到 38 万人。海军总吨位超过 150 万吨。

日本强化法西斯统治和实行经济军事化的目的，是为了对外实施侵略扩张，它的侵略目标首先是中国。

1931 年 9 月 18 日，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沟的南满铁路，反诬中国“袭击”日军，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动猛烈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日军进攻面前，蒋介石密令不准抵抗，30 万东北军不战自退。在事变后 4 个月里，日军侵占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白山黑水间的大好河山全部沦于敌手。

1932 年，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中国军队第十九路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奋起抵抗，粉碎了日军占领上海的企图，史称“淞沪之战”。同年 3 月 1 日，日本帝国主义炮制了伪满洲国，并要国际联盟承认。翌年，日本以国际联盟拒绝承认伪满洲国为借口，宣布退出国联。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全境后，逐步向华北地区蚕食。1933 年 1 月初，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华北之间的咽喉要地山海关，3 月又侵占热河省（今内蒙、河北省之一部），并逐步扩大在华北的侵略活动。

1936 年 11 月 25 日，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两国结成了侵略联盟。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制造“芦沟桥事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就这样，日本逐步成为亚洲战争策源地，首先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30 年代后半期的国际形势不仅令人忧虑，而且十分险恶。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迫近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军备竞赛。从 1934 年到 1936 年，日本的军费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从 43.4% 增加到 70%，而德国从 21% 增加到 67%，意大利从 20% 增加到 52%。

面对这种情况，斯大林承受的压力愈来愈大了。他相信战争已迫在眉睫，苏联在东西两面都受到威胁，而且很可能在它未来来得及积聚力量之前大战

就爆发了。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他命令加快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加快国防建设。他多次指出“落后就要挨打”，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凡尔赛条约只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停火协定。他密切注意西方的动向，寻找即将来临的冲突的早期征兆。

斯大林希望战争将局限在资本主义阵营之内；但是，又必须进行多方面的准备。如果苏联一旦遭到进攻，红军就要坚决反击，把敌人消灭在入侵的土地上。根据斯大林的倡议，联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加强红军的决议，强调必须开展全面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工作。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国防人民委员部对红军和后备队进行了认真的全面的训练。当时担任国防人民委员的伏罗希洛夫在党的一次会议上说：“技术的进步，军队结构的变化，都预示着未来的冲突将采取新的形式。目前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在未来的战争中，前方和后方的概念将失去其意义。飞机、坦克、化学武器这些战斗工具将不理睬过去的界限，或者说，旧概念中前线的界限对这些武器来说已不适用了。”伏罗希洛夫一方面高度估价军事技术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同时他又经常强调，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他指出，“可以认为，工业化在未来的武装冲突中将发挥最大的效用。但是，军队指战员的作用，人的作用，过去是，将来仍然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因此，我们的红军，从战士到高级指挥员，具有相当训练有素的战斗力是很重要的。”

斯大林在处理外交政策中，表现了极为谨慎、克制和现实的态度。他需要时间来加强苏联的工业和军事力量。在东西两面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力图扭转或至少推迟必将爆发的战争。为此他推行一项集体安全政策。30年代初期，苏联同波兰和芬兰谈判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933年6月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上，苏联外长建议签订一项多边互不侵犯条约，这导致苏联同它南面和西南的所有邻国都签订了条约。此举对维护苏联的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尽管苏联和中国于1932年恢复了外交关系。但1931年9月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在远东就给苏联的利益与安全构成了一种严重的威胁。

斯大林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俄国在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所蒙受的耻辱仍记忆犹新。尽管日本人多次挑衅，他们仍然“泰然自若，不动声色”，表现了“顽强的克制和极大的耐心”。斯大林最担心的危险是日本人会侵犯蒙古，这个人民共和国当时起着缓冲国的作用，而且实际上是苏联的保护国。如果日本人这样做，战争就无法避免了。当时日苏关系非常紧张，两国都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匆忙调兵遣将，并制订计划在远东发展工业以加强国防。斯大林继续严守中立，拒绝同英国和美国合作反对日本，甚至不参加国联的一个调查满洲局势的委员会。他决不做任何有可能“被用作发动战争的借口的事”。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战争的阴云在欧洲上空集结。希特勒一再表示敌视苏维埃政权，并宣布他对乌克兰和苏联其他领土的要求。他的侵略扩张政策令人不安。在希特勒担任总理的最初几年，斯大林没有公开评论德国，他希望德国人格守原来的边界和条约。但他密切地注视着能表明希特勒真实意图的迹象。当时斯大林首先关心的是苏联边界的安全。德国人通过北波罗的海挺进的线路是毫无障碍的；由于波兰已经屈从，从中路进入苏联的线路也打开了。苏联政府于1934年夏季分别同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

加利亚签订的条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西南边男，的安全。但斯大林明白，波兰人对俄国的几百年的宿怨使波兰成了他的最危险的邻国。

为了加强国际间的合作，1934年9月，苏联参加了国联。莫洛托夫在1935年1月28日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谈到了“同国联合作的权宜之计”，说苏联政府不会轻易地过高估计这种组织的重要性。他接着谴责了德国的种族理论，引用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中针对苏联的“领土征服政策”。他虽然对苏联军队的强大力量充满信心，但德国的扩军步伐有高度发达的重工业作后盾，远远超过了苏联的发展速度，因此对局势的发展十分担心。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不得不采取非常灵活的外交政策，即坚持争取集体安全，同时不仅在道义上支持已成为侵略牺牲品的爱好和平的国家，而且给它们以实际援助。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根据联共中央的指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1937年7月，日本大举侵犯中国以后，苏联政府给中国提供了2.5亿美元贷款，用于购买苏联的装备。在这笔贷款项目下，苏联仅在1938年到1939年就向中国运送飞机777架，坦克82辆，载重汽车1550辆，大炮和榴弹炮1225门，机枪9525挺，步枪5万支，还有大批飞机炸弹、炮弹、子弹，以及其他军用物资。苏联空军的志愿飞行员在中国英勇地同日本侵略者作战，其中一些人在中国牺牲，并且安葬在中国土地上。

在那些年代里，苏联给予西班牙人民以巨大援助，帮助他们英勇反击佛朗哥叛乱分子及其后台德、意法西斯的武装干涉。当时，西方各大国，尤其是英、法统治阶级，既害怕西班牙民主力量的胜利，又害怕严厉的制裁将触怒法西斯强盗而引火烧身，乃以表面“公正”的态度，策动欧洲27个国家于1936年9月签订了不干涉协定。接着又在伦敦成立“不干涉西班牙事务委员会”。名义上对作战双方实施军火禁运，事实上只是使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军得不到武器供应，而叛军却能自由地从德国和意大利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应，其中包括从英、法等国转卖的武器和物资。西班牙民主进步力量和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

在此情况下，世界各国人民积极声援和支持西班牙人民，苏联政府对西班牙人民也给予了包括飞机、坦克和粮食等的物质支援。仅在1936—1937年，苏联就向西班牙共和派提供军用飞机800多架，坦克362辆，装甲车120辆，大炮1550多门，机关枪1500挺，步枪50万支，大批子弹、炮弹和其他军用装备、药品和食品。应共和政府的请求派往西班牙的苏联军事顾问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和精力都献给了委托给他们的事业。许多苏联志愿军加入了共和派军队。他们作战英勇。其中有飞行员772名，坦克手351名，炮手100名，水兵77名，其他军事专家339名，翻译人员204名。他们忠于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奋不顾身地同法西斯分子战斗。对他们的功绩，西班牙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欧洲和亚洲法西斯军事威胁的增长，迫使苏联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来进一步增强本国的经济和国防实力。苏联的经济成就是完成这项任务的物质基础。1937年，苏联政府的军事预算拨款由原定40亿卢布增加到175亿卢布，以保证更多地生产军用产品。结果，军队得到了更多的新武器和军事装备。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说，所有这一切都做得非常及时，因为不久日本法西斯的进犯就开始了。正是：未雨绸缪是上策，加强备战不宜迟。欲知后事

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二章 歼灭东犯之敌

哈勒欣河敌军犯，东洋鬼子吃铁拳；
红军战士显威武，顽敌碰壁暂收敛。

欧洲战火越烧越旺，而在远东，日本军国主义也越来越胆大妄为，所以斯大林对苏联边境的安全，愈发忧心忡忡了。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阻止侵略的步骤，除了加紧外交活动和强化国防建设外，还在边界一带修筑了一些防御工事。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斯大林对苏联的远东边界安全尤为担心。所以在此以前，就组建了远东方面军，建立了太平洋舰队。1936年3月，苏联又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

自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后，日本统治集团一直在试探苏联红军的实力，而且往往是趁世界其他地方发生危机的时候进行试探。1936年日本在中蒙边境挑起了三起边界冲突，此后又发生多起。这段时间，由于慕尼黑危机和德国法西斯加紧扩军备战，苏联似乎专心致志应付欧洲事态的发展。于是日本决定在中蒙边境对苏联的军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试探。然而，日本发动的侵略，已远远超出一次试探行动的范围了。日本人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是想借此提高日本军队在其他国家心目中的“声威”。此外，日本军政头目还希望把苏联和中国隔开，从而切断援助通道。

为了进一步取得德、意法西斯势力的援助，以便早日征服中国，并回过头来进攻苏联，日本法西斯经过谈判，于1937年11月6日同德、意法西斯签订了《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决定书》。通过这个议定书，意大利正式参加了1936年签订的日德“防共协定”。从此，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侵略集团正式形成。

事隔不久，1938年一二月间，德国法西斯由于在欧洲推行侵略扩张的需要，不满足于已有的“防共协定”，而渴望签订三国军事同盟。5月初，日本近卫内阁由陆军、海军、外务三省（部），拟定了日、德、意三国加强合作以对付苏联的基本方案。其后，日德双方频频接触。日本政府发起进攻武汉战役时，日本关东军特种情报机关截收了远东苏军一份密码电报。其中提到“应在香山洞（位于张鼓峰东北约12公里）以西高地配置兵力”。日本军事当局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试探一下苏联的反应，也向其德国伙伴表明签订反苏军事同盟的决心，于是一场蓄意向苏联进行军事挑衅的阴谋就这样确定了。

张鼓峰临近中苏边界，在图们江口上游20多公里的东岸，是一个海拔只是150米左右的高地。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站在这里还可以遥望海参威海港。沙草峰是位于张鼓峰北方2公里多的一个隆起的山峰，其高度略低于张鼓峰。所谓“张鼓峰事件”就是日苏双方军队围绕这两个山峰，反复进行决死战斗的地方。7月16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东条等人，对驻朝鲜日军司令官中村孝太郎中将下达命令，要驻朝鲜第十九师团尾高龟藏的部队集中到边境一带，准备向苏联进攻。7月30日，日军一个营抢占张鼓峰，次日又一个步兵营攻击位于张鼓峰以北的沙草峰，进行武装挑衅。8月5日，苏军开始反攻，经过5天激战，击退了日军。8月11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在这次军事冲突中，日方出动7000人，大炮37门。苏军出动大约两万人，大炮近百门，还有200多辆坦克。由于苏军坚持自卫原则，日军也不敢扩大事端，张鼓峰事件便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挑衅失败而告终。

张鼓峰事件后，日德之间关于签订三国军事同盟的谈判继续进行。不过，这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三国军事同盟的攻击对象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7月间，经五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会议讨论决定，军事同盟为“防共协定”的扩大，日本分别同德国签订反苏军事同盟，同意大利签订攻击英国的协定。但是，以东条为首的陆军将领对此表示反对，不同意军事同盟是“防共协定”的延续，不同意分别签，而主张签一个包括针对苏、美、英、法在内的三国军事同盟。外务省反对陆军的主张。驻德大使东乡甚至要求停止谈判，以免恶化同美、英、法的关系，对日本的将来不利。海军也不同意陆军的方案。海军省次官山本五十六认为，这样的军事协定会激起日本同美、英的战争，而日本海军兵力届时将抵不过美国。海军省和外务省的基调是只以苏联为对象。陆军的主张，是全盘接受了德国的主张。德国预计将来同英、法、美作战，要求不仅把苏联、也把英法美作为对象。日本近卫内阁在争论中下了台。

1939年平沼骐一郎组阁后，前后又召开70次五相会议，谋求统一意见。

这时，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攻占武汉，又陷广州，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军事当局东条等人，渴望早日签订三国军事同盟，借以增加反苏的资本。为了用反苏的实际行动推动这一军事同盟的签订，以及对竭诚援助中国抗战的苏联进行武力恫吓，不使苏联通过蒙古就近支援中国的抗战，日本帝国主义于1939年5月，又在中国东北的西部中蒙边境制造了诺门坎事件，发动了规模较张鼓峰事件更大的反苏军事挑衅。

早在这次军事行动之前，日本关东军就对诺门坎地区苏蒙兵力的配置及当地地形和自然条件，进行了周密的侦察。所谓诺门坎地区，是指海拉尔西南约200公里的地方，即从汗达盖、将军庙、阿穆古郎一线到哈勒欣河这一地区。这里是一片广阔的不毛之地，哈勒欣河东岸到处分布着沙丘、风淤沙堆和洼地。事件发生的当时，又遍地丛生着杂草和灌木。在地形起伏较多的地方，坦克、装甲车、汽车等难以行动。浩尔斯丁河从诺门坎中间穿过，把这个地区分成南北两地。浩尔斯丁河是哈勒欣河的一条支流，它是一条宽3至4米、水深约2米的小河流，但其河谷的宽度约达1500米，是个泥泞地带。1935年，日本关东军测量队员曾在浩尔斯丁河流域被蒙军抓住。在发生战斗的地方，哈勒欣河宽约30至40米，水深约2米，流速每秒约1米，只要拥有渡河工具，部队渡河并不困难。

哈勒欣河西岸的台地，看来比河面至少要高50米。苏军炮兵就在这些台地部署阵地，并充分利用了制高点，猛烈地轰击日军。但从日军一侧，却完全看不到台地上的苏军情况。日本关东军在进行了详细的侦察和部署之后，1939年4月，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就命令所属各兵团司令官要执行《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纲要指出，一旦发生纠纷，要求前线部队“断然采取坚决果敢的行动”，至于如何处理由此而产生的事态和如何收拾局面，则要“信赖上级司令部”。

5月11、12日，日本侵略军两次同蒙古骑兵交火。15日，日军驻海拉尔第二十二师团的部队将蒙军赶回哈勒欣河的西岸。6月，苏联集中兵力准备同日军一战，7月成立第一集团军，下辖三个步兵师，两个坦克旅，一个空降旅和一支炮兵部队。为调整苏蒙军事行动，以后贝加尔军区为基础，组成远东方面军。日军方面，由关东军直接出面指挥，6月间出动一批飞机对塔姆斯克机场等军事设施轮番轰炸，并派第一坦克团的主力增援边境日军，一

场激烈的进攻就要开始了。

为了加强对这次战役的指挥，粉碎日本法西斯军队的进犯，苏联最高指挥部特调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朱可夫前去指挥。6月2日，朱可夫抵达莫斯科，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对他说：“日军突然侵犯我友邻蒙古的边界。根据1936年3月12日的苏蒙友好互助条约，苏联政府有责任保卫蒙古不受任何外敌侵犯。”

“这是入侵地区5月30日的情况图。在这一带，”伏罗希洛夫指着地图说，“日军长时间的对蒙古边防人员进行小规模挑衅性袭击，而在这一带，日军的海拉尔警卫部队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并袭击防卫哈勒欣河以东地区的蒙古边防部队。”

“我认为，”国防人民委员接着说，“这里孕育着严重的军事冒险。无论如何，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你是否可以立即飞到那边去？如果需要的话，把部队的指挥权接过来。”

“我马上可以起飞。”

“非常好，”伏罗希洛夫说，“你乘坐的飞机16点可准备好，在中央机场。你到斯莫罗基诺夫那儿去，在他那里你可以拿到必要的材料，同时商量一下今后同总参谋部的联系问题。派给你几个专业军官。再见，祝你成功！”

朱可夫飞到前方后，虽然战斗已打了多日，但那里的苏军指挥部对敌人的情况并不真正了解，而且战备极差，前面电话电报线路连一公里也没有铺设，也没有现成的指挥所和着陆机场。面对这种情况，朱可夫随即约军政委一同前去视察，通过对发生冲突地域内的地形的观察，和同苏蒙军指战员的谈话，使他对已发生的战事的性质和规模以及敌人的作战能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各种情况表明，这不是一般的边境冲突，日军并未放弃其侵略苏联远东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疆土的企图，必须估计到，不久将会发生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朱可夫考虑了全面情况，随即得出结论：现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苏联第五十七特别军的兵力无力阻止日军的军事冒险，特别是如果敌人同时在其他地域和从其他方向发动进攻的话，该军就更无能为力了。考虑到情况的复杂性，朱可夫要求国防人民委员加强那里的航空兵部队，增调不少于三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旅的兵力到作战地域，并要求大大加强前线的炮兵力量。总参谋部完全同意了他的要求，并委任朱可夫担任前线总指挥。

又过了一天，莫斯科增派了空军力量，还派来了二十一名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领队的是白俄罗斯军区著名的飞行员斯穆什克维奇。同时送来了新型飞机——现代化的伊—16和“鸥”型飞机。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在前方进行了大量的训练教育工作，他们把作战经验传授给新来的青年飞行员。不久这一工作即收到了显著效果。6月22日，苏军95架歼击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空，与日军120架飞机进行了激烈的空战，有不少苏联英雄参加了此次空战，他们狠狠地教训了日本飞行员一顿。6月24日，日本空军再次进行密集袭击，也再次遭到痛击。失败后，日军指挥部极度混乱地将日机撤出战斗。在6月22日至26日的空战中，日军共损失飞机64架。通过实战，苏军飞行员提高了作战技能，锻炼培养了必胜的信心。

随后，日军又开始大规模的狂轰滥炸，其目的在于夺取制空权，以保证其部队将要进行的大规模战役。后来证实，日军6月份确实在哈勒欣河地域集中部队，以实施根据军事侵略计划制订的所谓“诺门坎事件第二阶段”的

战役。该战役当时的目标是：

- 围歼哈勒欣河东岸全部苏蒙军队；
- 渡过哈勒欣河，前出至河的西岸，以便消灭苏蒙预备队；
- 夺取并扩大哈勒欣河西岸之登陆场，以保障尔后的行动。

为了实施这一战役，日本军事当局陆续增援部队，并下令组成第六军，司令部设在海拉尔。第二十三师团、第八边防警备队等编入第六军属下。日军的如意算盘是，于7月上半月完成这一进攻战役，以便在秋季到来之前结束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全部军事行动。东条英机对他们蓄意发动的进攻充满信心，为了宣扬日军的“战功”，他甚至把一些外国新闻记者和武官邀请到作战地区，观看他们的“胜利进军”。在被邀请的客人中间，有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新闻记者和武官。

为了发动这次新的进攻，这时日军已经集结了约3.8万人，并得到135辆坦克、10辆装甲车和225架飞机的支援。而保卫哈勒欣河东岸一条46英里长的正面的，只有12541名苏蒙军。苏军的装甲车辆较多，共有186辆坦克、226辆装甲车，这给朱可夫提供了一次极好的机会，来检验苏联坦克的效能，检验各种战术的效果。

日军在拥有三倍于苏军的兵力优势的引诱下，企图包围并歼灭哈勒欣河东岸的苏蒙军队。作战计划规定，用一支强大的部队绕到守军左翼，偷渡哈勒欣河，夺占巴彦察干山，从背后实施攻击。这次攻势是7月2日发动的。步兵和坦克得以楔进苏蒙军阵地，一直进抵河边，才被阻止。7月2日夜间，日军陆续偷渡到河西岸，次日晨完成了部队的调动。日军打算在很快占领下一个目标巴彦察干山以后，继续向南开进，大有包围东岸苏蒙军之势。

7月3日拂晓前，蒙军的苏联总顾问阿弗宁上校到巴彦察干山视察蒙军骑兵第六师的防御。但是，完全出乎意外，他发现那里有日军，他们乘黑夜偷渡了哈勒欣河，正向蒙军第六师进攻。日军由于数量上的优势，在7月3日拂晓前占领了巴彦察干山及其临近地区。考虑到新形势的危险性，阿弗宁上校立即向苏军指挥部报告了巴彦察干山的情况。很明显，从这个地域日军可以毫不受阻拦地对苏军主力的侧翼和后方进行突击。

鉴于当时的情况，朱可夫决定发动一次三管齐下的反突击。命令坦克第十一旅从北面攻击日军，摩托步兵第二十四团从西北进攻，而装甲第七旅从南面进攻。同时命令炮兵和轰炸机、歼击机加强对哈勒欣河渡口的轰炸和炮击，阻止日军继续渡河和在巴彦察干山地域集中兵力。上午9时左右，苏坦克第十一旅前卫营的先头分队进抵巴彦察干山地域。双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厮杀。

日军在巴彦察干山集中了1万余人，而苏军只有1000人，双方力量虽然悬殊，但在进攻中，苏联的炮兵和坦克部队却表现了非凡的勇敢。苏军在行进间歼灭了刚渡河的日军，并向云集在巴彦察干山的日军展开猛烈的攻击。下面是一个名叫中村的日本士兵，在他的日记中所写的关于7月3日的交战情况：

“90辆坦克突然向我们冲来。我们当时惊慌失措；战马嘶鸣，拖着火炮前车四处奔跑，汽车也四处乱窜。空中，我军两架飞机被击落。官兵上下都胆颤心惊。我们嘴里越来越常说的字眼是‘可怕’，‘可悲’，‘心惊胆颤’，‘惊心动魄’。”

7月4日，白天和晚上，战斗都在继续着。直至5日凌晨3时，日军的

抵抗最后被粉碎。日军开始仓皇向渡口退去。但是，他们自己的工兵，由于害怕苏军坦克的突破，已把渡口炸毁。日军军官全副武装跳入河里，大部分溺死在水中。

侵占巴彦察干山的日军残余部队，全部被歼灭在哈勒欣河巴彦察干山的东面斜坡上。几千具尸体，大量被击毙的马匹，一堆堆被击毁的火炮、迫击炮、机枪和车辆，铺满了巴彦察干山。在这几天的空战中，日军损失飞机 45 架，其中包括 20 架俯冲飞机。日军第六军司令官荻州立兵将军（曾任日本驻苏武官），看到战况发展不妙，于 7 月 3 日晚即率领其指挥部退至河对岸。日军士兵小谷中士，在日记中这样记述了第六军司令部撤离战场的情况：

“荻州立兵司令官的汽车缓慢地、谨慎地向前开。月亮把平原照得如同白昼。夜是静悄悄的、紧张的，像我们这伙人一样。月光映照在河岸上，河水反映着敌人投下的照明弹的光亮。多么可怕的夜景！我们终于找到了桥，顺利地渡过河。据说，我们的部队被敌人大量的坦克围住，面临着覆灭的危险。真要特别警惕啊！”

7 月 5 日晨，巴彦察干山和哈勒欣河西岸已无枪声。这一带的战斗以日军主要集团被粉碎而结束。这一仗是苏联红军积极防御行动的典范。这一仗以后，日军再也不敢轻易冒险跨过哈勒欣河了。

此时，在哈勒欣河东岸的战斗仍在紧张地进行着。在巴彦察干山被击溃的敌人，把残余部队调到河东岸，企图支援担任钳制任务的安岗部队，但这支部队最后也遭到惨重损失，没有获得任何进展。苏军粉碎了日军在巴彦察干山的重兵集团，并守住了哈勒欣河东岸的防御阵地。这一胜利打击了敌人的侵略气焰，大大鼓舞了苏蒙军的斗志。

在巴彦察干山这一仗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坦克第十一旅，摩托化装甲第七旅，蒙军装甲第八营及同上述部队协同作战的炮兵和空军。巴彦察干山的作战经验表明，一支善于同空军和机动炮兵协同作战的坦克摩托机械化部队，是实施快速作战行动的决定性武器。

在朱可夫指挥这次战役的时候，苏联同西方国家的谈判以及与此同时对德国人的试探，也在 1939 年夏天进入了关键性阶段。斯大林对远东战局十分重视。正如鲁斯兰诺夫所写的：

“哈勒欣河战役的意义不可低估。当时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次战役的结局。它关系到苏联的国际威信，而且也是在实战条件下检验新武器装备和新战术的难得的机会。朱可夫深知这项任务也是对他的能力的检验，因此他必须经得起这次检验。”

日军吃了这次败仗以后，并不死心，仍在蠢蠢欲动，寻找战机。8 月 12 日，一个有炮兵、装甲车和部分坦克的加强步兵团，在 22 架轰炸机的支援下，向蒙军骑兵第二十二团进攻，并占领了战线南端的大沙高地。日军沿全线积极建立防御：运来木材，挖战壕，构筑掩蔽部，进行工程作业加固阵地等。从 7 月 23 日到 8 月 4 日，日本空军遭受 116 架飞机被击落的严重损失后，目前只限于对苏方中央渡口、炮兵阵地和预备队进行侦察飞行和小规模轰炸。

这时苏蒙指挥部，正按斯大林的指示紧张地进行总攻的准备工作。总攻预计不迟于 8 月 20 日，目的在于最后消灭入侵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日军。为了进行总攻，苏方除了增派两个步兵师、一个坦克旅、两个炮兵团和加强轰炸航空兵及歼击航空兵外，还必须把五六万吨的重要物资，从远达 650 公里以外的供应站运来。要在战役开始以前运到这一批物资，需要 3500 辆卡车和

1400 辆油槽车，而当时集团军群只有 1724 辆卡车和 912 辆油槽车。为了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英雄的苏联司机们作出了非凡的努力。在热风的人的条件下，往来一趟需驶行 1300 多公里，要花费 5 天的时间。他们夜以继日，终于如期完成了运输任务，对保证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朱可夫认为，战役战术的突然性是克敌制胜的决定因素。为此，苏军在制定战役计划的同时，还拟定了在战役战术方面欺骗敌人的计划。其中包括：

- 隐蔽运输和集中为加强集团军群从苏联调来的部队；
- 隐蔽调动在哈勒欣河东岸进行防御的兵力兵器；
- 部队和物资储备隐蔽地渡过哈勒欣河；
- 对出发地域、部队的行动地段和方向进行现场勘察；
- 参加此次战役的各兵种特别隐蔽地演练各种科目；
- 发布假情报，欺骗敌人，使日军弄不清苏方的真实意图。

为了欺骗敌人，掩护部队在夜间运动，苏军还使用了各种音响器材。这些器材能逼真地模拟打桩、飞机飞行、坦克运行的声音。在突击队伍开始调动以前 12 天至 15 天，苏军就开始模拟各种音响，使敌人对之习以为常，以后出现什么响动就不以为意了。而这一点对苏军真正变更部署和进行部队集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此外，苏军对指战员还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发动工作，并对日军的兵力部署进行了详细的侦察。一切准备就绪之后，1939 年 8 月 20 日，苏蒙军队发起了合围、歼灭日军的总攻战役。

为了实施包围计划，朱可夫建立了 3 个集群，即南部集群、北部集群和中央集群。南部集群编成内有：步兵第五十七师，坦克第六旅，蒙古骑兵第八师，摩托装甲第八旅，坦克第十一旅的两个坦克营，一个自行火炮营，防坦克第三十七营和一个喷火坦克连。北部集群的编成内有：坦克第十一旅，摩托装甲第七旅，步兵第三十六师第六 一团，蒙古骑兵第六师和防坦克第八十七营。中央集群的编成内有：步兵第三十六师和第八十二师，步兵机枪第五旅和两个炮兵团。朱可夫的预备队是摩托装甲第九旅和空降兵第二一二旅。

日军打算 8 月 24 日发动攻势，朱可夫则比日军提前 4 天，于 8 月 20 日抢先动手。这是一个星期日，天气晴朗。日军指挥部深信苏蒙军队不会进攻，也没有做好进攻的准备，因而允许其军官星期日休假。其中不少人在这一天远离自己的部队，有的到海拉尔，有的到甘珠尔庙等地。朱可夫认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情况，决定就在星期日开始进攻。5 时 45 分，苏军炮兵对日军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阵地开始进行突然猛烈的射击。部分炮火则对苏航空兵要轰炸的目标发射烟幕弹。

在哈勒欣河地域，由远而近，飞机马达的隆隆声越来越响。在空中出现 150 架轰炸机和近 100 架歼击机。飞机的突击非常凶猛，红军指战员的情绪极为高涨。8 时 15 分，各种口径的火炮和迫击炮对日军目标开始火力袭击，充分发挥了它们的威力。8 时 30 分，苏联航空兵再一次飞临上空。通过各条电话线和无线电台发出预定的密码命令——15 分钟以后，开始冲击。苏航空兵和炮兵的突击非常成功，日军在精神上、火力上都被压制住了；在一个半小时内，日军炮火无力进行还击。日军的观察所、通信联系及炮兵阵地虽然全被摧毁了，但仍拼命顽抗，死不投降。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

在这次反击中，有一位观察家亲眼目睹了朱可夫所表现的领导能力，后

来他向鲁斯洛诺作了这样的描述：

“朱可夫命令他的一个师进攻日军坚固筑垒阵地。整个战役的结局取决于这次进攻的成败。可是，这个师败下阵来，损失惨重，而且被敌人的火力压得不能动弹。师长打电话报告情况，并请求新的指示。朱可夫命令他再次发动进攻。过一会儿，朱可夫亲自拿起话筒，要这位师长接电话。当朱可夫得知他还没把部队拉上去时，便问‘你到底能不能开始进攻？’师长小心翼翼地表示没有把握。于是朱可夫说：‘我现在解除你的师长职务，叫你的参谋长接电话。’朱可夫又向参谋长提出同样的问题。参谋长作了肯定的回答。朱可夫说：‘我现在任命你担任师长。’但是，参谋长也未能重新发动进攻。当他向朱可夫报告以后，听到了同样的命令：‘我解除你的师长职务，等待新师长的到达！’朱可夫派他的一名参谋去指挥这个师，而且派出炮兵加强了这支部队，并给予空中支援。在付出巨大牺牲之后，终于攻克了敌军阵地。他所制订的反攻计划的其余各阶段也都取得了胜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段故事流传很广。作为斯大林的解决问题的能手，朱可夫不断地被派往各地去处理重大而紧急的事态。他很快得到了这样的名声：他是一个对下级行动迟缓、犹豫不决或反应迟钝不能容忍的说不二一的指挥员。

就这样，在朱可夫强有力地指挥下，经过5天的激战，苏军终于在8月26日完成了对日军第六军团的合围。

27日开始分割歼灭被围的日军，由于流沙、沙坑、沙丘使战斗行动极为困难。日军异常顽固，战至最后一人。但是，日军士兵逐渐识破了官方所吹嘘的“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某些日军士兵和军官所写的日记，反映出他们当时的心情。

下面是日军连长福田日记的摘录：

“1939年8月20日。

“从清早天气就很好。敌人的歼击机和轰炸机50架，一群群地出现在天空。6时30分，敌人的炮兵全力进行射击。炮弹在我们头上呼啸。

“炮弹遮天盖地打到我们近旁。真可怕。观察所使用一切办法寻找敌人的炮兵，但毫无办法，因为轰炸机在轰炸，歼击机在扫射。敌人全线获胜。

“7时45分。可怕。人们怨声载道，炮弹隆隆爆炸，简直像在地狱一般。形势十分困难，情况很糟，我们被包围了。如果黑夜即将到来，全体人员应呆在交通壕里，排成一行……士兵的心灵是悲哀的……我们的处境不好，很糟，乱七八糟。

“8时30分，敌人火炮不停地向我军射击。躲到哪儿，都没有生路，到处是炮弹，只有在菩萨脚下才能得救。

“10时40分。残酷的战斗在继续。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受伤……射击一直不停。

“8月21日。

“苏蒙空军大批飞机轰炸我们的阵地，火炮也不停地轰击。在轰炸和炮击以后，敌人步兵投入攻击。死亡人数不断增大。晚上，敌人的飞机轰炸我们的后方。

“8月22日，9时30分。

“敌人步兵开始冲击，敌人机枪猛烈开火。我们处境极为危险，我们胆颤心惊。士兵情绪糟透了。所有军官死光了，我被任命为连长。这事使我非

常不安，一夜都睡不着。”

就是在这个时候，福田的生命和日记都中断了。1939年8月30日，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日军第六军团全军覆灭。这是对日本法西斯的严重打击，迫使日本执政当局不得不重新考虑苏联武装力量的威力。

正当日军在中蒙边境的反苏战斗中被打得惨败时，8月23日，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因为希特勒事先根本没有向日本打招呼，日本对此毫无所知。消息传来，日本政府大为震惊，于是便向德国提出抗议，责备它背信弃义。苏德条约加深了日本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平沼内阁被迫下台。不久日苏蒙签订了诺门坎停战协定，这次相当于局部战争规模的反苏军事挑衅，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日军伤亡5万多人，损失飞机180多架，火炮损失72%。

在为纪念在哈勒欣河牺牲的英雄而树立的纪念碑上，刻有如下的词句：

“为捍卫热爱和平的蒙古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为保卫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在哈勒欣河地域与日寇作战中献身的苏军英雄战士和蒙古人民革命军英勇的战士，永垂不朽！”

苏联红军在这次战役中打出了国威、军威，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英勇顽强的形象。苏联政府为了表彰苏联军人反对日本侵略的功勋，授予其中70人以苏联英雄称号。朱可夫回到莫斯科，备受嘉奖和礼遇。斯大林怀着感激的心情，亲自向他表示祝贺。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命令，提前晋升朱可夫为大将。斯大林在接见这位从前线凯旋归来的将军时，详细询问了苏日两军作战的情况。

“你认为日军怎么样？”斯大林安详地叼着烟斗说。

“与我们在哈勒欣河作战的日军训练不错，特别是近战。”朱可夫回答说，“他们守纪律，执行命令坚决，作战顽强，特别是防御战。下级指挥人员受过很好的训练，作战异常英勇。他们一般不会投降，剖腹自杀毫不迟疑。军官，特别是中高级军官，主动性差，死守命令，习惯于墨守成规。”

斯大林还就日军的技术装备、作战特点及红军作战中遇到的困难和需要改进的问题等，同朱可夫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朱可夫说：“对于我们所有的部队、兵团指挥员、部队指挥员和我本人，哈勒欣河战役是一个学习战斗经验的好机会。我认为，日本方面如今对于红军的力量和作战能力也得出了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

斯大林对朱可夫的介绍十分满意。他说：“现在你已经有作战经验了。你到基辅军区去，利用自己的经验加紧训练部队。”

基辅军区是苏联最大的军区之一，它是苏联的西大门，这个军区的司令员责任尤其重大。朱可夫利用这个机会，随即问道：“如何理解西方战争的极端消极性？下一步战事将会如何发展？”

斯大林笑着说：“以达拉第为首的法国政府和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政府，不愿认真对希特勒作战。他们仍然希望怂恿希特勒同苏联作战。1939年他们拒绝同我们建立反希特勒同盟，他们不想束缚住希特勒侵略苏联的手脚。但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自己得为这种近视的政策付出惨重的代价。”

朱可夫回到旅馆后，久久不能入睡。斯大林的外表，他那低沉的声音，对问题的深刻分析，渊博的军事知识，以及听取汇报时那样聚精会神，这一切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战局将向何处发展？他脑子里一直盘旋着这个问题。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三章 绥靖逆流

绥靖主义昧心良，引狼入室为哪桩；
祸水东流是诡计，搬起石头自遭殃。

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咄咄逼人的侵略，斯大林多次倡议西方国家与苏联联合起来，制止侵略，维护集体安全；但是，在短视的西方政治家们的阻挠下，这种努力都付之东流了。

1936年7月举行的国际联盟会议，在英法的纵容下，取消了对意大利的制裁。为此，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发表了极其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我们在这里集会，是为了结束人们一读就一定会感到痛心的国际生活史的一章。”为此，绝不应奉行绥靖主义。“对我本人来说，我宁愿有一个设法至少提供某种援助——即使这种援助是无效的——的国联，而不愿一个对侵略行为熟视无睹和无动于衷的国联……”

李维诺夫进一步阐述了苏联的外交政策，并以此作为他的主要任务：保证人们对侵略和侵略威胁既不熟视无睹又不置若罔闻。苏联政府及时地和忠实地参加了对意大利的制裁，谴责德国单方面废弃凡尔赛和约关于限制军备的规定。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地区以后，李维诺夫在国联理事会上说，除非采取有效的对抗行动，否则国联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有害的而不是有益的组织，因为不采取对抗行动“就会使各国放松警惕，就会使人们产生幻想”。与此同时，苏联驻伦敦大使伊凡·马伊斯基也在谴责这样一种看法：可以容忍在东方的侵略而不会危及西方的和平。他说：“这是最大的错觉……和平是不可分割的。”

当时，在苏联和中欧之间，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有六个东欧国家：与苏联接壤的有立陶宛、波兰和罗马尼亚，在这些国家西面的第二层是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这些国家的总人口接近一亿，其中大部分是非俄罗斯斯拉夫人。这块辽阔土地的大部分地区，经济是原始的，生活极端贫困，由于存在许多地区性的不和与敌对现象，而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虽然其中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偶尔设想在东欧建立一个有效的力量集团，但都没有取得成功。

匈牙利是马扎尔人的祖国，他们对大小斯拉夫民族都没有什么感情。罗马尼亚和苏联对比萨拉比亚有争议。现代的立陶宛是把帝俄时代的几个波罗的海省份分割出来而形成的。波兰人和俄国人是宿敌，两国的边界只不过是一条在1920年激烈战争之后双方都感到精疲力竭的情况下确定的妥协边界。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条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诞生了，罗马尼亚的地盘则由于这种条约而大大地扩大了。这四个国家都是法国的盟国，都像法国一样想要维护凡尔赛“体系”。人们本来可以期望，这一共同目标会使这四个国家在军事和外交上形成牢不可破的团结。其中三个国家参加了“小协约”。“小协约”的主要目的是相互保护，使匈牙利的修订边界愿望不能得逞。在南斯拉夫北部有50万马扎尔人，在斯洛伐克有75万，在罗马尼亚有150万。但是，波兰不是“小协约”的成员国。在东欧国家中，波兰是幅员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它是共同利益中最薄弱的一环，这种薄弱主要是由于它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不友好的态度造成的。

当时的波兰政府奉行亲德反苏反共的政策。1933年4月，纳粹头子会晤

了波兰驻柏林的公使，同时波兰首脑毕苏斯基元帅同驻华沙的德国武官进行了会谈。次年一月，两国签订了一项十年互不侵犯条约。两国的结合不是偶然的，主要是两国的政权都是默武主义和独裁主义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都憎恶共产主义。戈培尔、弗兰克、特别是戈林经常访问波兰。在柏林，波兰大使利普斯基可以随时见到希特勒。而希特勒每次公开提到波兰时，口气都是和解而友好的，他还吹捧毕苏斯基是那个时代的真正伟人之一。

鉴于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西方大国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统治集团，在法西斯战争狂人面前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奉行了一种极为危险的牺牲小国和鼓励“祸水东流”的政策，结果到头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希特勒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莱茵地区和吞并了奥地利之后，胃口越来越大，立即转向他的下一个目标——捷克斯洛伐克，着手实施他的“绿色方案”。希特勒现在决意消灭捷克斯洛伐克，要从地图上抹掉这个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新取得独立的国家。他对这个国家的新生深恶痛绝。

希特勒侵捷，仍像并吞奥地利一样玩弄“特洛伊木马”的诡计。在开始时，他并不直接出面，而是唆使他在这个国家的代理人、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党头目康拉德·汉莱因出面闹事，制造纠纷，进行颠覆，以便迷惑视听，掩饰他的真实意图。至于这种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希特勒已经在11月5日向军事领袖们所作的演说和“绿色方案”的头几个指示中表示得清清楚楚了：消灭捷克斯洛伐克，攫取它的领土与人民，使之归属第三帝国。

尽管有了奥地利的先例，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仍然没有憬悟到这一点。由于他们政治上的短视，惧怕战争和战后可能爆发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仇视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所以准备把捷克斯洛伐克奉送给希特勒，作为推动德国法西斯向东反苏的礼物。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本来订有同盟条约，当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法国有义务给予援助。可是一纸条约，从来不能保证帝国主义者说话算数。达拉第政府虽然口头上多次声明恪守法捷条约中的义务，背后却同张伯伦搞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勾当。1938年4月底，达拉第前往英国与张伯伦磋商。张伯伦对达拉第说，英国是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的，劝法国也这样做。张伯伦和达拉第居然说，希特勒的全部要求只不过是要求为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同胞“申张正义”而已。张伯伦说，“希特勒要求的是民族自决，而不是征服”。英法会谈后，法国通过外交途径密告希特勒，他要尽力摆脱对捷的条约义务。英法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卷入军事冲突，而且还助桀为虐，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

希特勒软硬兼施，一方面以武力吓唬英法，另一方面又伪善地宣称，如果满足德国对捷的要求，它将别无他求，准备同英国达成广泛的协议。在8月里，德国动员数十万军队参加军事演习，德国飞机经常到捷克斯洛伐克领空骚扰。戈林还请法国空军代表团“参观”飞机工厂和飞行表演，结果将法国空军参谋长吓呆了。这位患软骨症的参谋长认为，“如果9月底打仗，法国空军将在两周内被消灭，连一架飞机都不会剩。”英国首相张伯伦卖力地帮助希特勒侵占苏台德地区。他说，“英国在东欧没有重大利益”，“应让希特勒在东欧为所欲为”。更有甚者，1938年9月15日，这位掌握着大英帝国命运的人，这位已经是69岁高龄而且又没有坐过飞机的人，居然降尊纡贵，不惮7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到德国最偏远的伯希特斯加登去，央求希特勒千万不要动武，并许诺说，“对元首的要求定将协力促其实现”，并且还

在公开场合加以鼓吹。从此，臭名昭著的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阴谋就这样开始了。

按照事先和希特勒的约定，9月27日，这位英国首相给捷总统贝奈斯发了一份电报，警告他，如果9月28日下午两点捷政府还不接受德国的条件，德国军队马上就会得到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命令，波希米亚将受到德国军队的蹂躏。这样，张伯伦就把战争的责任从希特勒头上转嫁到了贝奈斯的头上。然而，贝奈斯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份电报，第二份电报马上又来了。接着张伯伦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警告。威胁说，“这个计划如果不能实现，贵国除遭到武力侵略与武力肢解以外，将没有其他出路。而且，虽然这可能引起无数生命的冲突，但是不论这一冲突的结果如何，捷克斯洛伐克都将再也不能按原有疆界重建故国。”

张伯伦办完了这件事情以后，就在晚上8点30分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他说，“为了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里我们对之毫无所知的人们之间的争吵，我们居然在这里挖壕沟，这有多么奇怪，多么荒诞，多么不可思议！”为了争取“和平”，他决心到德国进行第三次访问。他接着说，“不论我们如何同情一个强邻压境下的小国，我们决不能不顾一切地使整个大英帝国仅仅为了它而陷入一场大战。”

当晚10点30分，希特勒要张伯伦“继续努力”的信到了，这正是英国首相急切要抓住的一根救命的稻草。他马上答复“元首”说：“拜读来信，使我深信你可以不经战争立即得到你所有的基本要求。我愿立即亲自来柏林，同你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讨论移交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法意两国的代表也可以参加。我深信，我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达成协议。我不能相信，你会为了在解决这个长期未决的问题方面有几天的拖延。就不惜承担发动使人类文明化为乌有的世界大战的责任。”希特勒对此欣然同意。

1938年9月29日上午，西欧四大国政府首脑正在向巴伐利亚州南部优美的古城慕尼黑集中。他们当中有两人从南面同乘火车而来，另外两人则乘飞机从西面飞来。

东道主希特勒和他的贵宾墨索里尼曾在前奥德边界上的基费尔斯费尔登会晤，尔后乘德国元首的专列前往慕尼黑。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则在9时以前分别从伦敦和巴黎乘飞机到达这里。还有许多新闻记者也纷纷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因为他们预计，使欧洲一直处于战争边缘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国际危机就要结束了。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交界地带，即所谓苏台德区，是进行这次力量与意志对抗的直接起因。但是，这天上午，却没有一个人从捷克斯洛伐克来到慕尼黑。直到这天下午，在会议已经开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允许布拉格派代表来，但不是来参加会议，而是来等待别人把他们国家的命运通报给他们。

莫斯科也没有人参加会议。李维诺夫和苏联的其他发言人对苏联被排斥在外十分不满。但是，大家知道，希特勒是决不会同意给苏联一个席位的。事实上，说服希特勒同意开这个会，已经够难的了，只是由于他的朋友、另一个独裁者墨索里尼在最后一刻向他发出呼吁，他才答应放弃武力解决。

希特勒对达拉第的邀请，是由戈林打电话告诉法国外长弗朗索瓦—庞纳的。这位外长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二话没说，就转达了邀请。一小时后，邀请被接受了。我立即通知戈林。‘感谢上帝！’他欢呼起来。‘太好了！’”

张伯伦对于不让苏捷代表与会是高兴的。在 1938 年 2 月，下院辩论外交大臣艾登辞职一事时，张伯伦曾宣称：“欧洲的和平必须取决于 4 个大国即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我们自己的态度。”当天晚些时候，他在为他的名单不包括苏联一事进行辩解时声称，“俄国”是“一部分属于欧洲，一部分属于亚洲”的。至于捷克斯洛伐克，由于不让一丝不苟而又善于辞令的贝奈斯到会，他就不会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而使会议的结果更难迎合希特勒的要求。对此，英国首相即使不是在公开场合，也肯定在私下里感到宽慰。

在举行慕尼黑会议的时候，张伯伦已经接近 70 高龄了，而且看上去也确实老态龙钟。尽管他很不习惯于坐飞机，但他在过去两周内还是到德国作了两次往返飞行，而且现在还要作第三次。要知道，当时的飞机飞得远不如今天这样快，坐起来也不如今天舒适。张伯伦自从去了一趟伯希特斯加登以后，同他的大臣以及法国代表们举行了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有时是很伤脑筋的会议。他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向下院汇报自己的工作，还处理了大量外交问题。总而言之，张伯伦有充分理由感到疲惫和忧虑，人们本来可能预期他会对此感到悲观。但是，议会里的一些绥靖主义者对他接受希特勒邀请一举作出的反应大大鼓舞了他。当时在下院大厅里和楼座上爆发出的掌声和欢呼声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当晚，唐宁街上聚集了许多表示“良好祝愿”的崇拜者。他们高呼：“老尼维尔，你真好！”他走到窗前，就像对就寝时间已过、依然兴奋无眠的孩子们讲话一样地说：“我想你们今晚全都可以安睡了。现在，万事大吉了。”

因此，当张伯伦于次日清晨到达赫斯顿机场，并看到全体阁员都在那里为他送行时，他精神焕发，颇有些洋洋得意。以前常听人说，张伯伦出门总是随身带把雨伞，而这一次他并没有带。他笑容可掬地站在摄影机前挥动着他那顶黑色呢帽。个子矮小的金斯利·伍德和身材高大的哈利法克斯分站在他的两旁，从他的左肩方向望过去，可以看见霍尔—贝利夏那张喜气洋洋的圆脸。张伯伦亲切而诙谐地谈到他可以一而再地乘飞机去德国：“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常常重复一句箴言：‘如果你起初没有成功，那就努力，努力，再努力。’我现在正是在这样做。”接着，他想使他的讲话的文学水平更高一些，又说：“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希望我能像《亨利四世》中的霍茨珀那样说：‘从这堆危险的荆棘丛中，我们采摘了这朵安全之花’。”这句引语恰当地反映了他自己当时的心境，但是可惜那荆棘存活的时间却比花朵长得多。

达拉第丝毫没有理由像张伯伦那样自鸣得意，他倒是应当对自己有所怀疑。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国不是英国，而是法国，法国有义务帮助捷克斯洛伐克打退进攻。如果战争爆发，不是英国而是法国可以把 100 个师投入战场，并将成为作战的主力。无论从责任的角度讲，还是从军事实力的角度讲，重心都是在巴黎，而不是在伦敦。尽管如此，达拉第还是让张伯伦掌握主动权，一切让他决定。伯希特斯加登会谈，戈德斯堡会谈，这一切全都是伦敦决定的；法国一直跟在英国后头。显然，如果要在慕尼黑摊牌，那么法国人就要受张伯伦摆布。

此外，还有良知和个人责任的问题。看来，张伯伦从未怀疑过自己的方针是否明智，而达拉第却总是在自相矛盾的痛楚中备受折磨。要是希特勒再次一意孤行，这一切会有什么结果呢？要是向布拉格作出的保证没有得到遵守，那法国的三色旗不是要永远受到玷污吗？另一方面，难道只是为了这些

执拗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就应当牺牲年轻的法兰西这朵花，就应当使巴黎被德国空军炸成废墟吗？庞纳说过，法国同德国交战就等于自杀。空军参谋长韦尔明将军说，法国空军打不了仗。启程前，达拉第还问甘末林将军，万一割让领土不能避免，应当维护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甘末林回答说：要是防御工事不能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手中，他们的国家就不再存在任何“有效的军事价值”了。

毫无疑问，在希特勒邀请到慕尼黑来的贵宾中，最高兴的要算是墨索里尼了。他即将占据舞台的中心。这一前景自然使他得意，在前来慕尼黑的火车上，他同他的外长齐亚诺谈笑风生，对英国人的软弱大加嘲讽谩骂。他说：“一个崇拜动物乃至为动物修筑墓地、医院和房屋，把遗产留给鸚鵡的国家，肯定是开始堕落了。此外，且不谈其他原因，这也是英国人口组成情况造成的后果。那里有400万过剩妇女。400万性生活得不到满足的妇女会人为地造成许多问题，以便使她们的感官得以兴奋或受到抚慰。她们不能拥抱一个男人，于是就去拥抱全人类。”

当墨索里尼的专车进入德奥边界时，希特勒偕同德军司令凯特尔将军前去欢迎，并在车上与他举行密谈。希特勒握着墨索里尼的手发狂地说，“我们两个革命者”正在改变着欧洲的面貌，恢复德意两个国家强大的和受尊重的地位，实乃一大幸事。接着，他要凯特尔将军介绍军事局势。这位将军便在一张捷克斯洛伐克地图上标出了德国准备从奥地利、巴伐利亚、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对之发动进攻的地点。墨索里尼还能听懂对方用德语作的介绍，但齐亚诺，尽管他的英语和法语都讲得很流利，却不得不依靠多纳小声替他作翻译。墨索里尼有时插言提几个问题，特别是有关捷克斯洛伐克防御工事的坚固程度问题。

这时，希特勒直言不讳地讲出这样一个事实：西部战线“根本没有防御”。莱茵河同摩泽尔河之间有一些工事，但部署的兵力很弱。在同比利时以及同荷兰交界的地区，几乎毫无工事，莱茵河上游的情况也“强不了多少”。墨索里尼显出沉思的样子，希特勒赶快向他保证，在发动闪电进攻后三四天内，就能把捷克斯洛伐克人打败，那时西方还来不及动员。英国和法国没有充分武装起来，不会冒战争的风险。法国空军参谋长韦尔明将军不久前已看到德国空军力量是十分强大的。张伯伦和达拉第到慕尼黑来就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他们要避开任何战争危险。

大约11时，德意两国首脑所乘的火车驶入慕尼黑车站。前往迎接两位独裁者的有戈林、巴伐利亚州州长以及其他纳粹要人。为了庆祝这个重大的日子，学校放假一天。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乘汽车穿过欢呼的人群，来到在柯尼京街的查尔斯王子宫内为他们这些贵宾准备的房间。

尽管慕尼黑会议是当时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的焦点，但这次会议实质上只是走一个过场。希特勒邀请他的客人与其说是去开会，不如说是去跳四人舞。

慕尼黑的正式会议，是于9月29日12点45分在柯尼斯广场的所谓元首府里开始的。这次会谈不过是高潮的尾声，只是办一个正式手续，把希特勒的要求不折不扣地按时交给他而已。会谈一开始就有一种“普遍亲善的气氛”。形式上没有人当主席，实际上会议完全是由希特勒主宰的。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拼命迎合希特勒。甚至在他作了“无论如何要在10月1日进军”的开幕发言以后，张伯伦还要拼命迎合他。

23年后，达拉第对这场景象的描述十分逼真生动：“希特勒站起来，大骂捷克斯洛伐克人。他骂得可真凶。他伸胳膊，挥拳头，指责捷克斯洛伐克人对（苏台德）日耳曼人实行暴政，百般折磨，把成千上万惊恐万状的日耳曼人驱赶出去。希特勒进一步咆哮道：‘捷克斯洛伐克像现在这样存在下去，对欧洲的和平是个威胁……德国再也不能无视苏台德日耳曼居民的不幸和苦难了！’”

所有这一切根本不是一种和平的表示，而是表明，需要英国和法国来保证捷克斯洛伐克人撤出希特勒想要的地盘，这样一来，就没有必要采取敌对行动了，或者说所采取的行动的暴力性质也就“消除”了。达拉第后来声称，这时，他问希特勒是否打算把捷克斯洛伐克消灭，并入德国。如果是这样，那他只好回法国去了。大为不安的墨索里尼叫嚷说，这完全是误解。希特勒则用比原先平静一些的语调向达拉第保证，他根本不想吞并任何捷克斯洛伐克人，而只想使所有日耳曼人回到一个共同民族的大家庭。

这时，墨索里尼从他的上衣外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一项折中建议的草案。草案的第一条规定，捷方10月1日开始撤出；第二条规定，“担保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要向德国保证，撤退工作须在10月10日以前完成，现有设施均不得毁坏”。其实，这是墨索里尼的骗人伎俩。这项建议的草案原来是前一天在柏林德国外交部由戈林、牛赖特和威兹萨克草拟出来，并经希特勒审阅批准后送给这位“领袖”的。这样，所谓“意大利建议”不但成为这次会议上的唯一议程，而且成为后来慕尼黑协定的基本条款，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在柏林制造出来的德国建议。

英国人和法国人当然不知道这份文件的来历。不过，即使他们知道它的来历，他们是否会作出不同的反应，也是值得怀疑的。张伯伦和威尔逊一边听一边觉得，这是对以往“讨论过的许多问题的合情合理的重新阐述”，因此同意以这个文件作为讨论的基础。他们曾担心法国人会不同意，但是使他们“感到宽慰”的是，达拉第“当即表示他准备接受墨索里尼先生的文件，作为讨论的基础”。

这时，张伯伦马上表示赞同规定10月1日为撤离开始日期的第一条；但又说，他希望仔细讨论第二条。这一条规定捷克斯洛伐克人要在10月10日以前撤退完毕，而且不能毁坏现有设施。张伯伦显然觉得，这是提出那个最使他烦恼的问题——即把捷克斯洛伐克排除在会议之外的问题——的好机会。张伯伦问，“既然没有机会肯定捷政府会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英国怎能作出这样的保证？”

希特勒对张伯伦提出的问题十分反感。他说，他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保证不感兴趣；他们已经“在准备割让的地方进行破坏了”。墨索里尼支持希特勒这一意见：“等待捷克斯洛伐克派代表来是不行的，在撤退和防止破坏方面，这几个大国应当作出道义上的保证”。达拉第起初支持张伯伦坚持要让捷代表与会的立场，后来便退让了：“要是让布拉格代表参加会议会造成困难，那他准备放弃这一主张，因为重要的是迅速解决问题。”最后经过张伯伦的一再央求，希特勒终于同意了“让一名布拉格代表前来坐在隔壁的房间，以便能从他那里得到保证，并回去敦促捷政府认真贯彻执行”。

为此，希特勒大骂张伯伦。他对纳粹官员们说：“达拉第是位律师，他懂得哪些是小事，哪些是大事；你可以同他进行明确而满意的谈判。但是，这个张伯伦，就像一个好讨价还价的小店主……他比捷克斯洛伐克人还坏。”

他在波希米亚失去了什么？他没有失去任何东西？”

正当会议的参加者再次聚集在元首大厦的时候，一架从布拉格起飞的飞机正在来慕尼黑的途中，机上坐着捷政府的两名代表，一个是捷驻柏林的公使伏伊特赫·马斯特尼，一个是布拉格外交部的休伯特·马萨里克博士。贝奈斯总统苦苦哀求，说应当听听他的国家申诉自己的主张，结果只是得到哈利法克斯的粗暴“通知”。那是在9月28日晚上，哈利法克斯通知他，布拉格应当“选定受权代表捷克斯洛伐克人讲话的代表，以便明天一接到通知就到慕尼黑来”。

这两位捷克斯洛伐克人一下飞机，就像囚犯一样被警察带进隔壁的一个房间里。直到晚上10点，这两个郁郁不乐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给带去见首相忠实的顾问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威尔逊代表张伯伦把四国协议的要点通知了他们，并且交给他们一张捷克斯洛伐克人应立即撤出苏台德地区的地图。当这两个使者想提抗议的时候，那位首相顾问打断了他们的话头就走了。他们继续向跟他们在一起的阿希东—格瓦特金表示抗议，然而一点用处都没有。这位英国外交官告诫他们说：“你们要是不接受的话，就得完全单独去同德国人打交道。也许法国人同你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讲得客气一点，不过你们可以相信我，法国和英国的看法是一样的。他们不想管你们的事！”

虽然这样说必然会使两位捷克斯洛伐克使者十分伤心，但说的却是老实话。9月30日凌晨时钟刚敲过1点，希特勒、张伯伦、墨索里尼和达拉第就按这个次序在慕尼黑协定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协定规定德国军队将如希特勒过去一再预言的那样，在10月1日进军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在10月10日完成对苏台德区的占领。希特勒已经得到他在戈德斯堡所没有得到的东西了。

为了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屈从希特勒的要求，英法政府除了对他们施加压力外，还进行欺骗宣传，说苏联政府不遵守同法国和捷政府签订的互助协定。事实上，在当时策划出卖捷克斯洛伐克这个阴谋诡计的每一阶段，苏联政府都明确了苏联决心履行盟国义务的坚定意志。法国政府于1938年9月初询问，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受到袭击，苏联政府将如何对待。苏联政府在答复中提出如下的建议：

第一，发表苏、英、法三国联合声明，宣布如果德国无故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它们将援助捷克斯洛伐克。

第二，敦促国际联盟讨论防卫手段与途径。

第三，苏、法、英三国举行全面会谈，以讨论技术问题。

当亲德反共的波兰政府准备趁火打劫，参与瓜分从捷克斯洛伐克分割出来的战利品，并在捷克斯洛伐克边界集结军队时，苏联政府对华沙提出了抗议。苏联政府声明，它将把波兰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视为无端入侵，并将立即废除波苏互不侵犯条约。

伦敦与巴黎的诽谤者甚至不惜造谣说，慕尼黑协议是同苏联政府商量好的。事实是，在捷面临危机时刻，只有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坚决主张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政府不止一次声明：只要法国履行自己的义务，苏联就立即给予援助。后来斯大林曾委托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转告捷政府，即使法国不出兵，只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坚决抵抗法西斯侵略，并向苏联提出请求，苏联也准备给予军事援助。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统治阶级在这紧要关头拒绝了苏联的支援，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屈服了。他们宣称：“我们

宁愿希特勒攻进来，而不愿让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来保卫我们。”

在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签字之后，张伯伦又奴颜婢膝地找希特勒会谈所谓世界和平问题。他向“元首”建议，英德两国进一步合作来结束西班牙内战，并建议促进裁军，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加强欧洲政治和平，甚至还建议解决苏联问题。然后首相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上面已经写好了他希望两个人能在上面签字并且立即发表的东西：

“我们，德国元首兼德国总理和英国首相，今天再次举行了会议，一致认为英德关系的问题对两国对欧洲都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我们把昨夜签字的协定和英德海军协定，看成是我们两国人民再也不想彼此交战的愿望的象征。

“我们决心以协商的办法作为处理任何其他涉及我们两国的问题的办法，我们决心继续努力，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原因，从而有助于确保欧洲的和平。”

希特勒看了一下这个宣言，很快就在上面签了字，使张伯伦大为满意。这位蒙在鼓里的英国首相当然不知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就在这次慕尼黑会议中已经商量好，时候一到，他们就对英国并肩作战，就要收拾这位帮助他们“助桀为虐”的慕尼黑阴谋的设计师。但是不识趣的张伯伦，却以为自己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胜利”。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自鸣得意地拍拍他的上衣口袋说，“我得到它了”。他在边喝咖啡边吸雪茄时宣布：

“我始终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这就会为欧洲的和平开辟道路。今天上午，我同元首又进行了会谈，我们两人签署了这个声明。”

然后英国人和法国人前往机场，在下午的恶劣气候中，一个飞回伦敦，一个飞回巴黎。在回国的飞机里，张伯伦虽然很疲倦，却是“愉快的疲倦”。现在，人们对他的赞颂多极了。在赫斯顿机场等待他的是乔治六世陛下发出的邀请：

“我派我的宫廷大臣送这封信给你，问你是否可以直接到白金汉宫，以便我可以亲自向你表示我的衷心祝贺，祝贺你对慕尼黑的访问成功。同时，这封信向你表示最热烈的欢迎，由于你的耐心和决心，你赢得了整个帝国的同胞的永恒感激。”

在赫斯顿机场欢迎他的又是忠实的大臣哈利法克斯，他同他的首相一起乘车驶往白金汉宫。伦敦全城“热烈欢迎”这位“慕尼黑英雄”。在首相写给他姐姐的信中，叙述了这种“狂喜”的场面：

“甚至报纸上的描述也不能使人想象出在我从赫斯顿机场乘车前往白金汉宫的途中的场面。从头到尾，人们都夹道欢迎，各个阶层的人喊得嗓子都哑了，有人跳在汽车的踏脚板上，靠着车窗，向车里伸出了他们的手，想要同我握一握。”

的确这一天在伦敦街头是非常热闹的。张伯伦成了“凯旋而归的英雄”。他得意洋洋，手中挥舞着他同希特勒签署的宣言来迎接拥到唐宁街来的人群。他们向他高喊：“好样的尼维尔！”还对他高唱：“因为他是一个刮刮叫的好人”。张伯伦笑逐颜开，站在唐宁街十号三楼的阳台上向他们大灌“催眠曲”。

“我的好朋友们，”他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从今以后，整整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障。”他挥舞着《英德宣言》，在阳台上高呼：“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我建议你们安然睡觉去吧！”张伯伦的得意达到了高峰。

《泰晤士报》宣称，“没有一个征服者从战场上得胜归来的时候，曾带着比这更高贵的桂冠。”居然有一个自发的运动来筹集一笔“全国感恩基金”来向张伯伦致敬，不过，他谦虚地拒绝了。只有海军大臣达夫·古柏一个人以辞职来抗议张伯伦的慕尼黑之行。在继之而来的下院辩论中，当时仍然在野的丘吉尔在那篇值得纪念的发言中说：“我们遭到了一场全面的十足的失败。”然而，据他自己后来回忆，他被迫停下来，一直等到暴风雨般的抗议声平息以后才能接着讲下去。

在表决时，张伯伦以 366 票对 144 票在下院获得胜利，但是约有 30 名保守党人弃权，包括丘吉尔、艾登、古柏、阿末利和麦克米伦。为此，张伯伦感到不安，但是毫不动摇地相信他做的事情是对的。他写信给坎特伯雷大主教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有朝一日将会明白，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拯救他们，使他们有一个更幸福的未来”，慕尼黑协定“终于为全面的和平开辟了道路，而只有这种和平才能把世界从混乱中拯救出来！”

张伯伦给捷克斯洛伐克人带来的是什么“幸福”呢？请看：希特勒根据慕尼黑协定，强迫捷克斯洛伐克割让了 1.1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面住着 280 万苏台德日耳曼人和 80 万捷克斯洛伐克人。在这个地区内有着大量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事，他们构筑了在当时来说是欧洲最坚强的防线，只有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可与之媲美。

这还不算，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铁路、公路、电话和电讯系统都被打烂了。根据德国人的统计，这个国家被肢解以后，丧失了 66% 的煤，86% 的化学工业，80% 的水泥工业和纺织工业，70% 的钢铁工业和电力工业，40% 的木材工业。好端端的一个富庶繁荣的工业国，仅仅在一夜之间就被瓜分豆剖而破产萧条了。

更有甚者，1939 年 3 月 15 日，也就是慕尼黑协定签订 5 个月之后，希特勒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残余部分；从此，这个有着 12.78 万平方公里土地和 1500 万人口的国家，被希特勒“从地图上抹掉了”。3 月 23 日，德军又进一步侵占了立陶宛的默默尔港。4 月 3 日，希特勒又下达了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的密令。在德意法西斯咄咄逼人的侵略面前，西方国家仍一味迎合希特勒，鼓励“祸水东引”，对苏联政府“联合起来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倡议，采取置若罔闻、极不负责任的态度。

在欧洲走向战争的这一段历史上，1939 年 3 月 21 日是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这一天在柏林、华沙和伦敦都有频繁的外交活动。法国总统在外交部长庞纳陪同下，到达英国首都进行国事访问。张伯伦为了应付国际舆论，向法国人建议，他们两国同波兰和苏联一起发表一项正式声明，宣布四国将立即协商制止在欧洲发生进一步的侵略行径。3 天以前，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建议，正像他一年以前在德国并吞奥地利以后曾建议的那样，召开欧洲会议，由法国、英国、波兰、苏联、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参加，采取共同行动来制止希特勒的侵略。但是，英国首相认为苏联的建议“尚未成熟”。他对莫斯科十分不信任，因而认为由英、法、苏、波四国发表一项宣言，就是他所能做的极限了。他的建议由英国驻华沙大使在同一天提交给贝克，但是就包括苏联在内这一点而言，都受到了颇为冷淡的对待。这位波兰外长甚至比张伯伦

还要不相信苏联；此外，他也同英国首相一样，认为苏联的军事援助没有什么价值。他保持着这种看法，一直到大祸临头都毫无改变。

到了4月16日，就在戈林和墨索里尼会谈的当天，苏联外长在莫斯科接见英国大使，并且正式建议英国和法国同苏联缔结三边互助条约。苏要求缔约国签订一项军事协定来使互助条约具有实效，还要求由签字国（如果认为合适的话，还可以加上波兰）对中欧和东欧所有认为自己受到纳粹德国威胁的国家作出担保。斯大林希望西方国家同苏联团结起来，制止法西斯的侵略。正如5月4日丘吉尔抨击伦敦迟迟不接受苏联的建议时所说的，“如果没有苏联的积极协助，要组成一条反对纳粹侵略的东方战线是决不可能的。”然而苏联的建议竟然在伦敦和巴黎引起了“惊愕”。

在下院5月19日的辩论中，英国首相继续对苏联建议采取了如丘吉尔所说的冷淡甚至不屑一顾的态度。张伯伦有点懒洋洋地向下院解释说，“在两国政府之间有一道幕，或者说一道墙，极难穿过。”丘吉尔则在劳合·乔治的支持下争辩说：莫斯科提出了一个“公平的建议”，它比张伯伦的建议“更简单、更直接、更有效”。他请英王政府“给脑袋里装上点儿残酷的现实。如果没有一条有效的东方战线，就不可能在西方有令人满意的防务，而如果没有苏联，就不可能有一条有效的东方战线。”

5月份的最后一天，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又以新的外长身份作他上任后的第一次演说。他批评西方国家犹豫不前，并且宣告，它们要是真想同苏联一起制止侵略的话，就必须抛开枝节问题，在三个主要点上达成协议：

——缔结一项纯属防御性质的三边互助条约。

——对中欧和东欧的国家，包括所有与苏联接壤的欧洲国家在内，作出担保。

——缔结一项明确的协定，规定三国彼此间提供并且向受到侵略威胁的小国提供及时而有效的援助的形式和范围。

但是，英法苏谈判进展仍十分迟缓。波兰和罗马尼亚很乐意得到英国和法国的担保，它们拒绝接受苏联的担保。甚至不许苏联军队通过它们的国境去抗击德国的进攻。在这种僵局下，莫洛托夫在6月初建议英国派外交大臣到莫斯科来参加谈判。可是哈利法克斯勋爵不愿意去。艾登表示愿意代他前去，然而张伯伦拒绝了他的建议。后来决定派一名外交官前去。待英法代表抵达莫斯科后，莫洛托夫虽和他们举行了11次会谈，但英法代表在实质性的问题上仍拒绝表态。莫斯科对此十分气愤。日丹诺夫在一篇题为《英国和法国政府不想在平等的基础上同苏联缔结条约》的文章中说：“在我看来，英国和法国政府似乎并不想努力达成一项苏联能够接受的真正协议，而是想作姿态，以便向他们本国的舆论表明所谓苏联的不妥协态度，从而好同侵略者缔结协定。”斯大林不信任英国和法国，他认为西方盟国可能到最后会像一年以前在慕尼黑那样，同希特勒做成一笔交易。最后张伯伦在四面八方的猛烈批评和压力下，7月23日，才和法国同意了苏联的建议：立即举行军事参谋人员的谈判，拟定一项具体规定英法苏三国如何对付希特勒军队的军事条约。

人们不会忘记，当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发生时，张伯伦亲自出马同希特勒谈判，飞来飞去，不辞千辛万苦。但等到与苏联谈判时，却只派一些无足轻重的角色，7月下旬派去进行军事谈判的代表团，慢吞吞地坐船来到苏联时，

还忘了带全权证书。尽管如此，斯大林对这一谈判仍非常重视，一开始就提出缔结英、法、苏三国互助条约和军事协定，并要求保证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所有与苏联接壤国家的安全和独立，但是英、法政府却非常不信任苏联，也不相信苏联的军事实力。他们只要求苏联单方面承担许多义务，而却不对苏联的安全承担任何义务。

到8月中旬的时候，英法两国同苏联在莫斯科的谈判，事实上正陷于停顿状态。英法军事代表团是8月11日乘船抵达苏联首都的。他们在谈判时不与苏联代表讨论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用什么武力来对付纳粹侵略。他们避而不谈缔结军事条约的实质问题，只就抽象的无关紧要的所谓“原则问题”消磨时间。苏联代表伏罗希洛夫说，你们来这里“不是为了作抽象的宣言，而是要制定一项全面的军事条约。”这位苏联元帅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有没有规定波兰该采取什么行动？一旦战争爆发的话，英国拿出多少军队来援助法国军队？比利时会怎么办？他所得到的答复都是含糊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法国代表杜芒克说，他对波兰的计划一无所知。英国代表德拉克斯吞吞吐吐地说，目前英国有5个正规师和1个机械化师。而苏联则说，战争一开始，它能派出136个步兵师、5000门大炮、1万辆坦克和5000架飞机来对付从西面来的侵略者。

在8月14日一次关键性的会议上，伏罗希洛夫元帅强调指出，根本的问题是，波兰是否愿意允许苏联军队进入它的领土去迎击德国入侵的问题。如果不愿意的话，盟国又怎么能阻止德国军队迅速席卷波兰呢？他问道：“英国和法国的参谋总部是否认为苏军可以越过波兰，特别是越过维尔那山峡和加利西亚去同德军接触？”这是问题的核心。最后，如坐针毡的英法代表认为，伏罗希洛夫提出了他们所没有资格处理的政治问题。

在8月21日的会议上，伏罗希洛夫根据联共中央和斯大林的指示再次重申，苏联代表团的愿望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同意组织三国武装部队的军事合作，苏联同德国并无共同边界，只有苏联军队在有权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的条件下，它才能给英、法、波、罗以援助，如果不允许苏联军队进入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领土，他们就无法同英法军队合作。苏联军事代表团无法设想英国和法国的政府和总参谋部，在派出代表团到苏联来的时候，怎么会在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不给他们以指示？这只能使人怀疑，他们是否有同苏联进行认真而有效的合作的愿望。

杜芒克和德拉克斯要求本国政府指示回答苏联关于波兰的问题，等了3天都没有回音。在8月17日，杜芒克曾给巴黎打电报说，“苏联是想订军事条约的。它不想要我们给它一张没有具体保证的废纸。伏罗希洛夫宣布，只要他所说的那个关键性问题解决以后，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杜芒克要求巴黎设法使华沙接受苏联的援助，却遭到英法和华沙统治集团的粗暴拒绝。与此同时，英法领导人还背着苏联同德国进行秘密谈判，鼓励纳粹反苏反共。在此情况下，斯大林下一步如何行动，就成了全世界所注目的问题。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四章 权宜之计

人妖颠倒是非淆，绥靖逆流助桀虐；
为破祸水东引计，苏德条约签订了。

世界风云变幻急骤。但是，苏联和英法所进行的谈判，仍迟迟没有进展，一直陷入僵局。后来，莫斯科突然获悉，英国政府已经在同德国商谈一笔 5 亿或 10 亿英镑的军事贷款。这表明西方国家正力图把战争推向东方，实现他们“祸水东引”的目的。

对此，斯大林十分担心。如果西方国家这一阴谋得逞，苏联不仅是同希特勒单独作战，而且是同得到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支持的希特勒作战。这种战争是可怕的。英国大多数人受到张伯伦的蒙骗，以为英法苏三国协议正在趋于达成。劳合·乔治眼光比较敏锐，他说：“世界正在巨大的悬崖边上颤抖着。”

莫斯科曾两次向英国人民示意：谈判毫无进展。第一次是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在 5 月 3 日的辞职。10 年来，对全世界来说他已成为一个象征，他象征着一个通过反侵略的集体协议来建立和平的计划。斯大林用李维诺夫的辞职来说明这个计划已经失败了。在中国，在阿比西尼亚，在西班牙，在奥地利，在阿尔巴尼亚，在捷克斯洛伐克，在麦默尔，它都失败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首脑对侵略者的绥靖或鼓励，这个计划历经 8 年而告失败。这就是李维诺夫辞职所给予的信号。但是，西方报纸惯于把苏联的事务等闲置之，以致认为李维诺夫必然是因为某些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清算了”。

6 个星期后，莫斯科又发出另一信号。最高苏维埃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日丹诺夫，7 月 29 日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说，英法同苏联进行的谈判毫无进展。他认为不论英国或法国都不想同苏联结盟，也不准备制止希特勒。7 月底，所有欧洲国家的外交部都知道希特勒打算在一个月内夺取波兰走廊。这时苏联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建议英法两国派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以便规划共同保卫东欧事宜。伏罗希洛夫建议，假如希特勒攻打波兰，由苏联派遣两支军队，一支在北部攻打普鲁士，一支通过波兰南部攻打德国的中部。英法代表团回答说，他们必须征求华沙对这个建议的意见。后来他们通知说，波兰政府拒绝了苏联的援助。曾经不惜用威胁手段迫使捷克斯洛伐克人向希特勒屈服的英法政府，现在倒不肯想点办法来促使波兰人接受苏联的援助。谈判就此破裂了。伏罗希洛夫在 8 月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报告时，把英法的做法称为：“轻浮的假谈判。”这样，斯大林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作出自己的决定。

正好，这时希特勒向斯大林伸出了橄榄枝。8 月 15 日晚上 8 时，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奉命进见莫洛托夫，并按照柏林的指示，向他宣读了德国外交部长表示准备到莫斯科来解决苏德关系的急电。苏联外长“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这位大使的陈述，并且表示“热烈欢迎德国想改善对苏关系的愿望”。为了试探对方的意图，莫洛托夫进一步问道：德国政府是否有兴趣在两国之间签订一项互不侵犯的条约？是否准备发挥它对日本的影响来改善苏日关系并消除边境冲突？如果苏德联合担保波罗的海国家的安全的话，德国以为如何呢？他最后说，所有这一类问题“都必须具体讨论，那样，在德国外交部长来到了这里以后，就不会仅仅是交换意见，而是能作出具体规定。”

莫洛托夫的这些建议，正好是希特勒所希望的东西；而且，他比苏方提

出的更具体、更痛快。因为这个条约将使苏联置身于战争之外，从而能使他放心大胆地进攻波兰，而无需害怕苏联干涉。而如果苏联置身事外的话，他深信英国和法国是会不寒而栗的。纳粹独裁者无条件地接受了苏联的建议。舒伦堡大使奉命再次进见莫洛托夫，并且通知他：

“德国准备同苏联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如果苏联政府也有同样愿望的话，这项条约的期限可定为25年，期满以前不得废除。除此而外，德国还准备同苏联一起对波罗的海各国作出担保。最后，德国也愿意发挥影响来改进并巩固苏日关系。”

德国政府表面上装作不急于同莫斯科“做交易”，其实是非常急迫的。里宾特洛甫在这封电报的后面加上一段“附言”，作为他个人给大使的指示：“我要求你再一次把这一指示逐字读给莫洛托夫听，并且要求立即知道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先生的意见。为让你心中有数起见，再告诉你一句要绝对保密的话，如果我能在本周末或者下周初到莫斯科的话，对我们将特别有利。”

第二天，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高居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顶上，十分焦急地等待着莫斯科的回答。这次会谈的结果使纳粹头目感到失望。联共中央和斯大林不但知道希特勒在着急，而且无疑也完全知道他为何着急，因此想出种种办法对付他。在德国大使向苏外长读里宾特洛甫的电报的时候，莫洛托夫并不怎么关心它的内容，听完了以后，他就拿出了苏联政府对德国外交部长8月15日第一次来信的书面答复。

这份答复照会一开头就尖刻地回溯了纳粹政府以前对苏联的敌视行为，并且说，“直到最近以前，苏联政府部一直认为德国政府是在找机会同苏联发生冲突……更不用提德国政府利用所谓反共公约努力建立而且已经建立了包括一些国家在内的反苏统一战线这件事了。”照会解释说，正是由于这个理由，苏联“才参与组织一个反对（德国）侵略的联合防御阵线。”

“虽然如此，”照会中写道，“如果德国政府现在要对过去的政策实行改变，准备认真改善同苏联的政治关系的话，苏联政府只能对这样一种改变表示欢迎，并且准备在自己这方面修改政策，以便认真改善对德关系。”但是，苏联照会坚持认为，这一定要通过“认真而实际的步骤”来做到，而不是像里宾特洛甫所建议的那样跨一大步。

希特勒接到这个报告后，就不顾一切了。8月18日晚间，他在上萨尔斯堡的夏令总部又给舒伦堡大使发出了一封由里宾特洛甫署名的“特急”电报。指示他“立即安排再次晋见莫洛托夫先生”，告诉他，德国外交部长建议自己“立即动身来莫斯科”。他来的时候“将由元首授以全权，来全面地而且最后地解决全部问题”。

现在，希特勒进攻波兰已是箭在弦上。柏林，特别是上萨尔斯堡，空气的紧张几乎叫人不能忍受。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神经质地等待着莫斯科的决定。外交部的各种文电透露了威廉街这种紧张不安的感觉。施努尔博士报告说，同苏联人关于贸易协定的谈判已经在前一天晚上“达成完全协议”，但是苏联却拖着不肯在上面签字。他说，“显然，他们是得到了莫斯科的指示，为了政治上的理由而拖延签字”。为此，希特勒火烧火燎，直到8月19日晚上7点10分，那份望眼欲穿的电报终于来了。就在那天下午4点30分，莫洛托夫受权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德国大使，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草案交给他，并说，如果苏德贸易协定能在20日签字并公布的话，里宾特洛甫就可以在8月26日或在27日到莫斯科来。

莫洛托夫没有解释苏联突然改变主意的理由，舒伦堡猜想是斯大林过问了这件事。这位大使还在电报中说，他想劝诱苏联外长同意里宾特洛甫早日访问莫斯科的企图，“不幸，没有成功。”

在这个成败关头，希特勒决定直接同斯大林打交道。他放下架子，亲自请求这位他长期以来一贯痛骂诅咒的苏联“独裁者”，立即同意他的外交部长到莫斯科去。他给斯大林的电报是在星期天，8月20日下午6点45分特急发到莫斯科去的，离他收到舒伦堡的电报刚好12个小时。希特勒指示大使立即把它交给莫洛托夫。

在这封由希特勒签名的直接写给斯大林的电报说：

“我衷心地欢迎新的德苏商务协定的签字，认为它是改变德苏关系的第一步。

“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对我说来，意味着确立德国的长期政策。德国从此将恢复过去若干世纪中对我们两国都属于有益的政治方针……

“我接受你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先生交来的互不侵犯条约草案，但是认为迫切需要尽快地澄清与之有关的问题。

“苏联所希望的补充议定书的内容，我深信在最短期间就能够得到澄清，如果能有一位负责的德国政治家亲自到莫斯科去谈判的话。如若不然，德国政府就无法明白，这项议定书怎样才能在短时期内澄清内容并得到解决。

“德国和波兰之间的紧张关系已变得不可容忍了……不论哪一天都可以爆发危机。德国已经下定决心从现在起以在它支配下的一切手段来保护它的国家利益。

“在我看来，鉴于我们两国都有建立彼此间新关系的愿望，最好是不要丧失时间。我因此再次建议你在星期二（8月22日）接见我的外交部长，至迟到星期三，8月23日。德国外交部长有最充分的权力来拟定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议定书。鉴于目前的国际形势，外交部长在莫斯科只能逗留一天，至多两天，再长是不可能的。我将十分高兴得到你尽早的答复。”

在以后的24小时中，从8月20日晚间，希特勒给斯大林的呼吁通过电台发向莫斯科开始，到第二天傍晚，纳粹头子一直是处在近乎精神崩溃的状态中。他连觉都不能睡。半夜里，还打电话给戈林，说他心里嘀咕斯大林对他的电报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并对莫斯科迟迟不作答复感到惶惶不安。直到8月21日晚上9点35分，收到斯大林同意里宾特洛甫8月23日来莫斯科访问的复电后，希特勒心里的那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1939年8月23日夜里，斯大林接见了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他们商定了协议的文本。但会议的气氛是冷淡的，远远谈不上友好。陪同里宾特洛甫前往的主要助手高斯写道：

“里宾特洛甫在前言中亲手加进一句有关德苏两国形成友好关系的重要的活。斯大林对此表示反对。他说，苏联政府在被纳粹政府劈头盖脑地倾倒了6年大粪之后，不能突然之间把一项德苏友好宣言拿到群众面前来。因此，前言中的这一句话就被删去了。”

斯大林和希特勒都知道，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是一个暂时的权宜之计。他们是敌人，在他们之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条约规定：双方保证决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进行任何武力行动、任何侵略行为或者任何攻击；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为的对象

时，缔约另一方将不给予该第三国任何支持；缔约任何一方将不加入直接或间接旨在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条约还规定双方政府今后保持联系，对共同利益有关的问题交换情报；对某些问题产生分歧时，双方通过和平方法，友好地交换意见，以资解决。条约有效期为 10 年，除非缔约一方在期满前一年通知废止，条约将被认为自动延长 5 年。

据 1946 年 5 月 30 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所载，在缔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之际，德苏双方全权代表“在严守秘密的会谈中讨论了划分各自在东欧的势力范围问题”，结果达成如下协议，即所谓“秘密附属议定书”：

——在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所属地区发生领土上或政治上的变动时，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应成为德国和苏联两国势力范围的边界。双方承认立陶宛在维尔那地区的利益。

——在波兰国家所属的地区发生领土上或政治上的变动时，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将大体上以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散河一线为界。

——缔约双方的利益是否需要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以及这个国家的边界应如何划定的问题，只有在今后政治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中方能予以明确确定。在任何情况下，两国政府都将通过友好协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东南欧，苏联提请注意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国方面宣布，它对这些地区在政治上完全不感兴趣。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是近现代最重大的国际关系事件之一，长期以来对其评价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正确评价这一历史事件，必须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作出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在肯定它的历史作用时也不应无视它的消极作用。

这个条约的签订使苏联暂时避免卷入战争，赢得了巩固国防的时间；但它也使德国取得了苏联中立的保证，希特勒可以放手发动侵略波兰的战争。这个条约打破了德日法西斯的反苏统一战线，有助于苏联在二次大战中避免两线作战；但它使欧洲力量对比立即发生了有利于纳粹德国的变化，希特勒在进攻英、法时不用担心东线的苏联，至少是暂时摆脱了东西两线受敌的不利处境。这个条约的签订“炸毁了慕尼黑阵线”，粉碎了西方国家企图勾结德国、“祸水东引”的美梦；但是，苏联与德国签订条约以后不再揭露当时的主要敌人——法西斯德国发动战争的罪行，反而与德国发表共同声明，说什么“然如苏、德两国政府之努力依然无效，则继续战争之责任自当由英、法负责，”于是苏联疏远了自己可能的同盟者，束缚了自己支援欧洲反法西斯斗争的手脚，不利于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危险的敌人。

1939 年 8 月英法苏三国谈判的破裂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英法苏联合抗德的可能性化为乌有。战前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之所以没有形成，推行绥靖主义政策的英、法政府应负主要责任，苏联外交政策上的失误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属议定书”中，苏联和德国划分了势力范围，苏联这一行动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的。

当时，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希特勒的盟友大发雷霆。墨索里尼和佛朗哥公开表示不同意。这个条约对东京是沉重的打击，因为日本已经在中蒙边境同苏联作战。据说，日本头目曾告诉希特勒，他们在 8 月就可以参加“大规模的推进”。在反对德国同苏联签订这个条约的叫嚷声中，日本平沼内阁倒台了。伦敦保守党中的希特

勒支持者脾气发得最厉害。他们第一次叫唤要索取希特勒的命。但是，张伯伦政府依然故我。其后 10 天中，甚至在希特勒进攻波兰之后，张伯伦仍然企图召集参加慕尼黑会议的四国（英、法、德、意），来商讨同希特勒取得协议以解决波兰命运的问题。只是在这种尝试遭到拒绝后，张伯伦才同波兰签订了久经延搁的同盟条约，并且敦促波兰进行抵抗。

波兰人怎能进行抵抗呢？英国、法国没有送来援助。波兰空军两天之后便不起作用了；两星期内，有组织的波兰军队已不复存在。这个原来亲德、反苏反共的政府，受到其“主子和朋友”的收拾后，不顾广大人民的死活，仓皇逃到罗马尼亚边境某地。只有英勇的华沙市长留下来，他把一些宁死不屈的市民召集起来进行最后的抵抗。

本来唯一能够及时赶来援助的是苏联，甚至许以这种援助的诺言原本可能阻止希特勒的侵犯；但是，这种援助受到一个憎恨布尔什维克甚于憎恨希特勒的波兰政府的拒绝。在希特勒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时，波兰政府趁火打劫，充当帮凶，如今也落得捷政府同样的下场。英国的顽固分子们，面对波兰人的灾难，同样采取观望态度，在保守党的报纸上，没有表示希望拯救波兰，反而仍旧希望在东欧的废墟上“把战争转向苏联”。

美国著名作家、新闻记者特朗写道，在波兰遭受危难的时候，一位苏联外交家曾对她说：“要是没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我们现在就会受到德、意、日同盟从欧洲和亚洲两面夹攻。英法会据守马奇诺防线并且资助希特勒。美国会成为日本的兵工厂来反对我们，就像它反对中国那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我们就在希特勒、日本和支持希特勒的伦敦人士之间引起了矛盾。要制止对波兰的入侵已经太迟了。张伯伦甚至没有尝试这样做。可是我们已经分裂了法西斯世界阵营，我们将不需要对整个世界作战了。”

英国政治家丘吉尔说：“斯大林同希特勒做交易一举，固然足以令人齿冷，然而在当时是高度现实主义的。斯大林的首要考虑，就同任何其他国家政府首脑的考虑一样，是他自己国家的安全。”据斯大林后来告诉丘吉尔说，他在 1939 年夏天深信，希特勒就要打仗了。他决定苏联决不能被别人骗到单独对德作战的倒霉局面中去。如果同西方结成靠得住的联盟证明已不可能的话，那为什么不转而联合希特勒呢？他不是已突然来敲门求教了吗？

到 1939 年 7 月底的时候，斯大林显然已经深信，法国和英国不但不要一个有约束力的联盟，而且英国张伯伦政府的目的根本就是诱使希特勒在东欧发动战争。他似乎已经十分怀疑英国会对波兰信守自己的条约义务，就同法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信守义务一样。而过去两年，在西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助于加强他的猜疑：张伯伦在纳粹吞并奥地利和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以后，拒绝了苏联关于召开国际会议拟定制止希特勒侵略的计划；张伯伦在慕尼黑对希特勒姑息迁就，而且把苏联排除在会议之外；张伯伦在就缔结防御同盟共同对付德国而进行的谈判中拖延退缩，并且让 1939 年夏天稍纵即逝的时光在空话中消磨净尽。

美国著名记者、《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写道：“有一件事情除了对张伯伦以外，几乎对谁都是肯定无疑的。在希特勒每一次行动面前都要动摇的英法外交，现在已经完全破产了。这两个西方民主国家一步一步后退：

1935 年，希特勒公然藐视它们而下令征兵；

1936 年，他进军莱茵兰；

1938年，他夺取了奥地利；同一年，他要求得到而且果然得到了苏台德区；

1939年3月，他占领了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而英法只有坐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有苏联在它们一边，它们还能使那位德国独裁者对发动战争有所顾忌，而如果不能阻止他发动战争的话，它们还有可能迅速把他击败。但是现在，它们把这样一个最后的机会都断送了。”

1939年9月17日，正当德军攻占大半波兰、合围华沙并限令华沙当局在12小时内投降之时，苏联政府向波兰驻苏大使递交了一份声明。声明指出：“波兰政府已经崩溃且已无生命的迹象，这就是说实际上波兰国家和政府已不复存在。因此，苏波之间缔结的条约已归于无效……波兰已经成为可能对苏联造成威胁的种种偶然和意外事件的方便场所。苏联政府迄今为止一直是保持中立的，但它不能再以中立的态度来对待这种局势了。”“苏联政府对居住在波兰境内的同胞——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的命运不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些同胞被抛弃，任人摆布而毫无保障。”“鉴于这种局势，苏联政府命令红军总司令部所属部队越过国界，去把西乌克兰和西俄罗斯的居民的生命财产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同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以同样内容发表了广播演说。同日凌晨，苏军越过苏波边境向波兰东部进军，不仅进驻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而且越过了寇松线。苏联所占领的波兰地区面积为2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300万人。接着，9月28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德边界条约，确定了两国“最后的国界”；

10月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成立苏维埃政权并分别并入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

德国法西斯大举进攻波兰后，苏联为了防止战火东延，从1939年9月到1940年8月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建立了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东方战线”，而其第一步就是出兵波兰占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苏军开入波兰，加速了波兰的灭亡。苏联在东方战线建立过程中暴露了大国沙文主义，伤害了西邻小国的民族感情，从而易为法西斯德国所利用，把它们拉上反苏的轨道。同时，苏联为了本身的防务，恃强并吞邻国领土，并获得德国法西斯的支持，也有损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从而增加了英法美等国的疑虑和反感，不利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诚然，苏联推行东方战线政策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当时苏联正面临强敌压境的危险局势。然而，即使为了确保苏联的安全，防御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也决不能吞并别国的领土。尊重所有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任何国家，决不能借口本国的安全和防务的需要，借口不同意邻国的内外政策或借口邻国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和威胁，而强行占领别国的领土或迫使其改组政府。

当时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种种反应。

东欧的看法认为，希特勒原来打算不仅要占领波兰，而且要往东南插到巴尔干，还可能要往东北插向波罗的海各国，尽可能地深入，把利沃夫城当作纳粹乌克兰的首府。德国人的战略表明了这一点，因为在粉碎了波兰前线以后，德国人并没有停下来收拾波兰战场，而是横扫波兰向前进军，朝东南到利沃夫，朝东北到维尔那。据说，罗马尼亚的“铁卫队”曾经计划举行广泛的暴动，以迎接德国军队的到来。德国军队接近时，卡利奈斯库首相就被刺杀了。靠近波兰边境的一个罗马尼亚城市确实爆发了暴动，然而一看到河

对岸是苏联军队而非德国军队时，暴动就消沉下去了。

据 9 月 28 日《纽约时报》的电讯说，伦敦方面认为，“苏联人的行动已经阻止了希特勒对于罗马尼亚所抱的野心。” 9 月 27 日，美联社从东欧发出的一条电讯说：“对苏联的尊敬已经大大增加了；毫无疑问，农民们宁愿要苏联人而不要德国人呆在他们的边界上。”

从那个时候起，苏联利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给予的喘息机会，不仅准备了防御，而且也通过战争以外的一切措施来阻挡德国人渗入东欧各国。希特勒后来在他对苏联的宣战书中透露了这“一点，并且极为愤恨地列举了苏联人阻挡他的那些行动。

斯大林的头一个措施是通过缔结一些同盟、的办法沿着苏联的西部边境建立一条很宽的缓冲地带。在把 20 年前波兰违背国际联盟的意旨而夺走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派遣它们的外交部长到莫斯科去讨论缔结一项同盟的问题。他们分别来到莫斯科并且在文件上签了字。到 1939 年 10 月 10 日，离苏联人把军队开进波兰还不到一个月，他们已经同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结成了军事同盟，而这三个国家，过去曾经是敌军入侵的大道。原来是彼得大帝建造的一系列坚固的海军基地，就这样归于苏联的控制之下。虽然大多数美国报纸谴责这种行动，但是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却抓到了问题的所在，他说：“一天比一天更加清楚，苏联正在建立一片从波罗的海一直伸展到黑海的巨大的防御地区。”

随之而来的是戏剧性地把 50 万日耳曼人从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驱逐出境。希特勒的宣战书中表明了他对这件事多么切齿痛恨。他说：“远比 50 万为多的男女被迫离乡背井。对这一切，我保持了缄默，因为我当时不得不如此。”这并不是一个心满意足的胜利者所说的话。波罗的海日耳曼人是那些波罗的海国家中的上层，其中有一些人儿世纪来一直都是食采邑的贵族。在俄国革命时；就是这些人把德国军队引进来推翻当地红色政权的。驱逐了他们，也就驱散了对苏联最危险的欧洲方面的第五纵队。

希特勒看到：苏联作为一个中立国家乃是他走向世界霸权的直接障碍。在互不侵犯条约存在的 22 个月里，苏联已经三次阻止了纳粹的前进。苏联进军波兰把希特勒的东进阻滞了一年。苏联进军比萨拉比亚牵制了希特勒对英国的入侵。莫斯科在巴尔干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强权政治，把希特勒拖住在达达尼尔海峡。

希特勒看到：苏联中立的孤掌对他的阻碍，要比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希腊、南斯拉夫、英国等整个欧洲的武装部队加在一起对他的阻碍大得多。因此，他回转头来，用法西斯最强大、最野蛮的进攻打击苏联。正是：

硝烟滚滚天下乱，雾气腾腾罩地暗；如意算盘遭破产，恼羞成怒兵戟见。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五章 暴风雨前夜

助暴为虐招祸患，波兰疆土变颜色；
英法宣战实观战，不堪一击遭大难。

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侵入波兰领土。英法两国政府由于担心德国法西斯军队进而入侵法英两国及其殖民地，便对德国宣战。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

曾经宣布保障波兰的安全和唆使波兰拒绝苏联援助的英法两国政府，没有做任何事情来给波兰以实际军事支援，更没有对希特勒侵略军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它们仍然没有放弃把战场推向苏联的企图。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反动势力一个劲地怂恿苏联的邻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参加反对苏联的战争。但是，这一阴谋遭到了失败。根据苏联同这些国家达成的协议，苏联军队已进入它们境内。苏联军队掩护着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西部边界，这些国家的安全因而有了保障。

在保障南波罗的海地区不受突然袭击之后，斯大林就指示外交部开始同把着北方门户的芬兰进行接触。虽然芬兰的独立是俄国革命的“赠品”，然而芬兰却是波罗的海各国中最敌视苏联的。早年的民主芬兰已被推翻了，前沙皇将军曼纳海姆侯爵在德皇军队的支持下推翻了芬兰民主政权。芬兰已成为反苏国际行动的一个前进基地。芬兰统治集团已同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反动势力达成幕后交易。在它们的参预下，芬兰政府不断加强进攻苏联的军事设施——曼纳林防线和亚兰群岛等地。与此同时，希特勒还帮助修建了一个可容纳2000架飞机的军用机场，而当时芬兰只有150架飞机，显然这是根据某大国的军事意图而修建的。

斯大林知道，上述情况表明芬兰是不会欢迎同莫斯科缔结同盟的。但芬兰当时的对外贸易由于英德战争封闭了波罗的海而遭到破坏。为经济萧条所袭扰的芬兰要求同苏联贸易，并且想要利用列宁格勒——摩尔曼斯克铁路来外通世界。然而，当莫斯科1939年10月5日邀请芬兰派遣全权代表讨论“未决问题”时，其后果是出乎意料的。芬兰政府在答复之前先宣布了局部动员，派遣了大批武装部队到边境去，关闭了股票交易所，要求妇女儿童撤离首都赫尔辛基，并向美国呼吁给予“道义支持”。苏联报纸对于这种“有意制造的惊慌”表示了讥讽和不满。

芬兰代表团于10月11日抵达莫斯科。苏联人缔结同盟的提议由于芬兰人不愿意而放弃了。随后他们又提议交换领土以保障列宁格勒的安全。他们要求把边界后移，使列宁格勒处于大炮射程之外，并要求把一些屏障海道的小岛让给苏联。他们提出以同样富庶、只是战略意义较小而面积大两倍的领土交换。苏联还要求，把汉哥或者处于通向列宁格勒的狭长水道芬兰湾人口处的其他一个地点，租给苏联30年作为海军基地。芬兰的卡詹德尔总统广播了一项声明，认为这些条件并不影响芬兰的主权完整；讨价还价进行了一个月，莫斯科愿意付出更多的代价，芬兰在领土交换中将得到差不多三与一之比的便宜；汉哥基地的租让期将不是30年，而是到英德战争结束就可连同全部设施交还芬兰。许多芬兰人当时都在吹嘘他们的外交代表所要做成的“漂亮生意”。然而，芬兰的谈判代表突然中断了会谈。莫斯科认为，芬兰内阁是在西方想要“转变战争方向”的势力的秘密压力下这样做的。

所以，在11月末芬兰越境开炮并杀死红军士兵时，莫斯科就提出强烈抗

议；芬兰对抗议置之不理，苏军就在 1939 年 11 月 30 日开入芬兰。芬兰随即宣战并呼吁外援。国际联盟指责苏联“侵略”，将它开除。苏芬战争使苏联失去了更多的朋友。苏联人认为，“这是为了保卫列宁格勒而打的一次先发制人的战争”。

由于苏联军队采取了坚决行动，芬兰请求请和。

1940 年 3 月 12 日两国缔结了和约。但是，伦敦和巴黎曾竭力阻挠那次签字。法国总理达拉第告诉芬兰说，一支英、法远征军已经整装待命，准备前往救援。张伯伦和达拉第压迫瑞典同意让这支远征军过境赴芬，虽然这将使瑞典也卷入战争。3 月 10 日，张伯伦告诉下院说，他正在考虑打破瑞典的中立和迫使芬兰战争继续下去的办法。3 月 11 日《纽约时报》驻伦敦记者报道说：“伦敦盛传将发生具有更广阔的战线的战争，也许是对俄国的战争。”

但是，这种谣传来得太晚了。由于瑞典坚持了中立以及曼纳海姆将军低估了苏联的兵力，“转变战争方向”使之成为全世界联合反苏大战的企图失败了。曼纳海姆曾经告诉英法盟国，他在 5 月之前不需要援助；而张伯伦原期望到那时就可以迫使瑞典同意军队过境。芬兰人和英国人做梦都想不到，曼纳海姆防线在冬季进攻中就被突破了。在曼纳海姆预定援军到来之前两个月，芬兰人就求和了，苏芬战争就此结束。

在和约条款中，苏联人取得了曼纳海姆防线和汉哥海军基地，从而在陆地和海洋上保卫了通向列宁格勒的通道。这样，当希特勒从蹂躏西欧转向东方的时候，从波罗的海岸的汉哥，直到黑海岸的多瑙河口，这一跨越欧洲的绵长的缓冲地带已经完成了。这对巩固列宁格勒和摩尔曼斯克的安全，改善苏联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舰队的战略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苏芬武装冲突之后，斯大林决心就实战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对红军的人事制度以及战略战术进行彻底的改革。朱可夫后来称 1940 年为“大转变的一年”。军官的地位和权威提高了。将军和其他军官以及军士的军衔都得到了恢复。由于“大清洗”的缘故，在这次战争中，感到训练有素的军官极其缺乏，所以开设了军官集训班。在大清洗中被判刑的 4000 多名军官被召了回来，其中包括 罗科索夫斯基、罗特米斯特罗夫和托尔布欣，后来他们都成了苏联的元帅。对军事条令做了修改，强调的重点放在指挥和纪律上。

在这些激动不安的日子里，斯大林除了放手提拔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中下级军官外，还着手精心选择他的最高级军事指挥员。从保卫察里津战役那时起，伏罗希洛夫就一直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属于革命传统派，但在芬兰战争中已显示出他还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1940 年 5 月 8 日，铁木辛哥取代了他的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斯大林把伏罗希洛夫安排在别的职位上，因为他是一个受人爱戴、赤胆忠心的人。猛打猛冲的骑兵司令布琼尼未能掌握现代战争，但他和伏罗希洛夫一样仍然受到重用。

沙波什尼科夫则属于另一类。

1903 年他在沙皇军队里当军官，1910 年在总参谋部学院毕业。他思路广阔，有一个敏锐的分析头脑。在二十年代里他写了《军队的头脑》一书，以及其他有关军事编制和战略的基本读物。他谦虚宽厚，纪律严明。斯大林提拔他负责总参谋部的工作。后来他健康不佳，但仍保留了他的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并主管军事工程和防御工事。

1941 年 2 月 1 日，朱可夫就任总参谋长，他在沙皇军队中是一名军士，

是在实战中成长起来的指挥官。1939年他在中蒙边界的哈勒欣河一带，指挥几个装甲师，战绩显赫，歼灭日军5万多人。他机智、英勇、果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愧为苏联杰出的野战统帅。他和斯大林的关系有时激烈紧张，但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

提出由朱可夫任总参谋长的，显然是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然而，当斯大林把朱可夫召到他的办公室，并扼要地宣布说政治局决定任命他为总参谋长时，朱可夫却大吃一惊。他争辩说，他是个野战军军官，毫无参谋工作经验。斯大林听取了他的申辩后简练地重复道：“政治局已经决定任命你了。”他把重音放在“决定”两个字上。当朱可夫明白任何反对都无济于事时，他说：“好吧，如果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总参谋长时，我将请求再回部队。”

几个星期以后，铁木辛哥告诉朱可夫，斯大林曾询问他在新的岗位上工作得如何，并且要他亲自去向斯大林汇报。朱可夫忐忑不安。“他可能会向我问些什么呢？”“什么都问，”铁木辛哥答道，并补充说，“可是你要记住，他不愿听冗长的报告。你给我讲上几个小时的事，你得在十分钟内给他讲完。”“十分钟内我能对他讲些什么呢？这些全是严肃的问题，是要认真考虑的……”“你要告诉他的大部分情况他都知道，”铁木辛哥说，“因此你就集中讲讲关键问题吧。”

斯大林是个事必躬亲的领导者，对大事尤为注意，凡有关加强武装部队的各项工作，从挑选高级军官到实现机械化的计划，特别是采用T-34式坦克和新式火箭炮（喀秋莎）等，斯大林都没有依靠政治局、总军事委员会或其他机构的正式会议。他重视直接的个人接触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提供的第一手材料。他在孔策沃的别墅里，经常同铁木辛哥、朱可夫、伏罗希洛夫、麦赫利斯等人讨论到深夜。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朱可夫随身带了一份准备汇报的问题清单，应邀来到斯大林的别墅。铁木辛哥元帅和库利克元帅早已在那里。在场的还有几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同他打过招呼之后，随即问道：“你见过火箭炮喀秋莎没有？”

“只听说过，但没有见到。”

“哦，那你应当同铁木辛哥、库利克和阿博连科夫去靶场看一看火箭炮射击。现在就请你向我们谈谈总参谋部的工作吧。”

朱可夫把向人民委员报告过的东西简要地重述了一遍，然后说，鉴于复杂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及时克服西部边境防御和军队中存在的缺点。

“怎么，你认为我们很快就要同德国人打仗吗？”莫洛托夫突然打断他的话说。

“等一等，等一等……”斯大林阻止莫洛托夫。

斯大林听完报告以后，请所有的人进餐。中断了的谈话又继续进行。斯大林问朱可夫对德国空军有什么看法。这位新任总参谋长说：“德国人有一支不错的空军。他们的飞行人员在同陆军协同作战方面受过很好的实际锻炼。至于飞机，我们的新式歼击机和轰炸机丝毫不比德国的差，甚至还要好一些。可惜的是这种飞机太少了。”随后他们又就红军的装备、训练等问题进一步交换了意见。

据朱可夫回忆，这次晚餐很简单。第一道是乌克兰浓汤，第二道是烧得很考究的养麦米饭和很多熟肉，第三道是煮水果和新鲜水果。斯大林兴致很

高，有说有笑，喝着一种格鲁吉亚淡酒，并用这种酒招待客人，但多数人却宁愿喝白兰地。

未了，斯大林说，应当认真研究一下那些最急迫的问题，尤其是武装部队的训练和装备问题，要迅速提交政府作出决定。但是，应当依据我们现实的可能性，而不要去空想那些我们的物质条件暂时还不允许的东西。在联共召开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作出了关于加强国防工业的决定。决议指出，航空工业、化学工业、弹药工业、电子工业和国民经济中其他许多有国防意义的部门的领导人，应当从会议的批评中吸取教训，大力改进工作，否则就要被撤消领导职务。大会通过的最后一个和平时期的国民经济计划，要求国防工业在 1941 年有很大发展。

作为国防基础的国民经济，近些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联共中央和斯大林强有力的领导下，前两个五年计划都超额完成了。

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四年中增长了一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了 1.2 倍。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强调指出，在执行前两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鉴于国际形势大大复杂化而不得不对重工业的发展计划作出重大修改，大大加速了国防工业的进度。按照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的要求，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仍然得到了特别迅速的发展。整个工业年产量虽然平均增加 13%，但是国防工业的年产量则增加了 39%。许多机器制造厂和其他大工厂转为生产国防技术装备，一批大型专业军事工厂开始兴起。联共中央为使国防大厂得到所需的一切和保证完成生产任务，派出了经验丰富的党的工作人员担任党组织的负责人，并派去了著名的专家。从建厂到生产，斯大林亲自为国防工业作了大量的工作。他结识了几十个工厂经理、党组织的负责人和总工程师，常会见他们，以他固有的坚定不移精神要求他们完成预定计划。就这样，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脉搏跳动得更快了，在临战前的年月里，达到了最紧张最充分的程度。整个国家的生活也变得更严格更集中了。

1939 年 9 月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特别会议，通过了《普遍义务兵役法》。根据新兵役法，应征年龄为 19 岁，中学毕业生服役年龄为 18 岁。为了更好地学习军事，延长了服役期：陆空军的初级指挥人员由两年改为 3 年，空军士兵、边防部队士兵和初级指挥人员延长到 4 年，海军部队和舰艇人员延长到 5 年。到 1941 年 1 月 1 日，陆军、空军、海军和防空军较 1939 年增加了 1.8 倍，总数发展到 420 万人以上。与此同时，还对国民进行普遍的军事训练。公民，首先是青年，在入伍前接受保卫祖国的训练，这个传统在人民中间受到普遍的欢迎。从事群众性国防活动的是苏联支援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协会。到 1941 年 1 月 1 日，这个协会的成员达 1300 万人以上。每年有好几万飞行爱好者、跳伞员、射手和航空机械员，在 300 所以上的航空和汽车摩托俱乐部、航空学校和滑翔俱乐部学习专业知识。青年人入伍前学到的这些技能，后来在民兵和游击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各级指挥人员的专业训练方面，有 200 所以上的军事学校，19 所学院，10 个附设在普通大学的军事系，7 所高等海军学校，几十万人在这些院校中受过良好的教育。通过这些训练，大大提高了红军指战员的军事素质，为反法西斯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国防工业的发展，陆海空军的装备也大大加强。仅就空军来说，1940 年底航空工业比 1939 年增长了 70% 以上。在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转归航空

工业的企业里，同时兴建新的航空发动机厂和航空仪器厂。根据准确的档案材料，从1939年1月1日到1941年6月22日，工业部门为红军提供了17745架作战飞机，其中有3719架新式飞机。

1940年春夏两季，德国部队对西方的闪电式进攻更加剧了苏联战备的紧迫性。希特勒继占领挪威和丹麦之后，又于5月侵入荷兰和比利时。英国军队从敦刻尔克撤退。但是，使苏联人感到最震惊的还是法国的一败涂地。德军于6月14日占领了巴黎。斯大林原以为法国军队有马奇诺防线做掩护是安全的，拥有绰绰有余的力量顶住德国人。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身上了。苏联人的心情是复杂的，除了赞赏英国单枪匹马地反对德、意的立场外，普遍担心英国会同德国媾和，使希特勒得以腾出手来攻打东方。

就在这紧张的时刻，斯大林决定组建新机械化军、坦克师和摩托化师以及反坦克部队。按照计划，要装备齐这些新建的机械化部队，仅新式坦克就需要16600辆，总共需要坦克3.2万辆左右。一年之内要生产这么多坦克实际是办不到的。为此，斯大林号召加紧生产，延长工作时间。他说：“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

大约就在这时，斯大林要副国防人民委员沙波什尼科夫，就德国入侵可能采用什么计划，起草一份全面的参谋报告。在1940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否定了这份报告。沙波什尼科夫认为，德国的主攻方向将在波罗的海和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之间，针对着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斯大林仔细听取了这一汇报，并几次走到地图前，然后不以为然他说：“我不明白总参谋部为什么拟定了把兵力集中到西部方向的方针。有一种说法认为，希特勒将沿最短的路线对莫斯科实施主要打击。但是，我认为，对德国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乌克兰的粮食和顿巴斯的煤。没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德国法西斯就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战争。希特勒已在巴尔干站稳了脚根，看来他将准备对西南方向实施主要突击。”

当时斯大林在苏联全党全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没有人想到去怀疑斯大林的意见和他对形势的分析。但是，斯大林在判断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上犯了错误。由于这一错误，不得不在战争的前些日子里，把早先集中在乌克兰和后来调往那里的第十九集团军全部和第十六集团军的许多部队和兵团，大约一百个师转移到西南方向，对战争初期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

响。1941年春天修订作战计划时，对于现代战争初期的作战特点也缺乏充分考虑。当时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部认为，像德国和苏联这样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应该还像以前那样开始：先在边境交战几天以后，双方主力才进入交战。对希特勒的“闪电突击”和雄厚的人力、物力估计不足。并认为敌人兵力在集中和展开的时间方面，也会像苏方一样。事实上，无论是兵力还是条件都相差悬殊。

战争前夕，德国同被它占领的国家一起，生产钢3180万吨，煤6.964亿吨。苏联钢产量为1830万吨，煤产量1.659亿吨。德国的弱点在石油开采方面，但由于从罗马尼亚输入石油，依靠已建立的储备和合成油料的生产，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弥补。

德国建立了强大的军事经济潜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300个以上的大军事工厂，军事生产1940年比1939年增加了2/3，比1932年增加21倍。1941年德国工业生产了1.1万多架飞机，5200辆坦克和装甲车，7000多门

75 毫米以上口径的大炮，170 多万支步枪和自动枪。此外还有掠夺来的大量武器，以及仆从国和被占领国的生产能力。

截止 1941 年 6 月，德国军队比 1940 年增加了 355 万人，总数达到 850 万人，即 214 个师。而苏联到 6 月份，连同征召的补充兵员在内，共有 500 多万人。希特勒认为，进攻苏联的有利时刻来到了。

1941 年 3 月底，苏联政府已经获悉，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柏林与法西斯德国的里宾特洛甫和军界首脑进行了极为秘密的谈判。他们谈判的内容，莫斯科是不难猜到的。希特勒试图建立德日联盟，形成对苏联的军事包围。这实际上意味着苏联必须进行两线作战。

因此，保卫苏联的远东安全就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为了延缓战争爆发的时间，争取避免两面作战，在松冈途经莫斯科时，经过多次谈判，苏日双方签订了“中立条约”。在庆祝签字的宴会上，松冈向斯大林敬酒时，故弄玄虚，说了一些其他外交官不可能说的话。“条约已经签订了，”他脱口而出，“我不说谎，如果我说谎，我把脑袋给你。如果你说谎，那我一定会来取你的脑袋。”斯大林冷冷地反驳说：“对我国来说，我的头是重要的。你的脑袋对你们的国家也是重要的。所以，我们都小心地让脑袋长在肩膀上吧！”这番话弄得松冈很尴尬。

为了教训一下这个狂妄的日本人，斯大林特地给朱可夫这位哈勒欣河战役的司令官打电话说：“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访问德国回国途经这里，你要亲切地接待他。”“亲切”这两个字说得特别重。

“有什么指示？”

“松冈只想同你认识认识。”

显然，松冈洋右对哈勒欣河事件记忆犹新。过了几天，国防人民委员部外事处主任陪着松冈前来拜访。一进门他就向主人深深地一鞠躬。朱可夫按着斯大林的指示，“亲切”地欢迎他，问候他的健康，旅途是否劳累。他含糊地回答说：“我喜欢长途旅行。我是第一次到欧洲。你去过欧洲各国吗？”

朱可夫回答说：“很遗憾，没有去过。在方便的时候，一定设法去。我读了很多有关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书，但是，即使一本最好的书也不能使人了解一个国家的全貌。只有亲身访问和接触一个国家，才能更好地了解它，了解它的人民、风俗和习惯。”

谈话一直在这种“友好”气氛中进行。从始至终未涉及尖锐的政治问题。松冈给朱可夫的印象是狡猾诡诈，不愿开诚布公地交谈。可以看出，他宁愿多听，而不愿多说。会见后，朱可夫立即打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了会见的情况和对松冈洋右的印象。斯大林对这次会见很满意，最后他说：“日本政府同意签订中立条约了。”

苏日中立条约于 1941 年 4 月 13 日签订。条约为期 5 年。条约规定：“双方应维持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并且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条约指出，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或第三国家集团的军事行动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应守中立。苏联政府知道，苏日中立条约能减少日本进攻苏联并迫使它两线作战的危险，但不能完全保证法西斯德国的盟国——日本军国主义遵守所签订的条约。因此，在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不得不在远东保持大量的兵力。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这个条约使苏联赢得了一些喘息时间。

虽然在 1941 年的头几个月里，苏德在形式上还保持着正常关系，但却日益紧张起来。3 月，保加利亚加入了轴心国，南斯拉夫也同意加入。然而，3

月 27 日，在南斯拉夫爆发了反对亲德政策的暴动，结果成立了以西莫维奇将军为首的新政府。斯大林不失时机地同南斯拉夫的新政权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可是当德国军队侵入南斯拉夫、无情轰炸贝尔格莱德的时候，斯大林却无能为力。

面对日益紧张的局势，5 月 5 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向几百名刚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年轻军官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强调了红军建设中实现现代化和更新装备的重要性。他提醒他们说，局势很严重，不能排除德国在不久的将来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他坦率地告诉他们，红军还不够强大，还不能轻而易举地粉碎德军，红军仍然缺少现代化的坦克、飞机和其他装备，红军的官兵们仍在训练的过程中。苏联政府正努力通过外交和其他办法把德国人拖到秋季，冬天的到来会把德国人的进攻推迟到 1942 年。如果苏联的策略获得成功，那么同纳粹德国的战争几乎必然会在 1942 年发生，但这就会赢得几个月的宝贵时间。“从现在起到 8 月份”是最危险的一段时间。

这次会议之后，苏联有意做出“亲善”的外交姿态，继续煞费苦心设法防止任何像是挑衅的行动。1941 年 6 月 14 日，苏联塔斯社授权发表了一项只能是麻痹自己的声明，进一步强调了同德国的“友好关系”，说德国“和苏联一样坚定不移地恪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条款”，并且否认从伦敦散布出来“两国在近期会爆发战争的谣言”。柏林方面对这些姿态置若罔闻。希特勒已经下定决心实施他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在入侵苏联的前一天晚上，希特勒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关于消灭俄罗斯的计划》的密信。他在信中写道：“当我作出了这一决定后，内心感到我又获得了自由。”

在这些日子里，克里姆林宫的空气异常紧张，斯大林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他清楚地知道，同法西斯德国这样一个有经验的强大敌人作战，将给苏联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所以他竭尽全力争取时间，加强战备，尽量防止战争在 1941 年爆发。但是能否获得成功，他没有把握。这时，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的情报和谣传送到他面前。德国的参谋长于 1941 年 2 月 15 日发布了一项“用假情报迷惑敌人的特别训令”，以掩盖“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传出的假情报说，“德国军队在东线的调动，原属于历史上最大的迷惑演习，旨在分散人们对入侵英国的最后准备工作的注意。”毫无疑问，斯大林也受到了这种假情报的影响。他不相信希特勒会孤注一掷，背离俾斯麦的东方政策的传统，即“要求德国在西方进行战事时，应该避免对俄国的战争”。

1941 年 4 月初，丘吉尔给斯大林发来一份亲启电报，提醒他注意德国军队的调动和德国即将向苏联发动进攻。此后，英国方面于 6 月 18 日向苏联驻伦敦大使发出紧急警报。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报告以及苏联在日本的杰出的情报人员理查德·佐尔格的报告，都提到了德国入侵苏联的确切日期。斯大林对这些报告均持怀疑态度。他仍然极不信任英国。他既不信任张伯伦，也不相信丘吉尔。在外国武装干涉期间，丘吉尔对苏联的所作所为，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斯大林认为，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正竭尽全力怂恿德国对苏联作战，认为他们正处在严重军事形势之下，为了避免本身覆灭，非常希望德国进攻苏联。尤其是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于 1941 年 5 月 11 日飞往苏格兰，这更加剧了斯大林对英国秘密外交活动的怀疑。

1941 年春天，西方国家盛传苏联对德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准备的挑拨性消息。德国报刊大肆渲染这类消息，并且抱怨说，这些消息使苏德关系受到损害。“你看，”斯大林说，“用德国人吓唬我们，用苏联吓唬德国人，有人

就唆使我们敌对，以收渔翁之利。”

斯大林对希特勒过分小心谨慎，总希望推迟战争爆发，最后导致了适得其反。对德国无数次破坏已签署的协议未作应有的反应，纵容了一天变得蛮横无礼的希特勒，使他相信苏联软弱。甚至到了最后时刻，即德国军事机器的弹簧缩到准备对苏联实施致命打击的时候，斯大林还希望能防止发生可怕的冲突。但是，柏林已作出了决定：使用外交语言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6月21日夜，朱可夫从基辅打来的电话里获悉，一名德军司务长越过了防线对苏联指挥员说，德国军队将在次日凌晨发动进攻。朱可夫立即向斯大林和铁木辛哥作了报告。“也许这是德国将领们把这个逃兵送来，是为了挑起冲突吧！”这是斯大林的第一个反应。“不，我们认为逃兵说的是实话。”总参谋长坚持说。随后政治局委员们都来了，经过审慎的讨论和研究，斯大林才最后同意发出这样一项命令：命令列宁格勒、波罗的海、西部、基辅和敖德萨各军区的前线部队，立即作好战备，准备抗击德国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但时间已经晚了。

斯大林做了这样的处理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刚好要在卧室的沙发上休息一下，突然有人敲门。门声刺痛了他的心：任何时候都不曾有人这样唤醒他，也许发生了最坏的事情，难道战争爆发了？斯大林勒紧睡衣走了出来，卫士长向他报告说，朱可夫有急事打来电话了。随后，总参谋长在电话上向他报告了德军空袭基辅、明斯克等城市的情况。这一切表明，他最不愿发生的事情——战争终于爆发了。时间是1941年6月22日凌晨4时。只见他拿着听筒沉沉地叹了口气，然后粗声粗气地骂道：“希特勒这个大流氓！”

他终于明白了，事实证明他对战争的判断错了，而这一错误的代价却是巨大的。正是：一厢情愿，力图缓战；闪电袭来，仓猝应变。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六章 蓄谋已久

蓄谋已久好计算，背信弃义攻苏联；
旗开得胜更发狂，妄图六周庆凯旋。

正当斯大林对纳粹入侵还在半信半疑的时候，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凌晨3点半，希特勒就以190多个师的兵力，背信弃义，对苏联不宣而战。德国海陆空军一齐出动，像一场狂风暴雨，遮天盖地而来。德国的盟友和仆从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一道参加了这场罪恶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战役，在苏联国土上展开了。

征服苏联，独霸欧洲，夺取世界霸权，这是法西斯德国蓄谋已久的国策，也是希特勒梦寐以求的目标。早在1925年，希特勒在其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就写道：“当我们今天谈到欧洲新领土的时候，我们必须想到俄国和它周围的附庸国家。”

1936年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次年11月6日，意大利也参加了这一协定。顾名思义，这主要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是这一条约并没有改变希特勒的侵略野心。条约签订后不久，他便在一次会议上说道：“现在俄国并不可怕，因为我们已同俄国缔结了条约。但是条约只是在对我们有用的时候才有遵守的必要。一旦我们在西方腾出手来，我们就可以对俄国作战。”德国统治集团正是根据这个总的方针，不断加紧发动侵苏战争的准备。

希特勒阴险毒辣，狡猾多端。他利用威胁利诱、挑拨离间的手段，搜罗侵苏战争的伙伴。芬兰在苏芬战争后，对苏联怀有强烈的对立情绪，德国乘机拉拢，将其纳入侵苏战争的行列。

1940年9月，德芬两国总参谋部之间，达成了共同准备和进行侵苏战争的秘密协议。芬兰统治集团倒向德国后，苏联西北部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也随时有被封闭的危险。罗马尼亚自失去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后，对苏联极为不满。希特勒需要罗马尼亚的石油，便积极支持反苏的安东尼斯库上台，在罗马尼亚建立了亲德的军事独裁制度。

1940年10月德军进驻罗马尼亚后，苏联的黑海出口受到严重威胁。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相继加入德、意、日军事同盟，大大加强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力量。

1940年西欧战局结束后，德国武装力量在人数、技术装备和作战经验等方面，均已超过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希特勒认为进攻苏联的条件成熟了。他说：“如果我们进攻他们，斯大林的俄国将在8个星期内从地图上抹掉。”

希特勒妄图消灭苏联的野心虽然由来已久，但是制定侵苏战争的计划还是在法国投降以后。

1940年7月21日，他要求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为此进行准备。

10天以后，希特勒在伯格霍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公开表明了自己主要的战略目的。他说：“如果俄国被摧毁，英国的最后希望就被粉碎。那时，德国就将成为欧洲和巴尔干的主人。”他设想“最初将发动两个攻势：一个是在南方向基辅和第聂伯河进攻，第二个是在北方通过波罗的海国家，然后向

莫斯科进攻。两支军队在莫斯科会师。在这以后，必要时将进行一次特殊作战，以获得巴库油田。”从这次会议后，拟订入侵计划的工作就逐步展开。

制订计划的工作由陆军总参谋部、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局以及经济和军备局负责。为此，对苏联的地形、兵力、物资储备、工业设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计划制定后，德军统帅部于1940年11月28日至12月3日，在措森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役演习，以检查作战计划的可靠性和现实性。这次演习后，德军高级领导人对胜利充满信心。与此同时，他们也还感到有许多困难，特别是空间和人力上的困难。苏联西部形若喇叭，突入越深，正面就越宽。除非在贝帕斯湖——明斯克——基辅一线以西将苏军主力歼灭，否则德军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扼守深入腹地时不断拉长的战线。此外，后备兵力不足，车辆汽油只有三个月的储备。有些高级将领还担心，进攻苏联可能会重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线作战的错误，因而企图说服希特勒放弃这种冒险。但是希特勒一意孤行，决定暂时搁置进攻英国的“海狮计划”，集中力量先击败苏联，然后再解决英国的问题。

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发布第二十一号训令，代号为“巴巴罗萨”计划。希特勒所以要用十二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菲特烈·巴巴罗萨的名字来为其反苏战争计划命名，无非是想给这些战争涂上“圣战”的色彩。

希特勒发布的第二十一号绝密训令说：

“德国武装部队必须准备在对英国的战争结束以前，以一次快速的战役击溃苏联。为此目的，陆军必须动用一切可以调动的部队，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保卫已被占领的领土以防突然袭击……”

“准备工作……必须在1941年5月15日以前完成。必须非常谨慎，以防泄露进攻的意图。”

“巴巴罗萨”计划总的战略目的是：在对英国的战争结束以前，以一次快速的战役击溃苏联。该计划的制定者企图以大量坦克部队、摩托化部队及航空部队进行“闪电”式的突然袭击，分割围歼苏联西部红军主力，尔后向战略纵深发动进攻，攻占列宁格勒、莫斯科和顿巴斯，前出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伏尔加河、阿斯特拉罕一线，并于1941年人冬前结束战争。为此，德军最高统帅部集中了181个师又20个旅，4300辆坦克，4.7万余门火炮和迫击炮，4980架飞机，193艘舰艇，总兵力为550万人，编成3个集团军群和3个独立行动的集团军，准备在3个战略方向上实施进攻。

北方集团军群，由莱布元帅指挥，辖第十六、第十八集团军和坦克第四集群，共29个师，在第一航空队1070架飞机支援下，自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今加里宁格勒）以东向陶格夫匹尔斯、普斯科夫方向实施进攻，以便在有利条件下向列宁格勒推进。

中央集团军群，由博克元帅指挥，辖第四、第九集团军和坦克第二和第三集群，共50个师又两个旅，在第二航空队1600架飞机支援下，自波兰华沙地区向布列斯特、明斯克方向突击，割裂苏军防御的战略正面，围歼白俄罗斯境内的苏军，尔后向斯摩棱斯克方向进攻，直指莫斯科。

南方集团军群，由龙德施泰特元帅指挥，辖第六、第十一、第十七集团军，罗马尼亚第三、第四集团军，坦克第一集群和匈牙利一个快速军，共57个师又13个旅，在第四航空队和罗马尼亚空军共1300架飞机的支援下，自波兰的赫尔姆、热舒夫向科罗斯坚、基辅方向进攻，夺占基辅及其以南地域内的第聂伯河渡口，然后沿第聂伯河右岸向东南发起进攻，以便协同自罗马

尼亚境内进攻的军队，消灭右岸乌克兰的苏军，强渡第聂伯河，向顿巴斯发动进攻。

德军的“挪威”集团军和芬兰的东南集团军，卡累利阿集团军，共 21 个师又 3 个旅，在挪威和芬兰境内展开，由德军第五航空队和芬兰空军 900 余架飞机进行支援，夺取列宁格勒。

“巴巴罗萨”计划原规定，各项准备工作“必须在 1941 年 5 月 15 日以前完成”，后来，由于巴尔干战争不可能在 5 月中旬结束，希特勒决定将原定入侵的日期推迟到 6 月 22 日。

希特勒为了欺骗斯大林，为了隐蔽进攻苏联的战略意图，对各项战争准备工作，特别是对军队的集中和展开，采取一系列的政治欺骗和战略战役伪装措施。在外交上通过各种形式表示要与苏联“友好”，主动与苏联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一再声称要恪守这一条约。

1940 年 2 月和 1941 年：月又与苏联签订贸易协定，并以此作为苏德两国“和平友好的范例”大肆进行宣传，但暗中却在加紧侵苏战争的准备。在“巴巴罗萨”计划签署后，希特勒一反常态，批准出售给苏联新式飞机和一些先进的技术兵器。因为他很清楚，进攻苏联已为期不远，对方的国防工业来不及利用他们的新技术，而做出这种姿态，倒可迷惑一下苏联。在军事上德军统帅部故意制造准备执行“海狮计划”的舆论。在英吉利海峡东岸的港口，张贴了“打到英国去，活捉丘吉尔！”的标语，并给部队大量印发英国地图，配备英语翻译，在海峡沿岸集结大量渡海、登陆器材，配置假火箭，还进行了频繁的登陆演习，以此来掩饰“巴巴罗萨”计划。为了避免苏联对德军东调产生疑虑，希特勒指令德国驻苏的外交人员向苏联进行所谓“解释”：如向波兰调集军队时，德国使馆通知苏联说，这是为了派新兵去接替即将退伍的老兵；当其部队进驻罗马尼亚时，诡称只是派了一些“教官”去协助该国进行军事训练。德军还利用实施“马利他”战役（入侵希腊）和“向日葵”战役（在北非发动战争的掩护），将“A”集团军群调到东线，并散布假情报，扬言要实施“黑葡萄”战役（占领直布罗陀）、“阿提拉”战役（占领法国南部）和“鱼叉”战役（从挪威入侵英国），企图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上述地区，以保障德军隐蔽地向东线调集。

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处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早在 1934 年：月，斯大林在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就已说过，国际形势要求党“采取一切措施保卫我们的国家，以防备突然事变，随时准备捍卫我们国家以抵御侵犯”。1939 年 3 月，在法西斯侵略业已开始的形势下召开的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又明确指出德意日结盟的侵略性，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祸水东引”，怂恿德国发动侵苏战争的危险性，并强调苏联必须从各方面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1941 年 6 月 13 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鉴于战争已迫在眉睫，曾要求下令边境军区部队进入战争准备，并根据掩护计划展开第一梯队。但是，斯大林对战争的突发性、急迫性估计不足，唯恐敌人借故挑衅，没有立即下达命令。直到 6 月 21 日深夜，当大量的情报和事实业已确证德军将于翌日凌晨发动进攻时，斯大林才指示铁木辛哥下令各边境军区所有部队立即进入战争准备，隐蔽占领国境筑垒地区。但是，这已为时太晚。苏军大部分部队还未接到命令，德军的炮火准备却已经开始了。

1941 年 6 月 22 日 4 时 30 分，法西斯德国未经宣战就以突袭方式向苏联

展开了全线进攻。5时30分，当大批德军已进入苏联国境后，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才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递交了一份照会，其中充满了陈腐的谎言和捏造。照会说，德国信守德苏协定，而苏联一再破坏它，对德国进行了“破坏、恐怖和间谍活动”。苏联“反对德国在欧洲建立稳定的秩序的努力”。它同英国一起阴谋“进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德军”。由于集中“现有的全部俄国部队于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一条漫长的战线上”，它“威胁了”德国的安全。因此，“元首命令德国的武装部队用他们所拥有的全部力量对付这个威胁”。接着，意大利、匈牙利、芬兰追随希特勒德国，也相继发出照会，对苏联宣战。就这样，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法西斯匪徒向苏联发起大规模进攻。希特勒妄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在六个星期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打垮苏联，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战争。希特勒吹牛皮说：“我们只要在门上踢一脚，整个破房子就会倒下来。”

战争一爆发，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就号召全体苏联人民起来进行伟大的卫国战争，并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以及有莫洛托夫、朱可夫等参加的最高统帅部，动员一切力量，来打击敌人，争取胜利。

就在6月22日，战争爆发的当天，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发表了广播演说，号召全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勇敢投入战斗，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莫洛托夫说：

“强迫我们进行这场战争的是奴役法国人、捷克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挪威人、比利时人，丹麦人、荷兰人、希腊人和其他各国人民的嗜血成性的德国法西斯执政者。

“苏联政府现在表明它的不可动摇的信念说：我们英勇的陆军和海军以及苏维埃空军的大无畏的神鹰们，一定能光荣地履行他们对祖国、对苏维埃人民所应尽的天职，一定能给予侵略者以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的人民不得不同傲慢自大、胆敢来犯的敌人交锋，这并不是第一次。当年我们人民就曾发动卫国战争来回答拿破仑的‘远征’俄罗斯，而使拿破仑吃了败仗，落得败亡的下场。狂妄自大竟敢向我们国家发动新的‘远征’的希特勒，也必将落得同样的下场。红军和我们全体人民，必将为祖国、为荣誉、为自由而再进行一次胜利的卫国战争。

“苏联政府现在表明它的坚定的信念时说：我们全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全体男女公民，必将对自己的义务、对自己的劳动采取应有的自觉态度。我们全体人民如今必须做到大家空前的团结一致。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求自己并且也要求别人遵守纪律，服从组织，表现自我牺牲精神，而不愧做个真正的苏维埃爱国者，努力保证供应红军、红海军和空军所需要的一切，以便保证战胜敌人。

“政府现在号召你们，苏联的男女公民们，要把你们的队伍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我们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周围，团结在苏维埃政府的周围，团结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周围。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必然要失败。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苏德战争的爆发，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注意。6月22日晚9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声明，支援苏联对德作战。他说：“任何对纳粹帝国作战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翌日，美国代理国务卿威尔斯代表总统罗斯福发表了美国

支持苏联的声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纷纷发表声明，动员全世界各国人民支援苏联的反法西斯斗争。6月23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发出指示，号召组织广泛的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支援苏联抵抗法西斯的神圣战争，并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实际行动来援助苏联。毛泽东指出，苏德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与社会主义反侵略力量之间的殊死搏斗，是两个敌对社会体系不可调和的斗争，苏联的参战大大加强了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使全世界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迅速形成，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为保卫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由而顽强战斗。

希特勒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开始这场战争的。法西斯军队首先以大量的航空兵对苏联西部的重要城市、交通枢纽、军事基地以及正在向国境线开赴的军队进行猛烈轰炸，并在苏军防御纵深地区内空降伞兵，夺占要地，同时以数千门大炮对苏军的边防哨所、防御工事、通讯枢纽和部队集结地域实施猛烈轰击，然后以优势的坦克和摩托化兵团为先导，从波罗的海至喀尔巴阡山宽约1500公里的地面上，发起全线进攻。苏联西部的66个机场遭到猛烈的轰炸。苏军半天之内就损失飞机1200架，其中800架未及起飞迎战，即被毁于机场。许多重要的城市、通讯设施、交通枢纽和海空军基地，在德国航空兵和特务分子袭击下，遭受严重破坏。边境军区指挥机构基本上陷于瘫痪，部队出现了混乱。边防值班部队虽也进行了抵抗，但因得不到及时增援，防线迅速被突破。战争第一天，德军就前进了50~60公里。

苏联在战争初期，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但是在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的坚强领导下，及时吸取了失利的教训，决心动员一切力量粉碎德国法西斯妄图以一次快速的“闪电战”击溃苏联的迷梦。正是：欧洲战火连成片，苏联参战性质变；估计不足初受挫，军民同仇齐动员。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七章 严酷的考验

百万德军气势凶，最高统帅急调兵；
苏联军民齐奋战，严酷考验识英雄。

1941年6月21日之夜，是个难忘的不眠之夜，苏联总参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奉命留在工作岗位上。他们通宵达旦地传达最高统帅的命令，收听前线司令员们发来的特急电报，所有的来电都报告敌军正在进行空袭，要求下达命令。

22日凌晨3时零7分，黑海舰队司令奥克佳布里斯基海军上将，通过高频电话首先报告：“据舰队情报部门报告，大量来历不明的飞机正向我岸接近；舰队已作好充分战斗准备。请予指示。”3时30分，西部军区参谋长克利莫夫基赫将军报告，德国飞机空袭白俄罗斯的城市。3分钟以后，基辅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将军报告，乌克兰的城市遭到空袭。3时40分，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司令库兹涅佐夫将军报告，敌机空袭考那斯和其他城市。这些电报都送到斯大林那里，经过研究，决定“猛烈还击，并坚决歼灭进犯之敌！”

凌晨4时30分，联共中央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集合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斯大林站在桌子旁边，神态严肃，脸色苍白，手里握着没有点燃的烟斗。显然他很震惊。这是他一生中受刺激最大的时刻之一。他已经尽了一切可能来推迟这场战争——至少推迟到第二年春天。他以为取得了成功，但是他失败了。武器正开始源源不断地从国防工业输送给武装部队，紧张的训练正使部队的纪律和效率日益提高。他常对别人说：“再有6个月的时间，我们的情况就个大相同！”

现在，斯大林知道自己对战争爆发时间的估计犯了一个灾难性的大错误。他曾同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将领商讨过他的决定，他们都赞成他的观点。但是，他们都为他所左右，意识到他的过人智力和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现在认识到这完全是他的责任。

他错误地判断了希特勒的意图，他被这个盗世好雄欺骗了。社会主义苏联正面临一场浩劫的威胁，这场浩劫可能会严重影响到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及其一切成就。

在6月22日凌晨会议上，斯大林经过一番沉思和政治局委员们商讨之后，授权发出第二号命令，号召各军区向入侵者进攻。事后证明这个命令是不切实际的。红军正混乱地退却，通信联系中断，莫斯科失去了同普里皮亚特河以北的部队和其他军区的联系。正如朱可夫在回忆中所写的：“6月22日拂晓，所有西部边境军区同部队的有线通信都遭到了破坏，各军区和各集团军司令部无法迅速传达命令。德国人预先投撒在我国领土上的破坏小组，在多处破坏有线通信，杀害联络人员，袭击我军指挥人员。至于无线通信，边境军区的大部分还没有这种装备。因此，通信联络就成为当时最紧迫的问题。”

6月22日晨八时，总参谋部查明了以下情况：

——德国轰炸机猛烈袭击了西部、基辅和波罗的海沿岸3个特别军区的许多机场，首先是来不及起飞和分散在各个野战机场的飞机受到了严重损失；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许多城市和铁路枢纽，以及塞瓦斯托波尔和波罗的海沿岸的海军基地，遭到了轰炸；

——在苏联西部边境全线，同德国地面部队展开了激烈战斗。在许多地段，德军已开始同红军先头部队交战；

——担任掩护的第一梯队各步兵部队，接到战斗警报后，来不及占领预先构筑的阵地，从行进间加入战斗；

——列宁格勒军区管辖地段暂时是平静的，敌人毫无动作。

鉴于上述情况，斯大林手里拿着未吸完的烟斗，默默地在办公室踱来踱去。大约在6月22日下午一时，斯大林打电话对总参谋长朱可夫说：“我们各个方面军司令员；缺乏足够的作战指挥经验，看来有点发慌。政治局决定派你到西南方面军担任统帅部代表。还准备派沙波什尼科夫和库利克去西方方面军。他二人已到我这里接受指示。你必须马上飞往基辅，会同赫鲁晓夫到设在捷尔诺波尔的方面军司令部去。”

“在目前这样复杂的情况下，由谁来领导总参谋部呢？”

“把瓦杜了留下吧，让”他来代替你的工作。”

然后，斯大林稍带点怒气地补充说：“请你抓紧时间。我们这里好歹可以对付！”

朱可夫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不要等他，就立即飞往基辅，赫鲁晓夫在那里同他会合，然后乘车前往捷尔诺波尔，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的指挥所就设在那里。从战争的第一天起，斯大林就已经按照列宁在内战时期的做法，派自己信赖的得力代表到关键地区去。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为了同前线保持直接的联系，帮助那些经验不足的指挥员，同时也是为了显示他的存在，说明在艰难的时刻，领袖和他们战斗在一起。

统帅部的代表抵达前线后，首先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和问候，这使红军指战员们受到很大的鼓舞。接着迅速整顿部队，把被敌人的进攻打得七零八落的部队收拢在一起，转入积极的防御，并不失时机地对敌人进行反突击。

6月23日，朱可夫作为统帅部的代表，来到机械化第八军军长里亚贝舍夫中将的指挥所。从这位军长及其参谋人员的外表就不难看出，他们是经过了艰难的跋涉的。部队很快从德罗戈贝奇地区到达布罗德地区，情绪高涨。看到里亚贝舍夫及其参谋人员，使朱可夫想起了光荣的坦克第十一旅和它的勇敢旅长雅科夫列夫，想起了这个旅的战士们1939年在哈勒欣河巴彦察干山英勇地粉碎敌人的情形。他想：“这些人将来和现在打起仗来不会比他们差，要紧的是，反突击不要发动得过晚。”

里亚贝舍夫在图上指明了他的第八军的位置和部署方法，扼要地向这位总参谋长报告了部队的状况。他说：“我们军需要一昼夜的时间，用来进行全部集中、维修武器和补充储备品。同时，还要在这段时间内进行战斗侦察，组织指挥。因此，我们军要到6月24日晨才能全部投入战斗。”这时军参谋长和参谋人员走进帐篷。他们刚想自我介绍，就立即传来一阵德国俯冲轰炸机特有的尖叫声和随之而来的炸弹爆炸声。朱可夫看了看里亚贝舍夫和在场的军官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在全神贯注地工作着，就像在野外演习时一样。

6月24日，里亚贝舍夫指挥的机械化第八军，在别列斯捷奇科方向转入进攻。这个军训练有素，而且装备有最新式的坦克，大家对它寄予很大希望。与此同时，卡尔佩佐将军指挥的机械化第十五军，也在拉杰霍夫以东展开进攻。这两个军给予德军的打击，特别是机械化第八军的顺利行动，很快引起了敌人的重视。特别是当负责掩护克莱斯特集群第四十八摩托化军右翼的敌步兵第五十六师被歼之后，尤其是这样。

德军第四十八摩托化军，这天陷入了非常危急的境地，希特勒匪徒不得不用全部空军来抗击苏军的反突击，才使得这个军免遭溃灭的危险。德国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将军在这一天的工作日记中写下了下面一段话：“敌人不断地从纵深增调生力军来对付我们的坦克楔子……不出所料，敌人以大量坦克兵力在第…“坦克集群的南翼转入进攻。”

6月25日至26日，战斗行动不断扩大。德军投入了大量作战飞机。空中和地面都展开了残酷的战斗。双方损失严重。德国航空兵往往抵挡不住苏联飞行员的勇敢攻击，逃回自己的机场。由于德军先头部队到达杜布诺地区，里亚贝舍夫将军奉命率第八军转向这里。苏联机械化第五军的主力，然后也指向杜布诺。正在向杜布诺前进的还有步兵第三十六军和机械化第十九军。杜布诺地区6月27日起开始了残酷的战斗。

但是，苏联西方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的局势仍在继续恶化。至今，司令部仍没有同各集团军司令员建立稳定的通信联系。各师和各军不得不彼此孤立地同敌人作战，缺乏同友邻部队、同航空兵的协同动作，缺乏上级的有力领导。对此，斯大林焦急不安，认为一切都怨西方方面军首长和司令部，责怪库利克元帅毫无作为。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从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报告说，库利克6月23日在第三集团军司令部，但同他的联络中断了。过了一些时间以后，总参谋部依靠各种来源的情报，终于查明，德军大量装甲坦克部队和摩托化部队，已在这两个方面军的许多地段上完成了突破，并在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迅速推进。面对如此严重情况，斯大林命令组成预备方面军，并在苏谢沃、涅韦利、维捷布斯克、莫吉廖夫、切尔尼戈夫、杰斯纳河、第聂伯河一线展开。预备队方面军编有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集团军、以便加强纵深的防御。

6月26日，德国第三十九摩托化军抵近明斯克筑垒地域，同苏联派往这里的尤什维克将军指挥的步兵第四十四军发生冲突。唇来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所属的第四十六摩托化军抵达明斯克西南接近地时，苏联守军的态势便急剧恶化。纳粹空军对明斯克进行狂轰滥炸，城市一片火海。有成千上万的和平居民被炸死。

在明斯克近郊进行着顽强的战斗。苏步兵第六十四师、第一百师和第一百六十一师打得尤其出色。他们击毁了敌人100多辆坦克和歼灭了几千名法西斯匪徒。但是，由于敌众我寡，方面军统帅指挥不力，形势仍十分险峻。

6月26日，斯大林给在捷尔诺波尔的朱可夫打电话，要他立即回来，研究西线战局。他说：“西方方面军形势严重。敌人逼近了明斯克。我不明白巴甫洛夫是怎么啦。库利克元帅不知道在哪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生病了。你能不能马上飞回莫斯科？”

当天深夜，朱可夫飞抵莫斯科最高统帅部。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笔直地站着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和第一副总参谋长瓦杜丁中将。他们两人苍白而瘦削，眼睛由于失眠充满了血丝。斯大林的脸色也并不比他们好些。

斯大林同朱可夫点头问好以后，说：“请你一起来考虑一下，并且请你谈谈在目前情况下能够做些什么？”随手把一张西方方面军的地图放在桌上。

“我们需要40分钟，把情况研究一下，”朱可夫说。

“好吧，40分钟以后再向我报告。”

朱可夫和铁木辛哥等人走进隔壁一个房间，开始讨论西方方面军的形势

和红军的作战能力。那里的形势的确非常严重。第三集团军和第十集团军被合围于明斯克以西，进行力量悬殊的战斗。第四集团军的某些部队已退入普里皮亚特森林中。一些在前几天战斗中遭到严重损失的散乱兵团，从多克希齐—斯莫列维奇——斯卢茨克——平斯克一线向别列津纳河撤退。这支疲劳的部队，受到强大敌军集团的追击。鉴于上述情况，除建议使用第十三、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集团军，立即在西德维纳——莫济里一线占领防御以外，还应当使用统帅部预备队的第二十四和第二十八集团军，立即着手在后方地域沿谢利扎罗沃——斯摩棱斯克——戈梅利一线构筑防御。除此以外，还建议立即由莫斯科民兵师再组建2至3个集团军。所有这些建议都得到斯大林的批准，并立即发出相应的命令。

这些建议都从一个总任务出发，即在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上建立纵深梯次防御，以疲惫敌人，将其阻止在某一防御地区，然后集中必需的兵力组织反攻。但是，将敌人阻止在哪里，哪里是合适的反攻出发地区？有多少部队用于反攻？这些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底数都不太清楚。

6月27日10时零5分，总参谋长遵照斯大林的指示，通过“博多”式电报机向西方面军司令部传达了统帅部如下内容的命令：

要求司令部迅速找到所有的部队，同指挥员取得联系，向他们说明情况和敌我态势，给部队提供作战的一切必需品；查明需要给哪些部队空运油料和弹药，以免他们丢掉贵重技术兵器，特别是重坦克和重炮；将留在敌人后方的部队，指定按三个不同的方向集中。另外，提请司令部注意，敌机械化第一梯队已经脱离自己的步兵很远，这在目前是敌人的弱点，如能对敌机械化部队实行夜间进攻，必将取得重大胜利。

在贯彻执行上述命令中，虽然指战员表现了集体的英雄主义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但是西方面军所有地段的形势仍继续恶化。6月28日傍晚，红军被迫撤出明斯克。法西斯军队进城后，对城市居民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毁坏了大半个城市。

6月29日，斯大林两次来到总参谋部。他情绪低落，对西线混乱状况十分愤怒。朱可夫用电报同巴甫洛夫将军联络，但局势显然已无希望了。第二天，斯大林命令朱可夫把巴甫洛夫召回莫斯科。巴甫洛夫抵达时，朱可夫简直难以认出他来，在8天的战争中，他的变化太大了。巴甫洛夫被撤职，他与西线的其他将领一起被送到军事法庭审判，然后全都被枪毙了。

为了进一步鼓舞斗志，振奋民族精神，7月3日，也就是德国入侵后第十二天，斯大林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演讲，没有华丽的词藻。斯大林呼唤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保卫祖国的顽强的俄罗斯天性。他以朋友和领袖的姿态讲话，这讲话给了人民所期待的信念。在各地收听广播的苏联人中，特别是在武装部队中，产生了“巨大的热情和振奋了爱国之心”。后来在几个方面军发挥杰出作用的费久宁斯基将军写道：“我们一下子感到强大了许多。”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我的朋友们，我在向你们讲话！”这是他的开头语，同他通常讲话的形式截然不同，立即把听众与他团结在一起了。接着，他带着体贴人民的心情和对敌人无比愤怒的强烈感情，描述了他们所处的困境，一字一句都迸发出他自己要争取胜利的不可动摇的决心。

他说：“希特勒德国从6月22日起开始向我们祖国发动的背信弃义的军

事进攻，正在继续着。虽然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敌人的精锐师团和他们的精锐空军部队已被击溃，被埋葬在战场上，但是敌人又往前线调来了生力军，继续向前闯进。……我们的祖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针对人们思想上存在的疑问：“苏联政府怎么会同像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这样一些背信弃义的人和恶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呢？苏联政府在这方面是不是犯了错误？”斯大林解释道，苏德条约本来是为了求得和平，或者至少推迟战争，但希特勒背信弃义地破坏了协议，发动突然袭击，他虽然在短期内获得了有利的地位，可是他在政治上失败了，它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自己是血腥的侵略者。

斯大林用简明的语言使人民深切地认识到战争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敌人是残酷无情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侵占我们用自己的汗水灌溉出来的土地，掠夺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粮食和石油。他们的目的是要恢复地主政权，恢复沙皇制度，摧残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乌兹别克人、鞑靼人、莫尔达维亚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以及苏联其他各自由民族的民族文化和国家组织，把他们德意志化，把他们变成为德国公爵和贵族的奴隶。因此，这是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享受自由还是沦为奴隶的问题。”

斯大林直言不讳地告诉苏联人民，他们正在同一个疯狂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他们必须勇敢地毫不留情地打击敌人。他们必须消除后方的混乱和恐慌。接着他又强调指出，对某些地方，必须执行焦土政策。“当红军部队不得不撤退时，必须运走铁路上的全部车辆，不给敌人留下一部机车、一节车厢，不给敌人留下一公斤粮食，一公开燃料。集体农庄庄员应当把所有的牲畜赶走，把粮食交给国家机关保管，以便运到后方。凡是不能运走的一切贵重物资，其中包括有色金属、粮食和燃料等，都应该绝对销毁……在敌占区，必须建立骑兵和步兵游击队，建立破坏小组，以便同敌军斗争，以便遍地燃起游击战争的烽火，以便炸毁桥梁、道路，破坏电话和电报联络，焚毁森林、仓库和辎重。在被占领区，要造成使敌人及其所有走狗无法安身的条件，步步追击他们，消灭他们，破坏他们的一切设施。”

斯大林指出：同法西斯德国的战争是全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伟大战争。这个反法西斯压迫者的全民卫国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消除苏联面临的危险，而且还要帮助那些呻吟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枷锁下的欧洲各国人民。这将是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奴役和威胁而结成的统一战线。因此，他对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关于帮助苏联的历史性的演说和美国政府关于准备帮助苏联的宣言表示衷心的感谢。接着，他号召苏联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团结在苏联政府的周围，以忘我的精神支援红军和红海军，粉碎敌人，争取胜利。

1941年夏季，是灾难深重的时刻，苏联的党和人民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德国军队的进攻来势凶猛，似乎锐不可挡。但是，斯大林的讲话，像一声洪亮的警钟，从中可以听到列宁的一个著名号召：“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使人感到，直到法西斯侵略者被打垮，这个愤怒的呼声都不会沉寂，它将在苏联全体人民、在红军指战员中，爆发出难以估量的巨大能量。

在任何一个国家生活中的危难时期，在遭到内部或外部敌人进攻的时候，一个能反映共同努力的目的，把所有的人联合起来的号召，具有极其伟

大的意义。人民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党，党应当善于立即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明确指出他们的奋斗目标。斯大林发出了战斗号召。“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苏联全国人民都在这个口号下团结起来了。苏联各族人民，都是为着一个崇高的爱国主义目标——保卫自己的祖国——而站起来了。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使全苏联人民组成一个统一的战斗阵营，奋不顾身地投入反法西斯的卫国解放战争。

为了加强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深入扩大党在军队中的影响，根据党中央的决定，7月间改组了军队中的政治宣传机关，重新实行了政治委员制度。从战争的第五天起，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开始动员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上前线，其中有些起着政治战士的作用。他们是军队党组织的支柱。战争前夜，红军中共有共产党员56.3万，而仅在战争爆发后的头6个月内，就有110万共产党员奔赴前线。不仅红军的政治素质提高了，而且党对军队的领导也进一步加强了。据朱可夫回忆，战争头几天内就有50多名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00多名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党的边区委员会和州委员会的书记，以及一些有名望有经验的国务活动家，根据联共中央的决定被派去直接担负军事工作。党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措施，以加强战时国家生活和军队作战行动的各个方面的集中领导。

苏联政府和人民，遵照斯大林的指示，要认真地进行战争，就必须有巩固的后方，必须不间断地、充分地供给前线有训练的预备兵力、装备和给养，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开始了工业和运输的改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及农业的动员。国民经济纳入战时轨道，成千家工厂，昨天还在生产平时需要的产品，今天就转而生产弹药和技术兵器了。

希特勒占领了苏联西部最重要的经济地区，使不少军区的动员工作陷入了瘫痪，千百万苏联人和大量贵重物资遗弃在敌人后方。生铁、钢、钢材、电力等战略物资的生产急剧下降。新的工业中心受到了威胁。必须采取某种非常措施，拆下尚存的工厂，迁往东部，同那里的企业合并，然后以这部分国土为依托，猛烈打击敌人，歼灭敌人。

7月4日，也就是在斯大林发表讲话的第二天，国防委员会发布命令，要向东部地区疏散1523个工业单位，其中有许多规模庞大，包括1360多个主要军械厂。要求在1941年7月到11月被迁走，并迅速恢复生产。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甚至在40多年以后的今天，也很难想象，为了打败敌人，国家的全部生活转为战时轨道，曾使苏联人民投入多少力量，经历了多少艰难，表现了多么伟大的英雄气概！

苏联工业向东部地区转移，并立即投入生产，面临的情况是复杂的，必须使担负军工定货任务的每个工厂一直工作到战争情况不能允许时为止。企业的拆卸、装运经常在敌机轰炸下进行。成千上万满载人员和物资器材的列车，川流不息地驶向东方。从1941年7月至11月，苏联从波罗的海沿岸、乌克兰地区，转运了150多万车厢的物资设备，使数以千计的大型企业迁至乌拉尔、哈萨克斯坦、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等地区。

为了加强战备，早在战前，苏联政府就在乌拉尔、西伯利亚、扎沃尔日那等地区加速建成了一批国防工业和重工业生产基地，并在战争条件下成为苏联战时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战争爆发后，又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新建、扩建和迁移了大量的企业，保证了源源不断的战时供给，这不仅在苏联的历史上，就是在世界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他们采取了边建边生产、边迁边生

产的办法。因此，工厂还未完全建成，坦克、飞机、火炮、迫击炮、炮弹以及很多其他技术装备的军工产品就从工厂直运前线。人们全力以赴，昼夜加班生产，因此总的生产水平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不断提高。这里反映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巨大威力。难怪戈培尔 1943 年 1 月说：“看来有点神奇，从俄国广阔的荒原涌出一批又一批人群和技术装备，好像有个大厦术师能够用乌拉尔的粘土塑造任何数量的布尔什维克人员和技术装备。”朱可夫说，苏联人民在战时拆迁和恢复生产中建立的劳动功勋，就其规模及其对祖国命运所具有的意义而言，可以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最伟大的战役相媲美。

苏德战争的进展，引起了全世界各方面人士的关注。

1941 年冬季到来之前，丘吉尔和罗斯福脑子中的问题是，苏联正在奋力挽救自己免于失败和崩溃的命运，这种努力究竟能维持多久。英美军界除了少数不同意见之外，一致认为苏联的抵抗很快就会被粉碎。为了形成自己的看法，哈里·霍普金斯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于 1941 年 7 月 30 日抵达莫斯科。霍普金斯是总统最亲密的顾问，是个出色的人物。他体弱多病，但精力充沛，头脑清晰，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事业。他从斯大林的谈话中受到鼓舞，并很快与苏联领导人达成了充分的谅解。他在以后的关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正当苏联在备条战线上都灾难深重，西方各国领导人天天都在等待苏联垮台的消息的时候，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见给霍普金斯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他很快地说几句俄语欢迎我。他简短有力和彬彬有礼地握了握我的手。他热情地微笑。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没有一个不必要的动作或举止。就像是同一架各部件都配合得非常协调的机器谈话，一架有智力的机器。他所提的问题清晰、简明、直截了当……他对问题的回答从容不迫、毫不含糊……假如他永远像我所听到的那样谈话，就不会浪费一个音节。如果他想给一个粗率的答复缓和语气，他就喟然强作笑容，这是一种冷淡而又友好，严肃而又温暖的微笑。他并不向你讨好。他似乎没有怀疑。他向你担保俄国顶得住德军的猛烈攻击。他想当然地认为你也没有什么怀疑。他常常笑出声来，但笑声瞬息即逝，也许有点讥讽味道。他不作闲聊。他很有幽默感，见解深刻……

“他站在那里看着我离开，谁也不会忘记这位俄国独裁者这时的形象——严肃朴实，饱经风霜，意志坚定，穿着像镜子一样发亮的靴子，结实宽松的裤子和紧贴合身的上装。他没有佩带任何军用或民用的装饰品。他身体粗壮，就像足球教练员梦想中的一位守门员。他身高约 5 英尺半，体重约 190 磅。他的双手粗大，就像他的思想一样坚实。他的嗓音很粗，但总有所控制，抑扬顿挫恰到好处。”

斯大林就苏联的形势给霍普金斯描绘了一幅乐观的图画。他预言，莫斯科、列宁格勒各条战线，最迟将于 10 月初稳定下来。此时，他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他坚信，希特勒必败，反法西斯人民必将获得胜利。斯大林的大丈夫气概和要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给霍普金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霍普金斯的莫斯科之行，导致了美国和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协调和合作。

然而，在 1941 年 9 月初，斯大林在给丘吉尔的信中，却坦率地表达了他的深切忧虑。克里沃伊罗格和其他地方的丢失，“使苏联面临致命的危险……摆脱这一艰难困境的唯一出路，是今年在巴尔干地区或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同时要在 10 月初给苏联供应 3 万吨铝，每月至少援助 400 架飞机和 500

辆坦克（小型或中型）。”斯大林强调指出，“没有这两项援助，苏联不是被打败，就是被严重削弱，以至于长期无力在反希特勒的前线开展积极的战役来帮助盟国。”

在斯大林与丘吉尔的关系背后，潜藏着他继续对英国人的不信任。丘吉尔当然与搞绥靖主义的张伯伦大为不同，而且英国政府已放弃鼓励希特勒在东方进行战争以确保西方和平的政策。但斯大林把英国人看作是捉摸不透和不定向的人。苏联军民也认为英国政府是在保存自己的实力，让苏联人孤军作战。

在战争初期，苏联蒙受了严重的损失，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且战且退，实行战略防御，其主要目的是：

——把敌人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滞在各个防御地区内，赢得尽可能多的时间，以便从内地调集兵力和建立新的预备队，派往前方，在重要的方向上展开；

——使敌人遭到最大限度的损失，疲惫和削弱敌人，借以造成敌我之间力量的某种平衡；

——保证党和政府内迁居民和工业措施的执行，争取时间，使工业转入生产战时所需的物资；

——集中更多的兵力转入反攻，挫敌锐气，在战争过程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渐改变力量对比，夺取主动权，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条件。

自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苏军实施战略防御，至1942年11月18日，苏军在斯大林格勒胜利结束防御战役，为苏联卫国战争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苏军进行了17个月战略防御作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赢得了时间，积蓄了力量，创造了经验，为以后大量歼灭敌人，迎接战略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伟大的苏联人民，英勇奋战，经受了严酷的考验。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八章 最高统帅部

运筹决策有神功，全神贯注巧用兵；
力挽狂澜战局变，举世瞩目众英雄。

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一身兼任五职。除最高统帅外，他还保留着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同时他又是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国防人民委员。在同法西斯斗争的日日夜夜，他全神贯注于局势的发展。

整个战争期间，斯大林和他的最高统帅部一直在莫斯科，这对苏联人民在艰难条件下坚持反侵略斗争，有着巨大的鼓舞作用。7月初，鉴于敌人空袭的威胁，最高统帅部自克里姆林宫转移到基洛夫街区一家不大的院子里。那里有安全的工作场所和通信联络设施。一个月之后，作为最高统帅部工作机构的总参谋部的作战指挥人员，也迁到了离这个院子不远的地铁基洛夫车站站台工作。

1941年6月30日，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按照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时期列宁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形式，建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这一非常机关。国防委员会成了集中全部权力的有权威的国防领导机关。各人民团体、党的组织和苏维埃组织都必须执行它的一切决定和命令。为了检查决定和命令的执行情况，在各边区、各州、各军事工业人民委员部以及各主要企业和基建工程单位，国防委员会都派有代表。

国防委员会的最高统帅部会议，通常是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或他的别墅里召开的，会上讨论并决定各种最重要的问题。每次军事行动的战役计划均由党中央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共同审议，开会时并邀请负责战役保障的人民委员参加。这样就能在重大的军事行动上集中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战略领导上执行统一的方针，同时通过有组织的后方支援，把军队的战斗活动同全国的力量结合在一起。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清醒地分析了1941年6月22日以来战争失利的原因，斯大林依靠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出色地动员全国的力量奋起抗击敌寇。由于人民忘我的支援，苏联最高统帅部找到了最适合于当时情况的斗争方式和方法，终于从敌人的手中夺取了主动权。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苏军各级指挥机构，直到最高统帅部，在领导军事行动方面达到了高度完善的地步。希特勒统帅部，由于丧失了主动权，无法克服在组织和实施战役过程中所出现的困难，这就大大加速了他们的彻底失败。这也是法西斯德国总崩溃的开端。

在战争过程中，苏联党中央和苏联政府十分重视领导武装力量的问题。战争期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党中央组织部和书记处共召开了200多次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外交政策、组织和战略问题的决定，分别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人民委员会或最高统帅部负责贯彻执行。

总参谋部，作为最高统帅部的日常工作机关；它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战役和战略问题上，集中在全面深入地研究情况，集中在具体实现最高统帅部所定下的决心，并从组织上保证其贯彻执行。

为了改进对各个方面军的指挥，1941年7月10日，国防委员会建立了3个方向总指挥部，即：西北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为伏罗希洛夫元帅，军事委员为日丹诺夫，参谋长为扎哈罗夫；西方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为铁木辛

哥元帅，军事委员布尔加宁，参谋长为马兰金；西南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为布琼尼元帅，军事委员为赫鲁晓夫，参谋长为波克罗夫斯基。

国防委员会原打算通过建立方向总指挥部，来协助最高统帅部更好地指挥部队，更好地组织各方面军以及空、海军之间的协同动作。原先设想，方向军事委员会应比方面军首长更善于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来支援武装斗争。可是，方向总指挥部建立以后不到几个月，就表明它起不了这种作用。最高统帅部仍像过去一样直接领导各个方面军。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方向总司令并不掌握用于影响军事行动进程的预备兵力和物质器材。没有最高统帅部的同意，他们就不能做出任何重大决定。这样，方向总指挥部便成了一级单纯的转达机构，终于在 1942 年撤销了。

为了加强对方面军的领导，最高统帅部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战略领导制度，即向最重要的地段派出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制度。担任最高统帅部代表的都是最有军事素养的军事首长。他们对情况了如指掌，而且通常都直接参与制定当前战役的重大计划。最高统帅部始终要求自己的代表对战役实施领导，要求他们对战役的实施情况负起全部责任，并且为此授给他们以全权。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充当统帅部的代表呢？首先是最高统帅部的成员，其中包括伏罗希洛夫、朱可夫和铁木辛哥。最高统帅部在部队的常驻代表则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

除了负责直接在现场贯彻最高统帅部某个战役的决心的全权代表之外，最高统帅部还派出过军兵种代表。他们到部队去的任务，是帮助部队领导人和最高统帅部主要代表组织不同兵种作战。

战争期间，朱可夫曾以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身份去作战部队工作不下于 15 次。哪里有困难，斯大林就派朱可夫到那里去。他成了解决问题的能手。这除了他的卓越的指挥才能外，还由于他具有副最高统帅的地位。他能够开诚布公地和斯大林交换意见，斯大林也非常尊重他的才能。朱可夫不仅善于解决战场上的问题，而且还善于说服最高统帅改变他在暴怒之下所做出的不适当的决定。

1941 年 7 月 16 日，斯摩棱斯克几乎全部被敌军占领。第十六和第二十集团军在城市的北部陷入包围，但是他们没有缴械，仍继续抵抗 10 天之久，从而阻止了德军在莫斯科方向的进攻。在斯摩棱斯克会战过程中，红军部队、城市及其郊区的居民，表现了无与伦比的英勇顽强。每一所房屋，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居民点，都经过残酷的争夺战。敌人在斯摩棱斯克地区的进攻被制止了，由于这一胜利，苏军赢得了准备战略预备队和莫斯科方向采取防御措施所需的时间。1941 年 7 月 14 日在这里的奥尔沙战斗中，弗廖罗夫大尉指挥的炮兵连第一次使用了“喀秋莎”火箭炮。

西方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元帅，在战争最初那几个月的艰难日子里，做了大量工作，坚定地领导着部队，动员所有力量防御并抗击敌人进攻。希特勒的军事指挥机关和军队本身，对于苏军士兵的英勇无畏和集体英雄主义都感到信服。现在他们懂得：战争愈向苏联腹地推进，他们的困难就愈大。据德国将军承认，德军在斯摩棱斯克会战中，损失官兵 25 万人。

然而，国防委员会，特别是斯大林本人，以沉重的心情得知斯摩棱斯克的丧失。他怒不可遏。他把怒气都发泄在前方指挥员身上。7 月底，他命令铁木辛哥立即回莫斯科见他。当这位前线司令员走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几乎全部政治局委员都坐在那里。斯大林穿着一件旧上衣，站在屋子中央，手

里拿着已经熄灭的烟斗，这是他心情不好的可靠征候。

“是这样的，”斯大林说，“政治局讨论了铁木辛哥担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的工作，决定解除他的职务。有人提议由朱可夫担任这一职务。你们有什么意见？”斯大林朝向朱可夫和铁木辛哥询问。铁木辛哥默不作声。

“斯大林同志，”朱可夫说，“我认为更换方面军司令员会严重影响到战役的进程。司令员还没有来得及熟悉情况，就不得不指挥困难的战役。铁木辛哥元帅指挥方面军还不到4个星期。在斯摩棱斯克会战过程中他熟悉了部队，了解他们的能力。他做了处在他的地位所能做的一切，使敌人被阻止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将近1个月。我想，任何别人也无法做更多的事。部队信任铁木辛哥，而这是主要的一条。我认为，现在解除他的方面军指挥职务是不公正的，也是不适当的。”

加里宁插话说：“是的，朱可夫说得对呀。”

斯大林缓慢地吸着烟斗，看了看其他的政治局委员，然后说：“也许，我们可以同意朱可夫的意见。”就这样，斯大林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又把铁木辛哥派回西方战线。

华西列夫斯基，也同样多次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代表，被派往各个方面军。他和朱可夫不只一次地一同出发，去作战地区参加像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会战、进攻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和解放白俄罗斯等大规模战役的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凡是同华西列夫斯基一起工作过的人，总要谈到他渊博的知识和精确而清晰的思维能力。

华西列夫斯基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具有组织第一批红军正规部队的经验，参加了国内战争。当国内的反革命被粉碎，外国干涉者从苏联国土上被赶走，他指挥一个团达7年之久。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刻苦学习并显示出他是一个见识广阔、深思熟虑和有主动精神的指挥员。1936年，华西列夫斯基被送进总参军事学院深造。在这里他研究战役问题的知识能力增强了，军事素养加深了。1939年后他开始在总参作战部工作，成了统帅部拟定最重要计划的领导人。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后，华西列夫斯基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他直接参加了拟定抗击敌人突击和在通往莫斯科的接近道路上粉碎法西斯德军的战役计划工作。

从战争最初的几个月起，华西列夫斯基就与斯大林有密切接触。最高统帅绝不容许那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回答，他经常要求工作人员亲自到现场了解情况。华西列夫斯基不只一次地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作战部队工作。但是，他每次都准时圆满地完成任务。他给最高统帅部的每一个报告，都是非常全面而又极其明确的。最高统帅很赏识他的这些素质，所以，当需要深入分析某个问题、制定某种可靠的决定、提出某项完善的建议时，斯大林常常把他派到前线去。同时，华西列夫斯基很善于在最高统帅的面前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这方面，他既灵活，又很坚定。

原任外高加索方面军参谋长，后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和副总长的安东诺夫将军，也是最高统帅部中斯大林最宠爱的将领之一。安东诺夫具有很高的军事理论水平，卓越的组织能力，清醒的头脑，坚毅的精神，并具有突出的军事才干。在华西列夫斯基外出期间，他一直承担着总参谋长的重任。安东诺夫是一个辛勤工作而又精通参谋业务的人，所以他能把领导几百万大军的军事行动的一切线索，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由于他知识渊博，当时又年轻力壮，所以他把一切工作都处理得很完善。安东诺夫在最高统帅的心目中，

享有很高的威信。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在呈送报告给最高统帅时，都必须抄送一份给“安东诺夫同志”。其所以如此，他敢于直言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的报告始终如实反映情况，无论听起来多么令人不愉快。必要时，安东诺夫也敢于反对斯大林的意见。

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等人，从外表看很不一样，但他们有许多共同点：坚毅、勇敢、精明能干。他们是伟大卫国战争年代苏联最高统帅部的真正代表。他们对战胜法西斯强盗做出了巨大贡献。

最高统帅部是一个对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实行集体领导的机构。委员制和单一首长制的合理结合，构成了最高统帅部的工作基础。最后决定权在一切情况下均属于最高统帅。各次战略性战役和战局的意图和计划，通常是在最高统帅部工作机构的总参谋部准备，并有最高统帅部的有关成员参加。在此之前，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需要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研究参战国家潜在的政治力量和军事能力。只是在对所有共同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之后，人们才做出有关的政治和军事判断。最高统帅部所遵循的策略和战略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复杂工作产生出来的。

每当准备一次新战役时，斯大林总是把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叫到身边，同他们一起仔细地研究整个苏德战线的战役、战略情况，其中包括各方面军的状况，各种情报资料以及各兵种预备队的准备情况。然后，斯大林又把红军总后勤部长、各兵种司令和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保障当前战役的各个主要首长，叫到最高统帅部来进行研究讨论，最后再由总参谋部协同方面军根据最高统帅的意图，制定实施战役的计划。最高统帅部的活动，是与斯大林的名字分不开的。凡是由他安排的工作，他总是要求最高统帅部和国防委员会这两个高级机关作出的决定马上得到贯彻执行，决定执行情况则由他本人亲自认真检查，或由他指定另一些领导干部或机关检查。他对重要问题一丝不苟，对下级要求也特别严格。

斯大林对各方面军的情况掌握得十分清楚，一有变化马上就能作出反应。它通过总参谋部细心地注视着战役进程，不断对部队的行动作出必要的改变，并根据新出现的情况给部队提出新的任务。最高统帅规定了一套严格的制度。要求总参谋部每昼夜向他呈报两次标有各方面军情况变化的地图，图上并附有总参谋长的简短说明。

作战部与最高统帅之间架设了一条专用电话线。在这之前，斯大林是通过总机给作战部打电话的。有一次，因为占线，他未能立即打通。过了几分钟以后，作战部长受到批评并接到命令：“通知有关人员，架设一条专线。”这样又给他们安装了一部电话机，听筒上带有10米长的电线，这对于参谋人员看着地图汇报情况是非常方便的。

每天上午10时至11时，偶尔也稍迟一点，斯大林亲自打来电话。有时先问好，但经常是直截了当地询问：“有什么新闻？”

作战部长于是开始汇报情况，听筒贴着耳朵，从一个桌子转到另一个桌子。通常从战斗行动最激烈的那个方面军谈起，从战斗最激烈的地段谈起。情况依次汇报，每个方面军的情况分别汇报，形式不拘。如苏军行动顺利，汇报通常不会被打断。在电话中只偶尔听到几声咳嗽声和吸烟斗时巴啞嘴唇的声音。

据长期在总参谋部工作的什捷缅科将军回忆，在汇报中斯大林不允许漏掉任何一个集团军，即使昨晚在该集团军地带内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情况，

也不允许漏掉。如果漏掉了，他会立刻打断汇报，问道：“卡扎科夫集团军的情况怎么样？”

最高统帅从不容忍哪怕是微小的撒谎或文过饰非的现象，对于犯有这类过失的人他严厉惩罚。一次，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参谋长，由于没有如实报告敌人夺去一个重要的居民点而被撤职。

晚上，照例是由总参谋长带着标好的地图向最高统帅当面汇报。一接到电话通知，总参谋长即乘车沿着人烟稀少的莫斯科街道进入克里姆林宫，绕过最高苏维埃大厦，通过伊万诺夫广场，转入斯大林的宿舍和办公室所在地的所谓“小角落”。斯大林的办公室是一间宽敞而又光线充足的房子，四壁镶有染色的柞木板。室内陈放着一张覆盖着绿色呢绒的长桌。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像。战争期间，还增挂了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像。再就是几张黄色的椅子。此外，就没有任何多余的陈设了。隔壁的一间房子里放着一个大地球仪，旁边有一张桌子，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世界地图。在办公室最里边靠着关闭着的窗子旁边放着斯大林的写字台。上面经常堆满文件、纸张和地图。这里还放着载彼电话机和克里姆林宫的内部电话机，以及一筒削尖的各色铅笔。斯大林通常用蓝色铅笔写字，字写得很快。一般紧迫的重要文件，都由他口授或由他亲手起草。他不习惯任何事情都让秘书代劳。

听取汇报的，除最高统帅外，通常还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最高统帅部的成员。重大战役情况的汇报，还有各兵种的负责人参加。总参的工作人员和最高统帅部代表常常把地图摊在那张大桌上，站着向最高统帅汇报各方面的情况，偶尔看看笔记。斯大林通常是一面听着，一面在办公室里缓慢地来回走着。他不时地走近那张大桌子，弯下身子，凝视着打开的地图。有时，他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拿起“黑塞哥维那弗洛尔”牌的烟盒，抽出几支香烟，捏得粉碎，然后把烟丝慢慢地装进烟斗。

斯大林乐于听取那些有真知的见的报告。他自己讲话不多，也不爱别人多讲。他经常用“讲短点！”“讲清楚点！”一类的插话打断对方的发言。他主持开会时，从不讲开场白一类的话。他的发言声音轻，口齿好，能抓住问题实质，言简意赅，表达思想清晰。最高统帅对报告和文件中的弱点特别敏感。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对讲过的东西记得很牢，他不放过机会严厉申斥那些丢三落四的人。因此，总参谋部汇报前或拟订作战文件时，总要对事实反复进行核对，并根据战时条件认真思考，力求做得准确无误。

斯大林身材不高，外貌平常，但谈起话来却给人以深刻印象。斯大林那种无拘无束的谈吐，明确表达思维的能力，善于分析的头脑，渊博的学识，使得甚至一些有经验的知名人物同他谈起话来也要集中精力、全神贯注。斯大林广泛联系群众，他几乎熟悉苏军中的所有高级将领和军工厂的所有专家。朱可夫元帅说：“经常有人问我，斯大林究竟是不是军队建设方面的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和通晓战略战役问题的军事家？我可以肯定他说，斯大林通晓组织方面军和方面军群战役的基本原则，并且熟练地指挥了这类战役。他精通重大的战略问题。最高统帅斯大林这方面的才能，从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表现尤为突出。”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最高统帅是凭地球仪来研究情况和下定决心的，这与事实不符。”朱可夫强调指出，“斯大林在领导整个武装斗争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赋的智慧、政治领导经验、巨大的洞察力和渊博的知识。他善于从战略情况中找出主要环节，并抓住这个环节，采取对策，组织相应的进

攻战役。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

“斯大林的功绩就在于他迅速而正确地采纳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以充实和提高，然后以概括的形式——守则、指令、教令——立即推广到部队中去，指导实践。”朱可夫说，“此外，在战役保障方面，在建立战略预备队方面，在组织兵器生产方面，总之在前线提供一切必需品方面，我坦率地说，最高统帅表现出是一位杰出的组织家。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那是不正确的。”

斯大林在战胜法西斯德国及其同盟者的事业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领袖，作为统帅，他以卓越的才能和魄力，迅速扭转了战争初期由于估计失误所造成的混乱局面。苏联各族人民认定斯大林是他们英勇气概、爱国热情和必胜信念的化身。“为斯大林而战！为祖国而战！”——苏联红军高呼着这一口号歼灭了穷凶极恶的法西斯强盗，赢得了光辉的胜利。为了表彰斯大林在反法西斯的伟大卫国战争中的伟大功绩，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授予斯大林“苏联大元帅”的光荣称号。

欲知斯大林在战争初期的最困难阶段，如何进行战略防御，请看下文分解。

第十九章 战略防御

战略防御敌进攻，“元首”吹牛成泡影；
被动局面得扭转，德军损失敌酋惊。

战争进入第二个月，希特勒所谓要在6周内消灭苏联红军、夺取莫斯科和进抵伏尔加的叫嚣，化成了泡影。但是，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希特勒仍狂妄地宣称：“俄国快要完蛋了。”他对约德尔将军说：“我们只要在门上踢一脚，整个破房子就会倒下来。”

在卫国战争初期，德国法西斯在军事上占优势，处于战略进攻的主动地位。在战争开始后的头3个星期中，德国北方集团军群向前推进了450到500公里，南方集团军群向前推进300到350公里，中央集团军群向前推进了450到600公里。在德军强大的攻势下，苏军被迫向内地退却。到7月中旬，敌人占领了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一部分、第聂伯河以西的乌克兰地区，突入俄罗斯联邦西部地区，进抵通往列宁格勒的要冲，威胁斯摩棱斯克和基辅。在这一时期苏军的损失是：

28个师被击溃，70个师的人员和武器损失一半。此外，还有200个燃料、武器和弹药库沦入敌手。结果，苏德战场上的力量对比更加有利于德方。希特勒为此得意忘形。

10月3日那一天，他由前线回到柏林发表讲话说：“东方的敌人已被打垮，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在我们部队的后边，已经有了相当于我在1933年执政时德意志国家幅员两倍的土地。”

在德军处于暂时优势的情况下，斯大林提出了战略防御的方针。这一方针的主要精神，就是要进行积极防御，把坚定顽强的抵抗和对敌人的反击紧密结合起来。斯大林指出，战略防御方针的目的，就是要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不断削弱和消灭德军的暂时优势，争取时间，从内地调集兵力和建立新的预备队，为红军夺取主动和转入反攻准备条件。

根据斯大林提出的战略防御方针，苏联红军进行了一系列英勇顽强的防御战，同时还广泛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7月10日，德中央集团军群的先头部队到达斯摩棱斯克。德军的意图是，以强大的突击兵团分割铁木辛哥元帅指挥的西方方面军，将其主要部分合围于斯摩棱斯克地区，然后长驱直入莫斯科。苏联最高统帅部命令，一定要阻止德国坦克前进，在重组兵力时，坚决将敌军顶住。斯摩棱斯克是进攻莫斯科的咽喉要地，距莫斯科只有370公里，要保卫莫斯科，必须在这里阻截德军。

然而，从这次战役一开始，苏军处境就很不利。苏联西方方面军在第一线只布置了24个师。由于兵力武器不足，苏军未能建立纵深梯次配置。部队的防御实际上只建立了第一线配置。敌中央集团军群出动了第二、第三坦克集团军，第二、第九集团军，共29个师。在兵力、大炮和飞机数量上，德军比苏军约多1倍，坦克多3倍。

斯摩棱斯克战役是在极其宽广的地区展开的。从北面的伊德里察、大卢基，到南面的洛耶夫、诺夫哥罗德—塞维尔斯克，南北约600公里。西面从波洛次克、维帖布斯克，到东面的雅尔采夫、耶尔尼亚，纵深200多公里。战役初期，德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纳粹第三坦克集团军前进了150公里，占领了斯摩棱斯克西北的5个城市，从西北面紧紧围住了苏军第十六、第十九和第二十集团军的阵地。在西南部，德国第二坦克集团军前进了200公里，

占领了斯摩棱斯克西南的 4 座城市。战斗非常激烈。

在斯摩棱斯克市区，苏军守卫部队奉命实行“总体防御”。全城青壮年组成民兵，准备随时增援守城部队。当德寇于 7 月 16 日打进斯摩棱斯克时，当地军民奋不顾身，同德寇浴血奋战。最后展开巷战。苏联军民用刺刀、手榴弹保卫城市的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幢房屋。但由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太大，7 月 16 日夜，德军坦克部队终于占领了斯摩棱斯克。

斯摩棱斯克失守以后，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指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组织反攻。为此，最高统帅部从预备队中调拨出 20 个师给铁木辛哥指挥，以加强西方方面军。7 月 23 日至 25 日，苏军从别累伊——亚尔策沃——罗斯拉夫里向斯摩棱斯克实行反击。这时，被围困在斯摩棱斯克地区的苏军第十六和第二十集团军的大部也发动攻势，突出重围，与西方方面军的主力会合了。苏军这次反击虽未能消灭进犯斯摩棱斯克的德寇，但却有力地牵制并严重地削弱了德军，使德军遭受到很大的损失。到 7 月底，德军步兵损失 20%，坦克损失 50%，因而不得不转入防御。

8 月初，希特勒窜到前线，敌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包克向他汇报说，部队损失很大，特别是坦克。8 月 6 日，希特勒又窜到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司令龙德施泰特要求增援。希特勒看到中央集团军已占领斯摩棱斯克及其南北广大地区，而南方集团军群遇到了苏军强大兵团的反击，还停留在第聂伯河的西岸，基辅仍未攻克。因此，他命令中央集团军群的第二坦克集团军和第二野战集团军南下，插入苏联方面军后方，从第聂伯河东岸包抄苏军，攻下基辅。另外再抽调一个坦克军，支援北方集团军群。希特勒的战略意图是，在北方占领爱沙尼亚，消除苏联在波罗的海沿岸的空军基地，攻下列宁格勒，以便同芬兰军队会师；在南方，占领乌克兰粮仓、顿巴斯煤矿，消除苏军在黑海沿岸的空军基地，确保罗马尼亚油田的安全。此外，还有一个更加险恶的用心，就是迅速突入高加索油田区，断绝苏联的石油来源。

9 月 10 日，苏联在斯摩棱斯克一线的三个方面军同时转入防御，持续两个月之久的斯摩棱斯克战役到此暂时告一段落。据德国法西斯统帅部供认，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德军损失 25 万人。这次战役牵制德军达 60 天之久，使苏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保卫莫斯科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在苏德战场的南翼是广阔的乌克兰战线。在这条战线上，以攻、守乌克兰古都基辅为中心，德国法西斯及其仆从国的侵略军，同苏联军队展开了持续、激烈的战斗。从 1941 年 7 月上旬开始，到 9 月 19 日基辅陷落为止，历时两个半月。

在南北约 1000 公里、东西纵深约五六百公里的广阔战线上，苏联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总共有 86 个师。但在艰苦的防御战中，苏军已严重削弱，人员、武器都深感不足。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包括第一坦克集团军，三个野战集团军，另外还有罗马尼亚两个集团军、一个匈牙利军和一个斯洛伐克军。从 7 月 20 日起，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也直接参战，所以敌军总数共达 82 个师。人数比苏军几乎多一倍。

德军在南线发动进攻之后，乌克兰党组织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向全体军民发出号召，号召他们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当地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下，20 万基辅居民参加构筑防御工事，7 万多人参加了民兵，3 万共产党员

参军上前线。德军在南线的主攻方向是基辅，这一线的全部主力都投到基辅方面。7月11日，德国第六集团军的先头部队进入基辅地区。7月下半月和8月上半月，德、苏双方为攻、守基辅展开了持续、激烈的战斗。苏军在战略防御的原则下，顽强死守，同时伺机实行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千方百计地顶住德军的进攻。苏军英勇奋战，把敌人拖得疲惫不堪，使他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7月30日，德军用5个师进攻基辅，但被苏军击退了。8月6日，德军又对基辅发动大规模的攻势，经过12天的鹰战，德军才勉强前进8至10公里，但仍未能攻入基辅。

德军强攻基辅不成，便一方面改变战术，在基辅外围包抄和歼灭苏军，另一方面请求增援。经希特勒批准，德中央集团军群的第二坦克集团军和第二野战集团军南下乌克兰，包抄和进击苏西南方面军的后方。在基辅南面，德第一坦克集团军也从别拉雅——策尔科维迅猛南下，8月2日，进抵别尔沃马伊斯克，切断了苏军第六和第十二集团军的退路。与此同时，德第十七集团军又从文尼察南边向乌曼进攻，把苏军这两个军包围在乌曼的南边。被围苏军拼命杀敌，到8月13日，许多指战员壮烈牺牲，不少人被俘。

8月底，德第六集团军同苏联第五集团军在基辅以北展开激战。苏军且战且退。德寇紧追，并渡过第聂伯河，突入杰斯纳河地区，在切尔尼哥夫地区同南下的德第二集团军会师，把苏军第五、第二十一和第三十七集团军围困在切尔尼哥夫、基辅和涅仁的三角地带。9月12日，德第一坦克集团军从克列明楚格北上，迎接南下的德第二坦克集团军。9月15日，这两股法西斯坦克部队在基辅以东的洛赫维察会师，把苏联西南方面军的4个集团军包围起来。9月19日，基辅陷落，苏军蒙受了严重损失。据西方史学家记载，德国南方集团军群，抓到了65.5万名苏军俘虏。一再坚持死守基辅的赫鲁晓夫，险些作了德国法西斯的刀下鬼。

据朱可夫元帅回忆，关于基辅战役的决策问题，在苏联最高统帅部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7月29日，朱可夫作为苏军总参谋长、最高统帅部副统帅，就当时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和基辅的弃、守问题，曾当面向斯大林作过紧急汇报。朱可夫说：

“莫斯科战略方向上的德军，看来，最近期间不可能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因为他们损失太大。他们现在缺少大量预备队来补充各集团军和保障中央集团军群的左右两翼。

“我们认为，在乌克兰，主要战斗可能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克列明楚格地区某地展开，因为敌南方集团军群装甲坦克部队主力已到达该地区。

“我军防御最薄弱和最危险的地段是中央方面军。掩护乌涅恰和戈梅利方向的第十三和第二十一集团军人员很少，准备也不足。德军可能利用这个薄弱点，向扼守基辅地域的西南方面军的侧翼和后方实施突击。”

“你的建议是什么？”斯大林警觉起来。

“首先加强中央方面军，至少给它增加三个得到炮兵加强的集团军：从西部方向抽调一个集团军，从西南方面军抽调一个集团军，从统帅部预备队抽调一个集团军。委派一位经验丰富的能干的方面军司令员。具体地说，我建议瓦杜丁将军担任。”

“怎么啦，你认为可以削弱莫斯科方向吗？”斯大林问。

“不，不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方向的敌人暂时不会前进，而12—15

天以后，我们能从远东抽调至少 8 个战斗力很强的师，其中包括一个坦克师。这样就不是削弱而是加强莫斯科方向。”

“那么把远东送给日本人？”梅赫利斯挖苦地说。

朱可夫没有回答他，继续讲下去：“西南方面军必须立即全部撤过第聂伯河。在中央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接合部后面，应集中不少于 5 个加强师的预备队。它将成为我们的拳头，好伺机打出去。”

“基辅怎么办？”斯大林凝视他的总参谋长问道。

朱可夫明白，“放弃基辅”这几个字对于所有的苏联人，包括对于斯大林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不能感情雨事，作为总参谋长，他有责任向最高统帅建议采取在总参谋部和他本人看来当前唯一可能的、唯一正确的战略决定。

“基辅不得不放弃，”朱可夫断然回答。

一阵难堪的沉寂……总参谋长努力控制住自己，继续汇报：“在西部方向需要马上组织反突击，以夺回敌方的叶利尼亚突出部。敌人将来可能利用这个桥头堡来进攻莫斯科。”

“哪里还有什么反突击？真是胡说八道！”斯大林发火了，他突然高声说，“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来。”

朱可夫忍耐不住，回答说：“如果你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用说八道，那末还要他干什么。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职务，把我派到前线去，我在那里可能对祖国更有好处些。”

又是一阵难堪的沉寂。“请你冷静些，”斯大林说，“再说，如果你这样提出问题，那么我们缺了你能行。”

“我是一个军人，准备执行最高统帅部的任何决定。但是，我对形势和作战方法有清醒的看法，相信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而且，我和总参谋部是怎么想的，我就怎么汇报。”

斯大林没有打断他的活，显然已经平息了怒气。他十分平静他说：“你去工作吧，我们一会儿叫你来。”

朱可夫收起地图，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办公室。大约半个小时以后，他被叫到最高统帅那里。“是这样，”斯大林说，“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解除你的总参谋长职务，想叫你去担任实际工作。你有在实战条件下指挥部队的丰富经验。在作战部队你肯定会发挥更好的作用。当然，你仍然是副国防部长和最高统帅部的成员。”

“命令我到什么地方去？”

你愿意到哪里？”

“我可以做任何工作，可以指挥一个师、一个军、一个集团军、一个方面军。”

“冷静些，冷静些！你刚才汇报说要在叶利尼亚附近组织一次战役，那就请你负责这件事吧。”停顿了一下，斯大林又说，“必须把勒热夫——维亚济马防线上各预备队集团军的行动统一起来。我们任命你担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你什么时候可以动身？”

“一小时以后。”

“沙波什尼科夫很快就去总参谋部，你把工作交给他以后就可以动身。”

朱可夫来到叶利尼亚前线后，首先勘察了地形。那里正在同敌人进行火力战。来到阵地前沿，朱可夫同兵团指战员研究了情况，确信德军的防御工

事构筑得很好，看来有一场硬仗要打。德军在防御前沿和纵深把坦克、强击火炮及其他火炮都配置在掩体内，叶利尼亚突出部成了一个独特的筑垒地段。随后朱可夫就制定了战役的实施计划，并抓紧时间，着手进攻的准备工作。

8月12日，朱可夫亲自审问了德军俘虏米特曼。他19岁，父亲是纳粹党徒，本人加入了纳粹少年队。他随他所在的师到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南斯拉夫打过仗。米特曼供认，他们师大多数士兵都在19至20岁之间。加入这个师的人要经过特别挑选。这个师是随坦克第十师之后来到叶利尼亚地区的。米特曼把叶利尼亚地区看成是继续向苏联内地进攻的前进阵地。他认为德军在叶利尼亚地区受阻三周之久并转入防御，是因为德军统帅部想要赢得时间，向前线调集预备队和增援兵力。

准备工作就绪之后，朱可夫就于8月中旬向敌人发起进攻。苏军首先夺取了一些地区，重创了敌人。德军被迫把两个打得七零八落的坦克师、一个摩托化师和一个摩托化旅调走，换上步兵兵团。后来得知，德中央集团军群指挥部，曾因损失惨重，请求希特勒准许放弃叶利尼亚突出部，但遭到拒绝，因为在希特勒看来，叶利尼亚地区是下一步向莫斯科进攻时实施突击的有利的桥头堡。

整个战线的战斗十分激烈残酷。敌人用组织得很好的密集炮火阻止苏军前进。朱可夫使用了方面军所有的飞机、坦克、火炮和火箭炮猛轰敌人，打得敌人昼夜不得安宁。德坦克第十师、摩托化第十七师和步兵第十五师均被苏军彻底击溃。在这次战役中，涌现了第一批英雄的近卫师。他们打得非常英勇。米罗诺夫上校的步兵第一七师没有辜负这一英雄的称号，他们消灭了敌人步兵近五个团，包括“帝国”党卫师的“元首”团。由涅克拉索夫中校指挥的第586团，以迅速的突击占领沃洛斯科沃村后，但不料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涅克拉索夫中校尽管受了震伤，仍继续指挥战斗。激战持续了三天三夜。在兄弟部队的支援下，这个团不但突破了包围，而且击溃了正面敌军，夺占了火车站这个重要支撑点，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攻克叶利尼亚的战斗中，苏军共歼敌近5个师，德军死伤4.5万多人。这是苏德战争开始以来红军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朱可夫乘胜追击敌人。9月7日他率领部队渡过斯特里亚纳河，并奉命协同索宾尼科夫将军的西方方面军集群继续发动进攻。由于粉碎纳粹叶利尼亚兵团的胜利，红军的士气提高了，胜利的信心增强了。各部队更有信心地抗击敌人的冲击，以火力杀伤敌人，并协同一致地转入反突击。斯大林对这次战役的胜利十分重视，他亲自打电话对朱可夫说：“你们都是好样的！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乘胜前进！”正是：大将露颖在今朝，西线一举立功劳。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章 激战列宁格勒

艰苦环境育英雄，西京军民建奇功；
围困重重何所惧，岿然不动列宁城。

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德国中央集团军群调出一个坦克军，支援北方集团军群，妄图一举攻占列宁格勒。

1941年8月下旬，德国以32个步兵师、4个摩托化师、4个坦克师和1个骑兵旅的兵力，同时还配备了6000门大炮、4500门迫击炮和1000多架飞机，向列宁格勒发动猛烈的攻击。希特勒扬言，要在9月1日以前占领列宁格勒，并狂妄宣称，一定要把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抹掉。

列宁格勒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每个苏联人都特别珍视它。

在这里，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基础。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日子起，这个拥有300多万人口的海港城市，在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列宁格勒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它是彼得大帝1703年作为俄国“通向西方的窗口”而建造起来的。从那时起，200多年来它一直是疆域广大的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城市的建筑物，彩色画，雕塑品，名胜古迹，公园和博物馆，都是苏联人民的骄傲。

列宁格勒由于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因此就成了德苏双方争夺的重要战场。对希特勒来说，占领列宁格勒就意味着，在卡累利阿地峡作战的北方集团军群和芬兰军队，能轻而易举地在斯维里河地域会合，并切断苏方通向卡累利阿和摩尔曼斯克的交通线。这样不仅有利于巩固法西斯反动同盟，迫使其他一些仍在动摇的国家加入反苏战争，而且还能使在那里作战的德军，包括为顺利实施进攻莫斯科的“台风”战役的第四坦克集团军群解脱出来。同时，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对提高德国及其盟国军民的士气，保持他们对实现反苏战争计划的信心，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希特勒吹嘘的“闪击战”遭到了惨败，德国统帅部的计划被打乱了，东线遭受了严重损失，这就引起了人们的严重怀疑——德国能否顺利而迅速地结束对苏战争。

对斯大林来说，失掉列宁格勒，在各方面都会使战争形势严重复杂化。如果希特勒占领该城，并且德、芬军队在此会合，那么苏方就必须从北面建立保卫莫斯科的新战线，并消耗掉最高统帅部准备用于保卫首都的战略预备队。此外，还会不可避免地失掉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争夺列宁格勒斗争的极端残酷性和紧张性。

希特勒为了及早拿下列宁格勒，投入了70多万的巨大兵力。在1941年7月至8月的西北方向作战中，德军占领了列宁格勒州的大部分地区。9月8日，德国又攻占了吕瑟尔堡，从而切断了苏方的最后一条陆路交通线，并封锁了列宁格勒。它与外界的联系只能在空军的掩护下，通过拉多加湖或从空中进行。德军对城市的轰炸和野蛮的炮击开始了。希特勒的军队从四面八方进逼，其中大群的坦克和机械化兵团集中到了通向乌里茨克、普尔科沃高地和斯卢茨克的接近地。所有这一切说明，德军正准备进行一次决定性的进攻。局势变得一天比一天危急！

斯大林和联共中央号召当地军民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列宁格勒。当时西北方面军司令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和军事委员日丹诺夫向驻地红军发出紧急动员令。他们说：“列宁格勒面临着危险，法西斯匪军正向我们光荣的城市—

—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逼近。我们的神圣职责是：在列宁格勒大门口，用我们的胸膛阻挡住敌人前进的道路！”从此，苏联红军开始了长达 900 天保卫列宁格勒的英勇战斗。

德军封锁列宁格勒以后，连续用飞机和大炮轮番轰炸，妄图彻底摧毁这座城市。在这关键时刻，斯大林特将朱可夫从西线召回去接替伏罗希洛夫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这样，这位智勇双全的将军再次临危受命，充任稳定苏德战场每一危险地段的“消防队员”。

1941 年 9 月 10 日晨，天气阴沉、凉爽。朱可夫来到莫斯科中央机场，准备飞往被围的列宁格勒。停在跑道上的飞机旁站着三个人，高个子的是霍津中将，稍矮一点的是费久宁斯基少将，以及飞机机长。朱可夫已和斯大林说好，让这两位将军和他同行。机长报告说，全体机组人员已做好飞行准备。他们大家不约而同地看了看天空，心中暗自预测着航线上的天气。天空乌云密布，云层很低。机长微笑着说：“我们能钻过去！在敌军上空飞行，这样的天气最合适。”

当朱可夫一行抵达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时，门卫挡住他们，索取通行证。朱可夫通报姓名也无用。“将军同志，你只好等一下。”卫兵说后，去找卫队长。等了约一刻钟，司令部卫队长才带他们进入斯莫尔尼宫二楼会议室。伏罗希洛夫正在那里主持一个紧急的军事会议。参加的人有集团军司令员和兵种主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员，以及国家重点保护单位的负责人。会议讨论的问题是：一旦扼守不住列宁格勒应采取哪些措施。大家简短而冷静地发表了意见。提出的措施包括破坏一些重要的军事、工业等方面的目标。现在，从 40 多年以后的今天来看，这些计划是难以置信的。而当时呢？局势危急。但是，还有一些未被使用的力量。讨论的结果是，决心保卫列宁格勒，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在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刻，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都特别强烈地感到，他们肩负的任务是十分艰巨和重要的。

就在朱可夫抵达列宁格勒那天，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了。希特勒军队向第四十二集团军防御地段进行极其猛烈的攻击。德军坦克曾突入乌里茨克，又被苏反坦克炮兵击退到原来的位置。在坦克、航空兵和炮兵的支援下，敌步兵不顾重大伤亡，向普尔科沃高地、普希金城、科尔皮诺连续攻击。在这些激烈的交战中，第四十二集团军司令员用尽了自己的预备队。部队严重减员，有的师只剩下 10% 到 30% 的兵力，形势十分危急。

在列宁格勒东南接近地进行防御的是拉托列夫将军指挥的部队，其兵力严重不足。科尔皮诺城郊战线已接近伊若拉工厂，该厂正在为前线完成军工生产任务。在党组织号召下，工厂党员、团员带头参军，德国法西斯军队要在该地域突破列宁格勒城的整个企图都以失败告终。伊若拉区域的军民死守着阵地。在这战斗的日日夜夜，每个市民都奋不顾身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当务之急是给部队供应武器、弹药和军事技术装备。所有这些工作都是由他们在敌人不断地炮击和轰炸的情况下完成的。生产 KB 重型坦克的基洛夫工厂，变成了城市防御的大型支撑点。许多工人参加了民兵，少年、妇女和退休工人顶替他们生产。大部分工人被安排住在市政和其他工厂建筑物里，这些地方都成了工人的营房。车间面向前线的窗户，由于离前线较近，不得不用铁板和沙袋挡上。在空袭和炮击下，从未停止过生产。休班工人扑灭燃烧弹，医务工作者救护伤员。就这样，他们生产了一批又一批的坦克，源源不断地开赴前线。

9月11日拂晓，德军重新开始进攻，并配合数百架飞机轮番进行轰炸。敌人逼到了列宁格勒城市附近。形势要求采取坚决而有效的行动。哪怕有最小的可能性，也要日夜连续反击敌人，疲惫敌人，消耗其有生力量和技术兵器，破坏其进攻措施。必须在部队中振奋士气，建立严格的秩序和纪律，大大改进军队的指挥。9月11日，霍津将军被任命为方面军参谋长，9月14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任命费久宁斯基将军为第四十二集团军司令员，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前沿阵地的指挥。

在坚守普希金城和斯卢茨克的战斗中，邦达列夫上校的步兵第168师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个红军基干师曾在芬兰边界、卡累利阿森林、拉多加湖西北英勇作战45天。该师为完成统帅部命令，在极其艰难条件下进行了后卫掩护战，然后撤向瓦拉姆岛，再从那里调往列宁格勒。战士们几乎把师的全部技术兵器都保存下来了，其中包括一个榴弹炮团和一个加农炮团。该师得到列宁格勒的共产党员、政治工作者的补充后，又像在边界那样，在新利辛、斯卢茨克、普希金城附近同敌人进行英勇的拼搏。

9月13日清晨，德军又以两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师和一个机械化师的兵力，开始向乌里茨克总方向进攻。德军突破了防御，占领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索斯诺夫卡、芬兰科伊洛沃，并向乌里茨克推进。德军总参谋长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从西南进攻列宁格勒，打开了一个很深的缺口。”晚上他又写道：“在列宁格勒附近取得了重大胜利。我军向‘城堡内防线’的突进，可以说是完成了。”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清楚地认识到，列宁格勒的防御形势非常危急。为了消除严重威胁，决心将方面军的最后一个预备队——步兵第十师投入战斗。“这是最后一个了！”朱可夫说。决心本身含有巨大的冒险性，但当时舍此别无他法。9月14日晨，在短促而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步兵第十师与友邻兵团协同，在航空兵支援下，对敌人实施迅猛的突击。紧张战斗的结果，使防御恢复了原态势，敌人遭到重大损失，放弃了索斯诺夫卡和芬兰科伊洛沃。

希特勒催促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莱布陆军元帅加速夺取列宁格勒，尽快把第四坦克集群的机动兵团解脱出来，调给莫斯科方向的“中央”集团军群。为此，纳粹头子命令德军用封锁、不停的空袭和炮击，把列宁格勒夷为平地。哈尔德也疯狂叫嚷，要用饥饿配合德军发挥作用。列宁格勒军民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困难。全被封锁，从陆上没有一条出路，只有被誉为“生命之路”的拉多加湖是通往内地的唯一道路。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派人从湖上给列宁格勒军民运送给养。但是，这仍然不能满足列宁格勒军民的全部需要。列宁格勒很快就发生了饥荒，从1941年10月1日开始实行配给制。工人每天只能分到7两9钱面包，儿童、病人和一般公务人员则是3两9钱。但是，英雄的列宁格勒军民没有被敌人的封锁、轰炸所吓倒，也没有因饥饿而屈服。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一致奋起，同德寇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朱可夫从9月10日来到列宁格勒前线，一直日以继夜地紧张工作，领导部队在这座被围的城市周围修筑新的防御工事，制定突破德军封锁的详细计划。作为方面军司令员，他还使陷入困境的红军部队重新恢复了信心，鼓舞他们挡住德军新的猛烈进攻。著名国际问题观察家亚历山大·沃思曾亲眼目睹了苏联战时的种种情形，了解到朱可夫所进行的坚韧不拔的活动，明确指出他确实是在生死关头保卫列宁格勒的组织者。他写道：

“1943年，我在列宁格勒听到好几个苏联战时的激动人心的故事。他们

说，大约在9月10日，前线实际上已陷入一片混乱，伏罗希洛夫认为一切都完了。可是，斯大林于9月11日把朱可夫派到列宁格勒，朱可夫用了3天时间就把该城的防御充分组织起来了。

1945年6月，在柏林，有一次朱可夫对报界发表谈话，曾自豪地提到这个事实，虽然他没有详谈，可是维辛斯基说：“不错，正是朱可夫挽救了列宁格勒。”毫无疑问，正是在朱可夫担任司令员的短暂时间里（此后，他受命负责保卫莫斯科），列宁格勒周围的防线才得以稳固下来。”

若干年后，朱可夫在对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工厂的工人们发表演说时也确认说，他是“在德军突破到普尔科沃高地，零星的德军坦克冲进肉类联合加工厂的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的。显而易见，斯大林授权朱可夫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恢复列宁格勒防御，而不必顾忌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伤害任何人的感情。朱可夫毫不留情地执行了他的任务，使得他的一些下级内心颇为惶恐不安。

在朱可夫到列宁格勒任职的第二天，工兵主任贝切夫斯基上校，打开他的地图，向新来的方面军司令员汇报了在德军突破红村、赤卫队城以及卡尔平诺以前所做的事情。他指出了普尔科沃阵地工程和在内市、在涅瓦河沿岸、在卡累利阿地峡所做的准备工作。接着，工兵主任又叙述了一些敷雷小组和浮桥工兵部队目前正在执行的任务。

朱可夫专心听着，没有提任何问题，然后他不知有意或无意地急速挥动了一下手臂，以致一些纸页从桌子上掉下来，散落到地板上。他转过身去，一声不响地开始察看挂在墙上的一张大幅的城防要图。

“把坦克部署在彼得罗斯拉维扬卡地区做什么？”朱可夫突然向上校问道，“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吗？你过来，这儿有点不对头。”

“那是一些坦克模型，司令员同志。”工兵主任指着地图上的一支假的坦克部队的标志说，“一共50辆，是马林斯基剧院道具车间制作的。德国人已经来轰炸过两次了。”

“两次！”朱可夫挖苦地说，“你们玩这种把戏多久了？”

“两天。”上校工兵主任说。

朱可夫显然不大高兴地对贝切夫斯基说，德国人很快就会看穿这个诡计，并开始向这些假坦克投掷木头炸弹的。他命令这位工兵主任要在第二天早晨以前再制作100辆模型坦克，把它们配置在他在地图上指明的两个地点。贝切夫斯基回答说，车间一夜工夫造不出那么多。

朱可夫抬起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说，“车间若造不出来，我就拿你去受审，你们的政治委员是谁？”

“团级政治委员穆哈。”

“穆哈？你告诉你的穆哈，倘若你们不执行命令，明天就一起到军事法庭受审。我明天早晨要亲自去检查。”

贝切夫斯基后来写道：“听见这突如其来的威胁，我就像挨了一顿鞭子。”他认为朱可夫是在故意考验他的忍耐力。这位新来的方面军司令员显然对他前任的成绩感到失望，他喃喃自语：“他们在普尔科沃高地筑垒为什么动手这么晚？”朱可夫并未指望别人回答，接着便对贝切夫斯基说：“你可以走了。”

这个姓氏在俄语中的意思是“苍蝇”，朱可夫在这里显然是语带双关的。

当时，士气和军纪问题是必须立即解决的最紧迫的问题。朱可夫来到前线，发现第八集团军军纪问题严重。有些师长没有接到命令就把部队撤出战斗，也有些军官常常酗酒，有的士兵听见枪声就逃跑。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朱可夫和日丹诺夫发出警告说，对于读职者，一律予以处决，并宣布以叛国或擅自撤退的罪名逮捕处决了若干名官兵，以儆效尤。

朱可夫接过指挥权时，战场形势的确十分危急。由于施吕塞尔堡失守，列宁格勒同苏联其他地区的陆路交通均被切断。敌人的包围圈愈来愈小。德军在 12 英里宽的一块地段上突破到拉多加湖沿岸，把被合围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同正在穆加以东、沃尔霍夫河一带竭力阻止德国装甲部队向列宁格勒东部推进的苏军部队分隔开来。苏军第八、第四十二、第五十五集团军正被迫退往城郊的环形防线或退往芬兰湾。苏军南部参加卢加战役的残余部队，由于被德军坦克第四军团包抄合围，结果一部被歼，一部且战且退，向东和东北方向突围。这样，德军指挥部已经具备了近距离围攻列宁格勒的必要条件。

9 月 14 日晨，争夺戈烈洛沃的战斗再次打响，而且战斗更加激烈了。列宁格勒南面的筑垒地带这时大多被突破。冲在最前边的德军装甲部队已进抵离城市不到 7 英里的地方。9 月 15 日，尽管苏军进行了猛烈的防御战，特别是在乌里茨克，它一天之内曾数次易手，但德军第十八集团军还是在斯特烈尔纳和乌里茨克之间突破到芬兰湾，把苏军第八集团军同列宁格勒隔开了。这一天是战斗最为激烈的一天，德军感到苏军的抵抗变得更加猛烈了。

为了阻挡德军突击集团在乌里茨克和列宁格勒方向上继续进攻，朱可夫精心拟定出一项加强该城防御的计划。他的目标是使用空军和炮火突击来打击德军，以阻止他们突破苏军防御；在 9 月 18 日以前，组建 5 个步兵旅和两个步兵师，为列宁格勒的近距离防御的 4 条防线配备兵力；使用第八集团军突击德军的侧翼和后方，并解放穆加和施吕塞尔堡。这项计划要求动员这个地区的一切人力物力，包括他的方面军的部队、列宁格勒市民以及苏联海军，来加强预备队，扩大防御纵深。在第四十二集团军的防区，朱可夫计划建立能够阻止德军通过发动强攻来夺取列宁格勒的一道防线。他非常倚重海岸炮兵和波罗的海舰队的火力，因为随着战线缩小，越来越靠近海洋，它们将能发挥更大的威力。就这样经过日日夜夜 50 多天的英勇战斗，苏联军民终于粉碎了德军从南北两个方向进行正面突击以夺取列宁格勒的计划。

虽说红军把德军挡在列宁格勒之外，但这座城市及其保卫者们的命运仍前途未卜。敌人以武力占领的企图失败后，又决定进行封锁，让列宁格勒人挨饿，然后再摧毁该城。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列宁格勒周围的包围圈，还没有收得像人们可能希望的那样紧……考虑到我军在列宁格勒的严重消耗，而敌军又在那里集结了大量军队和大量兵器，所以直到饥饿发生作用，为我们帮忙以前，局势仍将是困难的。”与此同时，纳粹头子也作出一项狂妄的决定：如对方投降，将不予接受。这是对他早些时候作出的必须把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抹掉”的决定具体化。法西斯匪徒妄图通过围困、封锁和野蛮的轰炸，切断城市与外界的联系，将全城军民困死。

1941 年 9—10 月份，德军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猛烈的空袭，共投弹 9.3 万多枚。9 月下旬，德军连续空袭喀琅施塔得湾和列宁格勒港口，炸沉苏军战列舰“玛拉托”号。

10 月 4 日这一天，德军空袭持续时间长达 9 个多小时。列宁格勒遭到陆上封锁导致军民的粮食供应急剧恶化。9 至 11 月居民面包定量先后降低 5

次，11月20日降到最低限量：高温车间工人每人每天375克，一般工人和
技术人员250克，职员和儿童125克。

列宁格勒军民在被封锁中度过严冬，忍受一切艰难困苦，接受最严峻的
考验。他们顽强地战斗和工作，决心不惜牺牲一切坚持到底。直到1944年3
月初，苏军开始胜利反击，歼灭了列宁格勒周围的纳粹军队和芬兰帮凶军，
才彻底结束了长达3年零1个月的列宁格勒保卫战。

1941年下半年苏联军民坚守列宁格勒，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战略
意义。列宁格勒保卫战，坚定了苏联人民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斗志，鼓舞了他们
的胜利信心。德军攻占列宁格勒的企图被粉碎，苏军在这一方向上牵制了
德军大量兵力和全部芬兰军队，不但使希特勒“闪击战”计划中重要的战略
任务未能完成，而且对苏德战场其它战线的作战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当德
军中央集团军群对莫斯科发动秋季攻势时，只能从北方集团军群调去4个坦
克师和两个摩托化师参加战斗。

列宁格勒军民在苏联党政领导下团结奋战，是取得保卫战胜利的重要条
件。居民和军队一起在城市周围构筑防御工事，建立由数道环形地带组成的
防御体系。在列宁格勒周围以及市内，一共挖了93英里防坦克壕、崖壁和断
崖处，设置了125英里铁丝网，挖了7197条步兵班战壕和389英里交通壕，
修建了3000多个各种武器的火力点和掩蔽部。1941年7—8月份，每天都有
数十万居民参加构筑防御工事。城市居民是在被围困的条件下军队补充兵员
的主要来源。在被围的第一个冬春，列宁格勒为部队输送了10万多名新兵。
在1941年7至9月，列宁格勒党组织在市内组建了10个民兵师，其中7个
后来改编为正规师；城市很多民用工业转为军工生产，在敌人狂轰滥炸和严
密封锁的情况下，1941年7月至年底，他们为前线制造了713辆坦克，480
多辆装甲车，58辆装甲列车，1.3万多门加农炮和迫击炮，300多万发炮弹
和迫击炮弹，8万发火箭炮弹和炸弹。弹药的产量，1941年下半年比上半年
增长了9倍。

为了援助这座被围困的城市，苏联政府从9月开始，连续不断地向列
宁格勒调拨了大量生活和作战所需的各种物资，9至12月共空运6700吨急需
物资。

11月下半月，德军加强炮击和轰炸，城市开始处于饥饿状态，燃料很快
用尽，列宁格勒的处境非常危急。从11月14日至28日，苏军总后勤部向列
宁格勒空投了1200吨高热量食品。苏军除组织空中运输外，还在拉多加湖开
辟了一条联结列宁格勒和苏联后方地区的运输线，结冰期间则在冰上开辟军
用汽车路。这条航线被苏联称为“生命之路”。列宁格勒通过水上和冰上交
通线运送战斗和生活所必需的供应品，撤走了需要撤离的居民以及工业设备
等。在列宁格勒被封锁的第一个冬天，“生命之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沿该线给列宁格勒运到36万余吨物资和6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运出约55
万人和3700辆车皮的工厂设备、文化珍品及其它资财。

希特勒企图攻占列宁格勒以及用封锁和饥饿来扼杀这座城市的计划，就
这样被列宁格勒的英勇保卫者们彻底粉碎了。正是：

英雄何惧敌千重，
自有办法退敌兵；
森严壁垒御敌寇，
众志成城纳粹惊。

若问德军下一步如何行动及斯大林如何组织迎敌，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一章 严冬到来之前

冰天雪地是严冬，敌我双方奋力争；
统帅运筹制敌策，敌酋妄想克苏京。

基辅战役苏军损失惨重，损兵折将达 60 余万之众。在希特勒看来，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最大战役”。但是，尽管这个成就非同小可，他的一些将领对于它的战略上的重大意义却更加怀疑了。在中路，包克的没有装甲部队的集团军，在斯摩棱斯克东面不远的杰斯纳河一带，两个月来一直接兵不前。秋雨季节快来了，到时候苏联各地的道路将是一片泥泞。随之而来的将是冰天雪地的严冬。斯大林正在加紧组织力量，准备利用严冬的有利时机，对德国法西斯强盗给以沉重的打击。

希特勒虽然在战争初期，先发制人，捞到不少便宜，处于主动进攻的有利地位。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发展，每前进一步，困难也就愈来愈多。德军总参谋长 8 月 11 日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已经越发清楚，我们不仅低估了俄国巨人的经济力量和运输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低估了他们的军事力量。我们最初计算敌人大约有 200 个师，现在已经察明番号就有 360 个师。一旦十几个师被歼灭，俄国人就又投入十几个师。我军战线由于分布太广，显得过于单薄。”伦斯德在战后向盟军提审人员直率供认：“在发动进攻后不久，我便发现以前所写的关于俄国的一切都是满纸胡话。”

希特勒的坦克兵团司令古德里安和勃鲁门特里特等人，在他们的报告中对初次碰到苏联 T—34 型坦克都表示惊讶不已。他们对 T—34 型坦克事前毫无所闻。这种坦克的装甲很厚，德国的反坦克炮弹打上去就被弹回来，坦克毫无损伤。勃鲁门特里特后来说，这种装甲车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所谓“坦克恐怖”的开始。战争开始以来，德国人在以空军保护地面部队和进行战前侦察方面，一直占有压倒优势，现在却第一次不能用这种优势占便宜了。苏联的战斗机，尽管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在机场上遭到轰炸，在战争初期的战斗中也受到重大损失，但是，和那些新的师团一样，仍然不断出现，简直说不上是从哪儿来的。还有，德军进军过于迅速，加上苏联没有适宜的机场，德国空军基地又距离太远，使得德国空军无法有效地掩护前线作战。冯·克莱施特将军后来报告说：“在好几次挺进时，我的装甲部队由于没有飞机掩护，遇到很大困难。”

纳粹头目们对苏联还有一个估计上的错误。克莱施特说：“我们把胜利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入侵必然要使俄国发生政治混乱这种前途上……我们把过高的希望放在这样的信念上：斯大林一旦遭到重大失败，必然要被国内人民推翻。这种想法是元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制造的。”

由于纳粹头子和他的将领们之间对苏联的形势认识不同，因此在德国最高统帅部中，曾发生一场战略上的大争论。结果是，希特勒不顾大多数高级将领的反对，作出了哈尔德认为已证明是“东线战役中最大战略上的错误”的决定。问题说来也简单，但是却极关重要。这就是包克所率领的实力最强，也是迄今为止德国三路大军中成就最大的中央集团军，是从 7 月 16 日已经到达的斯摩棱斯克向前推进 200 英里，拿下莫斯科呢，还是仍然按照希特勒指令中规定的计划行事，以北部和南路两翼为主攻？换句话说，是以莫斯科还是以列宁格勒和乌克兰作为最后目标？

以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为首的陆军司令部，坚决主张全力进攻苏联首都。

支持这个意见的有包克，他所统率的中央集团军，正沿着公路向莫斯科进军；还有古德里安，他的装甲部队正在前边打头阵。他们在辩论当中，除了强调攻占苏联首都的心理上的价值之外，还申述了更多的理由。他们向希特勒指出，莫斯科是军火生产的重要来源，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苏联交通运输的枢纽。拿下莫斯科，苏联不仅要失去一个主要的军火来源，而且后方的兵员、供应也不能运往遥远的各个前线，各个前线就要因此而削弱以至于崩溃。此外，将领们还向这位现在已成为他们最高统帅的前下士提出一个最后的、无可置辩的论点。他们说，种种情报表明，苏联的主力现在正集中在莫斯科前沿，以图全力保卫首都。在斯摩棱斯克正东，50万苏军突破了包克的双重包围，正在挖壕据守，以阻挡德军进一步向首都推进。

据哈尔德战后供称，德军总参谋部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我军必须以击败敌人的军事力量为作战目标，因此，下一个最迫切的任务是，集中中央集团军的全部力量，击溃铁木辛哥的部队，进军莫斯科，拿下敌人这个抗战神经中枢，并击溃敌人的新的部队。由于季节变换在即，准备这次进攻的部队的集结工作必须尽快完成。与此同时，北方集团军须执行既定的任务，争取与芬兰人取得联系。南方集团军将继续向东推进，尽可能牵制敌人的力量。”但是，德军总参谋部与最高统帅部经过多次讨论，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后来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把总参谋部的一份备忘录交给了希特勒。

纳粹头子拒绝了将军们的建议。8月21日，希特勒向与他意见不合的总参谋部下达了一项新的指令。哈尔德在第二天的日记中逐字逐句地把指令内容抄录下来：

“陆军方面提出的关于东线作战如何继续的建议，不符合我的意图。在冬天到来以前，要达到的最重要的目标，不在于占领莫斯科，而是拿下克里米亚，拿下顿尼茨盆地的工业和煤矿区，并切断俄国的高加索石油供应线。北路的任务在于围困列宁格勒和同芬兰军队会师。”

希特勒在指令中规定，必须彻底摧毁南路的第聂伯河一带的苏联第五军团。这一支部队的顽强抵抗，使希特勒伤了好几天的脑筋。他还要求占领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包围列宁格勒，与芬兰帮凶军会师。他最后说，“只有这样，才能创造进攻铁木辛哥部队并顺利打败它的条件。希特勒现在已给同时攻占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主意迷住了，因为他自信这两个“共产主义圣地”一旦陷落，斯大林所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就要土崩瓦解了。

纳粹头子对那些不能赞赏他的战略天才的陆军元帅和将军们进行侮辱，并针对陆军8月18日的备忘录发出了一个“反备忘录”，例如其中说到，陆军司令部中全是一批“脑袋已被过时理论弄得陈腐不堪”的人。为此，哈尔德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大发牢骚：“不能忍受！闻所未闻！莫此为甚！”这天整个下午和晚上，他与陆军元帅冯·勃劳希契会商，讨论“元首”对陆军总司令部和总参谋部事务进行的“不能允许的”干涉，最后他建议陆军总司令和他本人辞职。“勃劳希契不同意，”哈尔德写道，“因为他认为这并不实际，而且也于事无补。”这个胆小怕事的陆军元帅，这次仍和从前一样，向那位以前的陆军下士屈服了。

这件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即8月23日，坦克集团军司令古德里安将军，来到纳粹头子的大本营晋见希特勒，竭力主张立即进攻莫斯科。希特勒对这位坦克将军十分宠爱，因此特让他把话说完，然后详细说明他所以作出不同决定的种种理由。他说，将来继续进行战争，十分需要乌克兰的原料和

农业。他谈到有必要使克里米亚半岛失去作用。希特勒认为“克里米亚是苏联进攻罗马尼亚油田的航空母舰”。他批评将军们“对于战争经济方面的问题一窍不通”，并强调他已发布命令，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在最高统帅部这里，”古德里安后来写道，“我头一回看到后来非常习见的一个现象：希特勒每说一句话，在场的凯特尔、约德尔等人莫不点头称是，只有我仍然坚持我自己的观点。”

这是战争爆发以来，德国最高统帅部中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可是更严重的危机及其不利后果还在后头。9月5日下午，希特勒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重新发动对莫斯科的进攻。他咬牙切齿地发布命令说：“中路军必须在8天到10天之内开始行动。包围他们，击败他们，消灭他们！”希特勒同意把中央装甲集团军的古德里安的部队重新调回来，这时该部在乌克兰正打得难解难分。同时他还同意从列宁格勒前线把莱因哈特的坦克军调过来。10月2日，大规模进攻终于开始了。进攻的代号是“台风”。一股强风，一股旋风，要猛袭苏联人，要在莫斯科前沿歼灭斯大林的最后的作战部队，要把苏联打垮。

1941年9—10月份，是苏联人民在战争时期经受的最艰苦的岁月之一。莫斯科的居民显著减少了。男人参加了军队或民兵，妇女和小孩或者疏散了，或者代替男人进工厂。很多人在通向首都的道路上构筑工事。就在城市里，在大街上，也设置了桩碧、防坦克菱形拒马和防步兵障碍物。苏联中央各部和外国使馆急忙撤退到伏尔加河上的古比雪夫。但是，斯大林和他的最高统帅部仍然留在莫斯科，指挥全国的战斗。

战报上的消息又是越来越糟。法西斯德国军队突进到列宁格勒。但列宁格勒方面军、波罗的海红旗舰队和列宁格勒的居民发誓，不把革命的摇篮列宁格勒交给敌人。他们光荣地恪守这一誓言。虽然四面被围，列宁格勒岿然不动。英雄的苏联红军坚守着芬兰湾南岸彼得戈夫至沃龙卡河这一重要地段。列宁格勒方面军第八集团军在此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它不仅坚守着奥拉宁包姆这块“弹丸之地”，而且实施了猛烈突击，把德军的兵力从进攻列宁格勒的主要方向上吸引过来。希特勒企图在列宁格勒地区与芬兰军队会合的计划破产了。德军突击列宁格勒的主力第四坦克集团军遭到失败，大大削弱了。这对于尔后的战事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因为敌人原打算夺取列宁格勒后把此地的坦克调往莫斯科方向。

南方出现了独特的局势。希特勒为了保障将来用以夺取莫斯科的中央集群的南翼，不得不从莫斯科方面把王牌第二坦克集团军调往基辅方向。敌人被迫放弃正面突击，实施机动，目的在于围歼苏军主力。在这次突袭中，苏联西南方面军受到严重损失。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阵亡，方面军参谋长图皮科夫中将和军事委员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布尔米斯坚科壮烈牺牲。遍体鳞伤的集团军司令员波塔波夫和另外几位兵团指挥员被俘。方面军司令部的部分工作人员，由作战部长巴格拉米扬少将率领突出重围。

经过几个月来的作战实践，在军队指挥方面，斯大林又进行了调整。经验证明，按作战方向建立指挥部的做法效果不好。方向指挥部成了最高统帅部与方面军之间的多余的中间环节。方向总司令没有决定重大战役行动的权利。他们的意图只有经过最高统帅部的批准才能付诸实施。他们没有名副其实的司令部，不具备通信工具，不掌握预备队，因此对于战役的进程和结局不能产生实际的影响。后来这级组织撤销了。各个方面军和战役集团军群直

接受最高统帅部的指挥和调遣，从而提高了部队机动作战的能力。

为了加强莫斯科的防御，斯大林决定把预备队方面军的主力配置在西方方面军的后面，以增大防御纵深。由志愿人员组成的几个莫斯科民兵师配置在通往莫斯科远接近地上。最高统帅部还向各部队派出自己的代表，现场了解各兵种详细情节，并与兵团和战役军团的指挥人员，就保卫莫斯科的一些根本问题共同研究出最好的解决办法。10月份，华西列夫斯基将军代表总参谋部参加了最高统帅部派往西方方面军的代表团。

与此同时，莫斯科的党组织，以及位于首都周围的、敌人可能实施突击方向上的许多城市的党组织，积极动员群众支援军队。越来越多的志愿人员加入了民兵、防空降队、消防队以及其他军事化的组织。工人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当时到处都可以发现，所有苏联人，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充满了真正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所有这一切说明，一场保卫莫斯科的恶战就要爆发了。

同样，在这一战役中，纳粹独裁者又一次犯了自大狂的毛病。他不仅要求在冬季之前拿下莫斯科，而且还要求北路的陆军元帅冯·李勃同时占领列宁格勒，在北面与芬兰军队会师，继续向前推进，切断摩尔曼斯克铁路。此外，他又下令伦斯德同时扫清黑海沿岸，拿下罗斯托夫，夺取迈高普油田，向伏尔加河岸的斯大林格勒进军，以切断斯大林与高加索地区的最后联系。伦斯德向希特勒解释说，这样做意味着要越过第聂伯河作400多英里的大进军，队伍的左翼将危险地暴露在敌人面前。这时纳粹头子对他说，南路的苏军现在已不可能进行什么了不起的抵抗了。伦斯德说，他对于这个荒谬可笑的命令“纵声大笑”，不久以后他碰到的却是与希特勒的估计迥然相反的情况。

法西斯军队沿着当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的老路向前推进。一开始，来势汹汹，像一股台风似的。10月上半月，德军打了一仗勃鲁门特里特后来称之为“教科书式的战役”。德国宣称俘虏了苏军65万人，还有5000门大炮，1200辆坦克。到了10月20日，德军装甲部队的前锋已进抵离莫斯科40英里的地方。这时，就连“头脑清醒”的哈尔德也相信：“凭着领袖的大胆的领导和有利的天时，在俄国的严冬到来之前拿下莫斯科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秋雨连绵，道路泥泞的季节来临了。这一路乘车行进的大军，越走越慢了，有时还不得不停止前进。正在打仗的坦克也得撤下来，去拖曳陷在泥坑里的大炮和弹药车。由于缺乏拖曳车辆用的钢链、挽钩，只得派空军运输机空投一捆捆绳子，其实这时十分需要飞机运送别种军需品。齐始下雨是在10月中旬，古德里安后来回忆说，“以后几个星期就听烂泥的摆布了。”勃鲁门特里特将军是在莫斯科战役中首当其冲的陆军元帅冯·克鲁格的第四军团的参谋长，他生动描述了当时的狼狈情形：“步兵在泥泞中一步一滑，每门大炮得用许多马队来拉才能前进。所有车辆都陷在泥坑里，一直陷到车轴部分。甚至牵引机行动起来也十分困难。不到几天，很大一部分重炮就动弹不得了……这一切，使得我们早已疲惫不堪的部队处于怎样的紧张状态，也许是不堪想象的。”

在哈尔德的日记上，在古德里安、勃鲁门特里特等德国将领的报告中，第一次出现了怀疑、甚至绝望的迹象。这种情绪也传播到战地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也可以说，这种情绪是从他们中间产生出来的。勃鲁门特里特回忆说，“现在，当莫斯科似乎已经在望的时候，官兵的心情却开始起了变化。

敌军的抵抗坚决起来，战斗越来越激烈，许多连队得不到增补，只剩下六七十人。”可供使用的大炮和坦克也不够。他说，“冬天快到了，可是冬衣连影子还没有见到。在遥远后方的广大的森林沼泽地带，游击队神出鬼没，四处活动，运输队常常遭到伏击。”从这个时候起，曾经在这同一条路上走向莫斯科的拿破仑大军的鬼影和拿破仑全军覆没的往事，就常常萦绕在纳粹征服者的睡梦中。德军将领们开始阅读或者重读科兰古侯爵所著的关于这个法国征服者 1812 年冬天在俄国惨败的可怕故事。

南线的情况也并不比中路好些。在遥远的南方，天气稍微和暖一些，但是也是多雨，道路泥泞，战事同样进行得不顺利。克莱施特的坦克已于 11 月 21 日开进顿河口的罗斯托夫。这时，戈培尔的宣传队大吹大擂他说，“通向高加索的大门已经打开了”。但是，这个大门并没有开上几天。克莱施特和伦斯德都认识到，罗斯托夫是守不住的。五天以后，苏联红军收复了罗斯托夫。德国军队在南北两翼受到夹攻，狼狈后撤 50 英里到米乌斯河一线。罗斯托夫的撤退是第三帝国历史上另一个小转折点。在这里，纳粹军队头一回遭受到重大的挫折。古德里安后来评论说：“我们的灾难是在罗斯托夫开始的；那是危机迫近的预兆。”德国陆军的高级将领伦斯德陆军元帅因此丢了官职。战后这位元帅受审时供称，希特勒给他下了一道命令：“留驻原地，勿再后撤。”他立即复电：“要想坚守，简直发疯。首先，部队固守不住；其次，若不撤退，将被歼灭。我再次请求撤销这项命令，否则请另派别人接替。”当晚，希特勒的复电来了：“同意所请，望即交出指挥权。”于是，伦斯德就这样免职回家了。

哈尔德在 11 月 30 日的日记中记述了伦斯德被撤职的情况：“元首大发雷霆，他把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叫进来，狠狠地辱骂了一顿。”骂陆军将领是饭桶，是胆小鬼，是鼠目寸光的无能之辈。12 月 1 日，莱希瑙陆军元帅接替了伦斯德，同时仍兼任他在法国时便担任的第六军团司令一职。第六军团在克莱施特的装甲部队之北，由于克莱施特的装甲部队正从罗斯托夫后撤，处境甚为险恶。莱希瑙给“元首”打了电话，请求批准他今晚撤退到米乌斯河一线。结果同意。“这样我们就恰好回到昨天所在的地方，”哈尔德说，“但是，时间和兵力白白浪费了，还丢了一个伦斯德。”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由于接二连三地受到刺激，心脏病大发，健康状况受到严重损伤。

随着严冬的来临，德军的处境愈来愈不妙了。据德军总参谋部记载，截止 11 月 26 日，德军在东线共计损失官兵 743112 人，相当于全部兵力 320 万人的 23%。1941 年的冬天，苏联很早就大雪纷飞，气温降到零下。据古德里安记载，初雪是在 10 月 6 日的夜间下的，正是对莫斯科重新发动进攻的日子。这样的天气提醒他再一次要求大本营发来冬衣，尤其是厚靴和厚毛袜。10 月 12 日，他记载说，雪还在下个不停。11 月 3 日，第一次寒潮到来，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到 11 月 7 日，古德里安报告说，部队开始发现“严重冻伤病员”。13 日，气温降到零下 8 度，“越来越觉得缺少冬衣了。枪炮和人一样受到了严寒影响。由于坦克履带防滑用的尖铁没有运到，一路冰雪，行动困难。天冷使得大炮上的瞄准镜失去了效用。发动坦克时得先在底下点火烘烤一阵。由于天气太冷，机关枪打不响。结果人心惶惶，甚至一直影响到后方博哥罗次克”。

在严冬面前，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也“无能为力了”。这位素来强悍善战的坦克兵司令明白表示，他决定去见中央集团军司令包克，请求收回发给

他的命令，因为他“实在无法执行”。他情绪消沉达于极点，11月21日写道：“冰天雪地，无处避寒，无衣御寒，人员装备受到严重损失，燃料供应也糟糕透顶。所有这一切，使我难以履行司令官的职责，长此以往，我的重大责任要把我压垮了。”

希特勒在冬季到来之前拿下莫斯科的狂言肯定是无法兑现了。但这仅是闹剧的序幕，一场惊天动地的莫斯科保卫战就要进入高潮了。正是：纳粹元凶枉费心，既损将军又折兵；若问京城保卫战，且待下回讲分明。

第二十二章 保卫莫斯科

德军攻打莫斯科，统帅号令壮山河；
休管顽敌拼死战，且看红军奏战歌。

1941年10月，莫斯科吃紧，希特勒以180万之众，1700辆坦克和1390架飞机从地上和空中滚滚而来。斯大林号召全国军民：“誓死保卫莫斯科！决不让纳粹血手法污列宁的陵墓！”一场英勇的莫斯科保卫战开始了。

9月30日，德国中央集团军以“台风”为代号，从南翼向莫斯科发起进攻。10月2日，德军从中部突破了苏军防线，从南、北两方面包围了维亚兹马。在南翼，德军3日占领了奥廖尔，6日占领了布良斯克。与此同时，纳粹坦克部队从北面突破了维亚兹马防线。7日，德第四坦克集团军又从南面突入维亚兹马，南北合围，把苏联4个集团军包围起来。被围苏军顽强抵抗，牵制敌军20几个师。10月中旬，部分苏军突围，退到莫日艾斯克防线，不少战士为国捐躯，许多指战员留在敌人后方，参加游击队，还有不少人被俘。据战后西方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书籍记载，从10月2日到10月中旬的两周内，进攻莫斯科的德军，完成了三个大的包围圈，在这三次作战中，苏军共损伤66.3万多人。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电召朱可夫立即从列宁格勒前线返回莫斯科。10月7日黄昏，当朱可夫大将来到克里姆林宫时，看见斯大林正独自一人呆在他的办公室里。斯大林正患流行性感，身体显然不大好。他向朱可夫点头致意，然后指着地图说：“你看！这里的情况很严重。我无法从西方方面军得到有关真实情况的详细报告。”斯大林吩咐朱可夫立即到方面军司令部去了解情况，并随时打电话向他报告。

告别前，斯大林问：“你认为德国人最近期间会再次进攻列宁格勒吗？”

“我想不会。敌人损失惨重，又把坦克和摩托化部队从列宁格勒地区调到了中央方向。敌人无力以列宁格勒地区现有的部队实施一次新的进攻战役。”

“你认为希特勒将把列宁格勒地区调出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用在哪里？”

“显然，用在莫斯科方向。”

谈话时，斯大林站在桌旁。桌上放着标有西方方面军、预备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情况的军用地图。斯大林望着西方方面军的地图，显然在运筹下一步的行动。他说：“看来，敌人已经在这个方向上行动了。”

15分钟以后，朱可夫来到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办公室。朱可夫7月底前往担任在斯摩棱斯克的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的时候，沙波什尼科夫重新就任总参谋长职务。看样子他疲劳极了。他的健康不佳，不久便离职了。他向朱可夫问好之后说，最高统帅已来过电话，指示他为朱可夫准备一张正在进行激烈战斗的莫斯科接近地的地图。这位总参谋长在介绍了几个方面军的危机处境以后说，在莫扎伊斯克防线和莫斯科近接近地修筑阵地的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而且这些地方防守薄弱。他认为必须派部队占领这些防线，首先是莫扎伊斯克防线。

由于情况紧急，当天夜里朱可夫就马不停蹄地驱车来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走进房间，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和军事委员、参谋长和作战部长等人，正在几支蜡烛的昏暗亮光下开会。尽管房间很暗，朱可夫还是能看见大家脸

上的紧张表情。朱可夫说明了斯大林派他来的用意。参谋长马兰金中将回答了朱可夫提出的问题，并汇报了10月2日至7日的情况。当前这里的主要问题是防备兵力不足，可能无法阻止德军向莫斯科突破。他向斯大林报告后又来到布琼尼的预备方面军司令部。

朱可夫动身去找布琼尼。天正下着小雨，乡间田野大雾弥漫，能见度很低。10月8日拂晓，朱可夫来到距莫斯科大约56英里的奥布宁斯克车站。他看见两名通信兵拉着电线从普罗特瓦河桥上走过来。他问他们给哪里拉线，他们的回答很唐突。一个战士冷冷他说：“命令我们给哪里拉，就给哪里拉。”

原来，美登这个城市已经放弃了。朱可夫来到美登，只看见有一位老太太在被炸弹炸毁的房屋废墟中寻找什么东西，朱可夫问她：

“老太太，你在那里找什么？”

她站在那里，花白头发蓬乱不堪，瞪大两只眼睛望望他，没有回答。

“老太太，你怎么啦？”朱可夫又问。

老太太开始默默地挖起来，根本不理睬朱可夫的话。

从废墟后面什么地方又走出一位妇女，手里提着半袋子东西。“请不要问她，”她对朱可夫说，“她不会回答你的问题的，她因为悲愤过度而疯了。”她对朱可夫说，前天德国飞机轰炸，扫射了这座城市。炸死炸伤了许多人。活下来的人都迁到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去了。这位老太太跟她的小孙子住在一起。空袭时她正在井边打水，她看见炸弹落在她家房子上，而她的孙子这时正在房子里。

这个女人家的房子也被炸毁了，她想在废墟下面挖回点儿鞋袜衣服之类。她一边跟将军说话，一边流泪，泪水从她的两颊簌簌落下来。朱可夫同她告别，说不出什么话来安慰这位妇女，他只有满腔的愤怒。在强烈复仇火焰的驱使下，他忘记了饥饿，忘记了他两天两夜还没有睡觉。叫醒司机，继续向尤赫诺夫方向前进。

经过实地勘察和了解，现在情况进一步清楚了。到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莫斯科附近开始进攻的时候，担任首都接近地防御的有三个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是科涅夫上将；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是布琼尼元帅；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是叶廖缅科中将。截止10月初，三个方面军的作战部队总共约有125万人，990辆坦克，7600门火炮和迫击炮，677架飞机。而敌人方面，其兵力却超过苏联三个方面军的总和，军队超过0.4倍，坦克超过0.7倍，各种火炮和迫击炮超过0.8倍，飞机超过一倍。

现在问题很明显，在大敌当前，必须科学地使用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必须加强部队的统一指挥和密切配合。统帅部决定将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组成西方方面军。任命朱可夫为司令员，科涅夫为副司令员。

从此，朱可夫以特有的精力着手执行他的新任务。他同科涅夫和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一起开了会，当场就一些问题作出了决定。首先，他们一致同意把方面军司令部迁到阿拉比诺。其次，派科涅夫带上几名军官前往加里宁，去协调那个极重要的方向上的各支部队的行动。朱可夫则同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尔加宁一起前往莫扎伊斯克，到现场视察防御状况。

10月12日清晨，科涅夫奔赴加里宁。那里的情况极为严重，必须对部队进行改编和重新部署。他亲自接管了第二十二、第二十九、第三十和第三十一集团军的指挥权。德军攻占了加里宁，他无法再继续前进。几天以后，

即在 10 月 17 日，成立了加里宁方面军，科涅夫任该方面军司令员。

朱可夫和布尔加宁来到莫扎伊斯克筑垒地域司令部，这条防线对于守卫它的红军部队来说，具有一系列有利条件。它的正面，得到拉马河、莫斯科河、科洛察河、卢热河和苏霍德热夫河的保护，这些河的河岸都很陡峭，对坦克的运动构成天然障碍。在这条防线上公路网和铁路网四通八达，使部队能够在各个方向实施广泛的机动。

苏军指挥部感到苦恼的唯一问题是部队不够，无法有效地占领这条 136 英里长的防线。虽然原来设想要部署 150 个营来守卫这条防线，但实际只凑足了 45 个营，部队的平均密度是每个营负责守卫三英里宽的正面。最高统帅部继续采取紧急措施来保卫首都。10 月 9 日，莫扎伊斯克防线司令部更名为莫斯科预备方面军，并得到了五个新改编的机枪营、10 个防坦克炮兵团和 5 个坦克旅。10 月 11 日，莫扎伊斯克防线部队并入第五集团军，由列柳申科负责指挥。

朱可夫的使命是明确的，时间是宝贵的。他和他的司令部人员日以继夜地工作。他后来回忆说，有些人简直累得站都站不稳了，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指示，莫斯科预备方面军所有战斗部队和设施，应在 10 月 12 日午夜 11 时以前，移交给朱可夫的经过改组的西方方面军。同时，最高统帅部给朱可夫派去了他迫切需要的预备队。从 10 月 7 日起，从其他方面军和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抽调部队派往莫扎伊斯克的有：14 个步兵师，16 个重新编成的坦克旅，40 多个炮兵团，10 个敷雷和喷火器连以及其他部队。为了阻止德军的攻势，朱可夫命令在威胁最严重的接近地的道路上建立许多防坦克支撑点和火炮支撑点，并且特别注意可能进行伏击的阵地。

10 月 13 日，在敌人强大的攻势面前，苏军被迫放弃卡卢加，并在莫斯科所有的主要接近地上进行浴血奋战。据方面军情报部门报告，10 月 15 日已有 50 多辆德军坦克推进到图尔基诺沃地区，大约 100 辆坦克推进到洛托施诺地区，100 多辆坦克推进到马卡洛沃和卡拉加托沃地区，大约 50 辆坦克到达博罗夫斯克地区，还有 40 辆坦克到达鲍罗季诺。德陆军第十三军向塔鲁萨方向进攻，夺取了塔罗萨和阿列克辛两个城镇，从北面对图拉形成深远包围。

西方方面军，在德军日益增强的压力下，不得不向后撤退，莫斯科面临的危险与日俱增。德军在苏军防御中部的纳罗-佛敏斯克和波多尔斯克方向完成了纵深突破。法西斯军队从西、北、南三方面包围了莫斯科。于是，在莫斯科近接近地造成了极其困难的局势。

莫斯科处在万分危机之中。从 10 月 13 日起，在通向莫斯科的所有重要作战方向都开始了激烈战斗。在 1941 年 10 月份艰难的日子里，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发出告军队士兵书，其中写道：

“同志们！在我国面临危险的严酷时刻，每一个军人的生命应该属于祖国。祖国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贡献出最大的力量，发扬英勇顽强、英雄主义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祖国号召我们要成为无法摧毁的铜墙铁壁，堵住法西斯匪帮去莫斯科的道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警惕性、铁的纪律、组织性、坚决果断的行动、必胜的信心和随时准备自我牺牲的精神。”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作出在莫斯科近郊歼灭德寇的决定，采取攻势防御的果断措施。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红军依靠前线防御工事系统，组织了坚强的攻势防御，以削弱和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赢得时间，准备集中后备力量，在一定时机，转入反攻，给予德军

以歼灭性打击。

根据斯大林的命令，10月17日建立了加里宁方面军，从莫斯科西北面阻击敌人。10月19日，国防委员会宣布莫斯科戒严，号召首都人民不惜一切，配合红军，誓死保卫莫斯科。20日，《真理报》发表《阻止敌人向莫斯科前进》的社论，动员全市人民在敌人到达首都之前，用自己的鲜血把他们埋葬。莫斯科市委召开全市积极分子大会，号召全市人民把首都变成攻不破的堡垒。

还在7月初，就在莫斯科市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了12个民兵师。参加民兵师的有各种专业人员：工人、工程师、技师、作家、学者和艺术工作者。当然，这些人员不是都具有军事技能，很多东西必须在战斗过程中才能熟悉。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很多自动编成的民兵组织参加了侦察、滑雪、袭扰敌人军营和截击敌人军车等活动，当他们取得必要的战斗经验以后，就组成为出色的战斗兵团。

在莫斯科危机的日子里，全市人民积极响应党组织的号召。三天之内就组织了25个工人营，12万人的民兵师，169个巷战小组和数百个摧毁坦克班。全市约有45万人参加修筑防御工事。莫斯科人民不畏严寒，日夜奋战，准备同德寇作拼死的搏斗。11月，在莫斯科附近修筑了320多公里长的防坦克障碍物，设置了250多公里长的防步兵障碍物。他们在冰冻的土地上，用自己的双手，挖出了300多万的土方！

留在莫斯科工厂里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们，表现了英勇无畏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用旧的设备生产，因为全部贵重设备都搬迁走了。人员少，而军工产品需在最短期限内完成。莫斯科汽车厂生产什帕金7.62毫米冲锋枪。这种枪的枪机则由第一轴承厂和奥尔忠尼启则厂生产。12月份，要求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比11月份多34倍。任务胜利完成了！

为了支援前线，许多民用工厂生产军用产品，例如第二钟表厂生产地雷引信；列宁格勒区的无轨电车修理厂，制造手榴弹；镰刀和锤子工厂修理坦克，还生产弹药；首都汽车修理厂，修理战斗车辆；“罗特-弗龙特”糖果点心厂，生产浓缩食品；原生产居民服饰用品的小厂，现在为前线生产反坦克手榴弹。

敌人对莫斯科的狂轰滥炸日甚一日。几乎每夜都有空袭警报。但是，在此以前党组织已做了大量工作，来加强地对空防御。千百万公民积极参加了防空训练。燃烧弹对莫斯科人来说已不再是可怕的了。在保卫莫斯科的战斗中，苏联空军起了很大的作用。仅在10月份的一个月中，苏联空军就出动飞机2.6万架次，支援和掩护地面部队袭击敌人。

战斗正在莫斯科西部接近地激烈进行着。莫斯科市民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越来越困难。他们冒着空袭，对莫斯科市内和市郊的大型工业企业继续进行大规模疏散。8.8万辆铁路货车，满载着设备、金属材料和各种半成品，满载着工人及其家属，奔赴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奔赴乌拉尔、西伯利亚、中亚和哈萨克。在开始疏散之前，莫斯科共有7.5万台金属切削机床，经过疏散只留下2.1万台。战前，莫斯科供电系统发电能力大大超过1400万千瓦，到1941年秋，不足上述数字的一半。但是，他们终于克服各种困难，保证了前线任务之急需。

英雄的莫斯科军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表现了“临危不惧，气壮山河，

誓死与德寇决一死战”的英雄气概。他们豪迈他说：敌人在哪里进攻，我们就把他歼灭在哪里！我们要在红场上为列宁而战斗，决不让纳粹血手玷污列宁的陵墓！在首都和全国军民的支援下，前线苏军浴血奋战，视死如归，把敌人拖得精疲力竭，进攻能力日益减弱。到10月底，德国法西斯军队已被阻止在加里宁——土耳其诺沃——沃洛克拉姆斯克—多罗霍沃和阿列克辛以西一线。

尽管局势依然严重，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斯大林决定举行传统的十月革命节阅兵式。11月1日，朱可夫被召到最高统帅部。斯大林对他说：“今年十月革命节，除了开庆祝大会外，我们还想在莫斯科举行阅兵式，你认为怎样？前线的形势允许我们这样做吗？”

朱可夫回答说：“德军在最近几天内没有力量发动大规模进攻；他们在10月份的作战中遭到了严重损失，现在正补充兵力和调整部署。但是德国军队能够而且肯定要破坏。”最后决定，无论如何要举行阅兵式。为了防备在庆祝活动中遭到空袭，从友邻方面军调来战斗机，以加强首都的空防。

1941年11月6日，在兵临城下、炮声隆隆、“敌军围困万千重”的莫斯科，苏联首都人民在地下铁道的马雅可夫斯基车站隆重举行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4周年庆祝大会。斯大林作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4周年》的报告。斯大林指出，德军后备快要枯竭，苏联后备才刚刚充分扩充起来，德国比苏联已大为削弱。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实行的闪电战已经彻底破产，德国帝国主义及其军队必然灭亡。

11月7日上午，首都军民在飘着雪花的初冬雾霭中，在红场举行了盛大的独具风格的阅兵式。革命歌曲响彻云霄，口号声、欢呼声连成一片，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以藐视和压倒一切敌人的大无畏精神，以新的无产阶级军队一定要战胜法西斯的必胜信心，威严地屹立在列宁陵墓前，检阅了红军队伍，并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说。他对苏联全体指战员说：“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战争。”“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彻底粉碎德国侵略者！消灭德国占领者！”这一空前壮举，大长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志气，增强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信心，大灭了法西斯的威风。

斯大林一再重申，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有信心消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希特勒德国一定会由于其罪行累累而崩溃。斯大体说：“这一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格、充满兽性的人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消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高尔基和契诃夫、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列宾和苏利柯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民族！……德国侵略者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好吧，既然德国人想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歼灭战。今后我们的任务，苏联各族人民的任务，我们陆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就是把侵入我们祖国领土的所有德国人——占领者一个不剩地歼灭掉！”斯大林讲话之后，全场起立，高呼：“伟大的斯大林乌拉！”“斯大林同志万岁！”在游行中，全副武装的苏联红军，迈着雄健的步伐从红场列宁墓前走过，接受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检阅，随后就从红场直接开赴前线。

德国法西斯的十月攻势既没有能够消灭苏军，也没有能够占领莫斯科，而是被迫转入了防御。经过半个月的休整，德军又于11月15日开始向莫斯科发起第二次大规模的进攻。这次德军的兵力是：中央集团军群有三个野战

集团军、三个坦克集团军，总共 74 个师和 4 个旅。其中，德第九集团军牵制加里宁方面军；第二集团军牵制西南方面军。在苏联西方方面军正面，德军集中了 51 个师，大炮、坦克和其他装备仍占优势。根据德军这次作战方案，德国第三和第四坦克集团军进攻北面的克林，从北面包围莫斯科；第二坦克集团军在南边占领图拉，从南面包围莫斯科；第四集团军在西面包围并消灭莫斯科以西的苏军，然后从南、北两面包抄，在莫斯科以东汇合。德军妄图采用这种南北钳形攻势，同时配合正面进攻，一举占领苏联首都莫斯科。

苏联西方方面军的兵力是：35 个步兵师，3 个坦克师，3 个摩托化师，12 个骑兵师和 14 个坦克旅。苏军的战斗口号是坚决死守，决不让德国法西斯进入莫斯科！

11 月 15 日清晨，德军开始向克林进攻，23 日占领克林。11 月 27 日，另一支德军占领了离莫斯科仅有 24 公里的伊斯特腊。当天夜间，一小股德寇在雅赫罗马地区渡过了莫斯科——伏尔加河运河。莫斯科已处在德军大炮射程之内，德军用望远镜几乎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尖顶。这在希特勒和他的大部分将领看来，莫斯科似乎已在掌心之中了。德军在苏联首都北、南、西三面，已到达距离目标二三十英里的地方。

希特勒远在后方的东普鲁士的大本营里，反复地端详着地图。在他看来，到莫斯科的这最后一程，根本算不了什么。他的军队已前进了 500 英里；他们只要再走二三十英里便行了。希特勒对他的军事顾问约德尔说，“我们最后再用点力就要胜利啦。”并命令陆军元帅冯·包克向莫斯科作最后攻击。他妄图在莫斯科举行“胜利庆典”。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斯大林打电话给朱可夫：

“你坚信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吗？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向你提出这个问题，希望你作为共产党员诚实地回答我。”

“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朱可夫回答说，“但是，至少还需增加两个集团军和 200 辆坦克。”

“你有这样的信心很好，要英勇顽强！”斯大林说，“你打电话给沙波什尼科夫，商量一下把你所要的两个预备队集团军集中到哪里。它们将于 11 月底准备好，但是坦克我们还没有。”斯大林并指示朱可夫采取紧急措施，用快速反突击战术，迅速地把德军打到运河西岸。到 11 月底和 12 月初，苏联第一集团军和重新组建的第二十集团军，在第十六和第三十集团军的紧密配合下，在空军的支援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击，解除了敌军从北面和西北面突入莫斯科的危险。

在这次保卫莫斯科的战役中，苏军第 316 步兵师，表现了苏联红军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这个师守卫着通往伊斯特腊和莫斯科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的最重要地段。该师的一位政治指导员罗契柯夫带领着一个战斗组，在杜波塞科沃附近的一个分道口坚守阵地。德军的坦克部队企图沿着这条公路直逼莫斯科。

11 月 16 日清晨，战斗打响以后，双方立即展开激烈的搏斗。在持续 4 个小时的战斗中，这个战斗组击毁了敌人 18 辆坦克，击毙德军数十人。指导员罗契柯夫鼓励战士们说：“苏联虽大，但已没有地方可退，后面就是莫斯科！”这时只剩下 28 个人。但是，他们宁死不屈，坚决守住公路，不让德军通过。最后，他们弹尽粮绝，指导员拿了一捆手榴弹，向德军坦克猛扑过去，把德军的一辆坦克炸毁。

28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尽到了保卫首都的光荣职责。

在莫斯科南面，德军于11月18日发起进攻，12月3日包围了图拉，切断了它和莫斯科之间的铁路和公路联系。苏军连夜抽调增援部队，向德军发动了快速反突击，在图拉工人歼击营的配合下，打退了德军的进攻。德军不能占领图拉，就从东面迂回，向卡希拉进攻，妄图从守卫图拉地区的苏军后方突破。苏军再次打退了德军的进攻。就这样，无论德军如何企图在11月份占领图拉，从而打开通往苏联首都的道路，但均未能得逞。图拉市像一个无法攻克的堡垒一样屹立着！图拉捆住了德军整个右翼集团的手脚。当时敌人决定迂回图拉，为此不得不把自己军队的部署拉长，古德里安集团军也因此失去了应有的战役战术的密度。

德军从南、北两翼包围和占领莫斯科的企图失败以后，便打算单刀直入，从正面直接突入莫斯科。12月1日，德军从正面，即纳罗佛明斯克地区向莫斯科发动最后一次进攻。经过五天激战之后，德军惨败，被迫退到纳拉河西岸。12月5日是莫斯科会战关键性的一天。在环绕莫斯科周围200英里的半圆形阵地上，德军全线被制止住了。傍晚，古德里安通知包克，他不仅已经被止住，而且还得后撤。包克打电话给哈尔德说，“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同时，勃劳希契也绝望地告诉他的参谋长说，他要辞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这一天被称为是德国将领们“黑暗、悲惨的一天”。

古德里安后来写道：“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必须作出这样一种决定，没有比这再困难的事了……我们对莫斯科的进攻已经失败。我们英勇的部队的一切牺牲和煎熬都已归于徒劳。我们遭到了可悲的失败。”在克鲁格的第四军团司令部里，参谋长勃鲁门特里特已看出形势到了转折点。他后来回忆道：“我们想在1941年打败俄国的希望，已在最后一分钟化成泡影了。”

在莫斯科城下20多天的激战中，德军损失惨重。从11月16日到12月5日，德军损失官兵15.5万人，坦克777辆，大炮、迫击炮数百门。希特勒向莫斯科发动的“台风”攻势遭到失败。苏军在斯大林的运筹下，一场威武雄壮的反攻就要开始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三章 “闪电战”破产

“台风”破产形势危，“元首”暴躁如滚雷；

闪电计划遭破产，苏俄大地暖气吹。

话说希特勒发动的“台风”攻势遭到了失败，斯大林不失时机地决定开始大反攻。这次大反攻的首要意图是，在莫斯科战线的西北面收复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西面解放伊斯特拉，南部解除德军对图拉的包围，从而消除首都所面临的威胁，并进一步扩大战果，尽可能把敌人远远地赶向西部。

12月6日凌晨，莫斯科大反攻开始了。在经过集中的空袭和炮火准备之后，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的部队从莫斯科南、北两面开始采取行动。现在随着战斗的胜利进展，战争的主动权已逐渐掌握在士气高昂的苏联红军手里。这时，早一天发动进攻的加里宁方面的部队，已经在加里宁以南楔入敌军防御。加里宁方向的攻势起初是成功的，但由于冬季道路无法通行和兵力不占绝对优势而受阻。西方方面军右翼向敌人施加了强大压力，大有分隔并合围从克林到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的德军集团之势。

苏联红军对克林的进攻，迫使德军指挥部开始从邻近地段调兵增援，但他们这样做，反而便利了红军向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红波利亚纳和伊斯特拉的进攻。到13日，德军在克林和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地区的抵抗已被粉碎，丢下大炮和车辆，向后退却。沿着积雪覆盖的道路向西退却的德军部队，遭到苏联空军的猛烈轰炸，损失惨重。

12月12日，即在这次反攻开始后不到一个星期，库利尔·卡利诺夫在方面军司令部会见了朱可夫将军。他写道：“朱可夫给人的印象是，他已经疲劳到了极点，两眼布满了血丝，深陷到眼窝里。他瞌睡得似乎挺不住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嘶哑的。但他仍然凭着他的非凡的毅力坚持着。在他面前，桌上放着好几杯配茶——配得发黑。他喜欢喝茶，而且喝得过多。”

朱可夫并没有疲倦到无法指挥部队的程度。他仍然保持着他在哈勒欣河和列宁格勒完成艰巨任务的那种旺盛的精力和坚强的意志。在他指挥下，别洛夫将军的两个哥萨克骑兵师和近卫第一师，12月16日到18日，打垮了德军坦克第十七师，步兵第二十八师、第二十九师和第三十师，解放了斯大林诺哥尔斯克和韦涅夫。在这次反攻期间，朱可夫发现有时不得不到各个方面军司令员那里去协调他们的行动，进行指导以及发布特别的指令。在反攻开始后大约一个星期，朱可夫发布了如下命令：

“……追击敌人必须迅速，以防敌人脱离战斗。必须广泛使用强大的先遣部队去夺占公路交叉点和隘路，并打乱敌军的行动队形和战斗队形。……我严禁对强固的抵抗中心实施正面进攻。先头梯队应毫不停顿地绕过它们，把它们留给后续梯队去歼灭。”

朱可夫是在他的突击部队陷入代价高昂、劳师费时的正面进攻而无法前进之后发出上述命令的。许多年轻的苏军指挥员缺乏进攻作战的经验，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化了。有的指挥员由于担心被合围，对于把部队投入战线上的缺口，有些犹豫不决。大规模装甲兵团的不足，严重妨碍了突破计划的完成。由于缺少坦克，朱可夫向敌人后方派出了滑雪部队、骑兵和空降兵，封锁敌军的退路，为围歼德军创造了有利条件。到12月16日，苏军部队已把德军赶出了加里宁、克林和耶列次。在此后的几天里，别洛夫将军的部队和弗拉索夫将军的部队，在对德军的大规模进攻中，缴获了许多武器和车辆。

12月16日夜，古德里安接到希特勒的一个电话，禁止他继续后退，并答应派来补充部队。奉命午夜去向“元首”汇报的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次会见时希特勒讲的一番话：“请安静！全面退却的问题毫无考虑的余地。敌人仅仅在几个地方取得了重大突破。关于修筑后方阵地的主张，完全是胡说八道。前线唯一的困难是，敌军士兵在人数上超过了我们。他们的炮兵一点儿也不比我们多。他们的士兵同我们的士兵相比差得远。”

尽管希特勒三令五申，但仍阻挡不住红军胜利前进。12月12日，哈尔德在电话上同冯·包克元帅讨论了当天发生的事态。嗣后，他在日记中隐晦地写道：“战局已进入十分危急的阶段。第134师和第45师不能够再继续作战了。没有补给品。对图拉和库尔斯克之间地段的控制垮掉了。集团军群的命令是分阶段地后退到图拉——诺沃西尔季姆一线。”哈尔德指出，在北方，积雪封锁了铁路线，阻碍了补给品的运输和部队的调动。与此相反，红军却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奋勇向前。

由于苏军最高统帅部的英明决策，各兵种的密切配合，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善战，以及后方人民的积极支援，到1942年初，苏军击溃了窜到莫斯科城下的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群的突击兵团，毙伤敌军16.8万人，把敌人赶离莫斯科100到250公里。在此期间，苏军解放了1.1万多个居民点，收复了克林、加里宁、卡卢加等许多城市，解除了德寇对图拉的包围。苏联红军前进到谢利查罗沃、尔热夫、沃洛克拉姆斯克、卢萨、别列夫和姆岑斯克一线，解除了德军对莫斯科的包围。与此同时，苏联红军在北方解放了齐赫文等城市；在南方，苏联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在刻赤半岛登陆，防止敌人从这里进攻高加索，同时也减轻了德军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压力。

在莫斯科战役胜利的鼓舞下，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乘胜前进，发动全线进攻。1942年1月5日，最高统帅部讨论了作战计划。据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一书中记述，斯大林说：“德军由于在莫斯科附近的失败而惊慌失措，而且他们过冬的准备很差。现在正是转入总攻的最好时机。”苏联最高统帅部的意图是：以西方正面为主攻方向，消灭德国中央集团军的主力，夺回尔热夫、维亚兹马和斯摩棱斯克；在北方，消灭列宁格勒附近的敌军，解除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包围；在南方，解放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半岛。

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决定，从1942年1月8日开始，苏联9个方面军以及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在空军的支援下，先后以110万之众，7652门火炮，774辆坦克，1000架飞机，向德国及其仆从军发动了全线进攻。

当德军遭遇红军的反攻而在冰天雪地中后撤时，德国的高级将领也开始被追究责任了。由于罗斯托夫的失守，伦斯德已被解除南线部队司令官的职务。陆军元帅冯·包克，自从12月间遭到失败以后，胃病转重，已于12月18日由冯·克鲁格元帅接替了他的工作。而克鲁格的被打得落花流水的第四军团已被逐出莫斯科近郊，而且永远不能再推进到那里了。甚至在德军将领中号称“英勇善战”，首先采用大规模装甲战而革新了现代战争的古德里安将军，也在圣诞节被解除了职务，因为他未经上级批准，擅自下了撤退命令。同样渲赫一时的坦克部队司令霍普纳将军，也以同样的罪名被希特勒突然撤职，褫夺了军阶。他的第四装甲集团军曾到达莫斯科北面望得见城区的地方，但随即被逐退。汉斯·斯波纳克将军，一年前曾以指挥空运部队在海牙登陆而得到骑士十字勋章，现在受到更严厉的处分。因为在12月29日当苏军在他背后从海上登陆时，他把一个师从他在克里米亚的一个军中撤了出来。他

不仅被立即褫夺军阶，还被拘禁，送交军事法庭审讯，在希特勒的坚持下被判以死刑。

甚至连善于逢迎拍马的凯特尔也与希特勒闹起纠纷。就是像他那样的人在12月初也清楚地看到：为了避免奇灾大祸，必须从莫斯科作全面撤退。但是，当他鼓足勇气向希特勒陈述这个意见时，希特勒对着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大声骂他是“木头人”。过后不久，约德尔看到，凯特尔哭丧着脸，坐在桌旁写辞呈，旁边搁着一支左轮手枪，看样子想自杀。约德尔悄悄地挪开手枪，劝凯特尔不要辞职，要对希特勒的侮辱继续忍耐。凯特尔照办了。

陆军司令冯·勃劳希契元帅，因为不能像纳粹头子所要求的那样，统率一支常胜不败的军队，这项吃力的差使使他的心脏病一再复发。到朱可夫开始发动反攻时，他已决意要辞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12月15日，他到新转移的防线视察以后回到总司令部，哈尔德在日记中说他“疲惫不堪”，并且写道：“勃劳希契再也看不到有使陆军摆脱绝境的办法。”这位陆军首脑已智穷力尽。他在12月7日曾请求希特勒免去他的职务，12月17日又提出一次，两天以后得到正式批准。3个月以后希特勒跟戈培尔及其他一些亲信谈起他对这位陆军总司令的看法时，说他是“一个爱好虚荣、懦弱无能的可怜虫，笨蛋一个”。还说：“如果勃劳希契再留在他的职位上，哪怕是几个星期，事情会酿成巨灾大祸。”

由谁来接替勃劳希契，这个问题在陆军人士中曾引起种种猜测。1941年12月19日，希特勒决定亲自担任陆军总司令。他深怕“兵败如山倒”，不可收拾。这个纳粹头子对陆军总参谋长说：“担任作战指挥算不得什么，是谁都干得了的。陆军总司令的任务是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方式训练陆军。我不知道有那位将军能按照我的要求做到这一点。因此，我决定亲自接任统率陆军的职务。”希特勒就这样取得了普鲁士军官团的胜利。这位曾在维也纳当过流浪汉的前下士，现在成了国家元首、战争部长、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兼陆军总司令。哈尔德在日记中不满他说：“将军们现在只不过是传送希特勒命令的信差，而他的这些命令是根据他的独特的战略思想制定出来的。”

希特勒担任陆军总司令10天以后，就发出一道命令，强迫他的法西斯军队不准撤退，坚决死守，直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为止。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德军转入防御，拼命死守。纳粹将领勃鲁门特里特认为，希特勒坚持要部队稳住阵脚、继续战斗的坚强意志，是他在战争中的最大成就；也许正由于此，法西斯军队才没有在冰天雪地中完全土崩瓦解。勃鲁门特里特说：“希特勒执意下令部队不论在任何形势下，不论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都必须坚守阵地，这无疑是正确的。他本能地意识到，在冰天雪地中作任何撤退，必将使前线在几天之内土崩瓦解。他也意识到，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德国部队一定要遭到拿破仑大军同样的命运……由于冰雪封途，撤退只能通过空旷的田野。这样，用不了几夜，部队就支持不住，他们就会情愿在半道上躺倒等死。而且，后方也没有为他们撤退准备好新的阵地，也没有他们可以守得住的任何防线。”

德国法西斯侵略军，不论是前线部队还是远在后方的大本营，全都惶惶不可终日。哈尔德把这种情况生动地记在日记中。“非常困难的一天！”这是1941年圣诞节日记的开头一句话。一直到新年以后，他在日记中记述了苏联军队的历次突破和德军所遇到的严重情况，其中写道：

“12月29日。又是危急的一天！……元首和克鲁格在长途电话中作了

紧张的谈话。元首禁止第四军团北翼继续后撤。第九军团情况岌岌可危，该军团的指挥官们显然已不知所措。中午，克鲁格慌慌张张地打来一个电话。第九军团请求撤退到尔热夫后面……

“1942年1月2日。激战的一天！……第四军团和第九军团情况十分危急……俄国军队已突破马洛亚罗斯拉韦茨北面的阵地，把前线撕开一个大缺口，目前还看不出有重建防线的办法……由于这种情况，克鲁格要求批准撤出深陷在敌后的阵地。与元首展开激烈争辩，元首仍坚持他的意见：不论后果如何，必须保持现有阵地……”

“1月3日。马洛亚罗斯拉韦茨和博罗夫斯克之间的防线已被突破，情况越发危险。库勃勒和包克十分激动，要求批准撤出北路正在崩溃的阵地。元首怀疑手下的将领是否有勇气作出困难的决定，发了一顿脾气。但是部队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明明是无法守住阵地的。元首下令：他会亲自来决定是否有必要继续撤退……”

但是，正如美国著名记者、《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所指出的，这种事情的决定权，已不在纳粹头子希特勒而在苏联统帅斯大林手中了。希特勒能勒令德国军队拼死守住阵地，但是他再也阻挡不了苏联军队的前进。1月8日是哈尔德在日记上记载的“万分危急的一天”。“莫斯科西南的苏希尼契的突破，使克鲁格的处境更困难了。因此他坚持要求撤出第四军团。”这位陆军元帅给希特勒和哈尔德打了一整天的电话，坚持要求撤退。到了晚上，“元首”才勉强同意了。他批准克鲁格“逐步地”后撤，“以保护部队的联络”。

原定要在莫斯科庆祝圣诞节的德国军队，现在，在这一整个可怕的冬天，却被苏军逐步地有时是迅速地击退。此外，也因为恐怕遭到红军的包围和突破而退却。经过三个月的鏖战，苏军在最高统帅斯大林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到1942年4月中，苏军在各条战线上，先后把德寇击退了150到400公里，解除了德军占领莫斯科和北高加索的危险，改善了列宁格勒的处境，加强了对列宁格勒的供应。苏军完全解放了莫斯科州和图拉州，部分地解放了列宁格勒州、加里宁州、斯摩棱斯克州、奥廖尔州、库尔斯克州、哈尔科夫州等，收复了刻赤半岛，夺回了60多座城市，1.2万多个居民点。在整个冬季战役中，德寇损失重大，约有50个师被击溃，仅陆军就伤亡83万多人。德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在2月将尽时，在日记中记下入侵苏联以来德军损失的数字。他写道，到2月28日为止，兵员损失共计1005636人，相当于他的全部兵力的31%。这还不包括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意大利部队在苏联的重大损失。

德军在莫斯科战役和冬季战役的失败，标志着希特勒“闪电战”的彻底破产。早在制定“巴巴罗沙”计划时，希特勒统帅部就狂妄宣称，要在6个星期之内，消灭苏联。然而苏德战争已经进行了8个多月，“巴巴罗沙”计划却远没有实现。它原定占领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和顿巴斯三个主要目标，只实现了一个，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仍牢牢掌握在苏军手里。至于实现他们的第二步计划，即占领阿斯特拉罕、伏尔加和阿尔罕格尔斯克，就更加遥遥无期了。

希特勒在莫斯科战役的失败，是德国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到的第一次大失败。他们曾经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就占领了西欧和北欧六个国家，逞凶一时，不可一世。他们妄想在一个半月之内，把苏联彻底打败，

从地球上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希特勒已经意识到，他要想征服苏联的这一赌博已经失败了，不仅在六个月的时间内办不到，而且永远办不到。哈尔德在 1941 年 11 月 19 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元首”向最高统帅部几个军官所作的一次长篇“训话”。希特勒在德国军队离莫斯科只有几英里而且正在死命进攻这个城市时，便已经放弃了在年内打败苏联的希望，而在打第二年的主意了。哈尔德记下了“元首”的打算：“明年的目标：首先拿下高加索。目的：俄国南方边疆。时间：3—4 月。北路方面，今年战事结束以后，进攻沃洛格达或高尔基，时间只能在 5 月底。明年还有什么目标，尚待决定。一切将看铁路运输的能力而定。关于将来要建立一堵‘东壁’的问题也待以后决定。”

莫斯科会战对许多德军指挥官来说也是无法忘记的。在会战期间。担任德军第四集团军参谋长的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流露出他的凄楚心情。他写道：

“莫斯科会战，使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首次遭到重大失败，它标志着希特勒和德国军队曾赖以在波兰、法国和巴尔干各国赢得辉煌胜利的‘闪电战术’的完结。第一个致命的决定正是在俄国作出的。从政治观点看，一切决定中最致命的决定，乃是决定首先进攻这个国家。因为这时我们与之交战的敌人比我们以前遇到过的敌人要强大得多。在那无穷无尽的东线，再也不能轻而易举地打胜仗了。”

“我国的很多领导人严重地低估了这个新的敌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无知，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既不了解俄国人民，也不了解俄国军队。我们的一些负责的高级军官，从来没有在东线作过战。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都是在西线度过的。因此，对于地理条件造成的困难，对于俄国军人的顽强，他们是毫无所知的。他们对专家们提出的警告置若罔闻。”

对纳粹侵略者们来说，这一认识一定是起了当头棒喝的作用的。6 个星期以前，希特勒还在柏林发表过狂妄的广播演说，“毫无保留地宣布俄国已被打垮，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如今，他的计划已经给打得粉碎了，他的希望已经化为泡影了。正如勃鲁门特里特将军所惊呼的：“东线战场到了一个转折关头，我们要在 1941 年打垮俄国、结束战争的希望在一瞬间破灭了。……置身莫斯科郊外的每个士兵都懂得，这是一次生死存亡的战斗……德军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坚守，要么被消灭。”

莫斯科战役后，德军的力量大大削弱了，只要纳粹的武库中失去了突然性的因素，它就要走下坡路了。与此相反，苏联军队在莫斯科战役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苏军开始为争夺战略主动权而斗争。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红军在因德帝国主义者背信弃义的进攻而暂时退却以后，夺得了战争进程中的转折，由积极防御转入向敌军有效进攻，……由于红军的胜利，卫国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从希特勒妖孽手中解放苏联国土的时期。”正是：苏俄大地红旗飘，最高统帅发号召；解放国土好时机，乘胜前进捉贼妖。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四章 合纵抗敌

合纵抗敌搞统战，团结多数拒凶顽；
斗争联合巧运用，战鼓雷鸣喜开颜。

苏德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新阶段。这不仅是战争地域的扩大和参战人口的增多，而首先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性质更为加强了。斯大林对内放手发动群众，抗击法西斯侵略；对外合纵抗敌，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到1941年4—5月间。希特勒向苏联边境大量集结兵力，发动进攻的动向已日益明显。6月1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致电美国罗斯福总统说：“看来德国即将大举进攻俄国。……如果这场新战争爆发，我们当然要遵循希特勒乃是我们必须击败的敌人这项原则，给予俄国人以最大的鼓励和我们能够提供的任何援助。我认为，此问不会有任何阶级性的政治反映，并相信德俄冲突不致使你感到为难。”

6月21日，美国驻英大使怀南特向丘吉尔口头转达了罗斯福的一项保证：如果德国进攻俄国，罗斯福当立刻公开支持“首相可能就欢迎俄国为同盟国而发表的任何声明”。所以，在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当天，英国首相丘吉尔立即在6月22日晚上9时发表广播演说，表明英国政府的立场。他说：“在过去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丘吉尔表示，“我们要对俄国和俄国人民给予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丘吉尔的演说无疑地反映了英国人民的意志。6月23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对德作战。24日，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将尽一切可能援助苏联。

斯大林说，“事物的逻辑胜过任何其他逻辑。”他在7月3日的广播中指出：“我们为了保卫我们祖国的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将同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为争取他们的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汇合在一起。这将是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奴役和奴役威胁而结成的统一战线。”苏联领导人对于英国首相的广播演说和美国政府的宣言表示感谢。至此，苏美、苏英关系得到改善并逐步密切起来。

以顽固反共著称的丘吉尔，所以要主动地援助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不是偶然的，主要是时代和局势的推动。为了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利益，不得不改弦更张。从1940年5月底敦刻尔克大撤退和6月下旬法国败降以后，英国空前危殆，丘吉尔一方面支持迁居伦敦的欧洲各国流亡政府，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另一方面大力争取美国支援，希望美国逐渐加入同盟国。1941年3月底，隆美尔指挥的德国军队和意大利军队在利比亚的昔兰尼加突然发动进攻，在12天中就占领了这个省，包围了托卜鲁克，并进抵离埃及边境只有几英里的巴尔迪亚。英军对希腊的援助也以失败而告终，4月底退出希腊，5月底退出克里特岛。与此同时，德国法西斯代理人又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寻衅，企图把英国势力赶走。因此，英国在地中海和中近东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1941年5—6月间，英国危如累卵，丘吉尔忧心忡忡，极力寻找对策，以使英国摆脱所面临的困境。

正当英国四面楚歌、危在旦夕之时，希特勒把强大的战争机器开向东方，

把 400 万大军和数以万计的飞机和坦克强加在苏联人民头上。这使丘吉尔如释重负，使英国政府的大臣们都有轻松和宽慰之感。据当时的外交大臣艾登回忆，6 月 21 日，丘吉尔邀他到契克斯去度周末。“第二天 7 点半光景，首相的侍从索那斯到我的卧室里来说，‘首相向你祝贺，德国军队已经进攻俄国了。’接着他递给我放在银盘上的一支大雪茄烟。我穿上睡袍，走进首相的卧室。我在品尝宽慰的滋味，此刻我也无心欣赏雪前了。”丘吉尔清醒地看到，苏德战争能使英国摆脱困境。因此，6 月 22 日，当苏德战争刚一爆发，这个老谋深算、具有政治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就在广播演说中表示：“任何对纳粹作战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他进攻俄国只不过是进攻不列颠诸岛的前奏。因此，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让我们加倍努力，只要一息尚存，力量还在，就齐心协力打击敌人吧。”

处在地球那一边的美国，虽然距离德国很远，但也直接和间接地受到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威胁。早在 1936 年，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时期，希特勒就开始觊觎拉丁美洲这块丰饶的土地，妄图在这里渗透德国人的势力。希特勒在与劳什林的一次谈话中，曾经透露说，我们一定要在拉丁美洲建立一个新的德国……德国人利用墨西哥的宝藏就能够成为富有的伟大民族……我们还将在巴西建立一个新的德国。希特勒妄图控制整个拉丁美洲，并在那里建立强大的基地，以进攻美国。美国总统罗斯福得知这一情报后，气愤他说，“我手中现在有一张新世界秩序的设计者、德国的希特勒政府所绘制的南美及中美一部分地区的地图。这张地图清楚地表明，希特勒的计划不仅是针对着南美，而且也是针对着合众国本身的。”后来，希特勒又在作战指令中正式宣布：“海军的战斗人员和装备应以能保证直接对英国、必要时对美国作战为限度。”尤其在 1941 年 4 月，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北非之后，法属西非面临被侵占的危险。而德、意法西斯军队一旦占领西非达喀尔，距巴西就只有 1870 英里，将直接威胁到西半球的安全。

虽然美国的安全和特权受到法西斯势力的严重挑战；但是，美国的反动势力十分猖獗，他们公开叫嚣，“对美国来说，共产主义在世界的胜利比法西斯主义更加危险。”而另一些政客则希望借希特勒之手削弱苏联，或者是使苏德两败俱伤，借收“渔人之利”。民主党参议员、后来的美国总统杜鲁门露骨地表达了这种愿望。他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要胜利，我们就帮俄国，而如果俄国要胜利，我们就帮助德国，让他们尽可能地互相厮杀，厮杀得愈厉害愈好。”

然而，以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代表的当权人士，却清醒地看到了德国法西斯是美国最主要的危险和敌人。所以，1941 年 6 月 23 日，美国代理国务卿威尔斯发表声明，支持苏联。他说：“对美国来说，共产主义独裁制度，同纳粹独裁制度的原则和主义一样也是不能容忍的。……但是，美国人民目前的问题是：希特勒正在竭尽全力征服世界，残忍奴役一切人民。因此，美国政府认为，任何防御希特勒主义的办法，任何集中力量——不论这种力量来自何方——的行动都将加速德国现在的领袖逃不掉的失败，并因而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国防和安全。在今天，对美洲各地的主要危险是希特勒的军队。”第二天，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准备给予苏联一切力所能及的援助。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党和政府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采取了灵活的外交

政策，积极争取同英美以及一切反法西斯国家建立和加强友好合作关系，组成国际反法西斯同盟。1941年7月12日，在莫斯科签定了苏英对德作战联合行动协定。在协定中，双方保证，在对德作战中，彼此给予各种援助和支持。两国政府承认，在这次战争中，除彼此同意外，既不同敌国谈判，也不同敌国缔结停战协定和单独媾和。同年8月16日，苏英还签订贸易、贷款和支付协定，规定英国给予苏联1000万英镑的贷款。鉴于德国法西斯分子在伊朗的活动十分猖狂，苏英两国政府商定，采取联合行动。

1941年8月，两国同时出兵，从南北两面进驻伊朗，从而防止了法西斯分子在伊朗的危害。后来，伊朗成为美英两国从南部援助苏联的交通要道。

在此期间，苏联政府还同流亡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政府发展外交关系。7月18日，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签订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一致行动的协定，同意双方在战争中，彼此提供一切援助与支持。7月30日，在伦敦，苏联政府又与波兰流亡政府签订了互助协定，恢复了苏波关系。在苏捷和苏波协定中，还规定在苏联境内分别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和波兰军队，以便共同参加对德作战。8月间，苏联同挪威和比利时的流亡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9月底，苏联政府正式承认了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

自1941年7月30日罗斯福的顾问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后，苏美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在同霍普金斯进行第二次会谈时，斯大林提出，希望美国能参加对德战争。对此，霍普金斯说，他的使命只是有关供应问题，至于美国参战的事，主要取决于希特勒自己和他对美国根本利益的侵犯。霍普金斯在同斯大林的两次谈判中，取得了有关苏联实力和前途的大量情报，加深了对苏联的了解。他相信苏军能够顶住希特勒的进攻。美国史学家舍伍德说，这是战时英美对苏联关系的转折点。因此，霍普金斯的莫斯科之行，对于加强和扩大反法西斯同盟起了积极的作用。

希特勒对苏联悍然进攻之后，斯大林在7月3日广播演说中表明，“这个反法西斯压迫者的全民卫国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消除我国面临的危险，而且还要帮助那些呻吟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枷锁下的欧洲各国人民。”斯大林的这篇演说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它促使英美政府也要对法西斯侵略和战争目的表明自己的态度。罗斯福和丘吉尔出于本国的切身利益和安全，秘密商定进行战时第一次会晤。1941年8月初，罗斯福和丘吉尔率领两国有关的军政官员在纽芬兰的阿金夏港举行会谈。罗斯福一行于8月9日乘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到达该地；第二天，丘吉尔乘“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进入阿金夏。双方在军舰上就有关对德政策问题进行了商讨和争论，最后于8月13日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14日正式公布，史称“大西洋宪章”。声明指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斯福和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代表首相丘吉尔经过会晤，认为他们两国国策中某些共同原则应该予以宣布。其主要内容是：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不承认法西斯通过侵略所造成的领土变更；尊重各国人民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恢复其被剥夺的权利和自治权，世界各国在贸易和原料方面享受平等待遇；促成一切国家在经济方面最全面的合作；在最终摧毁纳粹暴政之后，希望重建和平，使各国俱能在其疆土内安居乐业，保证人类都可以过无所恐惧、不虞匮乏的自由生活。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声明对于动员和鼓舞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一步加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罗斯福总统在美国还没有参战的情况下，挺身而出，与

丘吉尔发表这个声明，充分显示了这位具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勇气和胆略。他通过“租借法”向抗击法西斯的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据不完整的统计，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4年4月，美国，还有加拿大和英国，向苏联提供了飞机1.2万架，大型驱逐舰12艘，装甲车9000余辆，卡车22万余辆，以及其他许多武器、装备和大量战略物资，支持了苏联的抗德战争。

为了进一步加强苏美英三国之间的合作，1941年9月29日至10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苏美英三国会议。苏联代表团长是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英国代表团长是军需大臣比弗布鲁克，美国代表团长是罗斯福总统特使哈里曼。斯大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美英向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问题。在会前斯大林和丘吉尔的来往函电中，斯大林曾要求英国能在1941年内于巴尔干或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以迫使德国从东线调走30到40个师。但英国当时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这样做。这时美英即使在提供武器装备方面也各有困难。由于美国还没有直接参战，它的强大的工业还没有转入战时轨道。英国既要保卫本土，又要维护庞大的殖民帝国，兵力和武器装备都感到不足。尽管如此，美英两国还是尽力满足了苏联提出的一些要求，以支持它把反法西斯战争坚持下去。经过谈判，于1941年10月1日到1942年6月30日，英美两国每月向苏联提供400架飞机、500辆坦克以及其他各种武器和军用物资。苏联向英美提供原料。

莫斯科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果。1941年10月30日，罗斯福代表美国政府写信给斯大林，宣布给苏联1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11月7日，美国把租借法扩大到苏联，这样就为向苏联提供军事援助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关于三国外长会议的重要意义，正如莫洛托夫10月2日在闭幕会上所讲的：“像英美苏这样的强国的力量大联合，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大联合，就已大致预定了我们对希特勒匪徒的斗争必然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不管希特勒匪徒在战线的这一阵地或那一阵地取得了多少暂时的胜利，而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对希特勒、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单是切齿痛恨，是不够的；单是一心希望他们劫数难逃，也是不够的。”莫洛托夫说，“我们必须知道，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进攻、掠夺，我们都要把他们打垮，对他们迎头痛击，以便把各族人民所一致诅咒的这批犯罪的暴徒和侵略者的政权永远扑灭。要达到这个目的，就特别需要打破他们的阴谋诡计。这种阴谋诡计的真正本质，就是要把他们的敌国逐个击破。”

“这次会议的政治意义，就在于事实上它已昭示我们：现在已经怎样毅然决然地打破了希特勒匪徒的这些阴谋诡计。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由苏英美做先锋，已形成了反希特勒的强大阵线。狂妄自大的希特勒，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强有力的各国大联合，他还不曾受到过这种抗拒的威力。我们一点也不怀疑：我们的伟大的反希特勒阵线的实力是会迅速地增强，天下决没有能够打破这种反希特勒阵线的力量。这类国家的大联合已终于团结起来对付希特勒主义了，这种大同盟必将想出种种方法来把欧洲纳粹脓疮，以及它对于一切热爱独立和自由的各国人民的威胁，统统从地面上铲除干净！”莫洛托夫最后代表斯大林，代表苏联政府和人民，向英美两国代表提出保证：“我们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是不屈不挠的！我们对所有一切爱自由的各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必然能取得胜利，我们必胜的信念又是决不可动摇的！”

1941年底，苏联红军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取得了伟大胜利，希特勒“闪电

战”遭到彻底破产。同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进攻英、美、荷在东南亚的属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4天，德意日签订了对英美共同作战协定。英美被迫对日宣战，德美也互相宣战。从此，美国正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新西兰、南非联邦、哥斯达黎加、古巴、尼加拉瓜、巴拿马、萨尔瓦多、“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和波兰政府也相继对日宣战。中国也向德、意、日宣战。战争席卷和波及了世界4/5的人口。德意日法西斯不断扩大侵略战争，进一步促进了反法西斯力量的壮大和发展，加强了国际反法西斯同盟。

1941年12月22日，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举行“阿卡迪亚”会议，以商讨两国整个作战计划。会议期间，美国倡议由阶有对德意日三轴心国作战的同盟国家签署一项共同宣言，即《联合国家宣言》。美国提出的宣言草案经与英苏两国政府磋商并加以修改后，用急电发给各同盟国政府。12月27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分批会见了各同盟国驻华盛顿大使，并告知他们关于这个宣言的内容。

“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对于1941年8月14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所作联合宣言称为大西洋宪章内所载宗旨与原则的共同方案业已表示赞同。

深信完全战胜它们的敌国对于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并对于保全其本国和其他各国的人权和正义非常重要，同时它们现在正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兹宣告：

（一）每一政府各自保证对与各该政府作战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者使用其全部资源，不论军事的或经济的。

（二）每一政府各自保证与本宣言签字国合作，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

现在或可能将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给予物质上援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得加入上述宣言。”

《联合国家宣言》的签订，表明反法西斯同盟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标志着这个同盟的进一步壮大和加强，同时也为联合国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美国国务卿赫尔热烈欢呼这个宣言的发表。他说：“联合国家的宣言在历史上最大的共同作战努力中，把代表六大洲绝大多数居民的26个自由国家的决心和意志联合起来了。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说明遵守法律、爱好和平的国家到了必要的时候能够团结起来使用武力去维护自由、正义和人类的基本准则。”

但是，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内部并不是没有矛盾的。作为统一战线的主要成员——苏联、美国和英国之间，仍然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斗争。美国、英国和苏联，在战争中都是执行各自的战前政策。在整个二次大战中，美国 and 英国的政策始终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给苏联援助；另一方面又力图隔岸观火，从中渔利。它们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态度也不是很积极的。美国和英国之间又各有打算。英国力图保持和恢复其原有的势力范围，而美国在政治上除了反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共同点外，也充分利用英国在战争中的困难处境和不得不依赖美国的援助和支持的机会，极力排挤、瓦解和夺取英国的势力范围，力图在战后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

苏联的政策也有从自身利益考虑的一面。1941年4月，苏联同日本缔结了《苏日中立条约》。据日本报纸发表的日苏两国共同宣言，其中表明苏联

实际上承认了伪满洲国的现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世界上多数国家纷纷对日宣战，而苏联仍保持中立。直到 1944 年 11 月，苏联才第一次公开谴责日本为侵略国。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两次会议中，苏联在美国和英国同意它提出的各项条件之后，才答应对日作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国家和武装力量，经过曲折复杂的道路，终于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了摧毁德意日法西斯的狂飙怒涛。尽管在同盟国内部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但这并没有妨碍它们在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中采取一定程度的联合行动。斯大林曾指出：“否认参加英苏美同盟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和社会制度上的差别那是可笑的。但是，这是否排斥这个同盟中的成员采取共同行动，去反对使它们受奴役威胁的共同敌人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呢？绝对不排斥。”问题在于德意日法西斯把战争和奴役的威胁强加给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这是促使反法西斯同盟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而德国进攻苏联和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又进一步壮大和加强了这个同盟。正是：团结御侮力量大，顽敌横行到几时！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五章 争夺战略主动权

春暖花开硝烟浓，战略主动两相争；
统帅用兵多算计，捕捉战机显神通。

在莫斯科会战和苏军冬季反攻胜利后，敌我双方都急需休整。法西斯侵略军更是精疲力竭。随着泥泞季节的到来，漫长的苏德战线相对地沉寂下来。但双方都在秣马厉兵，准备更大规模的战斗，以争取战略主动权。

1942年春末，苏联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都有所改善。反法西斯战线在继续扩大和巩固。1月份签订了26国宣言。签字国一致同意全力反对进行侵略的国家，不和这些国家单独请和或签订停战协定，并与美英两国达成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各种情况，尤其是莫斯科附近德军的惨败，希特勒对苏联发动闪击战计划的破产，大大地鼓舞了各国的反法西斯力量，特别是进一步增强了苏联军民必胜的信心。

当时，苏联还无力进行全面反攻。自从西部国土沦陷后，苏联的工业产品减少了1/3，耕地面积减少了47%，牲畜头数减少一半。燃料电力都感缺乏，铁路运输极其紧张，人力更感不足。但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工农群众忘我地劳动，到1942年春天，苏联军工生产已恢复到战前水平。

为了进行下一步的较量，苏联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和各方面军司令部，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对前一阶段作战进行了总结、探讨和研究了苏军成功和失利的行动，深入研究了德军的强点和弱点及其作战技术。在莫斯科地区获得重大胜利的鼓舞下，苏联政府顺利地实现了把国民经济纳入战时轨道的转变。在苏军的装备中开始越来越多地补充了新式坦克、飞机、火炮和火箭炮。在发动冬季攻势时，苏联的武装力量在数量和技术装备上还远不及敌人。当时，它还没有训练好的预备队和足够的物质资源。如今，随着坦克工业和火炮工业的发展，斯大林已经能够开始组建由当时最新式的技术兵器装备的坦克军和坦克集团军了。

为了有效地对付德军的坦克，部队装备了改装了的45毫米反坦克炮和新式76毫米加农炮。组建了新的炮兵部队和兵团。在军队防空和国土防空的组织方面，斯大林采取了很多措施。到6月份，已建立了8个空军集团军，远程空军兵团也开始得到大规模补充。这时苏军作战部队的兵力增至560万人，坦克达到3882辆，火炮和迫击炮达到4.9万多门（尚不包括50毫米以下的迫击炮），作战飞机达到2221架。在北海、波罗的海和黑海的舰队中，共有140艘基本类型的战舰：两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32艘鱼雷驱逐舰，100艘潜艇。在部队中广泛展开了战斗训练，全面熟悉和掌握作战经验及新式技术兵器。

依然将东线作为其主要战场的德国法西斯统帅部，也在进行着夏季战局的准备。希特勒统帅部不断将精锐部队派往东线。到1942年5月，在苏德战场上，敌人约有619万（其中仆从军有81万），3200多辆坦克和强击火炮，5.7万门大炮和迫击炮，3395架飞机。德军在数量上仍占优势，苏方在坦克方面稍占优势，但在质量方面，相当大一部分坦克仍然落后于敌人。当时双方的战略计划都是夺取战略主动权。但德军在莫斯科惨败后，已无力在苏联战场上发动全线进攻，被迫把兵力集中在战线的南翼，以发动局部攻势。

其实，还在部队休整时，这位身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和陆军总司令的希特勒，就已在忙于制定夏季攻势的计划了。不过，这次计划不如去年那样野

心勃勃。现在他才开始明白，要想经过一次战役就摧毁红军的全部力量是不可能的。这年夏天，他企图把大部分力量集中在南线，征服高加索油田、顿尼茨盆地工业区、库班的小麦产区，并拿下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拿下这些地方，可以达到几个重要目标：使苏联失去为继续进行战争所迫切需要的石油、大量粮食和工业，另一方面却可使德国得到几乎同样急需的石油和粮食的来源。希特勒在即将发动夏季攻势时，对第六军团司令保罗斯将军说，“如果我拿不到迈科普和格罗兹尼的石油，那末我就必须结束这场战争。”

希特勒不仅需要石油来发动飞机、坦克和汽车，还需要人来补充他的兵员日减的部队。冬季作战结束时，德军伤员总数是 1167835 人，病员还不包括在内，后备兵员不足以弥补这样的损失。德国最高统帅部向德国的仆从国家要求提供更多的部队。早在冬天，凯特尔元帅匆忙赶到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为夏季攻势征募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军队，整师整师地征募。戈林，最后甚至希特勒也亲自出马，请求墨索里尼提供意大利的军队。

1942 年 1 月底，戈林到达罗马，点收意大利向苏联战线增援的部队。他向墨索里尼保证，1942 年可以打败苏联，1943 年可以使英国放下武器。齐亚诺对这位脑满肠肥、胸前挂满勋章的帝国元帅的种种表现简直不能忍受。他在 2 月 2 日的日记上写道：“此人还是那样趾高气扬，架子十足。”两天以后又写道：“戈林今天离开罗马。我们在艾克尔西奥饭店吃饭，吃饭的时候戈林别话不说，只谈他的珠宝。他手上真地戴着几只漂亮戒指……在去火车站的路上，他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貂皮大衣，既像 1906 年汽车夫的穿着，又像一个高等妓女去看歌剧时的打扮。”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的腐化堕落已日甚一日了。

墨索里尼向戈林表示，只要德国给大炮，就在 3 月份派两师意大利部队到苏联去。但是，他对他的盟邦在东线的失败是如此忧心忡忡，以至于使希特勒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举行一次会谈，以便说明德国仍然拥有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次会谈于 4 月 29 日和 30 日在萨尔斯堡举行。墨索里尼、齐亚诺和随从人员被安顿在一座巴洛克式的克莱斯汉姆宫里，这座宫殿曾经是历代王公主教的故宫，现在又经过一番装饰，布置了从法国运来的帷帘、家具和地毯。意大利外交大臣猜想德国人得到这些东西大概“所费无几”。齐亚诺看到“元首”倦容满面。他在日记中写道，“去年冬天那几个月在俄国的生活，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我第一次发现他添了许多白发。”

会谈中，德国方面照例说了一通对总的形势的估计。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请两位意大利客人放心：在苏联、北非、西线和公海上，一切都很顺利。他们透露，东线即将发动的攻势，矛头是指向高加索油田。“一旦俄国石油来源告罄，”里宾特洛甫说，“俄国便要屈膝投降了。然后英国也将屈服，以求保全被打得支离破碎的英帝国的残山剩水。”

齐亚诺带着几分耐心听着。但他得到的印象是：不论美国最后采取什么行动，真正吹牛的却是德国。实际上，只要他们一想到这里，“他们就觉得凉了半截身子”。像往常一样，话说得最多的是希特勒，经过他好说歹说，总算使墨索里尼答应向苏联前线提供更多的意大利炮灰。希特勒和凯特尔从各仆从国那里得到了很大收获。据德国最高统帅部统计，“盟邦”将有 52 个师可供夏季作战之用——罗马尼亚 27 个师，匈牙利 13 个师，意大利 9 个师，斯洛伐克两个师，还有西班牙 1 个师。这 52 个师约占东线的轴心国家全部兵力的 1/4。在德军进攻重点所在的战线南部，将要增援 41 个师的生力军。

其中一半，即 21 个师是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部队。哈尔德等绝大多数将领并不赞成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这么多的“外国”师上。他们认为，这些部队的作战素质是靠不住的。但是，由于他们自己人力不足，也只得接受这些援兵。这一决定很快就对即将到来的灾难起了促进作用。

德军统帅部的具体作战方案是，从奥廖尔南部发动进攻，夺取沃罗涅什；从哈尔科夫地区发起攻势，向东突破；然后，这些军队将与从塔甘罗格一带发动攻势的德军会师于斯大林格勒地区。希特勒的作战指令说，“无论如何，必须竭尽全力努力到达斯大林格勒市区。或者至少使这座城市处于重炮射程之内，从而使它不能再成为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纳粹头子所以如此重视斯大林格勒，是由它的战略地位决定的。该城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西岸，原名察里津。它是苏联内河航运干线——伏尔加河上的重要港口，又是苏联南方的一个铁路交通枢纽和重要工业城市，战前的居民约近 60 万人。斯大林格勒以西、以南是广阔富饶的顿河下游和库班河流域，是苏联的粮食、石油和煤炭的主要产区。1941 年德寇侵占乌克兰之后，斯大林格勒便是苏联中央地区通往南方重要经济区域的唯一交通线的咽喉，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此外，斯大林格勒含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的得失会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

苏联方面，斯大林根据 1942 年春季所得的情报，认为 1942 年夏季德寇能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这两个方向很可能是莫斯科和苏联南方。至于北方和西北方，斯大林说，预计德寇会实施规模不大的进攻行动。很可能德军会切去苏军防线上的突出部并改善其部队的态势。对于斯大林认为敌人可能实施战略性进攻战役的这两个方向，令他最担心的是莫斯科方向，该方向的德军有 70 多个师，100 多万人。关于 1942 年春季和夏初的苏军行动计划，斯大林认为，目前苏军还没有足够的兵力和兵器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在近期内，他认为应限于进行积极的战略防御，但同时必须在克里木、哈尔科夫地区、利戈夫——库尔斯克方向、斯摩棱斯克方向以及列宁格勒和杰米扬斯克地域实施一系列进攻战役。

冬季战役结束后，苏德双方战线犬牙交错，敌我阵地互有楔入，突出地段最深处达几十公里。双方经过积极准备之后，于 1942 年 5 月相继展开军事行动，为各自的大规模攻势创造条件。5 月 12 日，西南方面军奉斯大林之命，在哈尔科夫方向转入进攻，预计实施两个突击：一个在沃尔昌斯克地域实施，一个在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实施。进攻开始时发展顺利，苏军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并于三昼夜内前进了 25 至 50 公里。斯大林对此很满意；但不久局势就发生逆转。为解哈尔科夫战线之危，盘踞在克里米亚的德国第十一集团军，随即对克里米亚东部的刻赤半岛上的苏军发起进攻。5 月 15 日，德军占领刻赤半岛，苏军损失很大，经海路退到东面的塔曼半岛。

刻赤半岛陷落之后，克里米亚的德军稍事休整，于 6 月 2 日，倾其全力一 20.4 万人，进攻军事要塞塞瓦斯托波尔。苏联守军 10 万余人奋勇抵抗。敌众我寡，情况不利，英雄的红军战士在市民协助下，同侵略军拼杀一个月之久，直到弹尽粮绝，饮水告罄。6 月 30 日，红军奉命撤退，7 月 4 日撤退完毕。从 1941 年 10 月 30 日至 1942 年 7 月 4 日，在历时 8 个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要塞的英雄保卫者共毙伤德军 30 余万人。

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激烈进行时，驻守在克腊马托尔斯克地区的德军，也乘机进行反击。他们的目的是摧毁苏军的攻势，占领重要地区，为实施希特勒 41 号作战指令夺取有利的出发基地。德国第六集团军司令保罗斯供

称：“这次战役的目的，首先是消除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德军南翼交通线上的直接危险，保证守住哈尔科夫以及第六集团军设在那里的很多仓库和医院。其次，必须在北顿涅茨河以西和哈尔科夫东南占领地盘，以便渡过这条河流向东进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5月23日，从克腊马托尔斯克进攻的德军，同从哈尔科夫向东进攻的德军，在巴拉克列雅以南10公里处会师，包围了南路苏军。5月29日战斗结束，苏军受到严重损失，只有部分突围，西南方面军副司令员科斯坚科等几位高级将领也壮烈牺牲了。

在此期间，苏联的列宁格勒、沃尔霍夫和西方方面军都发动了局部攻势，企图配合和改善哈尔科夫战役的势态，但都相继失利，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样一来，在整个苏德战场上，德军又夺去了战略主动权，处于优势地位。尤其在南部战场，克里米亚战役和哈尔科夫战役之后，红军的力量大为削弱。

希特勒步步进逼。6月28日，德国两个集团军群，一百数十万之众，先后从库尔斯克东北、哈尔科夫东北、斯拉维扬斯克、斯大林诺一带发动进攻，企图在顿河西岸包围并消灭苏联布良斯克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的主力。苏军采取了机动灵活的防御战，在条件有利时坚决反击，不利时就主动撤退，避免陷入包围。在将近一个月的艰苦战斗中，苏军被迫后撤了150至400公里。在此紧急形势下，7月12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建立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其编制中有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二和二十一集团军，依次布置在巴甫洛夫斯克、克列茨卡亚、苏罗夫基诺、苏沃罗夫斯克，直到上库莫雅尔斯卡亚，总长530公里的顿河防线上。在顿河至伏尔加河之间，苏联动员18.3万人修建了工程浩大的防御工事。在斯大林格勒，早在1941年11月建立的城防委员会，也积极开展活动，大力加强民兵和工人歼击营的组织工作。参加过1918年察里津保卫战的老工人的光荣传统和模范行动，极大地鼓舞着城市保卫者。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对这次战役极其关注，并亲自指挥，使英雄的红军指战员信心倍增。

1942年7月28日，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发出第227号命令，严肃地指出了苏德战场南部的危险形势，要求红军坚决抵抗敌人的进攻。这个命令贯彻了同惊慌失措者和破坏纪律者作斗争的强硬措施，坚决地谴责了“退却情绪”。命令指出：“现在是结束退却的时候了。寸步不退！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主要号召。必须顽强地保卫每一个阵地，每一米苏联领土，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守住每一块苏联土地，竭尽一切可能去捍卫它。”这道命令迅速下达到苏军各级领导机关、军事院校、直到各个连队，苏军指战员经过学习受到极大的鼓励，“坚决歼灭进犯之敌，夺取战略主动权”成了每一个红军战士的座右铭。

到了1942年夏末，希特勒似乎又显得不可一世。在进攻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的战役开始以前，北非战场上便已取得了轰动一时的胜利。1942年5月27日，隆美尔将军在沙漠地区重新展开攻势。他率领有名的非洲军和8个意大利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把英国沙漠部队打得狼狈逃回离埃及边境不远的地方。德国的潜水艇在大西洋也十分活跃，平均每月击沉70万吨英美船只。美国、加拿大和苏格兰的造船厂虽在热火朝天地加紧生产，但也补不上这个损失。这时从地图上看，希特勒所占有的地区是相当惊人的。地中海实际上已成为轴心国家的内湖，德国和意大利拥有北岸从西班牙直到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在南岸拥有从突尼斯到离尼罗河60英里的广大地区。事实上，德国部队现在守着北起北冰洋上的挪威的北角、南到埃及、西自大西

洋上的布列斯特、东至中亚细亚边缘的伏尔加河南岸这一片广大地区。

8月23日，德国第六军团已抵达斯大林格勒正北的伏尔加河一带。两天以前，卐字旗已插上18481英尺的厄尔布鲁斯山，这是高加索山脉最高的一座山峰。8月8日，占领了年产石油250万吨的迈科普油田，虽然德国人发现油田已几乎全部遭到破坏。8月25日，克莱施特的坦克部队已进驻莫兹多克，距格罗兹尼四周的苏联最大产油中心只有50英里，距里海也只有100英里。31日，希特勒催促高加索方面的司令李斯特陆军元帅纠集所有可以调集的力量向格罗兹尼作最后进攻，以便他能够拿到油田。同一天，隆美尔也向阿拉曼发动进攻，力图向尼罗河突破。

希特勒妄图一箭双雕。他命令第六军团和第四装甲军团在攻占斯大林格勒以后，沿伏尔加河北进，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包围行动，从东西两面进逼俄罗斯中部和莫斯科。他认为苏联人已经完了，决定性的胜利已经在握；据哈尔德说，“元首”当时曾谈到分兵越过伊朗进驻波斯湾的问题。他眼看便可以与日本在印度洋会师了。德国情报部门9月9日的一份报告说：苏联在整个前线的后备力量都已消耗殆尽。希特勒对这份报告的正确性竟深信不疑。他在8月底与雷德尔海军元帅举行会谈时，他的心思已从苏联转移到英美方面。这位盗世好雄说，苏联在他的眼中正是一个“不怕封锁的生存空间”。他确信，不用多久便可迫使英美达到“可以谈和的程度了”。

与希特勒的看法相反，差不多所有战地将领都和总参谋部的将领们一样，看出了这幅美丽图画上的破绽。正如蔡茨勒将军后来回忆时所说的，“尽管大可乐观，却如镜中幻影”。首要的问题是，德国缺乏人力、枪炮、坦克、飞机和运输手段等种种资源，来实现希特勒执意要达到的目的。当隆美尔试图就埃及情况向希特勒指出这一点时，希特勒命令他到赛麦林山中养病。当哈尔德和李斯特陆军元帅也想就苏联前线情况指出这一点时，他们被撤了职。

虽说在德军咄咄逼人的情况下，苏军处境比较困难，但是在斯大林的卓越领导下，红军在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的抵抗日益顽强，秋雨季节又日益临近，这时就连最外行的战略家也会看出，德国军队在苏联南部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险。第六军团的北翼战线极长，从斯大林格勒沿顿河上溯到沃罗涅什共长350英里，毫无掩护。希特勒在这一线部署了仆从国家的三个军团，这些军团的战斗力都不可靠自不用说，他们的装备也不充足，缺乏装甲、重炮和机动能力。还有，他们的兵力十分分散。罗马尼亚的第三军团只有69个营，却守卫着一条105英里长的战线。德国自己腾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填补这个缺口。同时，正如希特勒对哈尔德所说，由于他认为苏联人已经“完了”，因此他并不为顿河侧翼这条暴露在敌人面前的漫长战线过分操心了。但是，这条战线却正是掩护斯大林格勒的第六军团和第四装甲军团以及高加索战线上的“A”集团军的关键。如果顿河侧翼垮下来，不仅斯大林格勒方面的德军要受到被包围的危险，而且高加索方面的德军也有被切断的危险。

1942年7月23日，正当德军攻势进入高潮时，纳粹头子又在进行另一次赌博。当时苏军正奉斯大林的指示在顿尼茨盆地和顿河上游之间全线后撤，一路迅速向东撤到斯大林格勒，一路向南退守顿河下游。德国必须当机立断：是集中力量拿下斯大林格勒、封锁伏尔加河；还是把主要矛头指向高加索，以夺取苏联的石油。早在月初希特勒便已反复考虑了这个决定大局的问题，但他拿不定主意。最初，石油气味的引诱力很大。“B”集团军所属的

第四装甲军团本来已经推进到顿河河曲一带，离斯大林格勒已经不远，但是希特勒却于7月13日把它从“B”集团军中抽调出来，派到南方去帮助克莱施特的第一装甲军团越过罗斯托夫附近的顿河下游，继续向高加索油田推进。这时，第四装甲军团本来也许可以奔袭轻取几乎没有防卫的斯大林格勒。但是，等到希特勒发觉自己犯了错误，为时已经大晚了。接着他一错再错。两个星期以后，当第四装甲军团回师北上，向斯大林格勒进发时，苏联人已经充分恢复过来，足以抵挡德军了；第四装甲军团撤离高加索前线，又使克莱施特的力量大受削弱，无法完成向格罗兹尼油田进军的任务。

纳粹头子不顾哈尔德和前线指挥官们的劝告，作出了同时拿下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狂妄决定。这是希特勒在战争时期所作的对德军命运最有决定意义的一项决定。因为过不了几天，这项决定便得到了两头落空的结果，从而导致德国军队有史以来最为丢脸的失败。为此，德军大本营曾出现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总参谋长哈尔德极力主张集中主要力量打下斯大林格勒，并试图解释说，德国陆军根本没有力量能在两个不同方向同时进行两场强大的攻势。希特勒反驳说，苏联人已经“完了”。哈尔德便竭力使他相信，根据陆军的情报远非如此。

“对敌人的力量一直作过低的估计，达到了可笑的程度，并且越来越具有危险性。在这里要想认真地进行工作已经不可能了。”7月16日晚上，哈尔德在日记上忧郁地写道：“凭着浮光掠影的印象，作出病态的反应，对形势及其发展前景毫无估计的能力——这些使所谓‘领导’具有一种极其特别的性质。”

哈尔德担任总参谋长职务的日子也已经屈指可数了。后来他在回想当年的情况时写道：“希特勒的决定，与自古以来公认的战略、战术原则不再有共同之处。他的决定是一种狂暴的天性在一时冲动下的产物，这种天性不承认可能性是有限度的，而只凭愿望和梦想行事……”

关于哈尔德所说的纳粹头子“对自己力量不恰当地估计过高，对敌人力量有害地估计过低”的情况，他后来谈过这样一桩事情：“有一次，有人把一份非常客观的报告念给他听。报告上说，斯大林于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以北、伏尔加河以西地区仍能集结100万到125万生力军，在高加索的50万人还不包括在内。这份报告并证实了苏联为前线生产的坦克每月至少达1200辆。希特勒未等听完，便攥着拳头，嘴角上挂着白沫，把念报告的人大骂了一顿，不许他今后再念这种愚蠢的废话。”

“用不着有未卜先知的天才，也能预见到，”哈尔德说，“一旦斯大林把这150万大军用于斯大林格勒和顿河侧翼，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我十分清楚地向希特勒指出这一点。但是，结果却是解除了我陆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这事发生于9月24日。早在9月9日，哈尔德听凯特尔说，握有高加索方面军队最高指挥权的李斯特陆军元帅已被革职，他便料到下一个该轮到他了。凯特尔还告诉他，“元首认为他在精神上已不能符合他所任职务的要求”。关于这个问题，希特勒在哈尔德24日向他辞行时对他作了详细的解释：“你我的神经都太紧张了。我有一半是为了你的缘故。我看不值得再这样拖下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热情，而不是专业的能力。在你这样的旧式军官身上，我是得不到这种热情的。”哈尔德就这样下台了。

然而，调换一个总参谋长并不能改变德国陆军的处境。这时分兵两路进

攻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德军，受到苏军的顽强抵抗，阻滞不前。斯大林决心力挽狂澜，此时此刻他正在苏军最高统帅部筹划一次震惊世界的大战役，不久一场厄运就降临在作恶多端的希特勒头上了。正是：胡作非为食恶果，大难临头竟不知。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六章 斯大林格勒之战

斯城地区大会战，歼灭德军百余万；
从此局势大转折，战略反攻在眼前。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空前宏伟的战役。它通常以1942年7月17日德寇开始进入顿河大河湾为起点，到1943年2月2日苏联军队全歼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德军为结束，历时200天。战场总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从辽阔的顿河草原一直延伸到陡峭的伏尔加河岸。在这次战役的高峰期，双方同时参加战斗行动的达200万人以上，2000辆坦克，2.5万门大炮和2300多架飞机。

德军在沃罗涅什方向突破苏军防线后，第四坦克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进攻斯大林格勒。这时，希特勒认为斯大林格勒方向的苏军实力空虚，一个第六集团军就足以在行进中拿下斯大林格勒。于是命令第四坦克集团军改属“A”集团军，继续南下，参加对罗斯托夫的攻击。同时把意大利第八集团军调至顿河西岸，布置在巴甫洛夫斯克到维尧申斯卡亚一线，以便第六集团军全力攻打斯大林格勒。

7月17日，斯大林格勒外围防御战开始了。德军在切尔河地区猛攻苏联第六十二和第六十四集团军的前沿阵地。在希特勒签署的第四十五号作战指令中，进一步阐明占领斯大林格勒的意图：“A”集团军群的任务是加强顿河上的防御工事，迅猛突向斯大林格勒，消灭集中在那里的敌军，占领这座城市，封锁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陆上交通以及顿河上的航运。紧接着快速部队将沿伏尔加河向阿斯特拉罕迅猛推进，封锁伏尔加河这条主要航道。”

7月23日晨，德军以五个师的兵力进攻苏联第六十二集团军的右翼。经过三天的激战，德军突破了防线，其机动部队在卡明斯基地区前出顿河，从北面严实地包围了第六十二集团军的右翼。为了粉碎德军的突击兵团，苏军把第一和第四坦克集团军投入战斗，以反突击使第六十二集团军被包围的几个师解了围。但苏联的这两个坦克集团军当时正在组建中，总共只有240辆坦克。它们未能击溃德军的突击兵团和恢复第六十二集团军的原来阵地。7月25日，德军对苏联第六十四集团军的右翼阵地实施突击，企图在卡拉奇附近强渡顿河，直扑斯大林格勒，造成了从西面和西南面对斯大林格勒的严重威胁。

为了便于指挥作战，8月5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将南方部队分别组成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斯大林命令上述两个方面军，采取坚决措施守住斯大林格勒地区。他在8月9日对两个方面军司令员的指令中说：“叶烈缅科同志和戈尔道夫同志注意：保卫斯大林格勒和击溃从西部和南部进攻斯大林格勒的敌人，对于我们整个苏联战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希特勒看到一个第六集团军拿不下斯大林格勒，7月31日命令德国第四坦克集团军从高加索调头北上，向科捷利尼科夫斯基——斯大林格勒方向进攻，以配合德军第六集团军从顿河西岸发起的攻势。纳粹头子认为，必须首先夺取斯大林格勒，“高加索的命运取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在他的指令下，德军第四坦克集团军从齐姆良斯卡亚地区出发，突破苏联第五十一集团军的防线，于8月2日到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地区，并继续北进。从8月5日起，在这个地段开始了激战。德军凭着兵力和武器的优势，以及空军的制空权，猛烈冲击。苏联第六十四和第五十七集团军的战士们则英勇杀敌，坚决

抵抗，打退了德军的多次进攻，仅8月9日一天就消灭敌军3个团，击毁德军坦克100辆。到8月10日天黑，苏军把突进到京古培的德军驱逐到外围防线，使德国第四坦克集团军遭受很大损失，被迫转入防御。

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战局，引起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日益严重的关注。8月12日他派国防委员会委员、党中央书记马林科夫、苏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飞抵斯大林格勒前线。他们二人视察了战场，协助当地两个方面军的司令部采取了一些加强防御的措施。为了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密切配合，苏军最高统帅于8月13日指示叶烈缅科上将统一指挥斯大林格勒地区的两个方面军。从7月17日到8月17日的外围防御战中，为了打击法西斯侵略者，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成千上万的苏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7月底，在克列茨卡亚地区的一次战斗中，以波洛托为首的4名苏军反坦克手，用仅有的两枝反坦克枪，同德寇的30辆坦克进行搏斗。一天之中，四位英雄击毁敌人坦克15辆，没让敌人通过自己的阵地。8月6日，苏联空军上尉巴兰诺夫带领的4架歼击机，同25架德国飞机进行空战，巴兰诺夫一人就击落4架敌机，因此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8月16日，科切特科夫少尉率领16名近卫军战士守卫杜鲍维伊农庄附近一个高地。他们打退了德寇一个连队的5次进攻。第二天早晨，12辆德国坦克向阵地冲来，激烈的战斗之后，16名苏军战士，只剩下四人，而且子弹告罄。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四位英雄把手榴弹绑在身上，视死如归地冲向敌人的坦克，与敌人同归于尽。就这样，无数的苏军英雄用生命和鲜血抗击了法西斯强盗，给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迫使德军一个月之中只前进了60至80公里。德寇“在行进中”占领斯大林格勒的计划遭到彻底破产。

随后，奸诈的希特勒改变打法，从西北和南部同时发动强大的钳形攻势。8月17日，德国第六集团军集中了9个师的兵力，从北部的特列赫奥斯特罗夫斯卡亚向东突进。在南部，德国第四坦克集团军也集中了9个师，从阿布加涅罗沃向北突击。为了配合和支援这两支主攻的侵略军，德寇又从卡拉奇派出两个师，向东推进。德国法西斯的这次攻势，总共动用了21万人，2700门大炮和迫击炮，600辆坦克和1000多架飞机。经过7天的激烈战斗，8月23日，北路德军在拉托申卡、雷诺克地区逼近伏尔加河。这就把苏军的阵地切成两部分：苏联第六十三、二十一集团军和第四坦克集团军在北面，与在市区的第六十二集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失去了联系。伏尔加河的航运也一度中断了。

就在8月23日这一天，希特勒的飞机对斯大林格勒疯狂地轮番轰炸。当天夜间和第二天，继续狂轰滥炸，一昼夜之间德国出动飞机2000架次。城市的工厂企业、居民住宅、医院、学校、幼儿园遭到严重破坏。满城一片大火，在百里之外都能望见。成千上万的和平居民惨遭杀害，许多儿童也遭毒手或变成孤儿。一座60万居民的欣欣向荣的城市变成一片废墟。据英国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披露，在出动飞机的数目和使用炸药的重量方面，8月23日夜间的轰炸是德国空军自1941年6月22日以来所进行的最猛烈的一次轰炸。里希托芬的整个航空队都用上了，同时还出动了所有可用的容克—52型飞机中队，以及来自奥廖尔和刻赤机场的远程轰炸机。里希托芬航空队的许多飞行员都出击了三次，投下的炸弹一半以上是燃烧弹。“这是一次纯粹的恐怖袭击，其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屠杀和平居民，压垮三军，瓦解士气，散布惊慌失措的气氛，在军队退却的道路上设置了火葬场——就像在华沙、鹿

特丹、贝尔格莱德和基辅一样。”

苏联最高统帅部命令斯大林格勒地区的苏军，采取紧急措施，坚决守住阵地，消灭逼近伏尔加河岸的德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调动了内务部的第十师、军政大学的学员、防空兵、海军陆战队等部队，加强市区防线；动员装甲兵和机械化部队训练中心的战士、全市民兵和工人歼击营，投入保卫拖拉机工厂的战斗。为了消灭逼近伏尔加河岸的敌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副司令员科瓦连科将军带领一支突击队，8月23日从萨莫法洛夫卡地区出发，向西郊的大罗索什卡反击，一度把突进到伏尔加河岸的德寇切成两段。德军在8月24日凌晨反攻，虽然伤亡惨重，但恢复了被切断的联系。在这几天的战斗中，苏联第六十二集团军第八十六师的33名反坦克手表现得最突出。他们守卫着大罗索什卡附近的一个高地。8月24日，德军出动大批坦克，包围了这个高地，向这33名战士多次发动猛烈进攻。战士们的食品和饮水都已告罄，烈日当空，酷暑的人，他们舌敝唇焦、口渴如焚。但这33名勇士寸土不让，顽强抵抗，在两天的激战中击毁敌人坦克24辆，然后突出了包围圈。

斯大林格勒的形势越来越严重，8月25日全城处于戒严状态。城防委员会发出了庄严的号召：“斯大林格勒的市民们！我们决不让法西斯匪徒侮辱我们的城市。我们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奋起保卫城市，保卫家乡；我们要使每一幢房屋，每一个城区，每一条街道，都成为不可攻克的堡垒。大家都来修筑街垒，拿起一切能使用的武器，保卫自己的家乡吧！”

英雄的斯大林格勒人民积极响应这一号召，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除了已参加民兵的五万人以外，几天之内，又有7.5万市民投入战斗。仅共青团组织就派出7000名男团员参军，3000名女团员参加战地救护和通讯联络工作。为了减轻供应的负担，为了安全，城防委员会把30多万伤员和老幼居民撤退到伏尔加河东岸。市民的积极参军参战，更加鼓舞了苏军的士气。

正当斯大林格勒近郊的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苏联国防委员会任命朱可夫为最高统帅助理，委派他到斯大林格勒前线，就地了解情况，指挥苏军进行反击。8月27日晚上，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朱可夫，并对他说：“由于斯大林格勒形势困难，我们已命令火速将莫斯卡连科指挥的近卫第一集团军调到洛兹诺那地区，并于9月2日晨由该集团军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其他部队对突进到伏尔加河的敌军集团实施反突击，与第六十二集团军会合。同时，马利诺夫斯基将军的第六十六集团军和科兹洛夫将军的第二十四集团军都拨归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斯大林要求朱可夫迅速采取措施，使莫斯卡连科将军的近卫第一集团军能在9月2日实施反突击，并在其掩护下使第二十四和第六十六集团军进入出发地区，迅速投入战斗。

朱可夫奉命于8月29日飞抵斯大林格勒前线，在和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戈尔道夫、近卫第一集团军司令员莫斯卡连科等高级指挥员研究了战场形势之后，决定在9月3日晨由近卫第一集团军从北面首先发动进攻。但是苏军的攻势受到德国空军和地面部队的顽强阻击，只前进了几公里，收效不大。

随着敌军攻势的加强，斯大林格勒的形势越来越险恶。9月3日，斯大林又给朱可夫发出紧急电报：“斯大林格勒形势恶化了。敌人距斯大林格勒只有3俄里（1俄里等于1.06公里）。如果北部集团部队不立即援助，斯大林格勒可能在今天或明天被攻占。应要求位于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的各

部队司令员立即突击敌人和援助斯大林格勒的军民。不得有任何迟延。现在迟延就等于犯罪。”斯大林再次强调，朱可夫的主要任务是把德军的兵力由斯大林格勒引开，如果办得到，还应消除隔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的走廊。

朱可夫按照斯大林的命令，调集三个集团军于9月5日拂晓对德军阵地开始炮轰，同时进行空袭，随之发起冲锋。但敌人的阻击仍很顽强，在一天的交战中，苏军只前进了二至四公里。这次对德军的大规模反击，迫使德军把大量坦克、炮兵和摩托化部队从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古姆拉克、奥尔洛夫卡、大罗索什卡往北调动，投入阻击苏军的战斗。这就削弱了德军对斯大林格勒市区的压力，延缓了攻击斯大林格勒的速度。

9月12日，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奉召返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了前线的形势。他们认为，德国法西斯貌似强大，已经没有力量完成其1942年苏德战场的战略计划了。德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保罗斯第六集团军和哥特第四坦克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初激战中遭到严重的消耗，已经没有能力夺取斯大林格勒。他研究了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军队的强点和弱点。各仆从国的军队与德军比较起来，装备差，经验少，甚至在防御中都缺乏战斗力。而最主要的是，这些军队的士兵和许多军官都不愿意被希特勒、墨索里尼、安东尼斯库、霍尔蒂和其他法西斯头子派到遥远的俄罗斯土地上为外国侵略者送死。与此相反，数百万苏军指战员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和家园而战。在一年多的艰苦战斗中，他们经受了锻炼，学会了很多东西，成长壮大起来了。同时，苏联的军工生产已有很大发展。苏联正在组建拥有新式武器的战略预备队，到11月份，苏军将增加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和坦克部队。那时，他们将能完成更重大的任务。但在目前，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浴血奋战中，蒙受沉重损失，以现有的兵力不可能给予敌人毁灭性的打击。经过研究，苏联最高统帅部认为，苏军的行动计划应该是：第一，继续以积极防御疲惫敌人；第二，着手准备反攻，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围歼法西斯军队。斯大林并令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迅速返抵前线，着手制定实施这一重大行动计划，并争取尽早实现重大的战略转折。

在德国方面，由于其夏季攻势连续得手，希特勒更加飘飘然了。他对部下反复强调：“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集中每一个可用的人，尽快地占领整个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两岸。”保罗斯声称：“威克斯将军和我都注意到了漫长的和防守不够的顿河战线以及局势的内在危险。”但希特勒在作总结时说：“俄国人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们已不能再进行可能对我们构成危险的广泛的战略性的报复行动。此外，顿河北翼将从盟国军队方面得到很多的增援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我看不出北线有什么严重危险。在其他方面必须关心的是，要尽快地把城市拿到自己手中，不让它变成大家长期关注的焦点。”于是法西斯军队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在9月13日对斯大林格勒又发动了新的进攻。

为了侵占这座历史名城，希特勒又从高加索等地调来九个师，结果德军仅用在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兵力就有50多个师，70多万人。用来直接进攻市区的有13个师，总共17万人。他们拥有1700门大炮和迫击炮，约500辆坦克。到9月13日为止，苏联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防守从巴甫洛夫斯克到那尔佐夫卡一线；东南方面军有4个集团军，防守斯大林格勒市区和南部的湖泊地带。这两个方面军共有120个师，但人员编制严重缺额，许多师只有编制人

数的 20—25%，有的师甚至仅有 800 人。在市区争夺战中，德军的兵力和武器方面均占优势。

在这危急关头，英勇善战的近卫第十三师渡过伏尔加河，并立即投入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他们采用反突击，同德国法西斯侵略军展开殊死搏斗。争夺市中心的激战达到白热化，仅 9 月 14 和 15 日两天内，在市中心区有 2000 多德军被击毙。9 月 16 日，近卫第十三师夺回了马马耶夫岗。第一火车站的争夺战持续了一周之久，火车站曾 13 次易手。从 9 月中旬起，全市的街道和广场都变成了激烈战场。当年保卫察里津的老战士特罗维扬给斯大林格勒战士们的信中写道：

“我的孩子们，现在正在进行伟大战役的地方，对我们祖国是神圣的。我们这个城市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

“孩子们和朋友们！亲爱的战士们！要同敌人拼到最后一口气，坚决守住自己的阵地。如果遇到困难，请想到我们这些察里津的保卫者吧！我们必须赢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让父辈的言行在这个艰苦的斗争中鼓舞着你们。”

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光荣地履行了他们对祖国发出的誓言——打退法西斯匪徒的疯狂进攻，消灭其精锐师团，守住斯大林格勒。当斯大林格勒南、北、西三面被包围，陆上交通被切断之后，伏尔加河成了支援这次伟大会战的唯一运输线。而负责这一艰巨任务的伏尔加河分舰队作出了伟大贡献。这支舰队动用全部船只，并征用当地的各种民船，冒着敌人的炮火和轰炸，进行了 3.54 万次航行，完成大量的运输任务。这种动人的壮烈场面，使视死如归、勇敢过人的苏军战士感动得流下眼泪，同时也给他们增添了无比的力量。

在争夺城市的战斗中，苏联卫国战争的正义性激起千百万指战员的爱国主义热情，使他们能以无比英勇的壮举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史诗。在 10 月中旬，苏联共青团员潘尼卡科与敌人坦克同归于尽的壮烈举动是人们永志不忘的。几辆坦克喷着火舌向潘尼卡科的战壕开来。这位英雄用完了所有的手榴弹，身边只剩下两瓶液体混合燃料。当他从战壕里探出头来，抓起燃烧瓶时，大火烧遍了他的全身。但他没有去扑灭身上的火焰，而是一跃跳出战壕，跑到法西斯跟前，对准坦克发动机口的外壳打破了第二个燃烧瓶。火舌和浓烟吞没了英雄和法西斯的战车。

近卫军中士雅科夫·巴甫洛夫领导的一个战斗小组，死守“一月九日广场”上的一座大楼达两月之久，对第十二近卫师的防御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英雄，战后重建了那座大楼，并命名为“巴甫洛夫大楼”。全苏闻名的英雄炮手波尔金科，用一门大炮单独同 15 辆德国坦克搏斗，克敌制胜。电话员瓦西里·吉塔耶夫身受重伤后，用牙齿咬住打断了的电话线，恢复了通讯联络。扎伊采夫发起的神枪手狙击运动，在斯大林格勒被围困时期，消灭了数千名敌人。

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的红军战士们，在 1942 年 11 月初，即十月革命 25 周年前夕，给斯大林写了信。信中说：

“在这伟大战役的激战时刻，在经久不息的隆隆炮声和飞机的怒吼声中、在映红了伟大的苏联伏尔加河陡峭河岸的火光中，我们给您写信；告诉您，并通过您告诉全体苏联人民，我们的士气空前高昂，意志坚强，我们的双手在不停地打击敌人。……”

“今天我们在斯大林格勒作战，大家都懂得，我们捍卫的不是一个斯大

林格勒。在斯大林格勒，我们正捍卫着我们的祖国，捍卫着我们所珍视的一切，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能生存。在斯大林格勒这里决定着我国命运。在斯大林格勒这里决定着苏联人民是自由还是不自由的问题。

“……从战壕里发出这封信，我们向您宣誓：我们要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战斗到最后一次心脏的跳动。一息尚存，我们就要保卫斯大林格勒，决不让敌人进抵伏尔加河！”

这就是正义战争的伟大精神力量的源泉。侵苏德军团长威廉·霍夫曼，10月27日在日记中写道：“俄国人拼命抵抗，疯狂顽强；他们不是人，而是某种钢铁铸成的东西；他们不知疲劳，不怕炮火。”可见，法西斯之徒永远无法了解和估计为正义而战的人民的意志和力量。正是：

钢铁战士英雄胆，无惧敌人枪和弹；

誓死保卫英雄城，竭诚鲜血写诗篇！

就这样，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防御阶段，以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失败而告终。从7月到11月间，德军在顿河、伏尔加河地域和斯大林格勒的交战中，损失近70万人，1000多辆坦克，2000多门大炮和迫击炮，1400架飞机。德军在伏尔加河地区的总的战役态势也复杂化了。他们没有师和军的预备队，在“B”集团军群两翼是战斗力不强的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军队，他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毫无前途的岌岌可危的处境。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苏军最高统帅部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准备好了大反攻。

这时两军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斯大林格勒方向，德国法西斯及其仆从国共有80个师，3个旅，总计100万人，大炮和迫击炮10290门，坦克675辆，飞机1216架。届时，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方向已有三个方面军，共110万人，1.55万门大炮和迫击炮，1463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350架作战飞机。从兵力和兵器对比上，这时苏军已占优势，大炮已为1.5比1，坦克为2.2比1。苏军的这三个方面军，已配有崭新的T-34型坦克，1250台“喀秋莎”火箭炮。这些火箭炮一次就可以同时发射1万发炮弹。苏军士气空前高涨。

苏军兵力和武器的增长，为大规模的反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一反攻计划是由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签署，最高统帅斯大林批准的。到11月13日，苏军十分巧妙地、隐蔽地完成了这一巨大的反攻准备工作，致使德军没有发现。希特勒错误地估计：斯大林格勒地区苏军的后备力量空虚，在冬季只可能对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进行反攻，所以他从法国、德国以及列宁格勒等地区抽调12个师去加强其中部战线。希特勒的失策给即将从斯大林格勒地区大举反攻的苏军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苏军整个反攻进程是在斯大林亲自指挥下按计划进行的。

1942年11月19日晨，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面，苏联西南方面军的两千门大炮开始轰鸣。接着，苏军兵分两路，以坦克部队为先导，向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阵地冲击。敌军惊慌失措，开始瓦解。几个小时以后，消息传到伯希特斯加登，这时希特勒和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主要将领们正在阿尔卑斯山上的胜地流连忘返。德军最高统帅部虽然也曾料到苏军可能在顿河地区发动进攻，但并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无需希特勒于11月8日晚在慕尼黑向他的“老党员同志”发表了出名的啤酒馆演说之后，同他的主要军事助手凯特尔和约德尔赶回东普鲁士大本营。因此，他们仍然在上萨尔斯堡享受山间的清新空气。

留在腊斯登堡的新任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将军打来的加急电报，突然打断了他们的宁静生活。蔡茨勒得到了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大事日记中所称的“紧急消息”。进攻开始的最初几小时中，占压倒优势的一支苏联装甲部队，在斯大林格勒西北的顿河沿岸，在绥拉菲摩维奇和克列茨卡林之间，全面突破罗马尼亚第三军团的阵线。在斯大林格勒这个被围城市的南面，另一支强大的苏联部队正在猛攻德国第四装甲军团和罗马尼亚第四军团，眼看就要突破他们的阵线了。在此情况下，德国第六军团不是仓皇向西退却，就是束手就擒。为此，这位参谋长建议希特勒同意第六军团从斯大林格勒撤退到顿河河曲一带，恢复被突破了的阵线。这么一个建议竟惹得“元首”大发了一顿脾气。

“我决不离开伏尔加！我决不从伏尔加后退！”希特勒大声叫喊。事情就这样定了。他一时发疯作出的这个决定，很快就带来了灾难。他亲自下令第六军团坚守斯大林格勒周围阵地。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于11月22日回到大本营。这天已是苏军发动进攻的第四天，南北两面的苏军已在斯大林格勒西面40英里顿河河曲上的卡拉赫会师。至此，苏联反攻战役的第一阶段顺利完成，把德军22个师约30万人合围起来。

在苏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希特勒急电被包围的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保罗斯，命令他坚决抵抗，稳住斯大林格勒方面的防线，同时答应派援军去解围，空运战争物资。为此目的，希特勒特地从列宁格勒前线把冯·曼斯泰因元帅调到南方。又从战场各地，甚至从法国搜集了一点兵力，聚集在科捷利尼科尔斯基和托尔莫辛附近，组成顿河集团军群，由曼斯泰因元帅指挥，准备为保罗斯解围。12月12日，德国援军的主力从科捷利尼科尔斯基出发，沿铁路线北上。他们不顾重大伤亡，向斯大林格勒方向猛冲，12月16日渡过阿克塞河，并向梅什科瓦河逼进。在这里受到红军顽强阻击，发生了激战。

12月19日，这支德军进抵梅什科瓦河，离斯大林格勒只有40公里。这时，曼斯泰因命令保罗斯向西南突围。但是，被围困的德军已精疲力竭，需要数天的准备才能突围，而且因为缺少燃料，坦克行驶不了40公里的路程。结果这一幻想又破灭了。就在这个时候，苏联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什方面军的另一支大军，以450辆坦克为先导，从马蒙附近发起了新的攻势。这支苏军来势迅猛，粉碎意大利第八集团军之后，至12月23日南下180公里，直插托尔莫辛的北面，对希特勒的顿河集团军的后方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与此同时，另一支苏军从下切尔斯卡亚发起攻势，迫使德军顿河集团军群的左翼西退。在此情况下，曼斯泰因为了自身的安全，不得不命令北上的德军南撤，并将其第六坦克师调到顿河以西，以抵挡从北面袭来的苏军攻势，同时命令保罗斯停止突围。12月24日，苏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乘机从梅什科瓦河一带发起反攻，紧追退却之敌，12月29日占领科捷利尼科尔斯基。于是，希特勒的解围计划彻底破灭，被围德军已成瓮中之鳖，覆灭的命运也已注定了。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对德军的包围圈，初期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20公里。

30万被围之敌每天需要750吨的物资，德空军元帅戈林答应每天空运去500吨，但实际上只运到100多吨。于是军中出现饥荒，弹药缺乏。包围圈逐渐缩小，敌军伤亡与日俱增。德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向希特勒汇报说：“士兵饥饿沮丧，对最高统帅部失去信心，伤员得不到适当照顾而奄奄一息，还

有成千的人在冻死。”因此，他请求希特勒批准突围。但希特勒对此无动于衷。至12月底，被围的30万法西斯军队中，实际上有战斗力的仅剩下20余万人了。

至1943年1月初，被围德军的处境更加狼狈。每人每天只分到一片面包，15人分食1公斤土豆，喝的只有雪水，骑兵的马匹也被宰食精光。每人一天只领30发子弹，坦克因缺少燃料不能开动，大炮缺少炮弹。这支猖狂一时的法西斯匪军，个个忍受着饥饿和严寒，蜷缩在冰冻的战壕里，等待着灭亡的命运。

苏军最高统帅部为了减少无谓的流血牺牲，同时也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于1月8日，派使者到德军阵地向保罗斯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军投降。最后通牒提醒保罗斯说，你的部队已被切断，解围无望，空中接济也不能保持了，然后指出：“你军已陷入绝境。你们饥寒交迫，疾病丛生。俄罗斯的寒冬还刚刚开始。严霜、寒流、暴风雪还在后头。你的士兵缺少冬衣，卫生条件又差到极点……你们的处境已一无希望，继续抵抗下去实在毫无意义。”苏军建议他们接受下列投降条件：所有被俘人员一概发给通常标准的口粮；伤病员和冻伤人员将得到医治；所有被俘人员可以保留他们的军阶领章、勋章和个人财物。通牒要求保罗斯于24小时之内答复。

这位集团军司令将苏方最后通牒的全文以电报发给希特勒，并要求准予便宜行事。纳粹头子立即驳回了他的请求。要求投降的期限到了之后，又过了24小时，即1月10日早晨，苏军以5000门大炮狂轰猛炸，斯大林格勒战役进入最后阶段。这一仗打得激烈而残酷。在瓦砾成堆、遍地冰冻的城内废墟上，双方无情地拼杀，不顾一切地进行战斗。但是战斗并没有持续多久。六天之中，德军的袋形阵地已缩小了一半，只剩下15英里长、9英里宽的一块地方。1月24日，阵地又给一劈为二，最后一条小小的临时跑道也失去了。过去，飞机还运来些供应品，并运走了2.9万名伤病员，现在再也不能降落了。

这时苏军指挥部再次建议被围的德军投降。保罗斯司令部发生了意见分歧，两个军长主张投降，但保罗斯没有得到希特勒允许，拒绝进行投降谈判。苏军的建议再次遭到拒绝。

1943年1月22日，苏军对被围的德军发起全线进攻，经过四天的激战，前进了10到15公里。1月24日，保罗斯又请示希特勒，并把德军所处的绝境告诉了他：“部队弹尽粮绝，已无法进行有效的指挥……伤员1.8万人，无衣无食，也无药品绷带，继续抵抗下去已无意义。崩溃在所难免。部队请求立即允许投降，以挽救残部生命。”但是，这个法西斯魔王从来不怜惜士兵的生命，他的回答仍是“不准投降”，并命令德军死守阵地，“直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

这时苏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到1月25日傍晚，敌军龟缩到南北长20公里、东西宽3.5公里的地段上。从1月10日到25日，敌人毙伤和被俘者达10万人以上。但困兽犹斗，他们还继续作垂死的挣扎。于是，苏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决定从东西两面同时进攻，在斯大林格勒战区展开消灭残敌的战斗。

其实，德军继续抵抗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办不到的事。1943年1月底，这一场史诗性的战役已近尾声，像一支点完了的蜡烛，就要劈啪几声油干火灭了。1月28日，这支曾经恒赫一时的军队的残兵余卒被分割在三小块袋形

阵地之中，保罗斯将军的司令部在南面的一块，设在当初生意鼎盛、如今已成一片废墟的“中心”百货公司的地下室里。据一个目击者说，总司令坐在黑暗角落里的行军床上，样子万分颓丧。

行将灭亡之前，向他们祝贺的无线电报开始如雪片涌来，保罗斯和他的部下根本没有心情欣赏这些。戈林曾在阳光充足的意大利消磨了大半个冬天，手上摆弄着珠宝，身上穿着皮大衣，到处大摇大摆。1月28日，他也打了一个电报来：

“第六集团军的英勇奋战，将名垂青史，后世子孙将会骄傲地谈起兰吉马克战役的大胆，阿耳卡萨尔战役的顽强，纳尔维克战役的勇敢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自我牺牲精神。”

就在这伙法西斯匪军覆亡前夕，盗世英雄希特勒还导演了一场令人作呕的丑剧。

1943年1月30日是法西斯在德国执政10周年。这一天，希特勒下令授予保罗斯将军“元帅军衔”，同时给予在斯大林格勒被围的117名德国军官各升一级，妄图以此来提高他们的士气。但是，无论怎样封官晋爵也挽救不了这伙法西斯侵略者灭亡的命运。第二天，即1月31日，斯大林格勒市中心的德军全部被歼。德第六集团军司令保罗斯及其司令部的全体官兵，在中心百货公司的地下室里全部被俘。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元帅这时完全失去了“不可战胜”的威风，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形。他装病躺在行军床上，灰溜溜地当了俘虏。他的参谋长代表他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2月2日，被围的德军全部投降或被歼灭。这时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向最高统帅斯大林元帅报告说：

“1943年2月2日16时，顿河方面军的红军完成了您的命令，击溃和消灭了被围的敌军斯大林格勒兵团。由于完全消灭了被围的敌军，斯大林格勒市和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战役结束了。”这一仗，苏军仅在包围圈内就消灭了德军约30万人。在苏军反攻阶段（1942年11月19日至1943年2月2日），德国及其仆从国军队的损失达80万人以上。在持续200天的整个战役中，法西斯军队在顿河、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地区共损失150万人，35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2万门大炮和迫击炮，3000架飞机和大量的其他技术兵器。斯大林格勒地区大战是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一次战役。

希特勒对保罗斯的“贪生怕死”恨之人骨。在大本营举行的一次最高统帅部的会议上，“元首”杀气腾腾他说：“他们已经在那儿投降了——正正式式、完完全全地投降了。他们本来应该团结一致，负隅顽抗，然后用最后一粒子弹自尽……保罗斯应该举枪自戕，正像历来的司令官眼看大局已去便拔剑自刎一样……甚至瓦鲁斯还对他的奴隶下命令说：‘现在杀死我吧！’

但是，这如何向德国人民公布呢？经过反复思考，才于2月3日，也就是保罗斯等投降后的第三天，希特勒发布了一项自欺欺人的特别公报：

“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结束。第六军在保罗斯陆军元帅的卓越领导下，忠实地履行了他们打到最后一息的誓言，为优势的敌人和不利于我军的条件所压倒。”

瓦鲁斯是罗马帝国奥古斯都王朝的将军，负责指挥驻日耳曼的罗马军队。公元9年，日耳曼的凯鲁斯奇人部落爆发起义，瓦鲁斯车兵征讨，在条陶堡森林中了埋伏，部队全部被歼，瓦鲁斯自杀。

德国广播电台在宣读这项公报时，奉“元首”之命，先播送低沉的鼓声，宣读之后播放了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第二乐章。希特勒宣布全国志哀4天。4天之内各地剧院、电影院和一切娱乐场所停止营业。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德国历史学家瓦尔特·戈立茨在他所写的关于总参谋部的一书中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个那拿，肯定是德国军队所遭到的最大的一次失败。”还不仅如此。斯大林格勒战役与阿拉曼战役、英美在北非登陆合在一起，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伟大的转折点。

曾几何时，希特勒的军队席卷大半个欧洲，打到离亚洲不远的伏尔加河，在非洲也几乎打到尼罗河，而现在退潮之势已经开始，而且一退再也不能回涨了。纳粹进行大规模闪电攻势，以成千上万的坦克和飞机蹂躏了众多的国家。现在这一切行将告终了。希特勒可怕的大迷梦，终于在冰天雪地的斯大林格勒破灭了。当然，希特勒在局部地区还会拼死进攻，还会继续蛊惑人心、欺骗群众，但从总的趋势来看，它从此走下坡路了。正是：

败局一定无可挽，

欺世之说不能圆；

俘虏如何称壮烈？

留给后世作笑谈。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806年拿破仑在那拿战役中打败过普鲁士军队。

第二十七章 战略转折

六神无主心发颤，打脸充胖又失算；
趁热打铁不失时，统帅谋划新篇章。

由于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反攻取得了胜利，苏德战场的战略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苏军的急剧变化，为苏军在广阔地段上实施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在选定的方向连续实施突击，并计划在苏德战场的整个南翼展开进攻，在顿巴斯和罗斯托夫方向扩大战果，指向德军“顿河”、“B”、“A”三个集团军群。斯大林还计划在西北和西方方向实施一系列进攻战役。在列宁格勒附近实施进攻战役的目的是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

1943年是苏德战争进程中发生根本转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苏军在最高统帅部的领导下，在列宁格勒到高加索山前的广阔战线上，转入了反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早在1942年年底，德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就向希特勒建议，德军应迅速从高加索撤退。纳粹头子为了罗斯托夫以北顿河右岸的安全，不同意“A”集团军群从高加索全面撤退，只允许分阶段撤到马内奇河和库班河一线。鉴于苏军可能突入“A”集团军群的后方并对其实施包围，德军统帅部决定撤出高加索东南部的部队，加强黑海沿岸和山区的防御；并打算先把坦克第一集团军主力从纳尔奇克、莫兹多克地域撤出，由“顿河”集团军群在罗斯托夫以东阻击苏军的进攻。

1943年1月初，苏联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南方方面军后，向前推进150至250公里，首先荡平了科捷利尼科斯基地区的德军，继而南下与北高加索方面军配合，经过激战，于1943年春季肃清了北高加索的敌人，解放了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歼灭了28万多敌人。顿河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继续西进，收复了罗斯托夫、哈尔科夫、库尔斯克等许多重要城镇和地区。为日后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北方，列宁格勒方面军与沃尔霍夫方面军协同一致，于1943年1月12日发动攻势。两个方面军的突击集团突破了德军防御。第二天，德军把驻在姆加地域的预备队一个师投入战斗，力图恢复原态势。几天内德军又向锡尼亚维诺地段投入3个师的兵力，反击在拉多加湖以南突入的苏军。从1月15日至18日苏军两个方面军突击集团奋力向前推进，同时向两翼扩大突破口。德军伤亡惨重，阵地相继丢失。苏军对防守锡尼亚维诺突出部北部的德军进行压缩。经过七天的激烈战斗，苏突击集团军和第六十六集团军在锡尼亚维诺以北会师。这样，在拉多加湖以南形成了一条宽8至11公里的走廊。通过这条走廊，列宁格勒军民便可从陆路直接与内地联系，德军妄图占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摇篮列宁城的计划于是彻底破产。从此这个方向的作战主动权完全转到苏军手中，德军和芬兰军队在拉多加湖以东会合的威胁已经解除；陆路交通的恢复，使苏军可以不断得到人员、装备和弹药的补充，保卫城市的力量因而迅速得到增强，使苏军在西北方向上的战略态势大为改善。

但是，希特勒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他在全国实行总动员，到处搜罗炮灰，以补充德军在苏德战场上的损失。

1943年3月初，德军在南部战线发起反突击，并于3月16日重新占领哈尔科夫，3月18日占领别尔哥罗德。苏军加强了抵抗，很快制止德军的反

扑。此后，苏德战线又稳定下来。但苏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突出阵地，给德军的防线造成很大的威胁，于是双方都向库尔斯克方向调遣兵力，准备进攻，一场新的大规模的厮杀即将开始。

希特勒的意图是，在库尔斯克地区粉碎苏军的主力，进而占领顿河、伏尔加河流域，进取莫斯科，完成 1942 年未竟之业。为此目的，经过 3 个月的准备，至 7 月初德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南北两侧，即别尔哥罗德地段和奥廖尔区域集中了 17 个坦克师、3 个摩托化师和 18 个步兵师，配有 2000 多架飞机和所谓新式武器“虎式”、“豹式”坦克以及“斐迪南式”重型强击火炮，总兵力约 100 万人。希特勒准备把这支侵略军投入总共只有 100 多公里的狭窄地段，来一个重点进攻，妄图创造一个“德国的斯大林格勒”，夺回已经失去的战略主动权。

1943 年 4 月 15 日，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发布了一项只供高级军官阅读的绝密命令。这项密令说：“我决定，一旦气候条件允许就实施‘堡垒’进攻计划，这是今年的第一次进攻。这次进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次进攻应迅速完成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次进攻应使我们掌握今年春夏两季的主动权。与此有关的一切准备措施，必须最慎重、最坚决地实施。在主要突击方向，应当使用精锐的兵团、良好的武器、有才干的指挥员和大量的弹药。每个指挥员，每个士兵必须深刻理解这次进攻的决定性意义。库尔斯克地区的胜利应该成为照耀全世界的火炬。”

为了完成这一进攻战役，在兵力部署上，希特勒命令“以一个突击集团军的兵力从别尔哥罗德地域，以另一个突击集团军的兵力从奥廖尔以南地域实施坚决而迅速的集中突击，以集中进攻的方法合围处于库尔斯克地域的敌军并将其消灭。”在作战方法上要求“广泛采用突然性并使敌人无法了解进攻开始的时间；保证在狭窄地段上最大限度地密集使用突击力量，以便利用当地全部进攻兵器的压倒优势，一次突破敌人防御，使两个集团军会合起来并以此封闭包围圈。”为了保守机密，希特勒要求在两个进攻集团军会合并组成突击集团军时，应当保持无线电沉默；而且“了解战役企图的人仅限于绝对必要的人员”。

其实，苏联最高统帅部早已洞察敌人的阴谋，为了准备大反攻和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3 月 14 日，斯大林急召朱可夫元帅从西北前线返回莫斯科研究军务。当朱可夫深夜来到最高统帅办公室时，斯大林正在聚精会神地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是有关冶金和电力的燃料问题，飞机和坦克制造厂的问题。参加会议的人除了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各部领导人、设计师和许多大工厂的厂长。从他们的汇报中十分明显地看出，在工业方面形势虽有好转，但仍然十分紧张。美国根据“租借法”许诺的援助，没有及时到达，更增加了军备紧张的程度。为此，斯大林要求各军工部门必须昼夜加班生产，成批地生产试用有效的新武器，迅速装备部队。并指令人民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目前军工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政治局会议结束，已是夜间 3 点过半，这时斯大林才腾出手来同朱可夫研究哈尔科夫地域的态势问题。最高统帅说：“从 3 月中旬以来，那里的情况严重恶化了。自从由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域进攻的敌装甲坦克和摩托化部队，把西南方面军赶过顿涅茨河以后，就在哈尔科夫西南出现了困难的局面。”斯大林要求朱可夫在天亮以前赶到西南方面军司令部，迅速查明情况，并采取措​​施，扭转局势。

斯大林当即给沃罗涅什方面军军事委员赫鲁晓夫打了电话，严厉斥责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没有采取措施对付敌人的反突击。斯大林把在场的参谋打发走以后，对朱可夫说：“情况再紧急也得吃了晚饭再走啊！”随即拉着他到餐厅一起用餐。其实，这时已是早晨5点钟了。吃过“晚饭”，朱可夫又到总参谋部作了必要的准备，就于早晨7点钟飞往前线了。

当天，这位最高统帅部代表就在方面军司令部利用高频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了情况。局势比早晨他在最高统帅那里听到的还坏。

德军占领哈尔科夫后，没有遭到特别的抵抗即向别尔哥罗德方向前进，并占领了卡扎奇亚洛潘。朱可夫同方面军指挥员研究以后，随即加强了在别尔哥罗德以北的防御，并向前派出战斗警戒。日后，德军虽多次企图在3月底突破苏军防线，但均未得逞。敌人遭到重大损失后，就地巩固下来。这时，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态势开始稳定下来。双方都在准备决战。为了加强沃罗涅什方面军的领导，最高统帅斯大林任命瓦社丁上将为方面军司令员，并令其以固有的毅力着手巩固方面军的部队，并建立纵深梯次防御，准备参加即将展开的“斯大林格勒式”大战。

4月10日，斯大林又电召朱可夫元帅和苏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大将返回莫斯科，讨论1943年的夏季战局计划，其中包括库尔斯克突出部的作战计划。经过分析研究，他们一致认为，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上的考虑，希特勒匪帮将力图不惜任何代价守住从芬兰湾到亚速海这条战线。从目前情况看，希特勒有能力加强其某一战略方向的部队并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域准备一次大规模进攻战役。如果这一阴谋得逞，可使整个战略态势变得有利于德军，而且还会大大缩短德军的整个战线，提高其防御总战役的密度。

斯大林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听取了将帅们的设想。他赞同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库尔斯克地域，但认为对莫斯科方向的防御也不能掉以轻心。最高统帅的结论是：必须在所有最重要的方向，而且首先是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域建立牢固的、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参战部队以沃罗涅什、中央、西南和布良斯克四个方面军为主。在夏季战局的第一阶段，希望以强有力的防御手段抗击德军的进攻，消耗敌人，然后转入反攻，彻底粉碎敌人。并要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整师、整军甚至整个集团军地歼灭敌人。斯大林责成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制定实施这一战役的具体计划。

到了1943年夏季，在苏德战场上，两军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新的变化。苏联作战部队已发展到660万人，并拥有10.5万门大炮，1万多辆坦克，近1.03万架作战飞机。随着军工生产的大发展，部队的装备大大加强。除了每个集团军照例编有两个坦克军和1个机械化军外，还组建了5个采用新编制的、装备精良的坦克集团军。此外，为了保证突破敌人的防御及加强各集团军，还建立了18个重型坦克团。在改组空军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空军开始装备拉-5、雅克-9等新型飞机。到了夏季，几乎全部空军部队都换装了新式飞机，而且组建了很多作为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新航空兵部队和兵团，其中有八个远程航空兵军。

苏最高统帅部对扩大兵员后备的工作也十分重视。

1943年，有几十万人在各种训练中心接受训练，组建了大规模的战略预备队。到7月1日，在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内有数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两个坦克集团军和一个空军集团军。国防委员会在加强苏联军队和根据前线经验重新训练军队方面所进行的大量工作，急剧地提高了各方面军部队的战斗

力。

苏共中央十分注意提高部队的政治工作水平。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源源不断地被派往前线。到 1943 年，苏联武装力量中已有 270 万名共产党员和大约同等数量的共青团员。他们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士气。

总之，到 1943 年夏季库尔斯克会战前，苏军武装力量不论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超过了德国法西斯军队。苏联最高统帅部有了一切必要的手段，在所有最重要方向都牢牢掌握着战略主动权，并迫使敌人服从自己的意志。

希特勒及其军政要员知道，法西斯武装力量已经失去了先前对红军的优势，因而竭尽全力把优良的兵力都送往苏德战场。为了支援其侵略军，纳粹军事工业昼夜 24 小时开工，加紧生产新的“虎式”和“豹式”坦克及“斐迪南式”重型强击火炮。空军得到了“福克沃尔夫 190A 式”和“汉克尔 129 式”新式飞机。德军部队在人员和物资器材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补充。

在苏德战场上，敌方共有德国及其盟国的 232 个师，约 530 万人，5.4 万门大炮，5850 辆坦克，3000 架战斗机。各级司令部都加紧准备即将实施的进攻行动。为了实施策划好的进攻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战役，希特勒集中了 50 个最好的战斗师，其中有 16 个坦克和摩托化师，另外还有 11 个坦克营和强击火炮营，共拥有 2700 辆坦克和 2000 架飞机。希特勒准备把 90 万武装部队投入战斗。他认为胜利在握。法西斯宣传机构用各种办法提高士气，声称在即将开始的交战中肯定会取胜，能够重新夺得战略主动权。

为了胜利地进行这次战役，斯大林在库尔斯克地域集中了 133 万人，配有 3600 辆坦克和强击火炮，两万门大炮和 3130 架飞机。7 月 2 日，苏军最高统帅部根据多方周密的侦察，向库尔斯克前线各个参战部队发出预报：德军可能在 7 月 3 日至 6 日期间发动攻势。7 月 4 日，又从一名德国俘虏和一个从敌军潜逃过来的人的口供中得知，德军将在 7 月 5 日凌晨开始进攻。

1943 年 7 月 5 日 2 时 20 分，苏联的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什方面军先发制人，在敌人动手之前，开始炮轰德军阵地。当时万炮齐鸣，震天动地。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域最大的交战开始了。在这可怕的“交响乐”中，重炮的轰击声，炸弹、M—31 火箭弹、“喀秋莎”的爆炸声，以及飞机马达不停的轰鸣声汇成一片。丧魂失魄的敌人遭受到惨重损失，敌人的进攻指挥也被打乱了。

2 时 30 分，斯大林给朱可夫打来电话。

“怎么样？开始了吗？”

“开始了。”

“敌人如何动作？”

“敌人炮兵企图向我反击，但在我强大炮火的压力下很快就沉默了。”

“好吧，过一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

7 月 5 日这一天，敌人以三个坦克师和五个步兵师的兵力，进行了五次猛烈冲击，企图突入苏军防御，但未能取得重大效果。几乎在方面军的所有地段上，苏军都固守着自己的阵地，好像没有可以把他们推离原地的力量似的。只是到日暮前，德军付出重大的牺牲后才在奥利霍瓦特卡地域及其他某个地方楔入苏防御纵深三至六公里。

在这场阻击战中，英雄的红军战士打得非常英勇。伊吉谢夫大尉的炮兵连一天内歼灭敌人 19 辆坦克，自己也遭到猛烈的突击。全体官兵虽然在战斗

中英勇牺牲了，但守住了阵地，没有让敌人突入。由科诺瓦连科少校指挥的一个步兵团，在7月6日击退了敌人16次冲击，使法西斯军队遭受数以千计的伤亡。7月8日，德军加强了在奥利霍瓦特卡方向的冲击。纳粹军队在这里又一次领教了苏军英勇顽强的精神。由鲁科苏耶夫上校指挥的反坦克炮兵旅，与敌人的300辆坦克和近百架飞机进行了力量悬殊的战斗。就这样，到7月10日为止，德军损失了希特勒作为主要赌注的数百辆坦克后，并没有向前推进。

还在上述交战过程中，即7月9日拂晓，斯大林大元帅往中央方面军指挥所打电话。他向朱可夫问明情况后说：

“按照计划规定，现在该是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左翼行动的时候了把？”

“是的，斯大林同志。”

“为了不让敌人有时间组织将要被迫转入的防御，应使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全部兵力和西方方面军的左翼迅速转入进攻，否则中央方面军不能顺利地实施计划中的反攻。”

“我现在就到波波夫那里去，让布良斯克方面军在近日内向敌人发起进攻。”

7月12日，布良斯克方面军及西方方面军的加强近卫第十一集团军按照最高统帅的命令转入进攻。尽管德军的防御是纵深梯次配置的，工事十分完备，抵抗很顽强，苏军还是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并开始向奥廖尔总方向推进。不出所料，敌人在奥廖尔地域陷入一片慌乱，苏中央方面军毫不迟延地利用了这种形势，于7月15日转入反攻。于是，在这里，在奥廖尔地域，希特勒经过长期准备的总攻彻底垮台了。德军尝到了惨重失败的苦头，尝到了苏联猛烈炮火压向仇敌的全部威力。

但是，在个别地段，在别尔哥罗德地域，敌人实施了更加猛烈的向心突击。7月6日，奥博扬方向发生了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交战双方同时出动了数百架飞机和数百辆坦克参加战斗。可是敌人没有能够打破苏军的钢铁般的防御。坦克兵、炮兵英勇地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冲击。仅7月6日一天，德军就在这里损失了200余辆坦克、数万名士兵和将近100架作战飞机。

7月7日清晨，德军再次发起了猛烈冲击。天空和地面炮声隆隆，夹杂着坦克和马达的巨响，不绝于耳。沃罗涅什方面军部队，在航空兵强有力的支援下顽强战斗，没有让敌人突破第二防御地带，但在一些地方德军还是楔入了苏军防御。于是，方面军指挥员将近卫坦克第二军和第五军以及由其他方向抽调的一些步兵师和炮兵部队，在当时已处于危急状态的这一地段投入交战。两天内，敌人又损失了200多辆坦克和很多其他技术兵器。其步兵部队的人数已不超过原有人数的一半。7月10日，敌人经过调整部署，将主力集中在较狭窄的地段，重新向普罗霍罗夫卡方向进攻，打算在这里击溃已被削弱的苏联部队。7月11日，在普罗霍罗夫卡方向继续进行着激烈的交战。

日终前，沃罗涅什方面军地段上的战事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苏最高统帅部根据预定计划，从预备队中将近卫诸兵种合成第五集团军及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调往普罗霍罗夫卡地域，于7月12日晨投入战斗。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约有8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德军在奥博扬和普罗霍罗夫卡方向的全部坦克也不少于此数。两军旗鼓相当，但敌军的士气经过与红军的多次交战，已经低落下来。7月12日，在沃罗涅什方面军地段进行了最大的一次交战，

双方出动了数以千计的坦克和飞机进行厮杀，敌我双方都力争压倒对方，争夺战争的主动权。

这一天，斯大林往布良斯克方面军指挥所打电话，命令朱可夫立即飞往普罗霍罗夫卡地域，负责协调沃罗涅什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的行动。那里所有的地段都在进行激烈的血战，数百辆坦克和自动火炮在燃烧。战场上空，硝烟滚滚。这是在别尔哥罗德方向交战的转折时刻。已疲惫无力并对胜利丧失了信心的希特勒匪军，逐渐转入防御行动。朱可夫遵照斯大林的指令，将两个方面军的全部兵力投入决定性的反攻。7月16日，德国遭到重创后开始退却，苏军乘胜直追。在北面，三个方面军发起反攻之后，继续前进，于8月5日解放了被敌寇占领近两年之久的奥廖尔。在南面，沃罗涅什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自8月3日发动强大攻势，于8月5日解放了别尔哥罗德。为了庆祝苏军解放上述两座重要城市的胜利，经斯大林的提议，8月5日24时在首都莫斯科用120门大炮齐鸣12响，向英勇的红军表示祝贺。这是苏联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第一次鸣礼炮庆祝苏联的胜利。

之后，草原方面军继而南下，经过激战粉碎了哈尔科夫附近的敌军，于8月23日开进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至此，规模巨大的库尔斯克战役持续了50天，以苏军的辉煌胜利而宣告结束。在这次战役中，德军损失50余万人，3000门火炮，3700架飞机，1500辆坦克，其中有大批“虎式”、“豹式”等新式坦克。

库尔斯克战役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会战之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战役，是希特勒妄图挽回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丢失战略主动权的最后一次挣扎，实际上是德国法西斯势力灭亡前的回光返照。从此以后，德军在苏德战场最终地、完全地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再也没有力量发动进攻战了。所以斯大林说：“如果说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会战，预告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覆灭，那末，库尔斯克附近的会战，就使得它已经处于覆灭的边缘。”此次战役也证明，英勇的苏军不仅能在冬季发动攻势，而且在夏季也同样能胜利地进行进攻战，从而粉碎了希特勒关于“苏军不能在夏季进行有效进攻”的谬论。

库尔斯克战役还没有全部结束，斯大林就作出了下一步的决定：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苏军应当勇猛地追击德军，尽可能快地把法西斯占领和奴役下的苏联西部领土和人民解放出来。所以库尔斯克战役之后，在9月到11月的三个月时间内，苏军在南部和中部战场全线出击，猛打猛追，德军节节败退。在南方，红军9月份解放了诺沃罗西斯克和塔曼半岛，彻底肃清了高加索地区的敌人；同时解放了苏联的重要工业区顿巴斯，把克里米亚半岛上的敌军从陆地上封锁起来。

1943年10月，红军在多处渡过了第聂伯河。11月6日基辅解放，两天后，日托米尔解放。北面的进展没有这么壮观，但9月25日收复了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彻底解除了受进攻的威胁。到1943年底，红军已收复了德寇在1941年至1942年间向东大举进攻中所侵占的大部分领土。但白俄罗斯的大部分、西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地区仍在德寇手中。

红军在向西推进、解放德寇占领区的过程中，发现了德国法西斯对战俘和老百姓骇人听闻的残暴罪行。大部分战俘被活活饿死。这是因为德军接到了“元首”的命令，要求他们在德国以外就地寻找粮食，一切余粮都必须送回到当时已实行严格定量供应的德国。但这一灭绝人性政策的另一个理由

是，“俄国人是贱民，是劣等民族，只能像动物一样来对待，‘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制度’必须摧毁。”

据估计，1941年6月至1944年5月间，德军在苏联俘虏了516万人，其中105.3万人最后获得了解放。但375万多人因大屠杀、饥饿和寒冷而灭绝。他们被圈在露天里，没有任何遮蔽，没有食物，在秋冬的严寒中很快就死去。像这样死去的苏联老百姓，包括妇女和儿童，肯定超过这个数字。有人估计高达1000万以上。

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哈尔科夫通常有90万人口，在战争初期大批逃难的人涌入时，人口膨胀到130万。德军临近时，成千上万的人往东部方向逃跑。被占领时，市内大约有70万人，但只有一半幸存下来。那一半人当中，有12万人被送往德国从事奴隶劳动。有7万至8万被饿死冻死。约有3万人，其中包括1.6万名犹太人被处决。奥廖尔的11.4万人口，在解放时不超过3万人。德寇杀害了大约1.2万人，送到德国去做奴隶劳动的有两万多人。

每一个被占领的苏联城镇和乡村都遭到同样悲惨的命运。首先遭杀害的是犹太人，接着俄罗斯人遭到各种各样残暴的虐待。在基辅附近的娘子谷，10万名犹太人遭屠杀。德寇把凶恶残忍集中在犹太人和俄罗斯人身上。他们对待乌克兰人和穆斯林的态度略有不同，因为这些人被看作是苏维埃政权的“实际敌人和潜在敌人”。德军直到1942年底才稍为改变了一下对苏联战俘的待遇，让他们选择饿死或其他死的方法，或去参加反动的“弗拉索夫军”。但大部分苏联人宁死不屈，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至于关在达豪和其他集中营里的人，活下来的更是寥寥无几。

斯大林的长子雅可夫，原是第十四榴弹炮团的一名上尉，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与他的部队一起开赴白俄罗斯前线。1941年7月他被俘。后来德国人认出了雅可夫，大肆宣传斯大林的儿子已落入他们的手中，但斯大林就是不理那一套。

1943年冬末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斯维特兰娜难得去看望了一下她日夜忙于公务的父亲。斯大林对她说，“德国人提议我们用一名战俘去交换雅沙（雅可夫）。他们想要我同他们作交易，我不干！战争就是战争！”她补充说：“从他的语调中我可以看出他心烦意乱。关于这件事他一个字也不肯多说。”1945年夏天，欧洲战争结束后，她又难得去看望了一下父亲。斯大林又谈起了雅可夫。“德国人把雅沙枪决了，”他说，“我收到了一位比利时军官的一封信函。”她注意到他说话时心情沉重，不想多言。斯维特兰娜爱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感到在他被法西斯处决之后，她的父亲对这个儿子怀有深厚的感情，意识到他原来那样对待儿子是苛刻和不公道的。但她在一本书中写道，“这非常像我父亲的作法，因为他可以把自己的家属撇开不管，忘却他们，好像他们不存在一样。他整天想的是国家，是工作。”

在战争期间，斯大林昼夜所想的是国家的安危，是如何赢得胜利。他不仅忘记了家庭，而且也忘记了关心自己。他日夜操劳，脸上的皱纹愈来愈深，头上的白发也愈来愈多了。战争摧残了他的身体。唯一使他感到安慰的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于全体苏联军民的努力和作出了重大牺牲，终于在1943年扭转了战局，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这一年，苏军在一系列决定性的进攻战中击溃了德寇，解放了德军占领下苏联国土的2/3，迫使他们转为防守。苏军在中部战线前进了500公里，在南部前进了1300公里，解放了将近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斯大林指出，这一年，“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苏德战场上的战斗中，损失了400多万官兵，其中被打死的至少有180万人。此外，德国人在这一年中还损失了1.4万多架飞机，2.5万辆坦克和不下于4万门大炮。”斯大林继续说：“德军在我国战场上今年年底前的失败，是由以下两个极重要的事变预先决定了的，即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会战和库尔斯克附近的会战。”而“今年下半年我们夏季战役的胜利，是今年年初我们冬季战役胜利的继续和完成”。由于苏军威力强大的反攻和严重打击，德国法西斯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日益恶化，面临深刻危机。希特勒采取的战略防御和总动员等措施，已无法挽回自己的败局，德国武装力量的声望急剧下降。希特勒在战略防御过程中，一步步走近自己的坟墓。

1943年也是苏联国防力量发生转折的一年。在后方，苏联已拥有调整就绪的和迅速发展的战时经济体系。伟大的苏联工人阶级在这一年生产了3.5万架作战飞机，2.4万辆坦克和强击火炮。苏军新建了78个师，还储备有9万多名军官。苏军在人数和装备方面均已超过法西斯军队。苏军士气空前高昂。斯大林在总结1943年苏军取得胜利的原因时，曾转述了一段列宁的指示：“战争是对每个民族的一切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全面考验。战争的历史教导我们，只有那些在经济的发展和组织方面，在本国军队的经验、技能和战斗士气方面，在整个战争期间人民的坚韧不拔和团结方面都胜过敌人的国家，才能经受住这种考验。”斯大林领导的卫国战争期间的社会主义苏联正是这样的国家。

1943年是苏德战场出现伟大转折的一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根本转变的一年。在全世界人民的抗击下，法西斯侵略者丧失战略主动权，开始分崩离析；反法西斯同盟国开始从各条战线揭开战略大反攻的序幕。特别是希特勒妄图夺取战略主动权的反击遭到失败后，苏军展开更加凌厉的进攻，所向披靡。正是：

垂死挣扎也枉然，
回光返照徒自怜；
库尔斯克大捷后，
红军大步迈向前。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八章 盟国之间

叱咤风云三巨头，联合抗敌费运筹；
翩翩起舞比才华，苏联统帅最风流。

斯大林处理盟国关系的原则是，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则联合存，以退让求联合则联合亡。

1943年深秋，在德黑兰举行的“三巨头”会议，集中地表现了斯大林高超的外交艺术。

如今，参加德黑兰会晤的三国首脑，已无一人在世。最后去世的是丘吉尔，他活到90岁，1965年隆重地安葬在英国他自己的庄园里，当时他离开政界已10余年了。罗斯福死于1945年4月，正值希特勒德国投降前夕。斯大林比罗斯福多活了8年不到一点。他们三人在德黑兰会晤时都是反希特勒同盟国的首脑。那时深受前所未有的战争折磨的世界，都密切注视着“三巨头”的每一个行动，倾听着他们的每一句话。因此，德黑兰会议的召开自然吸引了全人类的注意力。不仅受蹂躏的欧洲各国期待着“三巨头”首次会晤时要作出的决定，轴心国也惴惴不安地等待着该三国会议的结果。反希特勒同盟“三巨头”是否善于协同动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时文明世界的命运和子孙后代的生活。

三位领导人各有对人类历史和未来的看法，各有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尽管如此，对共同敌人的斗争合乎逻辑地使他们在德黑兰聚到一起，并且通过了一致的决议。许多历史学家把德黑兰会议看成是反希特勒同盟的极盛阶段。但通向这一顶峰的道路却是不平坦的。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三方曾进行了长时间的书信来往。他们一致认为，三国领导人的会晤是必需的和重要的。当时，即1943年秋，在抗击希特勒德国的战争进程中出现了有利于同盟国的明显转折，因此不仅出于军事上，而且也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迫切需要反希特勒同盟三国领导人会晤，需要讨论和协商如何进一步联合行动，以便更快地战胜共同的敌人。同时，还需要就战后的安排交换意见。但在什么地方举行会议，曾经成为一个难题。斯大林希望会议在离苏联较近的地方举行，理由是苏德战场上正进行着激烈的战争，他作为一个最高统帅不能长久离开莫斯科。而罗斯福却借口美国宪法不允许总统长期不在华盛顿。

1943年9月6日，罗斯福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表示他“可以到诸如北非那样远的地方进行会晤”。丘吉尔则希望会晤最好在塞浦路斯或喀土穆进行。斯大林却在9月8日提出伊朗作为“三巨头”会晤的最合适的地点。两天后丘吉尔答复说，他“同意去德黑兰”。然而，罗斯福仍坚持在别的地方会晤，并提出了各种方案。他这样做，看来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威望。10月14日，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开罗在许多方面是吸引人的，据我所知，在那里的城郊，金字塔附近，有一家旅馆和几所别墅，这些场所都可以完全和外界隔绝起来。在前意属厄立特里亚首府阿斯马拉，据说有一些非常好的建筑物和一个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的飞机降落场。其次，也可以在东地中海的某一港口会晤，只要我们每人都备一条船，如果这个想法合您的意的话，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提供一艘很好的船，完全听您和您的随行人员支配，使您完全可以独立活动，同时可以同贵国舰队保持经常的联系。另一个建议是在巴格达附近会晤，在那里我们可以设三间舒适的营房，周围布置足够数量的俄国、英国和美国警卫人员。最后这个想法似乎是值得考虑的。”

苏联政府仔细考虑了罗斯福的提议，还是认为不能采纳。10月19日斯大林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写道：“很遗憾，我不能认为以您所提议的那些地点来代替德黑兰作为会晤的地点是合适的。问题并不在于安全，因为安全问题并不使我担心。”接着斯大林作了说明，1943年夏、秋两季苏军开展的攻势节节胜利，这表明苏军对德国的攻势能继续下去。夏季攻势可能发展成为冬季攻势。斯大林继续写道：“我的所有同事都认为，这些军事行动需要最高司令部每天的指导，并且要由我亲自同司令部联系。在德黑兰，和其它的地方不同，可以通过电报或电话与莫斯科直接联系而得到满足。因此我的同事们坚持以德黑兰作为会晤的地点。”

一星期后，罗斯福回了信，他仍然拒绝去德黑兰，理由是通向伊朗首都的航线有高山阻隔，那儿经常一连好几天不通飞机，因此飞机从华盛顿运送急需总统批阅的文件，可能会耽误很长的时间。鉴于这种情况，斯大林考虑让苏联政府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代替他参加首脑会议，这样选择会晤地点的困难就不再存在了。斯大林表示，希望他所提的建议将能使有关各方都满意。因此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如果罗斯福继续拒绝去德黑兰，那末斯大林就可能根本不参加拟定举行的会晤。罗斯福看到了这一点，他不愿失掉与苏联首脑亲自接触的机会，最后终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11月8日他写信通知斯大林，同意在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德黑兰举行三国首脑会议。

1943年11月25日，斯大林在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以及内务部人民警察部的警卫人员的陪同下，在孔策沃附近登上了火车。到斯大林格勒和巴库这段路程，他坐的是火车，然后从巴库换乘飞机去德黑兰。随同最高统帅的总参作战部长什捷缅科随身携带着所有战区的地图。在旅途的间隙，他便同莫斯科的总参谋部通话，并把获悉的最新情况标入地图中。他的责任就是每天早晨和晚上向斯大林汇报前线的重要情况。

在德黑兰，斯大林住的那座小别墅，就在过去曾是沙俄使馆而现在已是苏联大使馆的院子里。什捷缅科将军和他的密码人员住的房间紧挨着通信中心室。抵达后的当天晚上，斯大林视察了这一房间，觉得太小太黑，就指令换了一个大一些的房间。斯大林就在什捷缅科的房间里同前线的瓦杜丁、罗科索夫斯基以及莫斯科的安东诺夫直接通话。什捷缅科在这里用电话或电报接收安东诺夫起草的命令，让斯大林签署。然后再把批件用电报发给莫斯科。在德黑兰期间，斯大林还照常保持着对苏联所有战场上的行动的直接指挥。

“三巨头”会议于11月28日在苏联大使馆开幕。这是一片寂静、幽雅的庄园。这里没有任何干扰，也听不到东方城市的喧嚣声。宽敞的庭院，四周都是石头砌的围墙。几幢浅色砖房稀稀疏疏地坐落在庭院的绿荫深处。这里就是苏联代表团的住所。那座通常作使馆办公厅用的主楼，现在改作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官邸。关于让美国总统在会议期间下榻苏联使馆的问题，德黑兰会议的参加者之间事先已经讨论过了。最后定下来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美国驻德黑兰使馆地处城郊，而苏联和英国的使馆却紧挨在一起。只要用几块高高的挡板截断两个使馆间的街道，再在中间开辟一个通道，就能把两个使馆连成一个整体。这样苏英两国代表的安全就有了保证，因为这一片领土都警卫森严。如果罗斯福呆在美国使馆的驻地，那末他本人和其他的与会者就只好每天几次经由德黑兰城里狭窄的街道，去参加会谈。而街上的人群里很容易隐藏“第三帝国”的间谍分子。

多方情报证实，希特勒特务机关准备谋害德黑兰会晤的参加者。1966年，那个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奥托·斯特尔兹内证实，他曾受命在德黑兰劫走罗斯福。希特勒匪徒极其秘密地策划了这一行动。早在1943年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在卡萨布兰卡会晤后，希特勒就开始谋害反法西斯同盟三国首脑。这个被称为“远跃”的行动计划是由希特勒委托谍报局头目卡纳里斯和帝国保安处长卡尔登勃鲁纳两人制定的。为了更能掩人耳目，谋害“三巨头”的行动计划用的密码代号是“大象”。准备工作是在谍报局和党卫军保安处所属的特别训练班里进行的。德黑兰是三大国首脑会晤可能选择的会址之一，这一点希特勒的侦察机构早在1943年9月中旬在破译了美国海军电码后就知道了。

为了便于执行这一谋杀任务，早在会议开始之前，法西斯特务罗马·加莫特就已空降到离德黑兰不远的地方。他在当地一些纳粹同情分子中间找到了隐身之地，并与柏林建立了无线电联系。此后不久，几组党卫军密谋分子与加莫特结成了一伙。这些密谋分子中有盖世太保的奸细文费列得·奥伯格和乌尔里希·冯·奥尔特尔。这些人乘坐德国飞机空降到德黑兰。飞机是从当时已被希特勒侵占了的克里米亚起飞的。加莫特及其同伙后来被一名在德黑兰的英国秘密间谍头目瑞士人恩斯特·梅尔泽尔所破获。战前梅尔泽尔就是英国谍报机关的情报人员，后来经他的英国主子同意，受聘于希特勒德国谍报局。卡纳里斯对这位新来的特工人员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分析，但始终也未能发现他的“双重”身份。1940年底，梅尔泽尔受德国谍报局的委派，作为几个西欧商行的代办驻在德黑兰。1941年夏，德国人被迫离开伊朗，恩斯特·梅尔泽尔就成了秘密间谍的主要头目，希特勒侦察机构在德黑兰的联络员。柏林除了与空降在伊朗的密谋分子进行秘密无线电联络外，还通过藏在梅尔泽尔家的无线电发报机与谍报机构就策划谋害反希特勒同盟三国首脑的问题保持联系。自然，梅尔泽尔就把全部情况统统报告给他的老主顾英国人了。

与此同时，潜伏在敌人内部的苏联谍报人员也获取了这一重要情报。那是由两名有经验的苏联契卡人员季米特里·麦德韦杰夫和亚历山大·卢金所领导的特别小组。传奇式的侦察员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就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他在被纳粹分子所占领的罗夫诺地区有过不少英勇事迹。他德语说得很好，巧妙地伪装成德军中尉鲍乌尔·吉别尔特。希特勒党徒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怀疑过这位打扮得漂漂亮亮、身材修长、衣冠楚楚的前线军官，竟是一名苏联侦察员。最后他还是被法西斯分子发现了，而于1944年4月1日英勇地牺牲了。

有一次，尼古拉·库兹涅佐夫请新来的党卫军冲锋队长乌尔里希·冯·奥尔特尔到一所军官餐厅喝酒，结果奥尔特尔喝得烂醉如泥，把他要去德黑兰执行秘密任务的老底全兜出来了。“我马上要去伊朗，我的朋友，”他低声说道，“11月底‘三巨头’将在那里聚会。我们要搞一次空降阿布鲁齐行动。只是这次搞的是远距离的空降。我们要消灭‘三巨头’，扭转战争的进程。我们要劫走罗斯福，使元首更容易和美国商谈……我们分成几个小组去。人员的训练工作正在哥本哈根的特别训练班里进行。”

冯·奥尔特尔提到的“空降阿布鲁齐行动”指的是奥托·斯科尔兹内奉希特勒之命为营救墨索里尼所采取的行动。1943年7月，法西斯统治在意大利遭到失败后，墨索里尼被捕。在严加戒备下他被押送到阿布鲁齐地区附近

的一所山顶旅馆。这里是一片人迹罕见的荒凉地带。新任意大利总理巴多格里奥元帅，表示愿意就意大利退出战争的问题同英美进行谈判。希特勒对此气急败坏，决定无论如何也得抢出墨索里尼，以便借他的力量迫使意大利即使是在北部地区也要继续打下去。要从下面到这所山顶旅馆只有一条架空索道，索道进口警备森严。另一条路，那就是空降了。希特勒密谋机关选择了后一条路。纳粹头子把这一行动委托给党卫军冲锋队长奥托·斯科尔兹内去完成。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已干过多次阴谋破坏活动和谋杀勾当。1934年谋杀奥国首相陶尔菲斯，在并吞奥地利时逮捕奥总统米克拉斯和首相许士尼格，对南斯拉夫和苏联和平居民进行残酷迫害等等，一桩桩的罪行都是斯科尔兹内和他的党羽们干的。斯科尔兹内颇得希特勒的青睐，因此在策划代号为“远跃”的谋害德黑兰会议参加者的计划时，毫不奇怪他又被选中了，但这一次这位希特勒的宠儿可没有得逞。

鉴于德黑兰的复杂情况，美国总统接受了住进苏联使馆的建议。他住的房间正对着举行全体会议的大厅，这一点对于下肢麻痹、行动不便的罗斯福来说，也是极其方便的。苏联方面尽了一切可能使美国总统在苏联使馆里住得舒适满意。在罗斯福的住所内，美国人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总统的膳食仍和往常一样由他个人的厨师和服务人员负责。美国代表团和其他成员以及技术人员仍住在美国使馆，他们每天从住地前来开会。

“三巨头会议”正式举行之前，苏美两国首脑进行了友好会见。美国总统事先提出，只他一人参加，不带美方翻译查尔斯·波伦。罗斯福决定不带任何人，是为了使会谈有一种相互信赖的气氛。因此全部会谈由苏方外交官员别列日柯夫一个人翻译。

这天，斯大林身着元帅服，神采奕奕，提前来到客厅迎候美国总统。他指着旁边的沙发对翻译说：“这里靠边上是我坐的。罗斯福一会儿坐着轮椅来，让他坐在圈椅的左边，你就坐在圈椅上。”说完，斯大林又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思忖着什么。几分钟后，门打开了。一个菲律宾仆役推着轮椅进来，罗斯福笑容满面坐在轮椅里。双手紧紧撑住轮椅上的扶手。

“哈啰，斯大林元帅！”罗斯福精神抖擞地招呼着，伸出了手。“我好像来晚了点，请原谅。”

“不，您来得很准时，”斯大林说，“是我来得早一点，我作为主人应该这样。不管怎样，您是到我们这儿来，可以说是到苏联领土上来作客的。”

“我表示抗议，”罗斯福大笑起来，“我们不是规定得很明确，在中立国会见吗？况且这里是我的官邸，您才是我的客人呢。”

“咱们别争了，总统先生，您最好还是谈谈，给您安排得还好吗？您是否还需要什么？”

“不，谢谢，一切都很好，我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这就是说，您喜欢这里？”

“非常感谢您给我提供了这所房子。”

“请您坐得更靠近桌子点。”

菲律宾仆役把轮椅推到指定的位置，把椅子转了过来，拉紧了轮椅上的闸，退了出去。斯大林请罗斯福吸烟，罗斯福谢绝了。

然后掏出自己的烟盒，用他那细长的手指把一支香烟插在一个精制的烟嘴上，抽了起来。

“抽惯了自己的，”罗斯福笑了笑，耸耸肩，像是表示歉意似的，“您

那个赫赫有名的烟斗哪里去了？斯大林元帅，据说您就是靠这个烟斗来熏跑自己的敌人的？”

斯大林狡黠地笑了笑，眯缝着眼。

“看来，我几乎把他们全都熏跑了。不过严格说起来医生是要我尽量少抽烟斗的。可我还是把它带来了。为了使您愉快，我下次一定带着它。”

“应该听医生的，”罗斯福严肃他说，“我也得这样做。”

“您对今天这次谈话的日程有什么建议吗？”斯大林开始以谈正事似的语气说道。

“我想不必现在就明确地划定我们要讨论的问题的范围。只不过是就目前形势和未来的远景一般地交换一下意见。我也很想从您这儿了解到你们前线的情况。”

“愿意接受您的建议，”斯大林说道。他从容不迫地从烟盒里取出一支抽了起来。然后不慌不忙他说，“至于谈到我军前线情况，主要的大概就是我军放弃了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日托米尔。”

“前线天气如何？”罗斯福问道。

“只有乌克兰天气很好，前线其他地区是一片泥泞，土地还没上冻。”

“我想从苏德战场引开德国人 30 至 40 个师的军力。”罗斯福深表同情他说道。

“如果能办得到，就很好。”

“这是我准备在最近几天就在德黑兰加以阐明的的问题之一。问题复杂就在美国人需要供养一支远离美国大陆 3000 英里以外的为数 200 万人的军队。”

“这就需要有良好的运输工具，我完全理解您的困难。”

“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能够解决，因为美国正在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制造船只。”

斯大林提起不久前在黎巴嫩发生的动乱，他问罗斯福是否知道动乱的原因，谁应对此负责。罗斯福没有立即作答，他摘下夹鼻眼镜，用胸前口袋里的白手绢擦了擦镜片，再把眼镜戴上，然后思付着说道：“我认为应该由法国全国委员会负责，英国人和法国人曾保证给黎巴嫩以独立。黎巴嫩人有了自己的宪法和总统。他们想对宪法稍作修改，但是法国人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且逮捕了总统和内阁成员。现在黎巴嫩一切都正常了，已经平息下来了。”

会谈中斯大林和罗斯福还涉及许多问题，其中有战后苏美两国的经济合作问题，法国的前途问题，以及战后的殖民地等问题。罗斯福多次谈到必须重新对待战后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问题，表示希望让这些国家逐步自治和获得独立。在谈到印度支那的前途时，罗斯福说，可以向印度支那委派三四个托管人，经过 30 至 40 年使印度支那人做好自治的准备。罗斯福认为这种办法同样适用于其他殖民地。

罗斯福继续说道：“丘吉尔不愿意在实现关于托管制的建议方面采取坚决行动，因为他怕不得不对他的殖民地也实行这个原则。”他甚至提醒斯大林，在不列颠首相谈话时，最好不要谈印度问题。因为据他所知，丘吉尔对印度问题尚无任何考虑，丘吉尔想把这个问题搁到战后再说。

“印度问题是丘吉尔的一个痛处。”斯大林说。

“是这样，”罗斯福表示同意，“但是英国在印度总归要有所行动。我希望同您详细商谈一下印度问题，我认为在印度问题上的局外人，比那些有

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这一试探，斯大林的反应是谨慎的，他仅仅说总统的这个意见是很有意思的。

罗斯福看了看表，大会定于 16 点正式开幕，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我看，咱们该结束了，”罗斯福说，“稍稍歇会儿，开全体会议前集中思想考虑一下。我觉得，我们这样交换意见是有益的。总之，我很高兴和您认识并开诚布公地和您交谈。”

“我也同样感到十分高兴。”斯大林回答说。然后他站起身来，轻轻地向罗斯福点了一下头……

苏美英三国首脑第一次全体会议于 11 月 28 日 16 点开始，由美国总统罗斯福主持。这次会议持续了 3 个半小时。罗斯福宣布开会时说：“作为在座的政府首脑中最年轻的一个，我冒昧地第一个发言。我愿意向我们这个新家庭的成员们——聚集在会议桌周围的全体与会者保证：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尽快地赢得战争的胜利……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任何东西都不打算发表，但我们彼此之间要像朋友一样开诚布公。”德黑兰会议参加者相互保证不发表会议上讨论的任何东西，这一点无疑促进了自由交换意见，也有利于彼此之间更好地了解各方的立场。这就造成了一种良好的气氛。使三国能够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从而加强了这一时期反希特勒同盟的团结，尽管苏联与美英的社会政治制度有着根本的不同。

美国总统在谈到会议工作程序时说道，各代表团的参谋人员可以单独讨论军事问题，同时代表团本身则可以讨论其他问题，如有关战后安排问题。“我想这次会议将会成功的，”罗斯福在结束发言前强调说，“在这次战争中联合起来的三个国家将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并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紧密合作创造条件。”

在进入具体问题讨论之前，罗斯福询问了丘吉尔和斯大林，是否愿意就这次会谈的重要性及其对全人类的意义讲几句话。

丘吉尔立即举起右手要求发言。他说话清晰，从容而有节奏。为了强调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丘吉尔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把圈椅往边上推了推，以便给他那肥胖而笨重的身子让出地方来。“这次会晤，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世界力量的最伟大的集会，”丘吉尔说。“我们的手里握有缩短战争、赢得战争胜利和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等问题的决定权。我愿为我们无愧于上帝赐给我们造福于人类的良机而祈祷。”丘吉尔环视了所有在座的人，然后慢条斯理地坐在圈椅上。

斯大林发言了。他坐在座位上没有站起来。大厅里一片寂静，这可能是由于在座的多数人是第一次听斯大林讲话，也可能是斯大林说话声音大小。他说：“在祝贺三国政府代表会议召开的时候，我想讲几句话，我想我们是历史的宠儿，历史赋予我们极大的力量和极好的机会，我希望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要竭尽全力为了共同合作，而更好地利用人民授予我们的力量和权力，现在让我们开始工作吧。”

会议接着进入了实质性问题的讨论。首先由三国首脑介绍了各自战场的情况。在罗斯福介绍了太平洋战场同日本作战的情况后，斯大林着重介绍了苏德战场的情况。他说：“本来我们在准备进攻，结果德国人抢先了。今年 8—9 月份所取得的胜利连我们自己也没有估计到。原来德国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弱。现在德军在我们战场上有 210 个师，还有 6 个师正在调往前线的途中。

此外还有 50 个非德国师。苏联方面在前线作战的有 300 到 330 个师。”

斯大林在谈到苏联战场的近况时说，正是这一部分超过的兵力被苏联方面用来进攻。但是，因为我们打的是进攻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优势将会越来越小。德国人在撤退时野蛮地摧毁一切，这就造成很大的困难。给我们运送弹药带来麻烦。这就是苏军攻势放慢的原因。

“最近三周德国人在乌克兰的基辅以南和以西的地区发动了进攻，”斯大林继续说，“他们占领了我们的一个重要铁路枢纽——日托米尔，这已经公布了。大概他们日内还要夺取科罗斯田，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在这个地区德军有 5 个新坦克师和 3 个原有的坦克师，总共 8 个坦克师，还有 22 个到 23 个步兵师和摩托化师。他们的目的是重新占领基辅。所以我们前面会遇到一些困难……因此，盟军开辟第二战场，加速进入法国北部是非常重要的。”

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无疑是德黑兰会议的主要议题。

围绕这一问题无论在正式的会议上或是在非正式的会见时都展开了极为激烈的争论。众所周知，自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以来，德军的主要兵力都在东线，希特勒之所以能这样干，正是因为西线战场，以至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实际上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行动。苏联承担了希特勒军事机器进攻的全部重担。在德军入侵的最初日子里，在苏德战场上德军投入作战的兵力就有 550 万人。在苏联边境上总共集结了 190 个师，拥有 5 万门大炮和迫击炮，约 3500 辆坦克，3000 多架飞机以及其他的军事装备。德军指挥部之所以能够把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捏成一个拳头，就是因为它没有必要两线作战。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最关切的是盟军能积极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首先是在欧洲大陆与德军作战来给红军以有效的援助。

斯大林提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之后，罗斯福首先表态，他强调指出，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非常重要，也是苏联特别关心的问题。罗斯福说，西方盟国一年半以来都在制定相应的计划，但由于船舶吨位不足，仍不能确定这一战役的日期。

罗斯福总统说：“我们不仅想横渡英吉利海峡，还要向纵深追击敌人。而英吉利海峡是这样一个讨厌的水域，要在 5 月 1 日前开始渡海战役是不可能的。所以英美在魁北克制定的计划，出发点就是这个战役应在 1944 年 5 月 1 日左右付诸实现。”

美国总统指出，进行任何登陆战役，都需要专门的登陆艇。接着他谈到进行这些或那些战役的顺序，谈到哪些战役应优先进行。“如果我们将在地中海进行大规模登陆战，那末可能就得把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推迟两个月或三个月。因此，我们想就这个问题以及在舰艇少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利用地中海地区现有军队的问题，听听我们苏联同事的意见。”

罗斯福说完后，问丘吉尔是否想就他所说的作些补充。

丘吉尔停了一会儿，蠕动了一下嘴唇，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请求推迟我的发言，等斯大林元帅发言之后我再谈。但我原则上同意罗斯福总统所说的。”看来英国首相拒绝阐明自己的立场。其实他的立场与美国总统的观点是大不相同的，他想先摸摸苏联代表的底，然后再提出相应的论据。

斯大林看出了丘吉尔的诡计。在谈到第二战场时，斯大林说明，苏联方面指望盟国的正是在法国北部登陆，再也不能拖延，因为只有这样的战役才能减轻苏联战场上的困难。“也许，我的看法不对，”斯大林说道，“但我

们苏联人认为，意大利战场的重要性仅在于保证盟国船只在地中海自由航行。我们过去这样看，现在仍然这样看。至于说到从意大利直接进攻德国，那我们苏联人认为，意大利战场是不合适的……”

趁翻译正在译成英文时，斯大林从制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弯形的烟斗，打开他那特备的烟盒，取出几支香烟，不慌不忙地捏碎后塞进了烟斗，点燃后抽了起来。斯大林眯缝着眼，环视着所有在座者。当斯大林和罗斯福的目光碰到一起时，罗斯福微微一笑，会意地使了一个眼色，表示他记起了斯大林曾答应带烟斗来的事。也许罗斯福这个动作包含着更深的意义，那就是他同情斯大林驳回了丘吉尔尚未说出口的意思：丘吉尔对盟军在法国登陆是否合适表示怀疑。

翻译说完了，斯大林搁下烟斗，继续发言：“我们苏联人认为，在法国北部或西北部进攻敌人效果最好。德国最薄弱的地方是法国，当然这是一次艰巨的战役，在法国的德军将疯狂抵抗。但这终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我的全部意见。”

罗斯福向斯大林表示谢意，然后问丘吉尔是否准备发言。首相表示同意，他清了清嗓子，以他那特殊的绅士风度字斟句酌地开始讲话。他说，英国和美国很早就商定从法国北部或西北部向德国进攻，为此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准备。如果要说明为什么我们没能在1943年进行这些战役，需要举出许多数字和事实。但现在已决定1944年向德国发动进攻，进攻地点已经选定。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为使军队在1944年春未横渡英吉利海峡进入法国创造条件。我们能够在5月份或6月份为此目的而集中的兵力有16个英国师和19个美国师。在这些部队之后，主力部队要紧跟上去。而且预计在整个“霸王”战役中，5、6、7三个月内总共要调动100万人横渡英吉利海峡。

英国首相提出这些保证之后，接着就把话题转到了在欧洲其他战场上如何使用英美兵力的问题上。丘吉尔小心翼翼地选择用词，一再声明，这些建议只不过是把他的想法作为问题提出来供研究。然而，在这些声明的背后，却隐藏着英国首相的明确意图，这就是不从西面，而是从南面和东南面，正像丘吉尔爱说的从“欧洲的软腹部”来进攻德国。英国首相提出的意见不由地使罗斯福所规定的开始执行横渡海峡战役的期限又成了疑问。

据在场的苏方翻译别列日柯夫回忆，斯大林和罗斯福对英国首相的这一着没有作出反应。当伯尔斯少校译完他上司的最后一句话时，丘吉尔还停了片刻，想看看反应。他从烟具上拿起那支半截已燃成灰烬的香烟，小心翼翼地拿到嘴边，深深地吸了一口。等了一会，没有人提出不同意，于是他又继续讲下去。

“为了发动‘霸王’战役，”丘吉尔说，“我们已从地中海地区抽调了七个有作战经验的师及部分登陆艇。如果考虑到这一点，此外，还有意大利的恶劣天气，那么必须指出，我们对至今还没有攻下罗马有些失望。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占领罗马。我们认为，1月份将会有一场决战。而我们必将获胜。在艾森豪威尔将军领导下的第十五集团军司令亚历山大将军认为，罗马战役完全能够打赢。可能俘虏和歼敌11至12个师以上。我们不想再向伦巴第推进或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德国。我们只打算推进到罗马稍北的彼萨—罗马尼一线。此后就可以在法国南部登陆，并横渡英吉利海峡。”

丘吉尔向苏联代表团问道：“我们在地中海东部要采取的行动，可能会使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延缓一点执行，苏联政府对此是否感兴趣？”

没等苏联代表作答，丘吉尔又赶忙补充说道：“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还没有明确的决定，我们到这里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一种可能，”罗斯福插话说，“那就是当苏军逼近敖德萨时，我们可以在亚得里亚海北部地区登陆。”

丘吉尔继续说道：“如果我们夺取罗马，进而从南部封锁德国，那末我们就能进而在法国西部和南部发动攻势，并可以增援游击队。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并制定出详细的文件。”

斯大林仔细听了丘吉尔的阐述，然后接连向这位首相提出了几个问题。

“按照我的理解，你们将有 35 个师来进攻法国北部？”

“是的，正是这样。”丘吉尔回答。

“在开始进攻法国北部之前，预计先在意大利战场进行一次战役，目的是占领罗马，然后准备在意大利转入防御？”

丘吉尔点头表示肯定。

“除此之外还计划进行三个战役，其中之一就是在亚得里亚海地区登陆，我理解得对吗？”

“实施这些计划可能对俄国人会有好处。”丘吉尔说着，他的语调听起来已流露出一些失望情绪。然后这位首相又解释说：“最大的问题是必要兵力的调动问题。‘霸王’计划开始要用 35 个师，以后部队的数量将由美国调来的师团补充，其数目将达到 50 至 60 个师。在英国的英美空军最近 6 个月将增加 1 至 2 倍。此外，英国目前正在不断地聚集兵力。”

然而斯大林却没有让自己被这些议论所迷惑，他又一次提问：“不知我理解得是否正确，除占领罗马的战役外，还计划在亚得里亚海地区，同时还在法国南部分别发动一次战役？”

英国首相回避正面答复，他指出：“在‘霸王’战役开始时，计划在法国南部发动进攻。为此，将利用从意大利抽出的兵力，但这个战役的详细方案还没有拟定。”至于亚得里亚海地区登陆计划，丘吉尔根本避而不谈。

斯大林看了他一眼，然后用极为阴郁的声调说道：“我认为最好是把‘霸王’战役作为 1944 年一切战役的基础。假如在发动这个战役的同时，在法国南部登陆，那末两支军队就能在法国汇合。所以最好是进行两个战役：一个是‘霸王’战役，一个是支援‘霸王’战役的、在法国南部的登陆战役。而与此同时罗马地区的战役将是牵制性的战役。如果在法国南北两边登陆，当这两支军队汇合时兵力就增加了。不要忘了，只有法国才是德国人最薄弱的地方。”

斯大林和丘吉尔还在继续争辩着，气氛很紧张。罗斯福尽量设法从中缓和，他说：“如果进行地中海战役，那末势必要推迟‘霸王’战役，我是不想推迟‘霸王’战役的。”

丘吉尔满脸温色，垂头丧气地坐着抽烟，沉默了几分钟后仍坚持用进攻巴尔干地区的计划，来代替“霸王”计划。这一计划的真正意图是打算在合适的时机出兵拦截红军，阻止红军继续向西挺进。即使执行“霸王”计划，也要推迟在 8 月份付诸实施。最后，丘吉尔终于撕下伪装，建议这个问题由军事专家们来讨论。

“好吧，”斯大林毅然决然他说道，“让军事专家们去讨论吧。说实在的，我们没想到要讨论纯军事问题，所以也没有总参谋部的代表来，但我想，伏罗希洛夫元帅和我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果然在第二天上午举行的三国军事代表会议上，英国三军参谋长布鲁克将军再一次重复了丘吉尔首相的论调。美国代表马歇尔将军，尽管没有驳斥英国人提出的盟国在地中海地区登陆计划，但却明白表示，如果登陆工具不足而要实施这一战役，那就会大大延误“霸王”计划的实现。伏罗希洛夫虽然多次与对方论争，但最后仍是各持己见，军事代表们不仅在关于登陆战役的问题上没有找到共同的语言，就连更为重要的问题——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问题也没有解决。

11月29日全体会议开始之前，举行了一次显示同盟国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团结一致的隆重仪式。举行这种仪式适逢其时。它或多或少驱散了笼罩在会议上空的乌云，同时好像提醒人们，反希特勒同盟还面临着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这些任务只有采取协调一致的共同行动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以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和英国人民的名义向斯大林格勒居民赠送特制宝剑的仪式安排得十分隆重。由英国技术娴熟的、祖传的铸剑能手锻制成的双把巨型宝剑耀眼夺目，装在镶嵌着贵重饰物的刀鞘内。这柄宝剑象征着对斯大林格勒市给予法西斯致命一击的英雄们的尊重。

仪式开始前，大厅里早已挤满了人。当“三巨头”来到时，各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以及反希特勒同盟各国的陆海空三军将领都已聚集在大厅里等候。斯大林身穿佩带大元帅肩章的浅灰色军服。丘吉尔也穿起了三军统帅军服。军乐队演奏苏英两国国歌后，丘吉尔双手将宝剑取出，悬空高举，对斯大林说：

“国王乔治六世陛下命令我，将这柄依照陛下本人选定和赞赏的式样锻制的荣誉宝剑递交给您，请您转交给斯大林格勒市。这柄荣誉宝剑是由那些世代相传，其祖辈一直从事铸剑行业的英国能工巧匠锻制的。剑刃上刻有下列字句：‘国王乔治六世赠给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们——斯大林格勒市民的礼品，以表英国人民的敬意’。”

丘吉尔向前走动了几步，将宝剑交给斯大林。斯大林身后站立着手持冲锋枪的苏联仪仗队。斯大林接过宝剑，将剑抽出剑鞘，剑刃寒光逼人。他把剑捧到嘴边，吻了一下，随后手持宝剑轻声说道：“我代表斯大林格勒市民，对国王乔治六世赠送礼品表示十分感谢。斯大林格勒市民高度评价这件礼品。我请您，首相先生，向国王陛下转达斯大林格勒市民的谢意。”

间歇片刻。斯大林缓步绕过桌子走到罗斯福身旁把宝剑递给他看。丘吉尔托着剑鞘，罗斯福仔细地端详着长长的剑身。总统读了一遍剑刃上的题词，然后说：“的确，斯大林格勒市民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之后，“三巨头”一起坐在凉台上通往会议厅的高大门前照了像。这张照片已成为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而传遍全世界。

然而，在向斯大林格勒市赠送皇家宝剑仪式后接着召开的会议上，那种隆重而高昂的气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斯大林耸了耸肩膀表示，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难以继续进行会谈。大不列颠首相模棱两可的立场显然使他恼怒。但他仍以心平气和的口气说：“如像丘吉尔首相昨天所说，在8月份实施‘霸王’战役，那么由于这个期间天气不好，这个战役不会有什么结果。4月和5月是进行‘霸王’战役最合适的月份。”

人所共知，斯大林有时容易动怒，而且不容异见。但在整个德黑兰会议

工作期间，他都能克制自己。甚至在气氛十分紧张的时刻，他也很沉着、镇静，彬彬有礼。在这方面，丘吉尔则相形见绌，他常常突然发作，表现出神经过敏，有时甚至完全不能克制自己。

经过据理力争，丘吉尔继续坚持己见，强调客观困难，认为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还不成熟。看来继续会谈是没有意义了。这时斯大林从座位上突然站起，对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说道：“我们走吧，我们在这儿没有什么事好干了，我们前线还有许多事要做呢！”

丘吉尔在座位上显得坐立不安，满面通红，他嘟囔着：“你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为了使气氛略有缓和，罗斯福以调解的口吻说道：“现在我們都很饿了，所以我提议休会，去出席今天斯大林元帅招待我们的午宴。”

在宴会上，大家一面品尝着苏联人的美酒佳肴，一面继续交谈，对战争，对未来，充满信心。丘吉尔说：“我认为，上帝在我们这一边。无论如何我已竭尽所能使其成为我们的忠实朋友。”

斯大林抬起头，狡黠地看了丘吉尔一眼，而后取笑他道：“那么说，魔鬼自然是在我们这一边。因为毫无疑问，人人都知道，魔鬼就是共产党员。而上帝当然是行为端正的保守党人了。”

趁着余兴未消，宴会一结束，斯大林就邀丘吉尔举行双边会谈。在苏联首脑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丘吉尔只好声称：“我对登陆本身并不担心。我担心的是过30至40天后会发生的情况。”

斯大林针对这一点答复说，一旦法国北部登陆，红军这方面也将转入进攻。如果得知登陆将在5月或6月进行，那么苏联人就可以准备好给敌人不是一次，而是几次打击。目前的情况则是，德国人正在把自己的部队调往东部战场，并且只要在西方不出现对他们的严重威胁，他们就继续把部队调往东方。

“德国人非常害怕我们向德国边境推进，”斯大林进一步指出。“他们懂得，既没有英吉利海峡，也没有大海把我们和他们隔开。存在着从东面逼进德国的可能性。同时德国人也清楚，在西面，英吉利海峡在保护着他们；其次，为了逼进德国还需要通过法国的领土。德国人是不会往西线调兵的，特别是如果红军发动进攻的话。而红军如果得到盟军‘霸王’战役的支援，是一定要发动进攻的。”

在这些话语之间，使人明显感到一个暗示，即英国人和美国人即使登陆成功，但在进攻德国领土之前还有大量事情要做。而如果盟军一拖再拖，那么苏联军队将会首先进入德国领土。这一暗示，果然对丘吉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斯大林再次问他到底能否确定开始实施“霸王”战役的日期时，丘吉尔不再回避了，他认真他说，早些时候等他和总统两人会面时会有满意的答案的。

当第二天清晨三大国首脑在一起吃早饭的时候，罗斯福便笑容满面，以引人注目的郑重态度向大家宣布说：“先生们，我想告诉斯大林元帅一个使他愉快的消息。在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参与下，联合参谋部今天通过了下列决议：‘霸王’战役定于1944年5月进行，并将得到在法国南部登陆作战的配合。这次辅助战役兵力的大小，视当时登陆工具的数量而定。”

就这样，这个全世界人民瞩目的而又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终于定下来了。这是德黑兰“三巨头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它不仅对苏德战场将产生积

极的影响，而且对加速第三帝国的覆亡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1月30日是丘吉尔的69周岁的生日，用他后来的话说，这是一个非常忙碌而值得怀念的日子。由于欧洲第二战场悬案问题的解决，使这个祝寿会开得更加欢快和热闹。这天晚上，斯大林、罗斯福和他们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都前来英国使馆祝贺。在为国王乔治六世、加里宁主席和罗斯福总统的正式祝酒结束后，丘吉尔提议为“圣人罗斯福”和“伟人斯大林”各干一杯。罗斯福总统向丘吉尔祝了酒，斯大林也向老寿星祝了酒。艾登则向莫洛托夫祝了一杯酒。晚餐是按照真正的苏联风俗进行的。晚宴快结束时，斯大林把那位波斯服务员叫过来，给他斟满一杯香槟酒，祝他和他的伙伴们万事如意。斯大林此举给波斯的“下层”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祝酒时也曾发生过一次尴尬的事情。罗斯福提议为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将军干一杯，但他的话还未说完，斯大林站了起来，说他要接着致祝酒词。于是他便讲开了，言外之意是说布鲁克没有对红军表示真挚的友好感情，对红军的优秀品质缺少真正的了解，希望他以后对于红军的士兵表现出更深的战友情谊。

布鲁克感到难堪。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对斯大林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知道如果我忍气吞声坐下来，那么，他可能对我有过的任何尊敬就会丧失殆尽，而且以后还会继续对我攻击。”布鲁克在致答词时，转身向斯大林说，“元帅，请容许我谈谈您的祝酒词。你认为有必要对我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这使我非常惊异。你会记得，今天早上我们讨论掩护计划时，丘吉尔先生说过，‘在战争期间，真理必须用谎言来护卫。’你也会记得，你本人亲自告诉我们说，在你进行重大的攻势时，你总是对外界隐瞒你的真实意图的。你的一切假坦克和假飞机，总是集中在人们直接感兴趣的战场上，而你的真正意图却总是讳莫如深的。那么，元帅，你被假坦克假飞机蒙蔽了，你没有发现我对于红军的真诚友好的感情，也没有看出我对于红军所有将士的真诚的战友情谊。”

这时，斯大林脸上的神情是莫测高深的。听完翻译后，他转向丘吉尔，“显然颇有兴致”他说，“我喜欢这位将军。他的话听起来是由衷之言。我打算以后找他谈谈。”晚宴后，布鲁克走到斯大林面前，再次对他的指责表示吃惊。斯大林忙回答说，“最好的友谊就是经过误会之后建立起来的友谊”，接着就是热烈握手。

丘吉尔对斯大林有些敬畏，认为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强有力的对手。正如他的私人医生所说的那样，丘吉尔当着斯大林的面总是有一股不自在感。他感到他面前这个人思想敏捷，运筹帷幄，思考周全，这个人采用的“俄罗斯——亚细亚式的思维方法”，是他所理解不了的一个谜，但更主要的是这个人拥有绝对而又无情的权力。这是他从未碰到过的。斯大林同丘吉尔开了不少玩笑，丘吉尔没有介意。但在会议第一天晚餐时，丘吉尔在一个问题上就不知道斯大林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说正经话，致使丘吉尔反应过度。

在“三巨头”谈到战后如何惩处德国战犯时，斯大林说，一定要消灭德国总参谋部，因为希特勒强大的军事实力就是依靠5万名左右的军官，所以要把他们统统都枪毙。斯大林似乎讲起来挺认真，实际上是在开玩笑。因为在斯大林格勒和其他一些地方俘虏的保罗斯元帅及其他德国军官都受到了优待。但丘吉尔一听便紧张起来，他说：“英国议会和公众永远也不会容忍集体枪杀。”斯大林故作戏谑地重复说，“一定要枪毙5万人！”丘吉尔非常

生气。艾登忙作出种种姿势和暗示，要丘吉尔相信这不过是笑话而已。但丘吉尔根本不听。罗斯福力图重新用幽默来让大家一笑了之，他提出应该枪毙的不是5万人而是4.9万人。丘吉尔吼道，“我宁可此时此地让人把我押到花园里去枪毙掉，也不愿让这种可耻行为玷污我和我的国家的荣誉。”就在此时，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也加入了这场有趣的谈话。他说，他同意斯大林元帅的讲话，还说他确信美国军队的将士也会像他一样支持这样做的。丘吉尔一气之下离开餐桌，走进隔壁的一个房间。不一会儿有人在他的肩头拍了拍，他转过身来一看，原来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人都笑嘻嘻的。他们对他解释说，那不过是开玩笑。丘吉尔后来写道：“斯大林的风度是很有魅力的，如果他想表现出这种风度的话。”

尽管西方的政治家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和苏联领导人不同，但他们都赞赏斯大林的风度和才能。罗斯福说，他言简意赅，目的明确，为达到目的耐心而又坚韧不拔。布鲁克认为，斯大林具有杰出的军事头脑，说他每次发言都是以他那敏锐而又准确的洞察力来弄清局势的各种含义，“在这方面他比罗斯福和丘吉尔突出。”美国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团长迪安将军说：“谁也不会看不到此人的伟大之处。与这种本质上的伟大结合在一起的还有一种魅力。有时还有一种通情达理的热情，这种人情味似乎同他在为苏维埃国家利益时表现出来的那种令人生畏的无情不相吻合。”

德黑兰会议对当时的反法西斯战争形势进一步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希特勒的处境更加不妙了。正是：

盗世奸雄驾破船，
狼窝虎穴乱成团；
困兽挣扎到几时，
神兵一降输满盘。

欲知斯大林如何指挥大反攻，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九章 大举反攻

攻势凌厉如破竹，西部领土全光复；
十大突击十大捷，风雪激荡众欢呼。

斯大林从德黑兰返回莫斯科之后，就着手实施战略大反攻。

1944年初，苏军与德军之间的战线，从北往南，大体上从拉多加湖南岸，经斯摩棱斯克南下，沿第聂伯河为界。该线以西的列宁格勒州、白俄罗斯、第聂伯河西岸的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等广大区域仍在德军占领之下。驱逐敌寇出境，解放敌占区的全部国土，是苏军1944年的主要作战任务。

当时在苏德战场上，两军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法西斯军队尚不足500万人，而苏军的作战部队约为650万人，即超过敌人兵力30%。在武器装备方面，苏军的火炮超过德军70%，飞机超过敌人170%。苏军拥有大量的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还有源源不绝的物资支援，实力雄厚的预备队，和活跃在敌占区的近百万游击战士的紧密配合。苏军已有足够的兵力兵器实施大规模的进攻。

苏军连续取得重大战役的胜利，进一步增强了全国军民把法西斯德寇赶出苏联领土的信心。苏军在长期的作战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指挥和作战经验，掌握了防御和进攻作战的有效方法，特别是在突破德军防御、合围其重兵集团、夜间作战和强渡江河等方面，都有了成功的经验，为苏军在1944年实施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把德军全部赶出苏联领土，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4年初的国际形势对苏军进攻也十分有利。盟军已经肃清了北非的德、意军队，控制了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局势，又在意大利南部登陆成功，并正在集结力量准备在西欧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牵制了大量日军，敌后战场已展开了局部反攻。美、英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也使日军受到严重损失，削弱了日本的军事、经济实力。因此，日本已失去了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苏军解除了两线作战的后顾之忧，可集中力量对德作战。

希特勒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以被迫转入战略防御来稳定战局。与此同时，还要积极准备力量对付美、英军队可能在西线发起的进攻。为此，德军统帅部把198个师又6个旅和仆从国军队的38个师又18个旅部署在苏德战场，把64个师又一个旅用于防御美、英军队在西线的进攻，把38个师又两个旅部署在意大利。

斯大林为了做好这次战略反攻，早在1943年底就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利用有利形势发展胜利的问题。苏军最高统帅部总的意图是：在1944年把德军全部赶出苏联领土，把战争推到国外进行，并迫使德国的仆从国退出战争。为此，苏军制定了集中兵力连续实施一些高速度、大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战役计划。于是，苏军从1944年1月中旬开始，便从北起巴伦支海、南到黑海大约4500公里的战线上，连续对德军及其仆从军实施了10次歼灭性打击。这就是苏联卫国战争中著名的“十大突击”。

第一次突击是从列宁格勒区域开始的。参加这一战役的是列宁格勒方面军、沃尔霍夫方面军，波罗的海第二方面军和波罗的海红旗舰队，并有列宁格勒州的3.5万名游击队相配合。苏军当面之敌是德国的第十八和第十六集团军组成的“北方”集团军群。1944年1月14日，列宁格勒方面军从列宁格勒以西的奥拉尼延巴文发起攻势，向南推进，至1月19日击毙敌人两万多，占领了红村和罗普沙之后，继续向南边的卢加方向突击。沃尔霍夫方面军在

1月14日从诺夫哥罗德的南北两侧发起反攻，激战数天，歼敌1.8万人，于1月20日解放了诺夫哥罗德。

与此同时，在更南边的波罗的海第二方面军也开始向西攻击，牵制住德国第十六集团军。这样，敌第十八集团军的南北两翼已被粉碎，大有被包围的危险。于是德军在1月20日夜从姆加突出部位开始向西撤退。苏军则跟踪追击，1月21日解放姆加，1月26日至29日先后解放托斯诺等地，从而在莫斯科至列宁格勒的十月铁路全线上肃清了敌人。此后，苏军继续向西推进，到2月底已逼近纳尔瓦至奥斯特罗夫一线。这一战役共毙敌9万多人，俘敌7200人，彻底解放了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并为今后解放波罗的海沿岸的3个加盟共和国创造了条件。

苏军在第聂伯河以西的南部战场发动的强大攻势，史称第二次突击。这一区域土地肥沃，是重要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产地，而且是通往罗马尼亚和巴尔干的要道，所以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都极为重要。希特勒在这里布置了93个师，其中有18个坦克师，占其在苏德战场上坦克师总数的70%以上。苏军参加这一战役的有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三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最高统帅的代表朱可夫元帅负责协调乌克兰第一和第二方面军的作战行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负责协调乌克兰第三和第四方面军的作战行动。苏军的总兵力是177个师，与德军的比例是1.3比1。这次战役是从1944年1月末至3月份实施的。

在科尔松—舍夫琴科夫斯基地区，德军有9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和1个摩托化旅，共约8万人。敌人的这一突出部位严重阻碍着乌克兰第一和第二方面军的西进。1944年1月24日，乌克兰第二方面军进行了战斗侦察，1月25日从基洛夫格勒以北发起进攻，向西突击。1月26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从白教堂东南面发动攻势，向东南推进。两个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于1月28日在兹维尼戈罗德卡会师，至2月3日将科尔松—舍夫琴科夫斯基之敌完全包围起来。经过激烈战斗全歼了被围之敌，其中击毙5万多人，俘虏1.8万多人，同时消灭敌增援部队2.8万人。这一围歼战打得十分漂亮，速战速胜。之后，乘胜前进，渡过第聂伯河，横扫顽敌，完全切断了敌人与克里米亚之间的陆上联系。苏军稍事休整，继续西进，至3月底渡过普鲁特河，进入罗马尼亚国境。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在3月上旬歼灭了别列兹涅哥瓦特地区的敌军，并渡过南布格河。整个第聂伯河西岸的重大战役在3月底4月初宣告胜利结束。在这次重大战役中，苏军总共粉碎德军66个师，即占该地区敌军总数93个师的70%。苏军西进了400公里，解放了第聂伯河西岸的全部乌克兰地区，进抵苏联国境线，把德军在苏联境内的防线切成南北两段，占据了通向罗马尼亚和巴尔干的有利阵地。

1944年3月底至4月16日，乌克兰第三方面军进行了敖德萨战役，歼敌3.7万人，完全解放了苏联南方的重要港口城市敖德萨及其附近地区。1944年4月初至5月12日，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完成了克里米亚战役，歼灭敌军11万多人，完全解放了克里米亚半岛。这两次战役的实施都得到苏联黑海舰队及其航空兵的紧密配合，合称第三次突击。这样，苏军就在苏联国土的最南方肃清了敌人，苏联黑海舰队获得在黑海的行动自由，创造了今后由海路向敌人进攻的条件。

欧洲战局发展到1944年夏天，德国法西斯的处境更加不利。在苏德战场德军连遭失败，苏军的反攻越来越猛。6月6日，美英军队在法国的诺曼底

大规模登陆，终于开辟了第二战场，迫使德军在东西两线作战。德军在战场上的失败促使德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趋尖锐。1944年7月20日，在德军内部发生了谋杀希特勒的事件。事后希特勒采取残酷的报复行动，对德国军官实行大清洗，处决了700多人。这进一步加剧了法西斯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削弱了德国法西斯本身的力量。在此有利形势下，从6月份到年底，苏军发动了7次战略性的大战役。其规模和影响最大者，为第五次突击和第七次突击。

1944年6月10日至6月底，苏军在列宁格勒和拉多加湖以北的苏芬战场上展开强大攻势，一举粉碎芬兰法西斯军队，将其驱逐到1940年苏芬划定的国界线以西，解放了卡累利阿芬兰的大部分领土，迫使芬兰当局停战求和。这次称为第四次打击的战役，实际上是苏军夏季攻势的序幕。

著名的第五次突击，是从6月23日到7月底在广阔的白俄罗斯进行的，所以又称白俄罗斯战役。白俄罗斯人民在德寇的压迫下万分痛苦地度过了3个年头，希特勒匪帮洗劫了白俄罗斯人民的一切公共财富，蹂躏了城市，烧毁了120万幢村镇建筑物，使7000所学校变成了废墟。220余万和平居民和苏联战俘惨遭杀害。当时，德寇在白俄罗斯的占领区处于整个苏德战线向东突出的位置。这一地区由德国“中央”集团军群防守，约为80万人，但其中仅有4个坦克师。德军比较集中地分布在东线的维帖布斯克、奥尔沙和博勃鲁伊斯克等地区，以及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附近。参加这一战役的红军，从北往南，依次是波罗的海的第一方面军，白俄罗斯第一、二、三方面军，总兵力在150万人以上。同时有该区域的30多万游击队的大力配合。

1944年6月23日，伟大的战役打响了。波罗的海第一方面军从北面向维帖布斯克方向突击。当天，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分两路出击，于6月25日与波罗的海第一方面军会师，合围了维帖布斯克之敌。同时，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向正面的莫吉廖夫方向发起进攻，并于6月28日攻占了该城。6月24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分南北两路向博勃鲁伊斯克攻击，于6月27日将该地之敌包围起来。苏军攻势凌厉，到6月29日就围歼了维帖布斯克和博勃鲁伊斯克的敌军，同时解放了奥尔沙。在这六天之内击毙德军10万余人，俘虏3万多人。此后，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的左翼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右翼向明斯克方向推进，于7月3日解放了明斯克，并把从东面溃退下来的10万德军包围在明斯克以东地区，然后一举歼灭，其中俘虏德军5.76万人。这批俘虏在被押送去苏联东部战俘营的途中，于7月17日路过莫斯科示众。20个俘虏一排，由德军的将校在前面“领队”，在莫斯科主要大街上示众约3小时。他们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贼头贼脑地左顾右盼，“欣赏”苏联首都的夏季风光。当时旅居莫斯科的外国人目睹这一壮观，无不为之惊叹！苏联人民则嘲笑这些俘虏是战争期间“进入莫斯科的第一批德国人”。

西进红军，攻势凌厉，捷报频传。在北部，于7月13日解放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8月1日占领考纳斯，续而渡过涅曼河，逼近德国领土东普鲁士。在最西北方向，苏军于7月27日攻占邵良，到月底进抵里加湾海岸。在中部，苏军于7月27日占领比亚威斯托克城，从而控制了通往华沙的交通要道。在西南方向，苏军解放了巴拉诺维奇、布列斯特等许多城镇，并于7月23日占领波兰的重要城市卢布林。在纳粹统治下，卢布林是一座人间地狱，希特勒在这里设有规模很大的屠杀营。那里面有一整套毒气室、焚化炉和处

置室。就在这里，德国人把每批 200 至 250 人的一批批犹太人、苏联人和波兰人集体屠杀，然后火化掉。每天约有 2000 人死去。死者总计达 150 万之多。在卢布林附近的所有红军部队都奉命参观这一屠杀营，以此来激起全军将士对敌人惨无人道的行径的义愤，使他们在执行摧毁纳粹政权的任务中更加奋勇向前。

斯大林采取一切措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进攻的速度和规模。为了制定进军白俄罗斯的计划，他废寝忘食，征求了所有司令员的意见，时而单独讨论，时而共同商量。他频繁地同各个方面军和最高统帅部的代表们进行联系，有时一天要给他们打好几次电话。在局面已经扭转，红军节节胜利，捷报频传的情况下，他作出了一项特别的规定，要求现在不要低估敌人而要格外小心。他的心情也同样很急切，想尽快地把敌人赶出去，把他们消灭在德国的国土上。但是，他不允许放松准备工作，也不允许那种会导致冒险行动的过分乐观情绪。他要求指挥员胆大心细，勇猛顽强，周密计划，不打无准备之仗。结果第五次突击完全如愿以偿。在这次战役中，仅仅七天就消灭德军 54 万人，给予希特勒“中央”集团军群以毁灭性打击，西进了 500 至 600 公里，解放了白俄罗斯全部领土和立陶宛的部分领土；并在波军配合下解放了波兰的东部，逼近了东普鲁士和华沙。

为了从战略上支援和配合白俄罗斯战役，当时兵力最雄厚的乌克兰方面军，从 7 月 13 日至 8 月底进行了西乌克兰战役，史称第六次突击。结果，苏军歼灭德军 17 万多人，粉碎了德国“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占领了以利沃夫为中心的西乌克兰，并渡过维斯瓦河，占领散多梅希以西的地段，为日后攻取重要的西里西亚地区创造了良好条件。

1944 年 8 月 20 日至 9 月底，乌克兰第二和第三方面军在黑海舰队的配合下，进行了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史称第七次突击。这一地区由两个德国集团军和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组成的“南乌克兰”集团军群防守着，其总兵力约 80 万人。8 月 20 日乌克兰第二方面军从雅西以北发动攻势，8 月 21 日占领雅西城，继而南下。乌克兰第三方面军从宾杰里以南地段开始攻击，向西推进。8 月 24 日两个方面军在普鲁特河渡口会师，把敌军主力 22 个德国师和部分罗马尼亚军队包围在基什尼奥夫以南的森林地带，接着围歼了这股敌军。与此同时，苏军还粉碎了胡希以东和普鲁特河东西两岸的敌人。之后，苏军分头向罗马尼亚的中部和东部推进。在此情况下，罗马尼亚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于 8 月 23 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和全国主要城市举行了武装起义，推翻了安东尼斯库的法西斯政权，建立了罗马尼亚新政府。

新政府一成立就立即宣布罗马尼亚退出法西斯阵营和反苏战争，并对德国宣战。接着，罗马尼亚军队与苏军并肩战斗，共同参加反对希特勒的战争。苏军在 8 月 30 日占领罗马尼亚最重要的石油工业城市普洛耶什蒂，8 月 31 日进入布加勒斯特。在这期间，苏军在黑海舰队的协助下还先后占领黑海沿岸的苏利纳、康斯坦萨等城市和港口。以后在 9 月份，罗马尼亚军民肃清了国境内的德军，把祖国从法西斯德国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

在苏军猛烈打击下，纳粹军队节节败北，9 月 8 日苏军进入保加利亚、在瓦尔纳，德军沉没了约 400 艘船只。在此大好形势下，保共领导人民群众于 9 月 9 日在首都索非亚和其他城市发动了武装起义，一举推翻亲法西斯的政府，建立了祖国战线民主政府。新政府一经成立，马上宣布退出法西斯阵营和反苏战争，并对希特勒德国宣战。所以，当苏军进入保加利亚国境时，

不仅没有遭到抵抗，反而受到保加利亚人民和军队的欢迎。至9月底，保加利亚人民在苏军的协助下解放了祖国的全部领土，开始走上新的道路。

1944年9月和10月份，苏军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动了第八次突击，解放了爱沙尼亚全部领土和拉脱维亚的大部分领土，将30多个德国师围困在库尔兰的土库姆斯至里巴瓦一带。这股被围困的德军大部分直到1945年5月9日德国宣布投降后，才向苏军投降。1944年10月初，苏军以匈牙利为主战场，展开第九次打击。至年底苏军包围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10月中旬，苏军还分别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境内。苏军的第十次打击是1944年10月份在芬兰最北部进行的，结果把德军追逐到挪威境内。

苏联红军的10次突击，使德军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据苏联统计，1944年上半年，德军就有30个师又6个旅被全歼，142个师又1个旅损失过半，共损失100多万人和大量武器装备。

1944年夏秋，德军又有96个师又24个旅被歼，有219个师又22个旅损失过半。在此期间，德军共损失160万人、坦克6700辆，火炮和迫击炮2.8万门，飞机1.2万架。苏军通过10次歼灭性的突击，共歼灭敌人260多万人，取得了对德作战的决定性胜利。除拉脱维亚一小块土地外，苏联几乎全部恢复了战前的国境线，并协同东欧一些国家的反法西斯武装力量，解放了他们的国家。苏德战线已由4450公里缩短到2250公里，苏军腾出了更多兵力集中到主要方向作战，为最后战胜法西斯德国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法西斯德国已面临严重的时刻。至1944年底，武器的产量急剧下降。德国受到来自东面、东南面、南面和西面的夹击。官兵士气大为低落，他们异口同声他说：“德国完蛋了！希特勒完蛋了！”然而希特勒仍在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总动员，对法西斯制度稍有怀疑和有任何不同思想的人，都遭到希特勒分子无情的镇压。

尽管德军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但当时仍能进行防御战和积极的抵抗。它还有540万人。为了支撑摇摇欲坠的战争，10月18日，德国政府发布组织“民军”的命令，应征18岁到60岁的德国人。由希姆莱领导的民军作为预备军使用。像早先一样，希特勒统帅部目前仍将其大部分兵力置于东战场。它在这里有370万人，5.6万门大炮，8000辆坦克，以及近4100架作战飞机。同时还由于苏德战场的战线几乎缩短了一半，因而敌军的防御密度提高了，战斗的激烈性和残酷性也因而增强了。

此时，苏军的战斗力也大大提高了，在各个方面都超过了敌军。1944年底苏联作战军队的人数为670多万人，各种大炮10万余门，坦克1.18万辆，作战飞机1.47万多架。在西战场上，美军、英军和法军共有76个满员的装备优良的师和15个独立旅，6500辆坦克，1万多架飞机。希特勒统帅部用来对付上述兵力的，只有74个非满员的战斗力不强的师和3个独立旅，1600辆坦克和强击炮，以及1750架作战飞机。因此，在第二战场开辟后不久，盟军就在人数上超过敌人一倍，在坦克数量上超过三倍，在飞机数量上超过五倍。

斯大林在全面分析了情况和交战各方的能力后，决定1945年初在各个战略方向都实施强大的进攻战役。这些战役的主要任务是：

- 粉碎东普鲁士集团并攻占东普鲁士；
- 粉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奥地利的敌军；
- 前出到维斯瓦河河口——布龙贝格——波兹南——布雷斯劳——俄

斯特拉发——维也纳一线。

苏联最高统帅要求各路红军加强进攻的规模和速度，争取早日攻克柏林，捣毁希特勒的老巢：“要把法西斯野兽打死在它自己的洞里，在柏林城上升起胜利的旗帜。”具体他说，就是消灭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境内的法西斯军队，并在美英军队的协同配合下，两面夹击，在德国领土上粉碎敌人，迫使德国法西斯政权无条件投降。

斯大林认为，华沙至柏林是苏军的主攻方向，是直捣德国要害地区的捷径。但是，德军也必定在这里集中主力部队作拼死的抵抗。为了分散敌军中路的兵力，最高统帅部决定，首先加强南路和北路的攻势，以强大的部队牵制住敌军的侧翼，并将其中路兵力吸引到南北两翼。在尚未粉碎敌军两翼的时候，先用绝对优势兵力一举突破敌军的中路防线，并且猛打紧追，粉碎希特勒的防御计划。希特勒则估计：苏军仍将采用惯用的钳形攻势，只有粉碎德军的南北两翼之后，中路苏军才会开始进攻。所以他首先增强两翼的力量，把为数不多的预备队几乎全部派到东普鲁士，把苏德战线上德军坦克部队的2/3调到匈牙利。他妄图南攻北守，等到击溃南路苏军之后，再集中力量对付红军的中路。

1945年元旦刚过，斯大林就下达实施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的命令，这是苏德战场上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在前方胜利的鼓舞之下，苏联工人阶级以两倍、三倍的努力投入工作。

1944年生产了2.9万辆坦克及4万多架飞机，红军的装备也因此得以更大的改善。这次苏军出动180个陆军师，相当该线上德军的三倍。苏军的主力是朱可夫元帅指挥的实力雄厚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南侧由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协助，北边由白俄罗斯第二、第三方面军配合。他们的正西面，是德国整编“A”集团军群下属的30个步兵师、4个坦克师、两个摩托化师和两个旅，在这股德军的后方还有50个营。敌军总共约40万人。原定战役的发动日期为1945年的1月20日。但由于德军在西线的阿登进行反扑，丘吉尔向斯大林紧急求援。斯大林才将这次战役提前8天，于1945年1月12日开始。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分两路进攻。一路于1月23日在弗罗茨瓦夫附近渡过奥得河，继续向西挺进。另一路在1月19日解放了波兰的古城克拉科夫，到1月底攻占卡托维兹，并肃清了西里西亚地区的全部敌军。西里西亚是德国的重要工业区，其地位仅次于鲁尔，这里有丰富的煤矿、钢铁工业和人造石油等化学工业。尤其是在鲁尔多次遭到美英空军轰炸之后，很多企业都迁到这里，西里西亚的经济地位就更为重要。德国失去西里西亚工业区以后，煤的产量下降为1944年的1/4，钢的产量为1944年的1/6，从而促使德国的经济走向破产。渡过奥得河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于2月上旬一直推进到尼斯河，开始从东面威胁着德国首都柏林。

由朱可夫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于1月14日从华沙以南的马格努舍夫和普拉维发起进攻。其右翼部队于1月15日从华沙以北发动进攻，并渡过维斯瓦河，对华沙形成包抄的态势。编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波兰第一集团军也在1月16日从东面向华沙进攻。1月17日，波兰军队攻入首都华沙，接着苏军也相继入城。德国法西斯自1939年侵占华沙以来，犯下滔天罪行，尤其是血腥镇压1944年8月1日至9月下旬的华沙起义，使20万人惨遭杀害。三个多月以后，当苏波军队进入华沙时，城内仍是一片废墟，尸体

暴露街头，其景象之惨，目不忍睹。德国法西斯灭绝人性的暴行更激起苏军、尤其是波军对希特勒侵略军的刻骨仇恨，加强了他们彻底消灭法西斯的决心。1月17日以后，华沙一线的德军迅速瓦解，开始向西溃逃，苏军则紧追猛打。1月25日苏军在波兹南包围6万德军，以后主力部队继续向西推进。至1月底在库斯特林附近强渡奥得河，并在河西岸占据了桥头堡。苏军距离柏林只有六七十公里了。

这一战役历经20多天便胜利结束了。苏军西进570公里，粉碎了德国整编“A”集团军群，消灭德军35个师。仅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就俘虏敌人官兵14.7万多人，缴获敌机1360架，和1377辆坦克。苏军这一正面突击的进攻方式取得辉煌战绩。在1月底2月初苏军抵达奥得河之后便停止下来，在该线与德军一直对峙到4月中旬。在此期间，苏军的后勤部队和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西部，以备攻取柏林之用。同时，他们还完成了上西里西亚战役和东波美拉尼亚战役。经过50天的激战，苏军粉碎了“维斯瓦”集团军群，占领东波美拉尼亚广大地区，逼近了波罗的海海岸和奥得河河口附近。这样就消除了苏军北翼所受的威胁，使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可以集中力量攻打柏林。同时，苏联的波罗的海红旗舰队也扩大了活动范围。

战争打到了德国本土，希特勒及其同伙竭尽全力妄图挽救败局。东普鲁士是德国军国主义的摇篮。早从1932年起，德军就在这里修筑了巩固的防御工事，1944年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工事。该地区直接威胁着中路苏军的北侧，又是德国海军基地之一。在经济上它是德国的一个重要产粮区。希特勒从1944年秋季号召德军保卫德国领土以来，便把搜集到的一些预备队派到这里来。战役开始前，东普鲁士集团敌军共有58万官兵和28万人民冲锋队。希特勒的命令是：不惜任何代价守住东普鲁士，尽可能多地牵制苏军，长期阻挡苏联白俄罗斯第二和第三方面军前进，并使其遭受重大损失。

苏军参加这一战役的部队共有167万人。斯大林向攻击部队提出的战略任务是，消灭敌人最大的集群之一“中央”集团军群，前出波罗的海，占领东普鲁士及其最重要的海港哥尼斯堡和波尔拉伊。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肃清了哥尼斯堡地区的德军。共击毙敌军12万多人，生俘14万人。东普鲁士战役是一次艰苦顽强而持久的战役，苏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消灭了敌军大量有生力量，彻底肃清了德国军国主义的堡垒。所以这一胜利具有很大的政治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

由于苏德战场上德军主力大量被歼灭和盟军前出到了莱茵河，法西斯德国已面临无法挽救的彻底失败。德国已无力继续作战，然而在战争行将结束之时，苏联与同盟国的相互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尖锐的政治问题。

在美英军队统帅部的行动上，原来那种犹豫拖延的态度已为异常匆忙的行动所代替。英美两国政府催促其欧洲远征军尽快向德国中心地域推进，以便在苏军到达之前将其占领。

丘吉尔在1945年4月1日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

“俄国军队毫无疑问将占领整个奥地利并进入维也纳。倘若柏林也由他们占领，难道他们不会不适当地得出印象，似乎是他们对我们的共同胜利作出了绝大部分贡献？难道这种印象不会使他们产生一种将给未来造成极为重大困难的情绪？因此，我认为从政治观点来看，我们应尽可能向德国东部推进，如果柏林是在我们能达到的范围之内，我们毫无疑问应当将它占领。”

随后苏方得知，英军统帅部和许多美国将领采取了一切措施，力求占领柏林以及柏林以北和以南的地区。因此就在东波美拉尼亚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斯大林急召朱可夫返回莫斯科，商谈军务。

在朱可夫向最高统帅汇报了前线情况后，斯大林说：“我们出去走一走好吗？我感到有点精神不爽。”

在朱可夫看来，斯大林的整个面容、动作和言谈都给人一种身体相当疲惫的感觉。在4年战争期间，斯大林的确是过度疲劳了。他的工作非常紧张，经常睡眠不足，特别是在1941年至1942年曾为红军所受挫折而万分担忧。这一切不可能不影响到他的健康。

散步时，斯大林出人意外地开始同朱可夫谈起了他的童年生活。在交谈了一个钟头以后，他说：“我们喝茶去吧，还有些事需要同你谈一谈。”

在往回走的路上，朱可夫问道：“斯大林同志，我早就想知道有关你的儿子雅可夫的情况。有没有关于他的消息呢？”

斯大林没有马上回答这一问题。在又走过100来步之后，他才以一种低沉的语调说道：“雅可夫无法从战俘营逃出来。法西斯强盗会把他枪毙掉的。据说他们把他同其他战俘隔开，诱劝他背叛祖国。”

沉默了一会，他又以坚定的语气补充说：“不会的，雅可夫宁愿死也不会背叛祖国。”

朱可夫觉察到，斯大林为自己的儿子而十分难过。他坐在桌旁，沉默了很久，一点东西也不吃。

后来，他仿佛一面继续思考着这一问题，一面沉痛他说道：“多么艰苦的战争！它夺去了我们多少人的生命。看来，我们很少有谁的家庭没有牺牲亲人……这种体验只有在斗争中受到锻炼的、意志坚定的、受过共产党教育的苏联人才能忍受住。”

斯大林给朱可夫讲述了雅尔塔会议，要他作好攻克柏林的准备。一场捣毁希特勒老巢的战斗就要开始了。正是：运筹帷幄多奇计，决胜千里有大谋。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章 胜利前夕

胜利前夕事务忙，外交穿梭费思量；
三方首脑再会晤，相互摊牌亮主张。

1944年夏秋两季，英国首相在致罗斯福的信件中，三番五次地谈到了随着红军的胜利西进而发展的对苏关系问题。丘吉尔特别担心的是，希特勒侵略者被苏联军队从东欧和东南欧国家赶出去，会削弱西方国家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并导致伦敦和华盛顿所不希望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因此，英国人想尽快举行新的“三巨头”会晤，以便“弄清俄国人的意图”，并企图用某些义务“约束”莫斯科。

英国驻苏大使克尔奉丘吉尔首相之命，在同苏联政府首脑的谈话中，多次提出三国领导人再次会晤的问题。但斯大林推辞说，由于医生的反对和战场军务繁忙，他最近不能离开莫斯科远行。另一方面，罗斯福也认为，举行最高级会议时机不当，因为美国总统大选临近，需要他随时关注竞选活动，因而不能出国与会。

在此情况下，丘吉尔和罗斯福于1944年9月中旬在魁北克举行了会晤。双方讨论了亚洲和欧洲今后的战事问题。英国统帅部计划可归结为：抢在红军之前，占领中欧和巴尔干。英国政府对地中海战场尤为关心。伦敦把巴尔干看作是欧洲的经济和战略要地，对之非常重视。此外，丘吉尔及其亲信同僚还将巴尔干视为美英联军进入匈牙利和奥地利的捷径。在魁北克会谈中，美国代表团原则上同意丘吉尔的计划，但认为必须首先加速欧洲西部的进攻，以便在把德国人从法国、比利时与荷兰赶出去之后尽量多地占领德国领土。魁北克会议的决议说：“我们的主力将集中在左翼”，即西北欧。罗斯福和丘吉尔通知斯大林说：“我们打算迅速前进以歼灭德军和插入德国心脏。”

1944年8月底至10月初，苏联军队在南线的胜利进军使英美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丘吉尔的“巴尔干战略”破产了。1944年9月15日，苏联红军进入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并进军南斯拉夫，帮助南斯拉夫人民摆脱法西斯统治。这期间，在意大利的英美联军的进攻速度日渐缓慢。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认为，把会晤苏联政府首脑之事推迟到美国总统选举之后，是“十分冒险之举”。既然斯大林不能离开莫斯科，罗斯福又表示必须留在华盛顿，英国首相决定自己前往苏联首都，与斯大林举行“两巨头”会谈。

1944年10月9日下午，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他的外交大臣艾登抵达莫斯科。“两巨头”相遇有如故交相逢。其实，这是他们第三次见面。斯大林首先询问了首相旅途情况，然后就谈起波兰问题。双方一下子就谈妥邀请米科拉伊奇克来莫斯科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会谈。丘吉尔当即谈起他最为关注之事。他说：“我们来解决巴尔干的事情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这些地方也有自己的利益、派有各种团体和代理机构。不要为了枝节问题使我们意见相左。就英国和俄国而论，怎样做才能使你们在罗马尼亚占90%的优势，我们在希腊也有90%的发言权，而在南斯拉夫方面则平分秋色呢？”

丘吉尔乘着正翻译这段话之机，在一页纸上写出了这几个百分比，并把这字条递过去给斯大林。斯大林草草看了一眼，把字条递回给丘吉尔。这之后沉默了一阵。这页纸就放在桌上。丘吉尔没有碰它。最后丘吉尔终于开口

说道：“我们在处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上，用这种草率态度，这不至于被人说是玩世不恭吧？让咱们最好把字条烧掉算了……”

“不，您保存着。”斯大林说。

丘吉尔把这张纸对折起来，放入衣袋。两天之后，即10月11日，丘吉尔自莫斯科给罗斯福总统发了信件，就此事件通报如下：“绝对有必要的是：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问题上，我们要尽量取得一个共同的观点，这样我们才可能防止一些国家发生内战，避免在内战发生时也许您和我同情这一边，而斯大林同情另一边。我会不断地把这一切告诉您，所有英国和俄国之间取得的初步协议，如果未经同您进一步讨论并和您协调一致，任何事情都不会确定下来。在这种基础上，我相信您对我们试图同俄国人作开诚布公的会谈不致有什么介意。”

10月12日，美驻苏大使哈里曼到丘吉尔在莫斯科下榻的官邸拜会。天已近午，丘吉尔根据多年的习惯仍卧床未起，正在口授什么文件。哈里曼回忆道：“他把刚刚拟就的准备给斯大林的信稿念给我听。对他们两三天前首次会晤时商定的百分比做了一番解释。”哈里曼对丘吉尔说，这封信如果送出去，我敢肯定罗斯福与赫尔都不会予以承认。这时艾登走进了卧室。丘吉尔对他说：“安东尼·阿弗里尔认为我们不该发此信给斯大林。”由此，这封信就未发出。

后来，围绕丘吉尔1944年10月9日在克里姆林宫会谈时写下的这张臭名昭著的字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曾任斯大林翻译的苏外交部官员别列日柯夫，在《外交风云录》一书中作了如下的解释：“实际是怎么回事呢？丘吉尔在那张纸上写了自己提的百分比。斯大林看了这张字条一眼，一言未发，把字条还给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建议把字条烧掉，显然是考虑到：一旦对方同意此举，则会出现某种‘共谋’销毁‘赃证’的局面。但是，斯大林没给英国首相得出此类结论的任何口实。他洒脱他说，丘吉尔可以保存这张字条。这清楚地表明，他并不看重它。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

1944年10月，苏英莫斯科谈判最重要的军事政治成果是：双方就必须全力以赴地歼灭从巴尔干撤退的德军达成了协议。丘吉尔可以深信，苏联政府不打算向希腊和亚得里亚海沿岸派遣军队，并在完成任务之后从南斯拉夫撤军。苏英两国政府首脑在莫斯科还讨论了波兰问题、战后对德国的处置问题以及在打败德国之后苏联对战胜日本将做出的贡献问题。

美国大使哈里曼奉命出席了苏联方面同丘吉尔就对日作战问题进行的初步磋商。他坚持要有美国人参加协商。他宣称，由于美国担负着太平洋战争的主要任务，美国人理所当然应以最积极的态度参加就此问题举行的会谈。最后丘吉尔表示同意。于是，丘吉尔10月14日同苏联政府首脑会晤时，美国迪安将军受托介绍了太平洋战场上的战事进展情况。迪安将军讲完战局，受美国最高统帅部之托向斯大林提出了3个问题：

——在击溃德国后，要等多久才能看到苏联对日作战？

——为了发动攻击，苏联需要多少时间在远东集结兵力？

——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为集结和支持美国战略空军能提供多大的运输量？

当英国人和美国人离开克里姆林宫后，丘吉尔用对弱者进行庇护的语气对迪安将军说道：“年轻人，对于你敢问斯大林这三个问题，我表示钦佩。我想你是得不到回答的，但问问也无妨。”

然而，丘吉尔估计错了。第二天，斯大林作了回答。他说，在打败德国之后，红军要花三个月才能对日本发起进攻。必须在西伯利亚储备足够三个月的物资后才可作战。因此，考虑到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能力有限，滨海地区提供给美国空军使用的基地所需物资，只好由美国人通过海上运输供应。斯大林解释说，美国为此可以使用堪察加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斯大林再次强调，在打败希特勒后三个月，红军开始对日作战。接着，他补充说，为此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美国帮助苏联积蓄大批物资以供应西伯利亚；必须澄清苏联参加这一战争的某些政治方面的问题。斯大林说：“苏联人必须知道，他们是为着什么而在战斗。我们有确实理由向日本提出要求……”还是在德黑兰会议上讨论对日战争前景时，斯大林曾问罗斯福和丘吉尔，盟国能够在苏联没有自由的出海港的远东为苏联做些什么。当时，罗斯福提到大连有可能成为“自由港”。丘吉尔说得更笼统些，他认为“俄国的合理要求应该予以满足。”

在这种形势下，“三巨头”会晤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对时间和地点问题未达成协议。最早罗斯福考虑11月份在阿拉斯加会晤，苏方认为不合适，后来美总统又提议在地中海某地进行会晤，斯大林又以医生不允许而加以拒绝。他说：“年纪不饶人啊，在过去的年月里，我害流感两三天就能好，现在要拖一两个星期。”

美大使哈里曼说，地中海的阳光是有益于健康的。斯大林说，医生认为气候的任何一点改变都会产生不良影响。他提议派莫洛托夫去，他完全相信他。对此，当时在场的外交人民委员不同意他说，他永远代替不了斯大林元帅。经过反复磋商，罗斯福终于同意1945年2月份抵达雅尔塔出席“三巨头”会晤。为了保密，约定今后把这次会晤用代号为“阿尔戈航海者”，后来改为“磁电机”。

雅尔塔会议的准备工作在加紧进行。会议参加国商定不邀请新闻界代表，而只请摄影记者。当时，克里米亚刚从希特勒占领下解放不久，满目疮痍，匪盗尚未销声匿迹。为了修缮与布置这次会议用房和代表团将下榻的住处，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还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保证各国政府首脑和其他与会者的安全。苏联方面在极短的时间内高水平地完成了上述所有工作。后来，雅尔塔会议许多代表在回忆录中对保证各代表团正常工作的各项努力给予了应有的评价。

雅尔塔会议是在从前沙皇尼古拉的避暑行宫举行的。全体会议、领导人之间的私下会谈、参谋长或外长的分组会、午宴和晚宴穿插进行，讨论问题的范围十分广泛，气氛时而紧张，时而活跃。

在会议正式开幕前，三国领导人之间进行了预备性晤谈。2月4日下午3时，斯大林来到沃隆佐夫宫同丘吉尔会见。从首相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们就对德战争今后的进程问题进行了“有趣的争论”。斯大林说，德国缺少粮食和煤，它的运输系统遭到致命的打击。德国整个军事机体也受到严重破坏。最好的将领下了台。虽然希特勒还拥有强大的装甲部队，但帝国已经不是那个随心所欲到处陈兵的世界大国了。丘吉尔听了上述情况，把话题转到了西欧的军事形势。他走到地图前指划着各战场的情况，着重谈了意大利的战局。

下午4时，斯大林在里瓦基亚宫拜会了罗斯福。总统讲述了他在赴雅尔塔路上沿途所看见的破坏情景后说道，他现在对希特勒匪徒比1943年在德黑

兰时更加痛恨了。斯大林说，克里米亚所遭破坏根本不能与纳粹分子在乌克兰所干的相提并论。他们在乌克兰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破坏。罗斯福谈到他乘“昆西”号重型巡洋舰横渡大西洋的旅行时说，他曾就俄国人能否在美国人解放马尼拉之前进入柏林打赌。斯大林说，美国人会在红军进入柏林之前攻占菲律宾首都，因为在奥得河一带战斗非常艰苦。尽管苏联军队建立了几个前沿工事，但他们遇到了敌人的拼死抵抗。

罗斯福谈到西部战场形势后告诉斯大林，艾森豪威尔将军认为不可能在3月份以前强渡莱茵河，因为现在水流十分湍急，浮冰给架桥作业带来很大困难。因此，罗斯福最后说，对德国决定性的进攻看来不得不推迟到春天。

预定下午5时在里瓦基亚宫大厅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已经到了动身时间。按照斯大林的提议，雅尔塔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罗斯福主持。

罗斯福开始说道：“无论从法律上看，还是从历史上看，都不一定由我来宣布开会。在德黑兰是我主持会议开幕的，但那也完全是偶然的。但我认为，能主持本次会议开幕，对我是极大的荣誉。首先我想对给予我的殷勤接待表示感谢。”

总统略加停顿，环视了一下围坐在一张大圆桌的人们，继续说道：“三国首脑彼此已十分了解，并且他们之间的相互谅解还在增进。他们都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建立持久和平。所以与会者之间可以开始非正式的交谈。我认为，交谈应是开诚布公的。经验证明，谈判中的坦率态度有助于尽快达成圆满的决议。……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东线的形势，在这条战线上的红军正在十分顺利地向前推进。我希望有人来报告一下苏德战场的形势。”

苏军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根据斯大林的提议作了报告。他详细地讲述了苏联红军于1月12日至15日从涅曼河到喀尔巴阡山脉之间长达700公里的战线上所开始的进攻情况，并指出了一些集团军的主攻方向。安东诺夫解释道：“由于气候恶劣，这次战役曾打算在1月底待天气好转时开始。由于这次战役是作为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来准备的，因此很想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但是，鉴于德军在阿登山地向盟军发动了进攻，西线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形势，因此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不要等待天气好转，发起进攻的时间应不迟于1月中旬。”接着安东诺夫报告了苏军主攻方向上的敌我力量对比，苏联统帅部规定的目标和所达到的结果。最后他希望盟军在西线加速转入进攻，不让敌人从意大利抽走兵力。

接着丘吉尔说，他有几个问题最好由三国的参谋部来讨论。比如进攻的时间问题。应当弄清楚，德军如从意大利调8个师到苏联战场，需要多长时间？应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这一调动？是不是要抽调一部分盟军经留布良通道去同红军汇合？苏方认为，这当然不是英国首相灵机一动所说的话。他早就执意主张推进西方盟国部队截断苏联军队的路。丘吉尔当时没有得到罗斯福的支持，而现在，在这最后时刻，他重又试图兜售他的“巴尔干方案”，并俨然一副想帮助红军的样子。但是，他自己马上对他的建议的成功与否表示怀疑，说道：“采取这个办法是不是太迟了？”

随后，美国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讲了德国人集结了“极为雄厚兵力”的阿登山地情况后，通报了西线的军事行动。马歇尔接着说，德军大约很快就可恢复水下攻击，因为他们制造了一种改进型潜水艇。所以最近英美重型轰炸机对制造潜艇的船坞进行轰炸。美英方面，并要求苏军在冰上强渡方面提供帮助。

2月5日，三国领导人讨论了德国战败后将产生的政治问题，商定了强制德国履行无条件投降的各项条款的计划，以及处理德国的一般原则。为了限制今后德国发动新战争的能力，丘吉尔建议把普鲁士从德国分割出去，斯大林提出战后德国的赔款问题。斯大林说，法西斯德国几乎毁灭了整个欧洲，并给被纳粹分子占领的土地上的千百万人民带来了空前的劫难、饥饿、贫穷和死亡。

丘吉尔对德国赔款问题却持有不同的意见，斯大林话声未落，他就突然叫道：“一个有着8000万人口的饥饿的德国的幽灵浮现在我的眼前，谁来养活他们呢？谁来付这笔钱呢？到头来是不是至少有一部分赔偿还得由盟国自己去掏腰包？”

罗斯福当即感觉到了这一点。他说道：“我同意丘吉尔的意见，多少得为德国的前途着想。但是，合众国尽管慷慨地向别国提供援助，却不能保障德国的将来。合众国不愿意德国居民的生活水平高于苏联。合众国愿意帮助苏联从德国获得必需的一切。”

经过充分的讨论和交换意见，“三巨头”达成如下的协议：一旦德国无条件投降后，三国部队将各自占领德国的一个区域。由三国最高司令官组成一个中央管制委员会，执行互相协调管理控制的工作。并规定，战后的德国必须解除武装力量，解散德国的总参谋部，拆除德国的军事设施和军事工业，惩办战犯。要彻底取缔纳粹党、纳粹的法律以及它的组织和制度，从德国人民的公共机关中，从文化生活与经济生活中消除所有一切纳粹的和军国主义的影响。

关于德国的赔款问题，会议同意苏联提出的“赔偿总额应为200亿美元，其中50%应归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有”的建议，以此作为讨论的基础。并决定在莫斯科成立一个赔偿委员会，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三国代表还同意把德国的一个地区让给法军占领。该地区将从英国和美国占领区中划出，其范围由英美同法国政府协商决定。并将邀请法国政府参加盟国对德国管制委员会。给予法国这些权益，使丘吉尔很满意，因为他需要一个强大的法国作为战后的盟国，与苏联势力相抗衡。

在雅尔塔会议上，三国代表还就波兰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在持续8天的会议上几乎每次都涉及波兰问题，但最后仍未达成完整的协议。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波兰边界西移的问题。苏联代表提出，战后波兰的国界，东边基本按“寇松线”划分，西边应以奥得河及西尼斯河划界。罗斯福和丘吉尔始终不同意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这种划法。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三国政府酋脑认为，波兰的东疆当依照寇松线，而在若干区域应作出对波兰有利的自5公里到8公里的逸出。他们承认：波兰必须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的领土上的让予。他们觉得关于这些领土上的让予的范围，当于适当时机征询新波兰的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的意见，并且觉得关于波兰西疆的最后定界，应待和会解决。”这样，波兰的东部边界基本划定，但西部和北部边界仍是悬案。对于波兰政府的组成，苏联同英美仍持有不同的意见。

关于苏联对日本作战的政治条件问题，早在1944年12月中旬，斯大林已向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基本陈述清楚。雅尔塔会议期间，2月8日，斯大林偕同莫洛托夫先与罗斯福、哈里曼进行了商讨，并达成协议。2月11日，斯大林、罗斯福二人邀请丘吉尔共同在协定上签了字。苏联对日本作战的秘密条件是：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

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归还苏联；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协议还说，三国领袖同意，苏联的上述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雅尔塔会议的宗旨是制裁德国法西斯，以同盟国的联合力量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然而，雅尔塔协定是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而作出了直接牵涉四大同盟国之一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决定。当时与会的美国职业外交家查尔斯·波伦回忆说：“对雅尔塔协定的中肯批评是：它是背着我们中国盟友订立的。”这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丑恶表现。

雅尔塔会议结束之后，正当反法西斯联盟各国更加满怀胜利的信心向德、日法西斯展开进攻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却猝然去世了。这一噩耗传来，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斯大林代表苏联政府和他个人，对于罗斯福总统过早逝世向美国政府表示深切的哀悼。为了表示苏联人民对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的尊敬，雅尔塔一条街被命名为弗兰克林·罗斯福大街。

就在罗斯福逝世的当天，莫斯科时间4月13日晚8时，斯大林会见了美国大使哈里曼。莫洛托夫出席作陪。哈里曼在回忆录中对这次会见作了如下的描述：

“斯大林默默地迎接哈里曼……握住他的手约有半分钟之久，然后才请他就座。斯大林显得深为悲痛，仔细地向大使询问罗斯福去世的情况。斯大林说：‘我不相信美国政策在杜鲁门领导下会有任何变化。’哈里曼表示赞同说：这一点，在总统已有相当明确计划的领域，诸如战争和外交政策方面，是千真万确的。哈里曼说，杜鲁门会忠实遵循罗斯福的指引。他也是斯大林喜欢的那种人，重实践而不尚空言。”

然后哈里曼把话题转到他的主要目的。他说，杜鲁门总统自然不可能拥有罗斯福总统在世时那样崇高的威望。他直到成为副总统之时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海外，并不特别闻名。哈里曼说，这不能有助于事业，多半会导致一个不稳定的时期，无论是就国内来说或对国外而言，也未必限于战事的进行，而且涉及所有外交和内政问题。例如旧金山会议，很可能产生不少的困难。美国不知道杜鲁门总统能否实现罗斯福总统的计划。哈里曼继续说，美国人民了解：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元帅有着亲密的个人关系，这对美苏关系具有巨大的影响。

这时斯大林打断了哈里曼的话。他说，罗斯福总统虽与世长辞，但他的事业永世长存。斯大林声明：“我们将竭尽全力并满怀热忱地支持杜鲁门总统。”他请大使据此向美国新总统转达。哈里曼答应立刻这样做。他补充说，他相信，使美国社会舆论和全世界确信苏联政府愿继续与美国和其他联合国国家合作的最有效的途径，乃是莫洛托夫先生在这时到美国去。哈里曼建议，莫洛托夫可以在华盛顿停留一下，以便会见总统，尔后前往旧金山，哪怕在旧金山只逗留几天也好。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旧金山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召开日期简短磋商后，苏联首脑对哈里曼说，莫洛托夫的美国之行，虽然此刻颇费周折，但他仍然认为，将可以就此作出安排。

对于罗斯福之死，唯独柏林作出了奇特的反应。随着覆灭的临近，那里一直希望发生奇迹。歇斯底里大发作使希特勒越来越不耐烦。为了使希特勒

安静下来，戈培尔在4月的每天晚上给他朗读《腓特烈大帝史》的章节。这一章叙述的是七年战争阶段和腓特烈大帝所处的绝境。大帝甚至宣称，如果在2月15日以前他的运气仍不好转，他就要服毒自杀。但是在2月12日，俄国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死了。他的继承人保罗一世是腓特烈的朋友和崇拜者。“对勃兰登堡王室来说出现了奇迹。”戈培尔绘声绘色地读着。当时还得到了预示着德国在1945年4月中旬交好运的古老星象图。

4月13日，戈培尔得知罗斯福去世的消息，当即打电话给躲在帝国办公厅防空地下室里的希特勒。“我的元首，”戈培尔高喊道，“我向您祝贺！罗斯福死了！星象图写得清清楚楚，4月下半月是我们的转折点。今天是星期五，4月13日，这是奇迹的一天！”

然而，他们所梦想的奇迹却没有发生，伴随他们的是攻打柏林的震天动地的炮声。德国法西斯的末日就要到了。正是：穷寇已成瓮中鳖，狡兔无计出樊笼。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一章 攻克柏林

万炮齐发攻柏林，匪首自杀命归阴；
红旗插上国会厦，凯歌声中慰忠魂。

斯大林为了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尽快结束欧洲战争，决定从4月中旬开始实施柏林战役。苏军的意图是，以3个方面军的强大兵力，在远程航空兵和部分海军的协同下，在宽大正面实施猛烈突击，迅速突破奥得河、尼斯河防御，合围德军柏林集团，同时予以分割歼灭，攻占柏林，并于战役结束前在易北河同美英盟军会师。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是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总兵力在250万人以上，他们拥有4·16万门大炮和迫击炮，625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7500架飞机。

为了尽快成功地实施这次战役，1945年3月29日，朱可夫应最高统帅部的召唤，带着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柏林战役计划再次返回莫斯科。这一计划是方面军领导人和司令部在3月份制定的，一切原则问题基本上都同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商议过。当天夜晚，朱可夫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一个人在那里，刚刚同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们开完会。

斯大林默默地同朱可夫握过手后，就像往常一样，似乎是继续不久前中斷的谈话似地说道：“德国的西方战线已彻底崩溃了，看来希特勒军队并不想设法阻止盟军的推进。然而在同我们作战的各个重要方向，他们却在加紧部署兵力。你瞧瞧这张图上的关于德军的最新情况。”

最高统帅抽着烟斗，继续说道：“我看，将会有一场恶战。”然后，他又问这位方面军司令员，对柏林方向的敌人的估计如何。

朱可夫取出自己的前线侦察图放在最高统帅面前。于是斯大林就仔细察看柏林战略方向的德军的战役战略部署。根据苏方的情报，德军在柏林方向共有4个集团军，其编成不少于90个师，37个独立团和98个独立营。后来查明，德军在柏林方向的兵力不少于100万人，有1.04万门火炮和迫击炮，1500辆坦克和3300架飞机。在柏林还编组有20万人的守备部队。

“我军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呢？”斯大林问道。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不迟于两周之后就可开始进攻，”朱可夫说，“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大致到那时也能作好准备。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从多方面的情况看来，将拖到4月中旬才能彻底肃清但泽和格丁尼亚地域的敌人，因而不可能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同时从奥得河展开进攻。”

“有什么办法呢！”斯大林说，“只好不等罗科索夫斯基就开始了。即使他迟几天也碍不了大事。”

随后他走到书桌跟前，从一些文件中翻出一封信递给朱可夫阅读。信件来自一位外国的同情者。信中说希特勒的代理人同盟国的官方代表进行了秘密会谈，这些会谈表明，德国人建议盟国在德国同意单独媾和的条件下停止对德作战。信中说，盟国似乎是拒绝了德国人的要求。然而德国人仍然可能对盟军开放通向柏林的道路。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斯大林问道。但未等朱可夫回答，他又说：“我想罗斯福不会破坏雅尔塔协定，至于丘吉尔，这个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他又走到书桌跟前打电话给总参谋长安东诺夫，令他马上前来，15分钟

后总参谋长来到了最高统帅的办公室。

“罗科索夫斯基那里的情况怎样？”斯大林关切地问道。

安东诺夫报告了但泽和格丁尼亚地域的局势和作战情况。接着最高统帅又问他，华西列夫斯基在柯尼斯堡地域的情况如何。安东诺夫又报告了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的情况。

斯大林把刚才给朱可夫看过的信，又默默地交给他看。安东诺夫说：“这是希特勒分子和英国政府当局秘密勾结的又一证明。”

最高统帅对安东诺夫说：“你打电话给科涅夫，命令他4月1日带着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战役计划到最高统帅部来。到时我们一起研究实施柏林战役的计划。这两天，你和朱可夫再作些准备。”

4月1日夜里，克里姆林宫灯火齐明，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应召来到斯大林办公室，安东诺夫上将和什捷缅科上将也在场。“我们刚向斯大林问过，”科涅夫后来写道，“他就问我们：‘你们认为你们对最近的形势了解得很清楚吗？’”

朱可夫和科涅夫回答说，他们认为，根据他们在各自的方面军可以得到的情报资料，对局势已经了解得很清楚。

“给他们念一下这份电报。”斯大林对什捷缅科说。

作战部长念了一份电报，内容是英美军司令部准备实施一次战役，以便攻占柏林。已经建立了由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爵士指挥的主要突击部队。打算在鲁尔区以北沿着大部分英军部队与柏林之间的最短路线，实施主要突击。电报中列举了盟军司令部已经采取的几个初步措施，包括组织突击部队和集结军队。电报最后附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说，同盟国认为，关于在红军能够到达柏林之前攻占柏林的计划是非常切实可行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

当什捷缅科读完电报，斯大林转过身来向朱可夫和科涅夫问道：“现在谁将要攻克柏林，是我们还是同盟国？”

科涅夫首先回答，他向斯大林保证，苏军一定攻克柏林。

“所以说你就是这个脾气，”斯大林似笑非笑，然后又直截了当地问道：“你怎样才能为这一目的建立一个突击集团呢？你的主力部队在你的南翼，因此你显然将不得不大规模地变更部署。”

“斯大林同志，”科涅夫回答，“你可以放心，方面军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我们将在适当的时间内重新部署完毕，为进攻柏林作好准备。”

这时朱可夫作了回答。他说，他已经为攻占柏林作好了充分准备，而且他指挥的无论兵力兵器都处于“饱和状态”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已经把攻击的目标直接对准柏林，况且离柏林的距离又最近。

“很好，”斯大林说，“你们两人应该就在莫斯科这里，在总参谋部拟订出你们的计划，并在一两天之内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这样你们回方面军去的时候，就可以随身带上已经得到全面批准的计划。”

现在在莫斯科，这两个意志坚强的人，每人都希望使斯大林相信，应该采纳自己制定的最后突击德国的计划。朱可夫认为，他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部队能够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攻占柏林；而科涅夫则在继续进行活动，以便推翻最高统帅部早些时候关于让他的部队去攻占柏林以南地域的决定。总参谋部的一些成员建议，由两个方面军发动一次钳形攻势，可是这项建议既与朱可夫的正面突击的概念相冲突，也同科涅夫关于协同实施正面突击的建

议相抵触。

当4月3日上午再次召开会议时，斯大林听取了两位司令员的计划，然后走到挂图前，并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之间画了一条线，从而解决了僵持局面。这条线的终点是在柏林东南大约37英里的施普雷河上的吕本。据什捷缅科上将说，斯大林这时宣布：“哪个部队先到达这儿，哪个部队就参加攻占柏林。”

科尼利厄斯·瑞安在《最后一战》一书中写道：“倘若斯大林把这条线从吕本再往前画，一直画到德国边界，标出一条科涅夫不可逾越的界线，那么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显然就不可能再参加进攻柏林的战斗了。”尽管“斯大林没说什么，但却默许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可以表现主动精神”。虽然一句话没说，却向科涅夫的方面军开了绿灯。科涅夫觉得斯大林摸透了他的心思。正如科涅夫所说的，“斯大林心照不宣地号召进行一场比赛”，然后会议宣告结束。

攻打柏林是一场艰巨的硬战，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就是对朱可夫这样身经百战的元帅来说，也丝毫不能掉以轻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战争过程中，我们从未攻取过像柏林这样坚固设防的城市。柏林的总面积几乎相当于900平方公里。城市地下铁道和众多的地下建筑物使敌人得以实行广泛的机动。市区和郊区都为进行顽强防御作了细致准备。每一条街道、广场、胡同、房屋、沟渠和桥梁都构成这个城市总的防御体系的一部分。

希特勒知道柏林战役将最终决定德国法西斯及其本人的命运。所以在1945年2月初，他便下令强迫当地居民、战俘和被强制到德国服劳役的外国工人，在奥得河一线和柏林周围构筑防御工事。他们在柏林以东建成三道防御阵地：第一道是北起沃林湖东岸，沿奥得河延伸到尼斯河一线。从此往西10至20公里是第二道防线，其中以泽劳弗高地为主要阵地。再往西10至20公里为第三道防线。此外，环绕柏林城筑成了三层防御圈：最外一层距离市中心半径为24至40公里，沿着当地的湖泊、河川构成。第二层距离市中心12至20公里，主要利用郊区的森林筑成。第三层是沿着柏林的环城铁路修成的。同时，把柏林市区划成9个防御区，分兵防守。当时希特勒搜集到柏林附近的兵力近120万人，并装备有数以万计的大炮和1500辆坦克及3200架飞机。显然，希特勒指望在奥得河一线粉碎苏军的进攻。假若失败了，则将死守柏林城。他要求德国士兵和柏林市民“死守柏林直到最后一人”，其目的是把战争拖延下去，等待美英军队到达柏林地区，或者将柏林交给美英军队，或者一者美英军队与苏军冲突起来，他便从中渔利，借以保住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然而，这一切只是痴心妄想而已。

为了进一步弄清敌人的部署，朱可夫命令航空侦察兵六次拍摄了柏林、柏林所有接近地和防御地带的照片。根据拍摄的照片、缴获的文件和俘虏的口供，编制了详细的地图和有图表说明的报告，发给从司令部到连队的各级指挥员。为了便于指挥，工程兵还为朱可夫及其司令部人员制作了一台柏林及其郊区的精确模型。4月5日至14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召开了战役准备会议，并利用地图和模型进行了军事演习。参加军事演习的有各集团军、军、师、方面军炮兵部队和后勤部队的首长。

为了保证进攻作战的胜利，光是炮弹就需储备700多万发。在供应方面决不能有丝毫中断。战役的特点要求将弹药从方面军仓库不停留地直接运往

部队，而不经集团军和师的仓库中转环节。为此，将德国铁路路基改成了苏联轨道的宽度，这样弹药差不多就可直接运到前线。运输规模十分庞大，倘若把给这次战役运送物资的列车排列成一条直线的话，其长度将超过 1200 公里。

对柏林战役所进行的整个准备工作，就其规模和紧张程度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比较狭窄地段上，短时间内就集中了 77 个步兵师，3100 多辆坦克，1.5 万多门火炮和火箭炮。在方面军的主要突击地段上，每公里突破正面的火炮密度达 270 多门 76 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

在进行战役战术准备和物资准备的同时，各级政治机关和党组织也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进攻开始前，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书。号召他们奋勇杀敌，为人民立功。号召书说：

“战斗的决定时刻到来了。柏林，法西斯德国的首都就在你们面前，而在柏林之后，则是与盟军的会合和全面战胜敌人。注定要灭亡的德军残部仍在继续对抗。德军统帅部搜罗包括老人和 15 岁的孩子在内的最后一点民众预备队，企图阻止我军进攻，以便使自己的灭亡拖延时间。

“军官、军士和红军战士同志们！你们的部队历来享有永垂不朽的光荣。不论是在斯大林格勒城下、乌克兰草原上，还是在白俄罗斯的森林里和沼泽地上，对你们来说，都不曾存在障碍。柏林接近地上任何坚固的堡垒也阻挡不住你们。

“在你们——苏联勇士们——面前就是柏林。你们应当占领柏林，尽快占领它，以免敌人清醒过来。以我们的技术兵器的全部威力猛攻敌人，坚定我们的胜利信念，挖掘我们的全部智慧。决不能给自己士兵的荣誉和自己战旗的荣誉抹黑。

“战友们，猛攻柏林，意味着全面的、最终的胜利。以我们的英勇果敢、各兵种的协调一致、互相间良好的支援去扫除一切障碍……以新的胜利和新的荣誉在柏林上空树起自己的战旗。”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4 月 16 日凌晨 5 时，朱可夫下达了攻击的命令。顿时，数千门火炮、迫击炮和神奇般的“喀秋莎”火箭炮射击的火光，把整个大地照得雪亮。紧接着天地之间响起了炮弹和炸弹爆炸的震天动地的隆隆声。在空中，轰炸机的不间断的轰隆声也越来越大。敌人方面，在最初一瞬间还哒哒响了一会机枪，打了几发炮弹，随后转入一片寂静，似乎连一个生物都没有剩下。在 30 分钟猛烈的炮火射击过程中，敌人再未发射一发炮弹，这表明德军已受到绝对压制，其防御体系已被打乱。于是苏军决定缩短炮火准备的时间，立即发起总攻。

空中升起了数千枚五彩缤纷的信号弹。根据这一信号，间距为 200 米的 140 部探照弹一下子都亮了起来。1000 多亿度电光照亮了战场，它使敌人眼花缭乱，并为苏军坦克和步兵显露出黑暗中的冲击目标。炮兵更加猛烈地射击，步兵和坦克协同一致地冲向前去。到黎明时，红军已攻占敌第一阵地，并开始冲击第二阵地。在交战的头一昼夜里，出动的轰炸机达 6550 架次，发射的炮弹共 123.6 万发，即差不多 9.8 万吨钢铁落在敌人的头上。纵深 8 公里至 12 公里范围内的敌人防御，都被消灭或受到压制。希特勒的军队几乎完全被埋葬在一片炮火和钢铁的海洋之中。掀起的烟尘在空中形成了一道厚厚的烟墙，有的地方甚至探照灯的强烈光芒也照射不透。

4 月 16 日晨，在方面军的各个地段上，部队均顺利向前推进。但敌人在

醒悟过来后，就开始从泽劳弗高地用迫击炮进行抵抗，从柏林方面也出现了敌轰炸机群。苏军越接近泽劳弗高地，德军的抵抗就越激烈。这一天然防线高居四周地势之上，且坡面很陡，敌人在这里有重兵把守，成为向柏林进攻途中的严重障碍。它犹如一面厚墙挡在红军面前，掩护着它后面的一片高原，而在这片高原上应当展开柏林近接近地上的交战。

泽劳弗高地不但限制了苏军的坦克行动，对其炮兵也是重大的障碍。它遮盖着敌人的防御纵深，使得从苏军地面上无法对敌纵深进行观察，炮兵只好加强火力实施大面积射击。对敌人来说，守住这一重要的防线，还有其精神上的作用。因为在它的后面就是柏林。希特勒的宣传机关千方百计地强调泽劳弗高地具有决定意义。

15时，朱可夫打电话向最高统帅报告了前线的进展情况。斯大林听完后镇静地说：“在科涅夫那儿，敌人的防御要弱些。他比较容易地渡过了尼斯河，向前推进时也未遇到特别的抵抗。你要用轰炸航空兵来支援各坦克集团军的突击。晚上你再打电话向我报告情况。”

晚上，朱可夫又向斯大林报告了在泽劳弗高地上遇到的困难，并说在明天晚上以前不可能攻克这一防线。这一次斯大林有些生气了：“你没有按最高统帅部的要求去做，而让近卫坦克第一集团军在近卫第八集团军的地段上投入交战，结果毫无益处。”随后他又问道：“你们有把握在明天攻克泽劳弗防线吗？”

“明天，4月17日日终前，一定能突破泽劳弗防线。”朱可夫尽量保持冷静地回答说，“我认为，敌人为抵抗我军在这里投入的部队越多，我们攻克柏林就会更快，因为在开阔地比在城市里更容易消灭敌军。”

“我打算命令科涅夫让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两个坦克集团军从南面突击柏林。而对罗科索夫斯基，则打算命令他加速渡河，也从北面对柏林实施迂回突击，这样来支援你们。希望你们一鼓作气，突破这一堡垒。”

斯大林的命令，既是鼓励，又是压力，产生了极大的力量。4月17日清晨，在方面军的各个地段上展开了激烈的交战，敌人进行拼死抵抗。然而到傍晚，头天投入交战的各坦克集团军，在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协同下，在一系列地段上突破了泽劳弗高地的防御。敌人经受不住苏方坦克集团军的突击，开始退却。4月18日晨，泽劳弗高地终于被朱可夫的部队所攻克。

4月20日，朱可夫指挥下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继续发展进攻，经过激战后，突破了柏林远郊防御围廊。一天以后，进攻部队突入城郊，开始市区交战。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突破防御后，快速军团至20日前进95公里，从南面前出到柏林接近地。21日，近卫坦克第三集团军突入柏林南郊，近卫坦克第四集团军进抵波茨坦市南郊。向德累斯顿方向进攻的方面军部队击退了德军的反突击，保障了柏林方向主要突击集团的进攻。

苏军每前进一步都遇到很大的阻力，德军步步设防，十分顽强。就在苏军开始进攻柏林的前一天，希特勒发布了最后一道命令，警告官兵：“后撤当场格杀勿论”，并欺骗官兵说，如果让苏军“蹂躏”了德国，老人和孩子将被残杀，妇女和姑娘将成为军妓，其余所有的人将被驱往西伯利亚。因此，苏军在通往柏林的道路上，仍然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4月24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近卫第八集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近卫坦克第三集团军等在柏林东南会台，完成了对德军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合围，切断了该集团与柏林集团的联系。4月25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近卫

坦克第四集团军同白俄罗斯的第一方面军的第四十七集团军在波茨坦以西会合，从而完成了对德军柏林集团的合围。同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所属的近卫第五集团军前出到托尔高地区，同西线美军第一集团军所属部队会师。

当苏军兵临柏林城下时，希特勒慌了手脚。4月19日，他曾令海恩里齐的“维斯瓦”集团军群负责保卫柏林。三天以后，他接管了柏林防御的指挥权。过了两天，他又想重新任命柏林地区的军事指挥官。希特勒在4月20日他生日的时候曾想离开柏林，而且他的侍从和统帅部人员在10天前已去巴伐利亚建立了大本营，但他对是否要离开柏林一直犹豫不决。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希特勒仍然幻想能继续拖延战争，因此他最后决定留在柏林，并命令将他继续留在柏林的消息通过无线电台广播出去，妄图以此鼓舞士气。但是，希特勒的任何行动已不可能使德国逃脱彻底灭亡的命运。

柏林已成了一座战火熊熊、炮声隆隆的孤城了。决定自己在柏林顽抗到底的希特勒，既无后备也无援军了。英勇的苏军战士在威力强大的炮群和坦克支援下，在胜利的鼓舞下，在为祖国报仇雪耻的热情激励下，奋勇向前。近四年来，他们一直盼望着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现在彻底清算法西斯主义的时刻来到了。苏联军人的激动心情，是用言语难以表达出来的。下面是炮兵第832团尼科拉伊·瓦西利耶夫上士的回忆：

“傍晚，我们炮兵连来到高地上，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城市。我们充满了欢欣喜悦的感觉：这是敌人最后的防线，算帐的时候到了！……我们甚至没有觉察到，一辆汽车驶到了跟前，我们的司令员别尔扎林将军从车内走了出来。他向我们问好以后，就命令我们的指挥员：‘向柏林市内的法西斯分子开火！’指导员尤尔钦科给我们连的炮弹写上了：为斯大林格勒，为顿巴斯，为乌克兰，为孤儿寡妇们，为母亲们的眼泪，报仇！”

在强击柏林东部的战斗中，近卫步兵第286团和第283团表现特别突出。战士们以集体英雄主义精神，奋勇向前冲击。街角有幢筑有坚固工事的房屋，阻碍着近卫第283团前进。当确信正面冲击难于攻下这幢房屋后，该团一个连的党小组长库兹涅佐夫就带领一组战士，隐蔽地迂回过去，然后从后方突击法西斯分子。敌人的支撑点被攻下来了。近卫第283团的乌克兰英采夫上尉，在冲击一幢房屋时，与敌人进行了白刃战。他英勇地扑向敌人，一个人刺死了10名法西斯分子。以他为榜样，近卫军中士格罗巴扎伊和他的战斗班一起，消灭了数十名法西斯匪徒。

从4月26日至5月1日，前出到柏林东南的苏军，沿向心方向实施突击，分割歼灭了德军法兰克福—古本集团。与此同时，合围柏林的苏军展开了强攻城市的激烈的战斗。柏林巷战的中心任务，在于不让敌人有可能把他们的兵力集中起来形成拳头，而要把他们的守备部队分割在各个单独的基点上，并迅速将其歼灭。

在攻打柏林的过程中，苏军大约发射了180万发炮弹。对敌人的城防配系总共投射了3.6万余吨钢铁。为了摧毁敌人的工事和坚固的石头建筑物，苏军使用了每颗炮弹半吨重的大口径要塞炮。然而，尽管拥有威力如此强大的重武器，苏军战士有时还得用炸药把墙壁炸开，穿越前进。4月29日，被围德军已被分割成三个孤立的部分。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德军放水淹没了柏林的地下铁道，淹死了在地下铁道内避难的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和负伤的德军官兵。这一天，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第三突击集团军步兵第七十九军打响了夺取国会大厦的战斗，经过逐层逐房间的争夺之后，4月30日21时50

分，叶戈罗夫中士和坎塔里亚下士在国会大厦的主楼圆顶上，升起了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授予他们的胜利的旗帜。第三突击集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将军，亲自监督攻克国会大厦的这一历史性战斗。他在电话里向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元帅作了报告。

“国会大厦上升起了红旗！元帅同志，乌拉！”

“亲爱的库兹涅佐夫，衷心地祝贺你和你的士兵们所取得的光辉胜利。苏联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功勋。”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在1945年4月30日发布的第六号命令中说：“彻底战胜敌人的时刻即将来临。我们苏联的旗帜已经在柏林市中心国会大厦的主楼上飘扬。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们！向敌人前进——以最后一次迅猛的突击将法西斯野兽消灭在它的巢穴里，使完全、彻底战胜法西斯德国的时刻更快地来临。”

在希特勒最难熬的这些日子里，希特勒似乎已经消耗殆尽。他衣着邋遢，脸部浮肿，眼神呆滞，眼白上充满血丝；左手颤抖，犹如一个患中风的老年人。在仅仅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似乎苍老了许多。4月28日，无线电传来英国广播公司说希姆莱正与美方洽谈投降的消息，希特勒像疯子似的大发雷霆。一阵狂怒之后他失去了知觉，整个地下室一时鸦雀无声。“一个卖国贼决不能继承我的元首职务！”他对周围的人说，“你们必须出去做到使他绝不能继承我。”希特勒已等不及对希姆莱进行报复了。希姆莱的联络官菲格莱因现在在他的掌握之中。希特勒从禁闭室里将这个马夫出身的党卫队将军提出来，严加审问关于希姆莱的“叛国”情况，并指控他与希姆莱同谋。在“元首”的命令下，菲格莱因被拖到总理府花园枪决了。

“可怜的阿道夫，”情妇爱娃对希特勒的一位女侍从说，“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出卖了他。宁肯死一万人也不能让德国失掉他。”

希特勒为了酬劳他的情妇的忠诚，决定于4月29日凌晨，正式同爱娃结婚。他一直认为婚姻会阻碍他把全部精力用于领导他的党获得政权，领导他的国家称霸世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要他领导的了，而且他的生命也要结束了，他可以自由地同爱娃做几个小时的夫妻。戈培尔找来了一位市议员，在地下避弹室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主持了结婚仪式。男女双方宣誓他们是“纯雅利安人种”，而且“没有使他们不能结婚的遗传病症”。死到临头，这位独裁者还要坚持遵守形式。宣传部长戈培尔作为证婚人，也在结婚证书上签了名。

婚礼还没有结束，希特勒在隔壁的房间里，就把一个名叫格特路德·荣格的女秘书找来，开始口述他的遗嘱。希特勒称之为“政治遗嘱”的东西，第一部分是他对后代的呼吁，第二部分是他对未来的具体“指示”。希特勒在这个遗言中，重弹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的老调，又加上些最后的谎话。他号召德国人“决不放弃斗争”。他终于不得不承认，“国家社会主义”目前已经完蛋了，但是他向同胞们保证，由于士兵和他本人的牺牲，“种子已经撤下了，有朝一日会生长起来……在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民族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将要获得光荣的再生”。

希特勒的“政治遗嘱”的第二部分涉及继承问题。尽管第三帝国已在烈焰和爆炸中化为废墟，希特勒在没有指定继承人以前是不肯死去的。他在遗嘱里，指定海军元帅邓尼茨继任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同时还指定了戈培尔、鲍曼等一些人为新政府成员。4月30日下午，希特勒在总理府的地

下室自杀身死。这个骄横狂妄、恶贯满盈、妄图称霸世界的法西斯元凶，就这样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他的情妇爱娃服毒死在他的身边。接着，戈培尔在毒死 6 个孩子之后，命令纳粹党先锋队员把他自己和妻子开枪打死。5 月 1 日，汉堡广播电台广播了希特勒丧命和邓尼茨继任的消息。

至 5 月 2 日，德军完全停止了抵抗，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将军率残部投降。斯大林在他的“五一”节演说中宣布，柏林最后一战，击毙德军 100 余万，俘虏德军 80 万。红军部队缴获或摧毁 6000 架敌机，1.2 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3 万门野战炮以及大量的武器装备。

欧洲战争就要结束了，剩下的任务是，由盟国代表们去起草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文件，并着手解决实现和平的问题。在攻克柏林战役中，苏联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英勇顽强，视死如归，终于夺取了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正是：

苏军不怕攻坚难，
火海刀山若等闲；
可笑顽敌夸险固，
土崩瓦解半月间。

欲知德军无条件投降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二章 无条件投降

德国投降普天庆，苏联红场大阅兵；
第三帝国鬼域灭，欧洲大地见光明。

虽说希特勒死了，但他所建立的第三帝国还在苟延残喘。5月1日晚10点20分，新任“元首”海军元帅邓尼茨在汉堡就职广播讲话中，继续对人民进行欺骗。谈到新政府的任务，他说：“我的任务是拯救德国，使它不致遭受向我们进攻的布尔什维克敌人的破坏。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要继续把军事斗争进行下去。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阻挠这个目的实现，我们也就不得不继续进行抵抗他们的防御战。”

邓尼茨在广播结束时，抚慰德国人民说：“在我们做了重大的牺牲之后，上帝是不会抛弃我们的。”其实，这些都是空话。邓尼茨知道德国的抵抗已到尽头了。就在邓尼茨讲话的第二天，经过16个昼夜的英勇奋战，苏联红军已于5月2日下午3时攻克柏林。第三帝国的首都、希特勒的老巢的解放，标志着纳粹的武装抵抗基本上结束了。

5月1日3时50分，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克列勃斯将军被带到苏军近卫第八集团军指挥所。他自称受全权委托同红军最高统帅部直接接触，以谈判停战问题。克列勃斯将军还负责通知苏方，希特勒已于4月30日15时50分自杀身亡。这位德国将军带有戈培尔致苏联最高统帅部的一封信。信中说：“遵照去世元首的遗嘱，我们授权克列勃斯将军办理如下事情。我们通知苏联人民领袖，今天15时50分，元首已自愿离开人世。元首根据他法定的权力，在他留下的遗嘱中，已把全部权力移交给了邓尼茨、我和鲍曼，我们委托鲍曼与苏联人民的领袖建立联系。这一联系是遭受最大牺牲的各大国之间进行和平谈判所必需的。”戈培尔的信中还附有希特勒的遗嘱及新的帝国政府成员名单。遗嘱由希特勒签署，并附以见证人姓名。

鉴于这一消息极为重要，第八集团军司令员崔可夫随即向方面军首长作了报告，朱可夫立即派自己的副手索科洛夫斯基大将前往崔可夫的指挥所与德国将军谈判。同时，朱可夫还往莫斯科打电话给斯大林。接电话的值班将军说：“斯大林同志刚刚躺下睡觉。”

“请唤醒他。事情很紧要，不要等到早上。”

斯大林很快就来到电话跟前。朱可夫向他报告了关于希特勒自杀和收到戈培尔建议停战的信的情况。

“完蛋啦，这个混蛋！可惜没能活着把他抓到。”斯大林回答说：“希特勒的尸体呢？”

“据克列勃斯将军说，希特勒的尸体已经烧掉了。”

“告诉索科洛夫斯基，”最高统帅说，“除无条件投降外，不要同克列勃斯或其他希特勒分子进行任何谈判。如果不发生特别情况，夜里别再打电话给我。我想休息一会儿。今天我们要举行‘五一’节大检阅。”

“五一”节检阅，对于苏联人，特别是对于远离祖国的红军战士们来说，是多么亲切和珍贵啊！朱可夫可以想象得到，莫斯科的卫戍部队，此时此刻正在向红场行进。早上，他们就会站好自己的位置。在阅兵首长致词之后，他们就要骄傲地代表把欧洲从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下解放出来的强大的战无不胜的苏联武装力量，迈着整齐的步伐，成分列式从列宁的陵墓前，从政府和党的领导人面前，从灰色的克里姆林宫宫墙前通过。

早晨 5 时左右，索科洛夫斯基报告了同德军总参谋长初次谈话的情况。“纳粹分子在耍滑头，”索科洛夫斯基说，“克列勃斯宣称他未受权决定无条件投降问题。据他说，只有以邓尼茨为首的德国新政府才有权决定这个问题。克列勃斯要求停战，只是为了让邓尼茨政府的成员集中到柏林来。我想，如果他们不立刻同意无条件投降，就让他们见他妈的鬼去吧！”

“对！索科洛夫斯基同志，”朱可夫回答说，“你告诉他，如果戈培尔和鲍曼到 10 点钟还不同意无条件投降，我们就要实施最猛烈的突击，以彻底打消他们再作抵抗的念头。让希特勒分子考虑一下德国人民的无谓牺牲，和他们个人对这种不理智行为应负的责任吧。”

戈培尔和鲍曼到规定时间未作答复。10 时 40 分，苏军遂对柏林市中心敌特别防御地区，特别对帝国办公大楼展开最猛烈的射击。到天色刚暗下来的时候，朱可夫忽接到第三突击集团军的报告，说刚才在近卫步兵第五十二师的地段上，有一群德国坦克，约 20 辆左右，突出了包围。它们高速度向柏林西北郊驶去。显然，有什么人逃离柏林。这事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的人甚至说，突围的那一群坦克，可能带走了希特勒、戈培尔和鲍曼。方面军司令部随即发出了战斗警报，动员部队阻止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逃出柏林地区。并命令坦克部队组织追击，以找到并歼灭突围的坦克。至 5 月 2 日黎明时，这一群坦克在柏林西北 15 公里处被发现，并迅速被苏军坦克兵消灭。一部分坦克被击中烧毁，另一部分坦克被击毁。在被击毙的坦克乘员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希特勒分子的头目，烧毁的坦克中的尸体则无法辨认。

在苏军强大炮火的打击下，负隅顽抗的敌人已无法招架。5 月 2 日 1 时 50 分，柏林城防司令部的无线电台，曾多次用德语和俄语作了如下内容的广播：“我们派使者到俾斯麦的桥上去。我们停止军事行动。”晨 6 时 30 分城防司令宣布投降并向其部队下达了如下的停止抵抗的命令：

“4 月 30 日，元首已经自杀，他抛弃了我们这些曾宣誓效忠于他的人。根据元首的命令，我们德国军队还应该为柏林继续作战，尽管我们的弹药已消耗殆尽，尽管总的形势已使我们继续抵抗变得毫无意义。我命令：立即停止抵抗。”

尽管停止抵抗的命令已下，但个别城区有些战斗还在继续进行。5 月 1 日晚，步兵第三一师和第二四八师，进行了争夺帝国办公大楼的最后战斗。这个大厦附近和内部的战斗特别激烈。步兵第九军政治部的女指导员尼库利娜少校，在战斗中表现极为勇敢。她在沙波瓦洛夫营的强击组的编成内，穿过屋顶的破口向上攀登，从上衣中取出红旗，并用电话线把红旗固定在楼顶的金属尖上。苏联的战旗在帝国办公楼上空飘扬。

至 5 月 2 日 15 时，敌人被彻底解决。残余的柏林守备部队，共 13.4 万余人投降就俘。柏林巷战结束了。这一天是苏联人民、苏联武装力量以及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日子。最高统帅斯大林在命令中说道：“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部队，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部队协同下，经过顽强的巷战，彻底粉碎了柏林德军集群，并于今日，5 月 1 日，全部攻占了德国首都柏林市这一德国帝国主义的中心和德国侵略的发源地。”

在攻占帝国办公大楼之后，朱可夫和别尔扎林上将及其他强击参加者前往该处视察，以查清希特勒、戈培尔和法西斯当局其他领导人自杀问题。他们来到现场后，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似乎所有的尸体都已被德国人挖坑埋掉。然而埋在什么地方，以及是由什么人埋的，却谁也说不清楚。俘虏的德

军主要是伤员，他们对希特勒及其亲信，一点情况也未能提供。待他们正要结束对帝国办公楼的检查时，得到报告说，在地下室发现了戈培尔六个孩子的尸体。“坦率他说，当时我没有足够的勇气，下到那里去看那被父母亲杀死的子女，”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不久，在地下室附近，又发现了戈培尔和他妻子的尸体，让弗里切博士来辨认时，他证明这确是他们。”

大部分法西斯头目，包括戈林、希姆莱、凯特尔和约德尔在内，事先都离开柏林逃往四面八方。直到最后的时刻，他们还同希特勒一道，像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把希望寄托在似乎能拯救法西斯德国和他们本人的一张“王牌”上。4月30日，甚至5月1日，纳粹分子的头目们仍然企图延迟其彻底失败的时间，他们想出的办法是提出谈判，要求把邓尼茨新政府的成员召集到柏林，似乎在这之后才能对德国的投降作出决定。克列勃斯将军是一位有经验的军事外交家，他千方百计地企图拖延谈判的时间。由于希特勒分子当时没有接受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苏军奉命立即将敌人彻底消灭。

5月3日晨，朱可夫和柏林卫戍司令别尔扎林将军等人，一起视察了国会大厦，以及这一地域内发生过战斗的各个地点。伴随他们并作解说的是威廉·皮克的儿子阿尔图尔·皮克，战争时期他在红军队伍中作战。他对柏林十分熟悉，这就使得朱可夫能够比较容易地研究苏军当时作战的条件。

朱可夫说，这里你跨过的每一个地面，这里的每一块土地、每一块石头，都比任何言语更能清楚他说明，在帝国办公楼和国会大厦附近以及在这些建筑物内部所进行的，是怎样的一场殊死的搏斗。国会大厦是一幢庞大的建筑物，它的墙壁连中口径火炮都打不透，需要使用大口径火炮才行。大厦的圆屋顶上各种各样坚实的建筑，使敌人能在所有的方向都构成多层火力。国会大厦内部的作战条件，也是非常艰苦而复杂的。在这种条件下，战士们不仅需要具有英勇无畏的精神，而且要善于敏捷地判断情况，时刻保持警惕和戒备，善于从一个掩蔽物迅速转移到另一个掩蔽物，并精确地对敌人射击。红军战士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在大厦入口的柱子上涂满了苏联军人的留言。在士兵、军官和将军们简洁的词句和随便的签名中，可以觉察到他们为参加这次伟大的攻克柏林战役所感到的骄傲。朱可夫和城防司令别尔扎林将军也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名字。

5月7日，斯大林从克里姆林宫打来电话通知朱可夫说：“今天德国人在兰斯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是苏联人民，而不是同盟国，肩负了战争主要重担，因此，投降书应在反希特勒联盟所有各国的最高统帅部面前签署，而不是只在同盟军最高统帅部面前签署。”

“不在柏林，不在法西斯侵略的中心签署投降书的这种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斯大林继续说道，“我们已与各同盟国商定，把在兰斯签署投降书一事只当作投降仪式的预演。明天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要来柏林。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由你担任。维辛斯基明天就会到达你那里。在投降书签署后，他将留在柏林，充任你的政治助理。”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希特勒的继承人邓尼茨元帅，玩弄了一个狡猾的阴谋。他多次派人和美国司令部艾森豪威尔联系：“不要把德国士兵和老百姓丢弃给布尔什维克。”5月6日，他要求约德尔去兰斯美军统帅部，转达一项新的建议，并给了他书面指令。

“再次向美国人解释我们期望分别投降的理由。如你从艾森豪威尔那里不能比弗雷德堡取得更多的成果，那就答应全线同时投降，投降将分两个阶

段进行。第一阶段，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但要给予德军部队自由运动的权利。第二阶段，就没有这种自由了。要尽力使两个阶段的间隔长一些。如你能够做到的话，请说服艾森豪威尔接受在某种情况下，同意德军士兵个别向美国人投降。你在这方面的成就越大，德军士兵与难民在西线得救的人数就越多。”

5月6日17点30分，约德尔和他的副官，在两位英军将军的陪同下来到盟军司令部。他竭力向盟军表白，他们愿意向西方投降，而不愿向苏联人投降。并挑拨离间说，“你们不久就要与俄国人交战。要考虑一下，不要让任何东西落到他们手中！”兰斯投降书的签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

签约的消息还没有到达莫斯科。苏联将军尼古拉·斯拉维纳就进入了美国军事使团的办公室，递给迪安将军一封安东诺夫的来信。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在信上说，尽管兰斯的投降谈判在进行，邓尼茨“继续在电台宣布，德国人应该继续与苏联人战斗……而不要在西线抵抗盟军了……对公众来说，这就意味着邓尼茨单独与西方签订了和平条约，而继续与东方作战。我们不能让欧洲公众认为还有什么单独媾和”。安东诺夫重申：苏联最高统帅部情愿在柏林举行签署投降的仪式，由朱可夫元帅代表红军签字。

英国首相丘吉尔，也为投降问题忙碌不已。然而，他并不能忘却被围的布拉格人民。他向艾森豪威尔发出了最后的呼吁：

“我希望，您如有部队的话，不要让您的计划妨碍您向布拉格进军，也不用回避过早地与俄国人相见。我考虑过，既然您手中有兵，您是不想作茧自缚的，而且这个国家已经空了。不必回电了，但请告诉我，我们何时能见面。”

对丘吉尔来说，当柏林已沦陷到红军手中后，布拉格则是德国人还把持着的中欧的唯一大都城了。按照俾斯麦的名言，不管是谁，只要占据着布拉格，就等于占据着中欧，这句话对丘吉尔来说，也还有一定的意义。他在4月底打给杜鲁门的一份电报中说道，由巴顿来解放布拉格“能够完全改变捷克斯洛伐克战后的形势，而且对所有的邻国有特别的影响”。照他看来，如果西方犹豫不前的话，捷克斯洛伐克“将会走上南斯拉夫的道路”。

然而，邓尼茨的阴谋没有得逞，同样丘吉尔也没有如愿以偿。在斯大林的坚持下，又重新举行了德国投降签字仪式。

5月8日清晨，维辛斯基乘飞机从莫斯科来到柏林。他带来了处理德国投降所必需的全部文件，以及盟军最高统帅部代表的组成名单。从这天早晨起，世界各大报刊的记者、撰稿人和摄影记者开始到达柏林，以便记下从法律上肯定法西斯德国灭亡这一历史性时刻，记下希特勒德国承认自己的一切法西斯计划、仇视人类的目标遭到无可挽回失败的这一历史性时刻。

当天中午，盟军最高统帅代表到达柏林。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是英国空军上将特德、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斯巴兹将军和法军总司令塔西厄将军。德军凯特尔元帅、弗雷德堡海军上将和什图姆普弗空军上将，也在英国军官的护卫下，从弗伦斯堡乘飞机前来柏林，他们由邓尼茨授权前来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在柏林东部的卡尔斯霍尔斯特，在德国军事工程学校原为饭厅的一幢两层楼房里，准备了一间厅堂，投降的签字仪式就在这里举行。

盟军统帅部代表们稍事休息后，即来到朱可夫司令部讨论与希特勒分子投降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这时，凯特尔同他的伙伴们呆在另一幢房子里。据苏联军官们说，凯特尔和德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神情异常不安。凯特尔曾对

他身旁的人说：“从柏林街道经过时，我为柏林所受破坏的程度，感到极为震惊。”苏方人员回答他说：“元帅先生，当按照你的命令消灭了成千上万的苏联城市和村庄的时候，当千百万苏联人，包括无数的儿童，压死在这些城市和村庄的废墟的时候，你曾感到过震惊吗？”凯特尔脸色发白，他神经质地耸了耸肩，什么也没有回答。

24时整，盟军代表们进入大厅。1945年5月9日开始了。朱可夫元帅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部宣布，受降仪式正式开始。他说：“我们，苏军最高统帅部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受反希特勒同盟各国政府的委托，来接受德国统帅部代表德国作无条件投降。请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进入大厅。”

所有在场的人都转过头来注视着门口，曾向全世界吹牛，说他们能够以闪电的速度粉碎法白、英国，并能在六个星期至一个半月消灭苏联，进而征服全世界的人，现在就要露面了。头一个跨进门槛的，是希特勒的主要助手凯特尔元帅。他慢慢地走着，努力保持着镇静。他举起拿着元帅杖的右手，向苏军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致敬。跟随凯特尔之后进来的，是什图姆普弗上将。他是低矮个儿，眼睛里充满着凶狠而又无能为力的表情。一同进来的，还有未老先衰的弗雷德堡海军上将。德国人被安置坐在离门不远、专为他们准备的一张单独的桌子旁边。凯特尔不慌不忙地坐下来，并抬头凝视着坐在主席团桌旁的盟军统帅部的代表们。什图姆普弗和弗雷德堡也紧靠凯特尔坐下。随从军官们则站在他们椅子的后面。

朱可夫问德国代表团：

“你们手里有没有无条件投降书？你们是否已研究过它并有全权签署它？”

“是的，我们已研究过并准备签署它。”凯特尔元帅用嘶哑的嗓音回答说，同时随手交出邓尼茨海军元帅授权他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证件。如今凯特尔已经完全不像是在接受被征服的法国投降时那个目空一切、骄横十足的元帅了。现在他显得十分狼狈，虽然他还力图保持某种“将帅姿态”。

朱可夫说：“建议德国代表团到桌子这儿来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

凯特尔用不友善的眼光向大厅扫了一下，马上站起来，垂下眼睛，慢慢从桌上拿起他的元帅杖，迈着迟缓的步子走到桌子跟前。他的单片眼镜掉了下来，挂在镜绳上。脸上满布着红斑。什图姆普弗上将、弗雷德堡海军上将和随从德国军官，也跟他一起走到桌子跟前。凯特尔戴上单片眼镜，坐到椅子边上，用颤抖着手签署了五份投降书。什图姆普弗和弗雷德堡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投降书上写着：

“我们，这些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签字者，同意德国一切陆、海、空军及目前仍在德国控制下的一切部队，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

签署完毕之后，凯特尔从桌旁站了起来，戴上右手的手套，这时他又想显示一下他的军人的姿态，用他的元帅手杖行了个礼，昂起下巴，大步走出了房间。

此时此刻，在弗伦斯堡，希特勒的继承人邓尼茨元帅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写完了给全体军官的告别书：

“同志们……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倒退了1000年、1000年来就属于德国的这块土地现在落到了俄国人手中。我们应该遵循的政治路线是极为简单的。显然，我们应该同西方强国一起前进，同它们在被占领的土地上一起

工作，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在将来从俄国人手中夺回我们的祖国……

“ 尽管今天在军事上是彻底崩溃了，但是我们的人民已不是 1918 年的德国人民了。它没有被摧毁。或者我们组织另外一种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或者我们就服从于我们的敌人强加给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确信，承继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团结一致将一定会继续存在下去。

“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前程未卜。然而，这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要高度保持我们之间的同志情谊，这种同志情谊是在我们的国家遭受空袭的情况下建立的。只有通过这种团结，我们才可能度过未来的困难时刻，而且也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确信德国人民永远不会灭亡…… ”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法西斯分子不肯服输，仍妄图东山再起，但是在觉醒的全世界人民面前，他们的阴谋不会轻易得逞，而且永远不会得逞。

1945 年 5 月 9 日零时 50 分，受降仪式宣告结束。朱可夫随即以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名义，为这一长久期待的胜利，向所有在场的人表示衷心的祝贺。大厅里响起了一片难以形容的欢呼声。大家都在互相祝贺、握手。许多人的眼里涌出了欢乐的泪水，“ 亲爱的朋友们， ” 朱可夫对他的战友们说，“ 伟大的荣誉落到了我和你们身上。人民、党和政府信任我们，要我们在最后的交战中，率领英勇的苏军强击柏林。苏联军队，包括你们这些在争夺柏林的交战中指挥部队的人，光荣地实现了这一信任。遗憾的是，有许多人已不在我们中间了。否则，他们将为这长久盼望的胜利而多么欢欣鼓舞啊！他们正是为了这个胜利而毫不动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 当想起未能活到这一欢乐日子的亲人和战友们时，这些习惯于毫不畏惧地正视死亡的人们，不管如何控制自己，也不禁流出了热泪。

1945 年 5 月 9 日凌晨，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经过艰苦的奋战，经过重大的牺牲，欧洲战争终于结束了。自从 1939 年 9 月 1 日以来，在欧洲整个大陆上第一次出现令人感到有点异样但受到欢迎的平静。在这 5 年 8 个月零 7 天中，在 100 个战场上，在 1000 个被轰炸的城镇中，有千百万的男女被屠杀；还有更多的人。在纳粹毒气室里和党卫队特别行动队在苏联和波兰的死人坑边被杀害——这一切都是希特勒的征服野心所造成的结果。绝大多数的欧洲古城都遭到破坏。天暖后，无数未埋葬的尸体从瓦砾堆中散发出令人恶心的臭味。

在德国大街上，再也没有穿长统靴的冲锋队齐步前进的声音了，再也没有成群结队、身穿褐衫的人们的喧闹声了，再也没有“ 元首 ” 从扩音器里发出的尖叫声了。经过 12 年 4 个月零 8 天之后，这个“ 千秋帝国 ” 已寿终正寝了。除了一伙德国人以外，这段时期对所有的人都是黑暗时代，而现在这个黑暗时代也在凄凉的暮色中结束了。这个“ 千秋帝国 ”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曾将这个伟大的民族，这个富有才智但又极易被引上歧途的人民，带到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权力和征服的高峰，现在它却土崩瓦解了，其突然和彻底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按照事先的约定，法西斯德国投降的消息，美英苏三国将同时在当天上午 9 点公布于众。在华盛顿，还在上午 8 点 35 分，记者们就静悄悄地聚集在白宫里，杜鲁门总统和他的夫人、女儿，还有一批军政首脑已在等候他们了。“ 好， ” 总统说，“ 我举行的这个记者招待会的条件是，我发布的新闻必须从今天上午 9 点公布于众。 ” 接着他宣读了如下的一个简短的声明，“ 这是一个庄严而光荣的时刻。艾森豪威尔将军告诉我说，德国军队已向联合国投

降了。自由的旗帜正在全欧洲飘扬。”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为了结束战争，他号召美国人民“工作，工作，再工作！”他说，德国投降这只是一半的胜利，我们还必须不停顿地对日本作战，直至它无条件投降。随后，美国总统用简明的语言向日本人民解释了无条件投降的意义：

“这意味着战争结束。

“这意味着那些把日本推向毁灭边缘的军事首脑们的权力的结束。

“对于那些打算回到他们的家庭、田园和工作岗位的陆军、海军士兵们来说，这意味着食物。

“这也意味着免却为了一个不可能取得的胜利而斗争的日本人民的现今的痛苦和崩溃。

“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消灭或奴役日本人民。”

杜鲁门撇开了他的讲话稿说：“你们还知道，就是在这里，我们的前任们一贯强调，我们希望的是一个正义和公正的和平。在旧金山，我们努力要得到的——我们即将得到它——这就是正义与公正的和平。而我们现在不得不正视一些令人惊惧的问题。”他宣布，5月13日将是祈祷日，并又提醒道：“这非常合适，因为这一天也是母亲节。”

9点整，他已在白宫广播室里向全国讲话了：“这是一个庄严而又光荣的时刻。”接着补上了一句没有给记者念过的话：“如果弗兰克林·D·罗斯福寿数更长些，能够看到这一天，该有多好啊！”

与此同时，丘吉尔在唐宁街10号向英国人民发表了讲话。他先回忆了最近五年来的情况，接着忧郁地说，悲伤和苦难到了尽头，许多事情还有待我们去做。

“在欧洲大陆上，我们还应该确保，那些使我们投入战争的单纯而高尚的目的，在胜利后的岁月里，也不会被摈弃和漠视，‘自由’，‘民主’，‘解放’，这些字眼不会失去它们真正的含义。”丘吉尔继续说，“如果法律和正义得不到实施，如果是极权的或警察的政府取代德国侵略者的话，那么，惩罚希特勒一伙的罪行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就我们本身来说，我们不寻求任何东西。但我们应该确保我们为之而战斗的事业得以在现实中和文件中存在下去，以便使和平有意义。我们尤其要致力于使正在旧金山创建的联合国世界组织不要徒有其名，不要成为一个保护强国和嘲弄弱国的组织。在这辉煌的胜利面前，战胜者应该表现出他们的诚意，应该以他们高尚的风格无愧于他们动员起来的巨大力量。”

在白金汉宫午餐后，当英国首相出现在阳台上时，由于人们热烈鼓掌，丘吉尔的讲话很难被人听清楚。“这是你们的胜利，”他高声说道，“这是每一个国家中自由的胜利。在我们的历史长河里，我们从未经历过这么美好的一天！”

谁也无法辩驳的事实是，苏联肩负了对德国法西斯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的主要重担。这是苏联历史上所进行过的一切战争中最残酷、流血最多和最艰苦的一场战争。在战争期间，有2000多万苏联人死亡。在反希特勒同盟各国中，没有一个国家和一国人民曾像苏联一样，遭受到如此重大的牺牲，并为击败威胁全人类的敌人，而贡献过这样大的力量。因此，受降仪式一结束，斯大林就于当天发表了《告人民书》。

“战胜德国这一伟大的日子来到了。法西斯德国被迫向红军和我们盟国的军队屈膝，承认自己被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我们为了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遭到的巨大牺牲，我国人民在战争进程中所经受的无数苦难，为了祖国而在后方和前线进行的紧张劳动，这一切都没有白白过去，而是获得了完全战胜敌人的结果。各斯拉夫民族长期以来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终于以战胜德国侵略者和德国暴政而告终了。

“从此，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伟大旗帜，将飘扬在欧洲上空。

“三年前，希特勒公开宣称，割裂苏联，把高加索、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以及其他地区从苏联割裂出去是他的任务。他直截了当地声明说：‘我们一定要消灭俄国，使它永远不得翻身。’这是三年以前的事情。但是，希特勒的妄想是注定不能实现的，战争的进程把他这种妄想彻底打破了。实际上，结果与希特勒分子的胡言乱语正好相反。德国被彻底打败了。”

为了庆祝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的对德国的胜利，斯大林定于 1945 年 6 月 24 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作战部队、海军部队和莫斯科卫戍部队的阅兵式——胜利阅兵式。阅兵首长由副最高统帅、苏联元帅朱可夫担任，阅兵总指挥是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那天虽然下着细雨，但大家的情绪异常高涨，以致谁也不曾注意到这一点。当英雄的团队从列宁陵墓前通过时，大家特别兴奋。走在各部队前头的，是在同德军作战中闻名的将军、兵种元帅和苏联元帅们。随后，两百名老战士在鼓声中，把两百面法西斯德军的军旗投到了列宁陵墓的台阶下。这时，无比欢乐的情绪达到了顶点。人群高呼：“让复仇主义者和军事冒险的爱好者们记住这一历史性的场面吧！”

在胜利阅兵式结束之后，斯大林又进行新的部署，准备向日本侵略军进击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三章 歼灭关东军

对日宣战鬼子惊，苏联红军又出征；
中苏健儿相配合，一举歼灭关东军。

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后，斯大林就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决议和波茨坦会议的公告，积极准备对日本法西斯军队的进攻了。

1945年7月中旬，斯大林来到柏林出席了著名的波茨坦会议。会议正式开始前，斯大林拜访了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

7月17日12时整，苏联政府首脑的轿车停在巴倍尔斯堡“小白宫”门前。美国总统的亲密助手哈里·沃恩和詹姆斯·瓦达曼走下台阶迎接客人。斯大林穿了一身佩有金黄色肩章的白色大元帅礼服。为了表彰红军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战绩和历史性胜利，他刚刚被授予这个最高军衔。与斯大林同来的有莫洛托夫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参赞、翻译戈伦斯基。苏联首脑沿着铺上了厚厚地毯的楼梯来到二楼美国总统办公室：杜鲁门总统、国务卿贝尔纳斯和翻译波伦正在那里等候他们。

在谈话过程中，杜鲁门和斯大林讨论了会议的议程，斯大林当时做了几点补充，其中包括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问题。杜鲁门好像没有听见关于佛朗哥的意见，却问斯大林何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比较方便。斯大林说，莫洛托夫和艾登已经商定在今天，7月17日下午5时开会。贝尔纳斯以开玩笑的口吻提到斯大林有众所周知的晚睡迟起的习惯。斯大林也以同样的口气回答说，他的习惯在战争结束后已经改变了。

“关于佛朗哥政权，”斯大林这时用严肃的口气继续说，“我想说明一下我的观点。佛朗哥政权不是西班牙国内形势发展的产物，而是德国和意大利强加于西班牙的。因此，这对联合国家是一种危险。佛朗哥政权是有危险性的，它在西班牙为形形色色的法西斯残余分子提供庇护所。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同这个政权断绝关系。”

杜鲁门回答说，他现在没有关于佛朗哥的足够材料，但他一定研究这个问题。杜鲁门决心较随便地交谈下去。他说：“我不是个外交家，我来到这里是和您交朋友，直接与您共事，以便我们能够就这个或那个问题马上得出‘行，还是‘不行，的决定。”

斯大林回答说，开诚布公是好事，它将有助于苏联同美国共事。

杜鲁门说，假若美国和苏联建立了友好关系，那么产生的分歧将能迅速地和在开诚布公的气氛中得到解决。

“自然，”斯大林同意地说，“可能会有分歧，但应该解决分歧。”

杜鲁门无意中说出，他已经会晤过丘吉尔。斯大林对此反应很平和。他只是提到，英国人在对日战争问题上态度不够明朗。至于说到苏联人和美国人，斯大林继续说，他们将会履行自己的职责。根据种种迹象判断，英国人认为战争大体上结束了。

美国总统讲道，丘吉尔表示愿意在远东战事中给他提供援助。

“这个想法有点奇怪，”苏联政府首脑指出，“是德国人而不是日本人轰炸了英国。可以说，对他们来讲战争已经结束了。英国人民的这种情绪可能会对首相产生不利的影晌。美国人民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帮助了英国。也许，丘吉尔现在考虑要在对日战争中帮助美国人？”

“我们的处境不像英国在面临德国进攻时那样困难。”杜鲁门说。

“我们准备在8月中旬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坚决地说。

这话显然使杜鲁门感到为难。原来，美国急于要求苏联对日参战，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一直谈及这个问题，现在鉴于法西斯大势已去，德意已经无条件投降，日本法西斯的末日也即将来临了，因此杜鲁门根本反对苏联参加远东的战事，认为不再需要这种帮助了。现在斯大林这么明确地提起美国的请求和他答应在战胜德国之后参加对日作战的允诺，却使杜鲁门很不高兴。同时，杜鲁门明白，不管他现在有何作为或作何种表态，苏联总要参战，对此他已无可奈何。因此，总统认为最好是沉默不语。

斯大林趁此转了一个话题。他向杜鲁门通报了苏联政府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就雅尔塔会议上达成一致的问题进行谈判的情况。谈话之后，杜鲁门请斯大林留下共进午餐。席间他们进行了一般交谈。一起度过的时间使得斯大林和杜鲁门能留心心地相互打量。关于与斯大林的初次会面，杜鲁门在日记中特别写道：“他的眼睛，他的脸部表情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说话时注视着我的眼睛。他的心情很好，非常客气。我决心同他率直地对话。”

反希特勒同盟三大国领导人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与前两次会议相比有很多不同。首先，这次会议的独特之处在于，会议是在欧洲胜利完成对希特勒德国及其仆从国作战后不久举行的。一方面，这造成了一种精神振奋的气氛，似乎会议面临的任务理应容易得到解决。另一方面，也使人感到有某种离心力要把与会者引到不同的方向，以致难以达成一致行动。

波茨坦会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与会者也有别于德黑兰和雅尔塔会晤。这次代表美国的是杜鲁门，他的观点与行动方式与罗斯福的实践迥然不同。英国代表团只是在会议的第一阶段由丘吉尔率领。自丘吉尔在英国大选中失败以后，从7月28日起，英国代表团改由获胜的工党领袖艾德礼率领。西方大国新的政治人物的出现，自然不能不使波茨坦会议的工作受到深刻的影响。

一前两次“三巨头”会晤时，是许多问题刚刚提出来就加以解决。而波茨坦会议不同了，它已经拥有同盟国之间在继续作战和战后安排问题达成的许多重要的具体协议。因此，波茨坦会晤的参加者往往只是批准已有的原则性协议或使其具体化。但是，做起来并非轻而易举，因为西方的代表企图修正某些现有的协议，于是会议上往往为此进行着尖锐的外交斗争。当然，与此相对也就产生了需要讨论和解决的新问题。

在波茨坦会议上，最使杜鲁门棘手的是如何拒绝苏联对日作战问题。为了鼓动丘吉尔的反苏情绪，在会议的第一天，杜鲁门就给丘吉尔私下透露了一条重要消息：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小组研制的一枚原子弹在墨西哥沙漠爆炸了。丘吉尔的第一个反应是，西方列强的威力已大大加强，苏联的力量相应削弱，再也不需要苏联在远东参战了，或者说这种参战已是不可取了。远东将成为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尽管苏联在这个地区有它的太平洋海岸线和悠久的历史利益，它可以被排除在外。斯大林所领会的正是这个基本态度，这似乎为他对丘吉尔的不信任提供了进一步的根据。

杜鲁门和他的工作人员的反应是一样的。美国人曾催促斯大林协助早日结束对日战争。在雅尔塔，当斯大林答应在打败德国后的三个月内参战时，他们感到宽慰和高兴，并欣然同意了他的条件。一直到1945年5月8日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时，他还在争取得到斯大林关于红军将协助打败日本的保证，他也得到了这一保证。

突然间，两个月之后，盟国手中有了原子弹，它们竟拒绝苏联的援助，并积极策划在苏联可能宣战之前就打败日本。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开斯大林提出的条件，其中包括把俄国在 1904 年至 1905 年战争中丢失给日本的领土归还给苏联，这对斯大林和他同一代的人来说，是个关系到伟大民族自尊心的问题。

为了便于玩弄核讹诈，杜鲁门向丘吉尔询问关于把新式武器的新闻透露给斯大林的最好方法。丘吉尔写道，斯大林到底是“对希特勒作战中的一个伟大的盟友。而且我们两人都感到，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个支配大局的伟大的新事实，但是不要让他知道任何细节”。他们决定，由杜鲁门总统在一次特别会议之后非正式地提一下这件事。一周之后，杜鲁门带着他的翻译在全体会议之后，走到斯大林跟前，把具有非凡威力的新式炸弹的情况告诉了他。丘吉尔在距他们大约五码远的地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似乎他对这种新式武器的重要意义还没有什么概念。

虽然斯大林可能没有从杜鲁门的非正式谈话中立即理解这一事件的巨大意义，但是他很快觉察到盟国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有了变化。一位美国将军写道，“我们处在一种可以强硬和冷淡的地位。”他们以为现在已拥有远远超过了苏联的力量，可以为所欲为了。盟国态度的变化使斯大林感到不安。这是一种忘恩负义之举，使他深为恼火。他认为，是苏联把西方从纳粹的野蛮蹂躏下拯救了出来。如果苏联没有摧毁德国武装力量，希特勒就会征服英国，并把这场战争蔓延到北美洲。苏联应当受到盟国的感激和尊敬，而不应当受到他们的怠慢和冷落。对于有意冒犯苏联的民族自尊心，谁也不会比斯大林更为敏感，而在波茨坦，盟国造成了深刻而持久的过错。

就在波茨坦会议举行期间，1945 年 7 月 26 日，苏英美三国首脑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本的战后处置方针，经过反复的协商和斗争，通过了一项决议。这就是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因为苏联当时尚未参加对日作战，故没有签字。事后，这项公告是以美、英、中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公布的。当时，中国政府虽然没有参加讨论，但公告在发表之前曾征得了中国政府的同意。后来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时，也正式在公告上签字，所以又成了四国的对日共同宣言。

《波茨坦公告》说：“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境地之军人之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还说：“《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它小岛之内。”最后义正严词地警告日本说：“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波茨坦公告》，实际上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法西斯发出的一份敦促投降书。这对于日暮途穷的日本法西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随着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迅速发展，1945 年春在德国法西斯败降前夕，日本法西斯的处境就已经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了。然而，日本法西斯不甘心灭亡，还在拼命挣扎。日本法西斯统治集团于 1945 年春进行了战争末期空前庞大的军事动员，广泛地搜罗炮灰，妄图挽救注定失败的命运。

日本当权人士采取和、战两手策略。1945 年 5 月 11、12、14 日，最高

战争指导会议成员集会，分析了国际形势，决定努力防止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并请苏联从中斡旋，同英美进行和谈。5月下旬，日本政府决定恳请曾任首相、外相和驻苏大使的广田弘毅为对苏会谈代表。6月3日，广田弘毅和苏联大使马立克在箱根举行第一次会谈，希望苏联充当和事佬。另一方面制定最后的所谓“防御计划”，以保住日本本土和殖民地朝鲜为主要目标，试图作最后一次较量。

1945年4月7日，新任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在国会上说：“必须以任何手段批赢战争。”第二天，日本大本营批准了本土防御的补充计划，扬言要死守本上。

5月9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大势已去。但是，当天日本法西斯头目还叫嚷“日本将继续作战”。6月8日，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一个《战争指导基本大纲》，企图进一步动员人力、物力，准备“本土决战”，甚至预计局势万分危急时要日皇和政府迁到中国东北长春去。6月9日，日本国会紧急会议通过了“战时非常措施法”和“国民自愿服役法”。到1945年夏，日本军队由1943年的380万人，增加到720万人，几乎增加了一倍。但这些人很多是刚征来的新兵，既无训练，更无实战经验，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

就在日本法西斯进行空前战争大动员以图作最后挣扎时，反法西斯同盟国发出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但是，日本法西斯自恃还有一定的本钱进行挣扎，对于这一公告并不认真对待。在《波茨坦公告》发出后，日本政府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7月28日，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发表谈话，竟说什么“不予理睬，只有完成战争”。所以要使日本法西斯真正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要求，举手投降，反法西斯同盟国还要在战场上作最后的斗争。

为了彻底击败日本，根据雅尔塔会议期间的协定，在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三个月后，即1945年8月，苏联实行对日作战，8月8日下午5时（莫斯科时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交给他一份苏联对日宣战的通告，并当面宣布，苏联从8月9日起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由于美国人企图阻止苏联参加对日战争，苏联与两个盟国之间的裂痕扩大了。1945年8月6日，美国原子弹投到了广岛。斯大林和多数苏联人马上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意义。杜鲁门只跟他说过“超级炸弹”，而且，据莫洛托夫说，根本没有提到过“原子”这个词儿。日本已准备投降，其统治集团内部就战、和问题在进行着激烈争吵，即使美国不在广岛以及长崎投掷原子弹，即使苏联不宣战，也可能会在几天之内就放下武器。斯大林意识到，美国人使用原子弹主要是给苏联人看的，是为了威胁苏联。的确，贝尔纳斯后来承认，这枚原子弹与其说是针对日本，还不如说是为了“使俄国在欧洲易于驾驭”

苏联人现在感到，他们虽已从反对德国的悲惨战争中熬出了头，可现在又面临着来自西方的一种可怕的新式武器的威胁。斯大林敏锐地感到苏联的脆弱性。据报道，他召集了五个第一流的苏联科学家，命令他们在最短的时

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是：首相、外相、陆相、海陆、陆海军两总长。

威廉斯著：《美国外交的悲剧》，1959年纽约版，第69页；富勒著：《第二次世界大战》，1948年伦敦版，第390—397页。

间内不惜一切代价研制一枚苏联原子弹。

鉴于国际风云多变，斯大林紧急召见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要他迅速开进满洲。苏军攻击的主要目标是歼灭盘据在中国东北地区号称“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军。早在1944年9月18日，日本大本营给驻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关东军作好对苏战备，以应付苏联出兵。关东军于1945年1月拟订了一个纵深的防守计划。纵深防守的地区，大体上以长春为顶点，以图们、大连一线为底边的一块大三角形地区。这约占整个东北的1/5，是东北腹地的心脏部。5月30日，日本大本营又下达了关于关东军新的对苏作战计划要领。其主要精神是，以对本土决战有利为根本方针，不拘泥于中苏边境的防守，以中国东北和朝鲜为一整体实行全面持久的防御作战体系。

日本在兵力的部署上，主要有三条防线。第一，东部防区，由第一方面军负责，下辖10个师团和1个独立旅团，配置在饶河、佳木斯、敦化、图们一带。第二，西部防区，由第三方面军负责，下辖9个师团，5个独立旅团，主要配置在洮南、长春、沈阳地区。第三，北部和西北部防区，由独立第四军负责，下辖3个师团和4个独立混成旅团，配置在孙吴、爱珲、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一带。就这样，在1945年8月苏联出兵前夕，日本关东军用于对苏作战部署的兵力，连朝鲜北部算在一起，总计为24个师团、11个独立旅团，大约75万人。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伪满和伪蒙的军队。总共号称100万人。除地面部队外，还有一支规模不大的空军和一支松花江内河的小舰队。就在关东军按计划于东北腹地为核心进行纵深部署时，苏联就宣布对日作战了。

为了成功地实施这一战役，斯大林进一步加强了华西列夫斯基统率的苏联远东军，它辖有11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3个航空集团军。这支大军共有80个师，4个坦克机械化军，6个步兵旅，40个坦克机械化旅，总计1577725人。此外，还有太平洋舰队和红旗黑龙江分舰队，协同地面部队作战。苏军拥有强大的武器装备，仅作战飞机就有3400多架，坦克5500多辆。苏军的兵力兵器远远超过日本关东军，形成极大的优势。

根据1945年7月苏联最高统帅部制定的对日作战计划，苏军的作战部署是从蒙古的东突出部和沿海州东西两面对盘据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实行主要的突击，并从北面实行辅助的突击，以便速战速决，分割与围歼关东军于东北的腹地，不让战争旷日持久。

8月9日零时一过，苏联红军百万雄师，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凌厉攻势，从各个方面突入中国东北的中苏边界，对日寇关东军发起全线总攻击。苏联红军分四路进军。第一路是后贝加尔方面军，其任务是担任主要的突击，从西面突入东北的中部平原，同远东第一方面军相呼应，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切断关东军同华北日军的联系，分割和围歼关东军第三方面军主力于长春、沈阳地区。第二路是苏蒙联军，向承德、锦州和张家口进攻。第三路是远东第一方面军北翼部队，其任务是从东面突入东北的中部平原，分割和围歼关东军第一方面军主力于牡丹江、敦化地区，然后向吉林、长春、哈尔滨突击。第四路是远东第二方面军，其任务是策应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方面军北翼部队，担任辅助的突击，在红旗黑龙江分舰队的协同下，强渡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向哈尔滨、齐齐哈尔方向进攻，牵制并歼灭关东军的独立第四军。此外，第一远东方面军南翼部队在太平洋舰队配合下，切断关东军和日本本

土的联系，并向朝鲜北部进击，歼灭那里的日军。

经过几天的突击，由于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战，各路苏军都有很大进展。在进军途中虽然遇到关东军一些部队的抵抗，但阻力不大。后贝加尔方面军到8月11日已攻占鲁北、洮南、多伦等地。远东第一方面军北翼部队，到8月14日已攻占牡丹江等地；南翼部队在太平洋舰队配合下，8月12日攻占朝鲜北部的雄基、罗津两港口，不久又攻占清津港。远东第二方面军在8月14日前攻占了饶河、宝清，并封锁了孙吴。

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广播投降诏书。关东军士气更加低落，整个防御体系顷刻瓦解。18日，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将同苏军交战的日本第一方面军、第三方面军、独立第四军和第二航空军的参谋长召集到长春，下达了停止作战、向苏军投降的命令。

19日，苏军要求关东军全部停止战斗、缴械投降不得迟于20日12时。除若干通信联系断绝的部队外，到指定时间，关东军全部向苏军缴械投降。

与此同时，后贝加尔方面军继进占齐齐哈尔之后，进逼长春、沈阳，20日进驻这两个重要城市。苏蒙联军也于19日进占承德和张北。

20日，远东第一方面军北翼部队进占吉林、哈尔滨两个重要城市。远东第二方面军还进占佳木斯，并开进哈尔滨。22日，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坦克部队官兵大约200人，分乘10架运输机到达旅顺、大连，23日、24日苏军坦克部队乘火车进占大连和旅顺。远东第一方面军南翼部队，继攻占朝鲜北部的雄基、罗津、清津、元山等港口之后，24日进占平壤。至8月下旬，几路苏军都已进入东北的腹地，并在中国出关作战的八路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协助下，顺利地进占所有的重要城镇。在朝鲜北部，苏军在金日成领导的人民武装配合下，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到8月30日为止，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关东军各部队，全被解除武装。

在南库页岛方面，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所辖部队于8月11日晨发起攻势，越过北纬50度分界线，进入库页岛南部。

13日开始攻击日本守军。当时日本在南库页岛的守军为日本北部军管区第八十八师团，兵力大约1.8万人左右。经过一番战斗后，22日双方签订就地停战协定。

25日，苏军进占落合、丰原等地，苏太平洋舰队的一支陆战队还占领了大泊等地，南库页岛的战事便告结束。在千岛群岛方面，8月15日夜，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命令远东第二方面军和太平洋舰队立即准备实行登陆作战。当时日本在千岛方面的守军大约为五六万人。

18日晨，远东第二方面军所辖部队在海军舰艇协同下，开始攻占千岛群岛最北端的占守岛。经过一番战斗后，23日日本守军同苏军签订停战协定。从24日起，苏军部队从北往南依次进占千岛群岛的各岛。9月1日进占国后、色丹两岛后，苏军最高统帅部宣告千岛战斗结束。

这样，苏联红军自8月9日开始对日作战以来，历时三周多便全部胜利结束。苏联的军队和人民，在击败德国法西斯后挥戈东进，在中国人民、朝鲜人民的有力配合下，一举打垮了霸占中国东北多年的关东军和其他日军。在整个远东战役中，苏联红军共击毙日军8.37万多人，俘敌59.4万人，缴获大炮1565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以及许多轻武器。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战局发生根本转折以来，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也由战略相持阶段胜利地转入战略反攻阶段。1945年8月8日苏联宣

布参加对日作战，次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声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向全中国人民下了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动员令。他指出：“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8月10日，延安总部就发布大反攻的命令，要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向敌人展开全面进攻，并向敌伪军发出最后通牒，限期投降，如遇反抗，即坚决歼灭之。11日，延安总部又命令华北和山东有关部队立即从原地出发，向热河、察哈尔及东北各地进军，配合苏联红军作战。

经过一个月的战斗，在东北前线，解放区正规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有力地配合苏联红军作战，解放了日寇久已霸占的整个东北。在平津地区，晋察冀军区各部队截断了敌人所有铁路线，攻下张家口、秦皇岛、山海关等战略要地，普通县城几乎全部解放，残敌被迫龟缩到平、津、保几座孤城里。在归绥前线，大青山的部队和绥南部队，连续攻克了许多重要城镇，截断了平绥路，收复了归绥城。在太原前线，太行、太岳、冀晋、晋中、晋北各军区部队，切断了同蒲路、正太路，收复了许多重要城镇，包括太原外围重要据点太原县城。在国民党军队抢占太原后，解放区部队则收复并控制了山西省广大的地区，扫清了山西的残敌。在平汉前线，冀鲁豫、冀南、太行各解放区部队，胜利完成了对平汉路石家庄至新乡段的反攻任务，收复了这一带敌占土地。据不完全的统计，从8月11日总反攻开始到10月10日，解放区各部队共打死打伤敌伪军23万多人，缴获长短枪18万枝，轻重机枪2500多挺，各种火炮600多门，解放城市190余座，收复国土31万余平方公里。

1945年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在南京签署投降书。在8年抗战中，中国人民歼灭了大量敌军，据日本方面显然大为缩小的统计数字，日本官兵在中国战场共死伤133万余人。中国人民为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就这样，在中国人民、苏联红军、英美盟军及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抗击下，骄横一时的日本法西斯军队被彻底击败了。原定于8月底举行的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的仪式，因台风的影响改在9月2日举行。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许，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首先，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然后是接受投降的同盟国代表签字：美、中、英、苏以及所有对日作战的同盟国的代表依次签了字。至此，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被载入史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同时宣告胜利结束。

就在举行受降签字仪式的当天——9月2日，斯大林发表了《告人民书》的广播讲话。他说：

“今天，9月2日，日本的政府代表和军事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日]本东田博：《军队日本史——满洲事变、中国事变编》，东京新人物往来社1975年6月版，第280页。

日本在海陆两方面都已被联合国武装力量彻底击败和四面包围，它终于承认自己已战败而缴械投降了。

“在这次世界大战前夜，形成了世界法西斯主义和世界侵略势力的两个策源地：在西方是德国，在东方是日本。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就是它们。使人类和人类文明濒于毁灭的就是它们。西方的世界侵略势力策源地在四个月前已被消灭，结果是德国被迫投降。过了四个月，东方的世界侵略势力策源地被消灭，结果是德国的主要盟国日本也被迫在投降书上签字了。这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

“为了胜利，我们苏联人民没有吝惜过力量和劳动。我们经受了艰苦的岁月。可是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我们胜利了。从此，我们可以认为我们祖国已经摆脱了西方德国入侵和东方日本入侵的威胁，盼望已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到来了。”

9月3日，斯大林发布《最高统帅给红军和海军部队的命令》。他在命令中写道：“为了庆祝战胜日本，在今天对日胜利节，9月3日，21时，我们祖国首都莫斯科，以祖国的名义，用324门大炮齐鸣礼炮24响，向赢得这一胜利的英勇红军部队和海军舰队和部队致敬。在争取我们祖国的荣誉和胜利的战斗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无限的欢快，尤其是饱受日本侵略奴役的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正是：二次大战得结束，家家户户饮屠苏；多少欢笑多少泪，胜利万岁震天呼！

第三十四章 尾 声

二战结束忙重建，恢复创伤负重担；
斗换星移换人间，千秋功罪后人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感到极度疲劳，紧张的战争几乎耗尽了精力。但是，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使他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在国际上，他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严重挑战，杜鲁门咄咄逼人，肆意扩张，妄图称霸世界。最使他感到不安的莫过于美国把西德和日本重新建成经济和军事强国的政策。国内满目疮痍，到处是战争创伤，面临着安顿人民生活 and 重建家园、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巨大任务。

破坏是严重的。2500 万人民流离失所，1700 座城市和 2.7 万个乡村被大部或全部毁坏。大约 3.85 万英里的铁路被毁，比绕赤道一周还长得多。顿巴斯矿井 90% 遭到破坏和水淹。巨大的第聂伯水坝及其周围的工业消失了；急流重新在河道上出现，航行已经停止。700 万匹马、1700 万头牛、2000 万只猪被屠宰或者被抢走。

3000 多个工厂必须重建。最严重的是人力的损失，牺牲的人数达 2000 万以上。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人牺牲，给恢复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4 年以前，斯大林曾经宣布：“旧俄国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目前的危险是：经过这场战争之后，苏联变得虚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它和美国的距离拉得更大了。因此它还会再次挨打。斯大林决心不使这件事重演。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而且变成了世界第二大国。在历史上，俄国曾两次取得同样的大国地位，一次是在 1709 年彼得大帝取得波尔塔瓦的胜利之后，另一次是在 1812 年打败拿破仑之后。但每一次俄国都衰弱下去了。这一次，斯大林不能再让它重蹈覆辙。苏联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在经济的废墟上重建起来，并保持大国的地位。

1945 年 8 月 19 日，意味深长的是，这是在美国向广岛投掷原子弹之后的几天，斯大林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一个重新建设的计划。结果产生了第四个五年计划，于 1946 年 3 月 18 日被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这个计划要求到 1950 年把工业生产提高到战前水平的 148%。这意味着许多地方要从头做起，正像十月革命后一样。不过在 1921 年的时候，他们是在封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废墟上建设，现在却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上建设，这个经济基础虽然几经摧残，还是经受住了战争。他们有着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巨大工农业基地。这些基地有力地支援了战争。从 1940 年到 1943 年，乌拉尔的电力增长了一倍，生铁产量增长了一倍多。而且这第二次建设从一开始就有前次经济建设所训练出来的熟练人员。

计划规定了斯大林的 20 年海军建设计划的第一阶段。他决心继续执行他的战前政策，确保苏联有一支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海军。按计划每年交付 20 万吨位的军舰，这支海军将拥有 1200 艘潜艇，175 艘驱逐舰，35 艘巡洋舰，以及战列巡洋舰和航空母舰。在 1945 年至 1950 年间，主要危险似乎来自美国 and 英国海军的庞大的两栖作战能力。美国对于核武器的垄断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然而这种威胁并没有被看得如此紧迫，因为在这个阶段还缺少足够的运载系统。所以，优先权放在沿海防御部队，建立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

实施这个计划，需要有英勇奋斗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决心。斯大林一心想使苏联的工业产量超过西方，特别是超过美国。他在 1946 年 2 月 9 日对选

民的历史性演说中指出,一个预计在 15 年至 20 年间完成的工作的宏大纲领,工业生产要比战前提高两倍,这就是说,每年要产生铁 5000 万吨,钢 6000 万吨,煤炭 5 亿吨,石油 6000 万吨。斯大林说:“只有做到这一步时,可以说我们祖国已有了免除一切意外的保障。这大概需要三个新五年计划的时间,也许还要多一些,才可能做到,而且是我们所应当做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考验和检验的大学城”,它证明了苏联的社会和国家制度及其武装部队的力量。这个国家将为迎接未来新的挑战而作好准备。“单靠勇敢不能赢得胜利。”斯大林反复强调说,还要有强大的军事工业和各种充足的补给品。他引证战时产量的具体事例来说明他的主张。然后,他罗列了主要指标数字,阐述了党要把工农业生产提高到新的水平的计划。

当时,斯大林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毋庸置疑的。他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强大的号召力。战后五年计划是在四年零三个月中完成的。这次五年计划规定,苏联全部工业产品,在 1950 年要比战前 1940 年增加 48%,实际增加了 73%。恢复和新建的大企业有 6000 个。在被敌人几乎夷为平地的乌克兰,矿产量达到了 1940 年的水平;第聂伯河大坝得到了重建,到 1947 年 3 月就能够发电了。消费品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增长。到 1950 年,苏联的工业系统已比战前强大了。而且,还有了自己的原子弹,从此美国的核垄断地位被打破了。这在当时的苏联,甚至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特别是在恢复战争创伤的过程中,斯大林十分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从战前起,他就一贯注意提拔这些新的优秀人物,把他们当成苏联未来的希望。这一政策,在战后党员的成分上有显著的反映。到 1952 年,有 1/3 至 1/2 的党员的年龄在 35 岁以下,大约有 3/4 的党员的年龄在 45 岁以下。斯大林虽然公务繁忙,但他仍像在战争年代那样,直接联系着数以百计的著名科学家、发明家和各行各业卓有成效的优秀人物以及著名的劳动模范。斯大林经常和他们通信,询问他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在决定一些重要的建设项目的,多次召集专家座谈会,反复征求他们的意见。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苏联问题专家伊恩·格雷在《斯大林——历史人物》一书中写道:“谦虚和庄严,加上专业知识,这就是斯大林一向赞扬的品德。他设法用这些品德去谆谆教诲苏联的年轻一代。……在他自己的人表现不谦虚的时候,他对他们是严厉的。”他承认,朱可夫是苏联将领中最杰出的一员,而且得到公众的最充分承认。但是,个性倔强、行为豁达的朱可夫喜欢自夸。斯大林本人虽然武断专横,沉醉于个人崇拜之中,然而他严厉批评了朱可夫“骄傲自满、妄自尊大”的作风。斯大林保留了多数有才能的高级将领。华西列夫斯基在 1948 年 11 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并在四个月之后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科涅夫从 1946 年 6 月至 1950 年 3 月,一直担任陆军总司令,后来担任监察长。巴格拉米扬、马利诺夫斯基、麦烈茨科夫等,被任命为重要军区的司令员,他们都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文武全才的高级将领。

战争、建设耗费了斯大林的精力。他面色发黄,体质每况愈下,他的体力越来越不支,性格也越来越孤独了。晚年,他唯一的社交生活是孔策沃的晚餐会,参加者多是政治局的一些领导人。这些都是工作晚餐,他们边吃边讨论和决定政策问题。在孔策沃进晚餐的时候,斯大林谈论国家大事,作为一个老人回忆往昔。只有在这种场合他才感到舒畅。他经常回忆战争,怀念

艰苦年代的威武雄壮的战役。在一次晚餐会上，斯大林反驳了一种关于德国人需要经过 50 年后才能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的说法。他说：“他们会恢复过来，而且会非常迅速。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它拥有极为熟练和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和有技术的知识分子。给他们 12 年至 15 年的时间，他们就会重新站立起来。”然后，他站起身来，又补充说：“我们将在 15 年或 20 年里恢复过来，到那时，说不定，我们还得有一次较量。”说到这里斯大林又重复了他过去说过的话：“建设吧，不然就要在 10 年内被外国侵略者搞垮！”

在孔策沃，也像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一样，斯大林感到孤独，但是他不承认这一点。他十分怀念已去世近 20 年的妻子纳佳。他把她的自杀归罪于她的家庭、波利娜·莫洛托娃和迈克尔·阿伦的小说《绿帽》的坏影响，她死前在阅读这部小说。

1948 年，斯大林第一次公开跟斯维特兰娜谈起她的母亲，很明显，对妻子的怀念深深地折磨着他。

在战争期间，斯大林和他的孩子们很少见面，他一心扑在战争上。1944 年 5 月，斯维特兰娜到孔策沃去告诉她父亲，她想同莫罗佐夫结婚，他是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学生，是犹太人。斯大林对犹太人有些传统的偏见，他不同意这桩婚事，不过，他的主要批评是，这位青年人没有为自己的国家效劳。“前线正打得战火纷飞，他却坐在家享清福！”但是，他没有像女儿所担心的那样禁止这门婚事。“是的，春天来了，你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斯大林拒绝见她的丈夫，也不允许他住在他的家里，斯大林在外面给他们找了一套房间。斯维特兰娜怀孕后，他放宽了禁令。

1947 年春天，他女儿的婚姻破裂，1949 年春天又与尤里·日丹诺夫结了婚。他的父亲安得烈·日丹诺夫是斯大林的战友。显然，他想女儿和女婿可能会搬到孔策沃别墅的第二层楼里来住。但是，女儿和女婿拒绝搬进那座别墅，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

1951 年秋，斯大林在南方度过了他的最后一次假期。他再也没有离开莫斯科，大部分时间住在孔策沃。斯维特兰娜带着两个孩子在 1952 年 11 月 7 日革命纪念日去看过他，在 12 月 21 日他的 73 岁寿辰那天去探望了他。他看上去身体很不好，显然患有高血压，在医生的劝告下，他已经戒烟了。在这种情况下，斯维特兰娜感到应当更经常地去探望他。朋友们劝她给父亲打电话。她犹豫不决。自为他常常草率地回答：“我很忙！”但是，她知道，父亲欢迎她去探望，他喜欢看到她的孩子们。在他冷淡的态度背后，“他是真心关心他们的。他经常教导女儿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自己挣钱独立生活，决不能当一个他所称呼的“寄生虫”。

斯维特兰娜没有想到，在父亲 73 岁寿辰的那次探望是同父亲最后的一次会面。

1953 年 2 月 29 日晨，她忽然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她急忙赶到家里，吻了她父亲的脸和手，坐在他的身旁，握着他的手。他不时地睁开眼睛，但是什么也没有看见。他没有恢复知觉。死亡的痛苦开始了。他挣扎着呼吸，脸色开始发黑。溢血正在扩散。这是对死亡的可怕斗争。他举起左手，对他的女儿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告别的手势。3 月 5 日，他就与世长辞了。

3 月 6 日凌晨，莫斯科电台宣布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大批群众开始拥到红场，自动前来致哀的人，一直排了有 10 英里长。人们在默默地哭泣。在莫斯科，妇女们围着扩音器站在雪地里，红着眼睛。美联社报道了一个年轻

的家庭妇女的感想：

“ 怎能想象草原没有辽阔的空间？

伏尔加没有流水？

俄罗斯没有斯大林？ ”

这位美联社记者是在汽车里听到这一消息的。泪水从汽车司机的脸上滚下来。司机说：“ 请原谅。他是一个好汉子。是他领导苏联劳动人民摆脱了穷困，是他领导我们打败了希特勒。 ”

斯大林逝世至今已整整 30 多年了。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斯大林的评论也其说不一，有的人歌颂他，有的在肯定他的功绩时，也指出他的失误或严重错误。曾长期生活在苏联并在那里遭受过迫害的著名美国作家特朗，在《斯大林时代》一书里，对斯大林的功过做过如下的评论：

“ 今天没有人能对斯大林时代作出最后的评断。斯大林是那些需要由长期历史来加以评价的人物之一，他的工作离现在越远，其性质也就会越清楚。我们至少知道，他从 1928 年起，在一个国家， 在一个为敌人的世界所包围的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当他开始的时候，俄国是一个农业的和文盲的国家；当他结束的时候，俄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他两度这样建设了俄国：一次是在希特勒入侵之前，再一次是在战争的废墟上。这要永远归功于他；他是这项工程的工程师。

“ 他进行工作时是残酷无情的，因为他出生在一个残酷无情的国家里，并且从小就经历了残酷无情的生活。他是抱着猜疑的心情进行工作的，因为他曾经 5 次被放逐，并且一定多次被人出卖过。他默许了，甚至批准了政治警察对无辜的人的暴行，但迄今为止，还提不出证据来说明他是有意制造这些暴行的。这些暴行看来还是由于复杂的原因，其中包括斯大林的猜疑的倾向和中央委员会不加审视地批准斯大林所说一切的倾向。尽管有着这些侵害个人的罪行，仍然不乏证据说明：斯大林所说的‘ 人 ’ 是任何国家中最宝贵的因素的话并不是虚伪的。他终身从事于审慎地清除妨碍工人、农民和工程师们实现他们的理想的障碍，如果没有他的远见，他们会继续陷于失望中和默默无闻；但是，由于他的了解，他们成为了农业、工业和航空方面的领导人。 ”

在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看法，争论几度起伏。

1956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首次提出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谴责他滥用职权、破坏民主法制。作为犯有严重“ 罪行 ” 的人，斯大林的遗体被移出列宁墓，焚尸扬灰。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看法，在莫斯科红场上还为他树立了半身雕像。

近两三年，全面改革的浪潮在苏联兴起，人们对历史的、现实的重大问题正在进行广泛的讨论，关于斯大林的争论再度兴起。戈尔巴乔夫在 1987 年十月革命节的报告中提出，要“ 对十月革命以后 70 年来所做的一切进行严肃认真和有根据的分析 ”， “ 要站在历史真实的立场上，既看到斯大林在争取社会主义、捍卫其成果方面无可怀疑的贡献，也要看到他及他周围的人犯的粗暴政治错误和专横行为使人民付出的巨大代价，对社会主义产生的严重后果 ”。这是当今苏联最高领导人对斯大林的最新评价。

苏联学者在目前的讨论中认为，正确评价斯大林是很不容易的，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肯定。斯大林领导苏联近 30 年，走过了苏联历史上一段最艰难曲折的道路，一切成就和失败都和他联系在一起。他不单是一个人，而是代表

着一个时代。因此，如何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评价斯大林的功过，及其犯错误的原因，避免类似情况的再发生，不仅对苏联而且对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斯大林年表

1879年12月21日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斯大林)出生于格鲁吉亚哥里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一个鞋匠,母亲是一个农奴的女儿。

1888年9月—1894年6月 斯大林在哥里教会学校读书。毕业后进入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正教中学读书。

1896—1898年 斯大林在第比利斯正教中学领导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研究《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并阅读列宁的早期著作。

1899年5月29日 斯大林因宣传马克思主义被第比利斯正教中学开除。

1901年9月 斯大林在巴库创办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派的机关报《斗争报》。

1901年11月11日 斯大林被选人列宁火星报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个第比利斯委员会。

1902年3月9日 斯大林组织领导了巴士姆各工厂工人的政治示威运动。

1902年4月5日 斯大林在巴士姆党的领导小组的会议上被捕,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流放地。

1903年3月初 斯大林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

1904年1月5日 斯大林从流放地逃走。他回到第比利斯,继续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的工作。

1905年12月12—17日 斯大林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代表的资格在芬兰坦默福斯参加第一次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和列宁第一次会面。

1906年4月初 斯大林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斯大林和列宁一起,反对孟什维克,维护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路线。

1906年11月18日—1907年4月10日 在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新时代》、《我们的生活》和《时代》上,陆续刊登了斯大林的论文《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1908年3月25日 斯大林在巴库被捕,后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

1909年6月 斯大林从流放地跑回巴库,继续领导工人阶级斗争。

1912年1月5—17日 第六次(布拉格)全党代表会议,缺席选举斯大林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代表会议上,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俄国实际革命工作的中心(俄国中央局)。

1912年2月29日 斯大林从沃洛格达流放地逃走,先到巴库,后到彼得堡。

1912年5月5日 斯大林奉列宁指示负责筹办的工人阶级的日报《真理报》第一期出版,并登载了斯大林的论文《我们的目的》。斯大林再次被捕,后从流放地逃走,秘密回到彼得堡,同年9—10月份继续编辑《真理报》。

1912年12月28日—1913年1月1日 斯大林参加在列宁领导下举

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与党工作者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二月”联席会议。列宁和斯大林在会上筹划改善《真理报》编辑工作的措施。

1913年2月23日 斯大林在彼得堡被捕入狱,后被押解到图鲁汉斯克边区,流放4年。

1913年3—5月 布尔什维克党刊《启蒙》杂志第3—5期,连续刊登了斯大林的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列宁对这一著作评价很高,认为这是“布尔什维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纲领宣言”。

1917年3月12日 斯大林从图鲁汉斯克被解救出来,回到彼得格勒。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俄国中央局扩大会议决定斯大林参加《真理报》编辑部的领导工作。

1917年4月24—29日 斯大林参加全俄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会议。会上,斯大林拥护列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发表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代表会议选举斯大林为党中央委员。

1917年5月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立,斯大林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1917年6月16—23日 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军事组织召开了全俄代表会议,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民族运动和民族团队》的报告。

1917年6月20日 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斯大林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17年7月26日—8月3日 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列宁因受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通缉、侦捕未能出席代表大会。会议由斯大林主持。会议确定武装夺取政权,并注意巩固联盟。

1917年8—10月 斯大林用《无产者》、《工人》和《工人之路》的名义编辑出版党中央机关报,宣传党的政策,号召用暴力推翻沙皇反动政府。

1917年10月8日 斯大林探访秘密回到彼得格勒的列宁,与他讨论准备武装起义的问题。

1917年10月16日 俄共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列宁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

10月16日 党中央决定由斯大林负责领导武装起义的总指挥部。

1917年10月24—25日 列宁和斯大林领导武装起义。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发表《告俄国公民书》,宣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归苏维埃掌握。

1917年10月26日 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批准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1917年12月21日 列宁和斯大林出席全俄红军组织委员会会议。

1918年2月23日 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拥护列宁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主张。

1918年3月 俄共中央在面临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把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

1918年5月29日 斯大林被任命为南俄粮务总监,赋予非常的权力;并代表党中央负责南方战场的总指挥。

1918年8月4日 斯大林在致列宁的信中,报告察里津地区的军事形

势和土尔克斯坦的情形。

1918年9月17日 斯大林被任命为新组成的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18年9月19日 列宁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给斯大林发来贺电,祝贺他在保卫察里津战役中取得的伟大胜利。

1918年10月8日 最高苏维埃任命斯大林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18年11月30日 斯大林被任命为工农国防委员会委员和委员会副主席。

1918年12月30日 俄共中央遵照列宁的建议,通过了派斯大林统一指挥东方战线的决定。

1919年6月10日 党中央委托斯大林统一指挥西方战线。

1919年9月26日 党中央全会决定派斯大林到南方战线去击溃邓尼金。

1920年5月26日 党中央因波兰进攻苏维埃共和国,派斯大林到西南战线指挥作战。

1920年8月25日 斯大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立共和国战斗预备队的计划。

1921年3月8—16日 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作《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斯大林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

1921年12月29日 最高苏维埃批准斯大林为民族事务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1922年4月3日 党中央全体会议根据列宁的提议,选举斯大林为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1922年9月27日 斯大林和列宁商谈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起来成为统一的联盟国家的问题。

1922年11月30日 斯大林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关于共和国联盟的报告。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报告,批准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基本条文》。之后,斯大林又起草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

1924年1月16—18日 斯大林领导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1924年1月21日 全世界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列宁,在莫斯科附近的哥尔克村逝世,终年54岁。

1924年1月26日 斯大林在第二次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追悼会上发表演说《悼列宁》,并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名义宣誓遵循和执行列宁的遗训。

1924年5月23—31日 斯大林领导俄共(布)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列宁逝世后的第一个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中央组织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24年10月21—24日 斯大林出席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农村支部书记会议,并作了《关于党在农村中的任务》的报告。

1925年12月15日 斯大林为俄国共产党(布)改名为全苏联共产党——联共(布)发表演说。

1926年1月1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就组织问题发表演说。他在中央全会上再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总书记。

1927年4月5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表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的演说、1928年7月4—12日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作了《论共产国际纲领》、《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论工农结合和国营农场》等问题的报告。

1928年11月16—24日 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作了《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

1929年11月3日 斯大林写了《大转变的一年》一文。

1929年12月27日 斯大林出席全国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发表演说《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

1930年1月5日 联共（布）中央按照斯大林的建议，通过《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

1930年1月19日 斯大林写了《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论文。

1931年6月23日 斯大林在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表题为《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的演说。

1932年3月23日 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签署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联共（布）中央关于在伏尔加河中游建造3个强大的水电站的决议。

1933年1月7—12日 斯大林主持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会上作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报告，并发表《关于农村工作》的演说。

1934年1月26日—2月10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党代会上作了关于党中央工作总结报告。斯大林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35年11月14—17日 斯大林参加第一次全苏联工业和运输业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

1936年6月20日斯大林参加红场高尔基的葬礼。

1937年2月23—3月5日 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全会，并发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

1937年7月7日日军大举侵华，“七七”事变爆发，中国抗日战争从此大规模展开。斯大林派空军援助中国抗战。

1939年3月10—21日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党代会上作了党中央工作总结报告，并再次当选党中央总书记。

1939年5月11日 诺门坎事件爆发，日苏交战。斯大林派朱可夫将军指挥这一战役。

1939年8月23日 由于英、法政府拒绝与苏联签订联合反侵略的军事协定，并鼓吹“祸水东引”，在此情况下，苏联政府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9月1日 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39年9月15日 诺门坎事件以日本失败告终，日本第六军团被歼，被迫与苏签订停战协定。

1939年9月17日 苏军越过西部边界，进军波兰东部地区。

1939年9月27日 德军攻破华沙。

1939年9月28日 苏德签订划定波兰国界的条约。

1939年11月30日 苏芬战争爆发。

12月7日，苏军进至芬兰的卡累利阿防线。

1940年5月6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斯大林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1940年7月21日 希特勒命令制定进攻苏联的作战计划。

1940年7月21日 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同年8月初，这3个国家分别加入苏联。

1940年9月27日 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三国以政治、经济和军事一切手段相互援助。

1941年6月22日 希特勒撕毁互不侵犯条约，德军于凌晨3点半大举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

1941年6月30日 苏联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并任命斯大林为主席。

1941年7月3日 斯大林向苏联人民发表广播演说。

1941年9月29日—10月1日 斯大林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英、美三国代表会议。就苏租借武器问题举行会谈。

1941年9月30日—1942年4月20日 莫斯科会战。

10月19日，斯大林签署国防委员会保卫莫斯科的决定。

1941年9月30日—12月5日 为苏军防御阶段，1941年12月5日—1942年4月20日为反攻阶段。

1941年11月7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检阅部队并发表演说，说明红军的伟大的解放使命，并向苏联军人和男女游击队员们发布命令。

1941年11月15日 德军对莫斯科实施第二次总攻。

1941年12月7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和美、英、荷在太平洋的其它属地，日本对英、美、荷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1年12月11日 德、意、日签订共同进行战争协定。

1942年1月1日 苏、美、英、中等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宣言》。

1942年5月26日 苏、英在伦敦签订互助条约。

1942年6月12日 苏、英和苏、美公布关于苏英条约、苏美合作协定，以及关于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

1942年7月17日—1943年2月2日 斯大林格勒会战（7月17日—11月18日为苏军防御阶段，11月19日—1943年2月2日为苏军反攻阶段）。

1943年1月12—18日 苏军列宁格勒方面军、沃尔霍夫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协同进攻，粉碎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

1943年1月25日 最高统帅斯大林向西南、南方、顿河、北高加索、沃罗涅什、加里宁、沃尔霍夫以及列宁格勒等战线的军队发布命令，总结了红军两个月的进攻战役，提出了加强斗争，以粉碎德国占领军并将他们驱逐出苏联国土的任务。

1943年2月2日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被围德军遭毁灭性打击，残存的9万人，包括保罗斯元帅和22名将军都当了俘虏。德军在顿河、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损失共达150万人。历时200天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震撼世界，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1943年3月6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苏联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斯大林以苏联元帅的军衔。

1943年3月20日—5月13日 美、英、法军队在突尼斯展开进攻，德意军在北非失败。

1943年7月10日—8月17日 美英军实施西西里岛登陆战役。

1943年7月24日 斯大林为苏军胜利完成夏季攻势发布命令。

1943年7月25日 墨索里尼下台，成立以巴多里奥为首的意大利政府。

1943年9月8日 意大利巴多里奥政府向盟国投降。

1943年10月19—30日 苏、英、美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通过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中国也参加签署这一宣言。

1943年11月 66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奖给苏联元帅斯大林一等苏沃洛夫勋章，借以表彰他“正确领导红军进行抗德卫国战争和多次胜利的功绩”。

1943年11月22—26日 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发表《开罗宣言》。

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 斯大林参加在德黑兰举行的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会议发表《德黑兰宣言》。

1944年6月6日 美英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1944年6月20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将第一个“保卫莫斯科”奖章授给国防委员会主席、最高总司令、苏联元帅斯大林，借以表彰他领导英勇的莫斯科保卫战，在莫斯科近郊粉碎德军的功绩。

1944年7月29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令将“胜利”勋章奖给苏联元帅斯大林，借以表彰他“在组织和实现红军的进攻，使德军遭到致命的失败，使反德国法西斯强盗的战局根本改变为有利于红军方面的卓越功绩”。

1944年9月19日 苏、美、英、芬兰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停战协定。

1945年2月4—11日 斯大林参加在苏联雅尔塔举行的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签订《雅尔塔协定》。

1945年4月5日 苏联宣布废除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苏日条约。

1945年4月16日—5月8日 苏军进行柏林战役。

1945年4月25日 苏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与美军第一集团军，在易北河（托尔高地）会师。

1945年4月28日 墨索里尼被处死。

1945年4月30日 希特勒和他的妻子爱娃·勃劳恩自杀身亡，尸体在总理府花园火化。希特勒自杀一天以后，即5月1日傍晚，戈培尔首先毒死了自己的6个孩子，然后与他的妻子一起为希特勒殉葬。

1945年4月30日 苏军在柏林攻占国会大厦，并在它上面升起红旗。

1945年5月1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红军“五一”大检阅。

1945年5月2日 苏军攻克柏林。

1945年5月8日 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凯特尔元帅在柏林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欧洲战争结束。

1945年5月24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红军将领，在讲话中热烈赞颂苏联人民在爱国自卫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

1945年6月5日 苏、美、英、法四国在柏林发表关于管制德国的联合声明。

1945年6月24日 斯大林出席莫斯科红场胜利大检阅。

1945年6月25日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胜利大检阅的参加者,并发表演说。

1945年6月27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斯大林最高军衔——苏联大元帅称号。

1945年7月17日—8月2日 斯大林参加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的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会议。

1945年8月6日 美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9日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两地死伤近20万人。

1945年8月8日 苏联对日本宣战。

1945年8月9日—9月2日 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本作战,进行远东战役。

1945年9月2日 日本在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5年9月2日 斯大林向苏联人民发表广播讲话,宣告对日战争胜利结束。

1945年9月3日 斯大林就对日战争胜利结束,向红军部队及海军舰队发布命令。

1946年2月9日 斯大林对选民发表历史性的演说,指出一个预计在15年至20年间完成的宏大的工作纲领,工业生产要比战前提高两倍。届时,每年要生产钢6000万吨,煤炭5亿吨。

1946年2月25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再次任命苏联大元帅斯大林为苏联武装力量人民委员长及苏军最高总司令。

1946年3月18日 最高苏维埃通过斯大林主持制定的第四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要求到1950年把工业生产提高到战前水平的148%。

1946年3月19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批准斯大林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及苏联武装部长。

1947年12月14日 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签署苏联部长会议与联共(布)党中央关于实施市制改革及取消粮食品和工业品的配给制的决议。

1948年8月2—23日 斯大林接见美、英、法三国讨论柏林问题的代表。

1949年2月28日 斯大林和马林科夫签署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关于自1949年3月1日起降低日用品价格的决议。

1950年12月 战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提前于4年零3个月完成。1950年的工业产值较战前的1940年增加73%,新建和恢复大企业6000个。

1952年 斯大林发表并出版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探讨了政治经济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

1953年3月5日 斯大林因病逝世,终年73岁。

作者后记

斯大林是继列宁之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最重要的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执政时间最长，前后达 30 年之久。斯大林生活的时代，是历史上一个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在这个时代，不仅俄国的生活改变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世界的变革。

当列宁在世的时候，斯大林作为苏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经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反对沙皇制度和武装夺取政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十月革命以后，又为保卫无产阶级的革命成果，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国内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斯大林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工程师，这里所取得的一些成就，和所发生的一些问题和错误，无不打上他的印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希特勒以闪电战方式占领波兰，继之进攻北欧，随后又侵占了荷兰、比利时、法兰西等国。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法西斯竟撕毁条约向苏联发动突然进攻，在这严重关头是斯大林领导苏联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军民的最高统帅，而且为促进和巩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了大量工作，为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斯大林在为苏联人民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犯了很多严重错误。主要是：他在党内外斗争中，有时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肃反问题上犯了极为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错误地处理和迫害了不少好人；在国际共运中也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等等。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运造成了不可低估的损失。

在这本书里，笔者并不想对斯大林的一生和整个“斯大林时代”进行全面的剖析，而主要是写了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为苏联人民和党的领袖，作为苏军的统帅，他是如何领导千军万马，如何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进行全民战争的；不仅描绘了他在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大战以及攻克柏林等重大战役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伟大统帅的形象，而且也写了他在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上的伟大政治家的风采。在写他的成就的同时，也写了他的失误，特别是在战争初期，由于他对战争的突发性估计不足，缺乏及时的战备动员，使苏军蒙受了重大损失，以及后来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他又如何以坚韧不拔的意志领导全国军民扭转战局的。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笔者为了弄清斯大林在各个时期的情况，曾先后查阅了上千万字的中外文史料。其中主要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斯大林全集》、《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以及曾在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工作过的伏罗希洛夫元帅、朱可夫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什捷缅科大将等人写的战争回忆录。此外，还有欧美国家出版的有关二次大战、苏联和斯大林的一些书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中的《激战列宁格勒》、《保卫莫斯科》及《攻克柏林》等章节，主要参考、引用了朱可夫所撰写的回忆录。与此同时，笔者还和一些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和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进行过广泛的交谈，力求排除片面性，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表述；但由于笔者政治水平和历史知识的局限，难免有不妥或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解力夫

1987年10月于北京

